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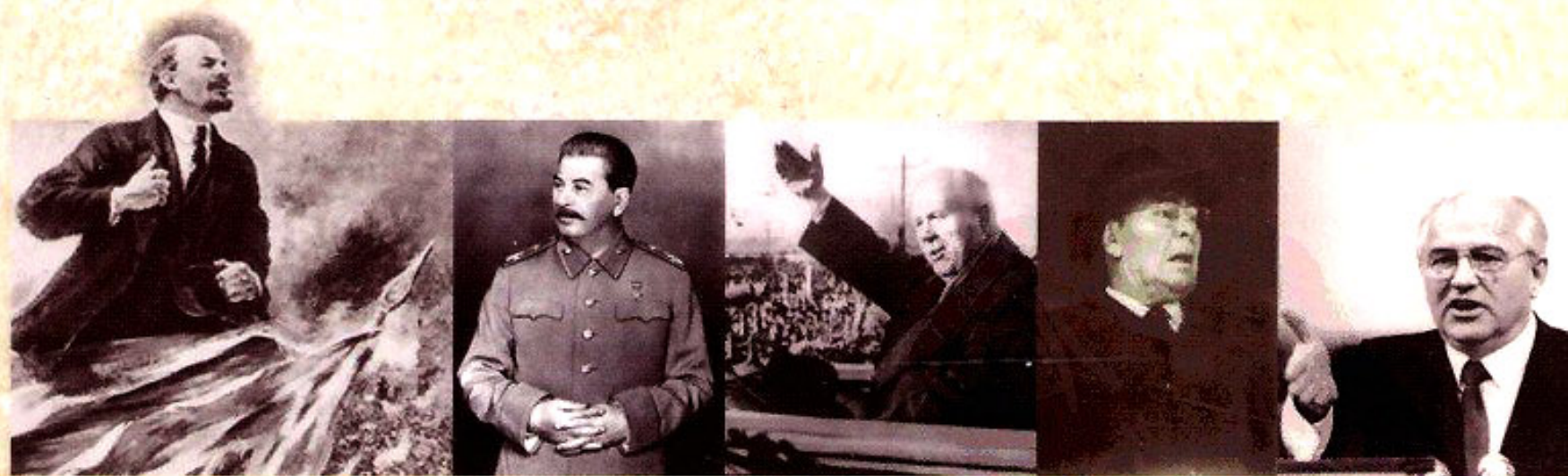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下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新华出版社



THE TRUTH ABOUT THE SOVIET
UNION: REFLECTIONS
ON 101 IMPORTANT
QUESTIONS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下

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 陆南泉等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10

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I. ①苏… II. ①陆… III. ①苏联—历史—研究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145 号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主 编：陆南泉 黄宗良 郑异凡 马龙闪 左凤荣

责任编辑：刘 飞

特约编辑：江建明

封面设计：王小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08

字 数：15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404 - 9

定 价：246.00 元（全三册）

温馨提示：本社“新华版短信书友会”新书直订 发短信至：13651277005

本社图书策划中心诚征品位畅销选题 发邮件至：xhchzx@163.com

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目 录

序一	阎明复 (1)
序二	李凤林 (3)
前言	主 编 (1)

第一编 十月革命与列宁时期

1.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3)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16)
3. 列宁为什么说俄国苦于资本主义不足?	(34)
4. 二月革命真相如何?	(46)
5. 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夺得政权的?	(61)
6. 十月武装起义是怎样进行的?	(78)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84)
8.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如何发展变化的?	(94)
9. 什么是军事共产主义, 其后果如何?	(106)
10. 新经济政策及其意义和教训是什么?	(120)
11. 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夭折了?	(139)
12. 列宁是怎样认识与发展党内民主思想的?	(159)
13. 列宁“政治遗嘱”产生了怎样的风波?	(170)
14. 谁是保存列宁遗体的始作俑者?	(180)

第二编 斯大林时期

15. 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	(191)
16. 如何评价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政策？	(214)
17. 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	(242)
18. 如何认识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大清洗”运动？	(263)
19. 20 世纪 30 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280)
20.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苏联缘何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	(286)
21. 斯大林是怎样控制意识形态的？	(301)
22. 斯大林模式是怎样形成的？	(311)
23. “苏联模式”是“可疑”的“假命题”吗？	(329)
24. 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336)
2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344)
26. 布哈林及其理论的真相如何？	(354)
27. 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367)
28. 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吗？	(391)
29.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质及其危害是什么？	(399)
30. 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408)
31. 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与协定？	(426)
32. 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东方战线”？	(444)
33. 如何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在二战中的作用？	(458)
34. 为什么说了解战后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认识赫鲁晓夫 “解冻”的钥匙？	(479)
35. 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493)
36. 外蒙古是怎样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503)
37. 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519)
38. 冷战与斯大林有何关系？	(539)
39. 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的后果是什么？	(555)
40. 如何评价斯大林在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	(567)

41. 斯大林最后同意打朝鲜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589)
42. 缘何必须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 (606)
43. 俄罗斯在重新评价和肯定斯大林吗? (620)

第三编 赫鲁晓夫时期

44.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的“解冻”? (645)
45. “贝利亚事件”真相如何? (669)
46.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 (687)
47. 能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忘恩负义”吗? (717)
48. 如何解析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 (734)
49. 如何看待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问题? (747)
50.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何在? (757)
51. 赫鲁晓夫上台后缘何首先抓农业改革? (777)
52.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 (799)
53.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813)
54. 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国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818)

第四编 勃列日涅夫时期

55. 如何在苏联历史上给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定位? (827)
56.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缘何停滞不前? (847)
57. 为什么说苏斯洛夫是“灰衣主教”? (865)
58.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878)
59. 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大搞军备竞赛? (895)
60.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 (911)
61. 勃列日涅夫是如何扼杀“布拉格之春”的? (926)
62. 苏联入侵阿富汗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什么? (939)

第五编 戈尔巴乔夫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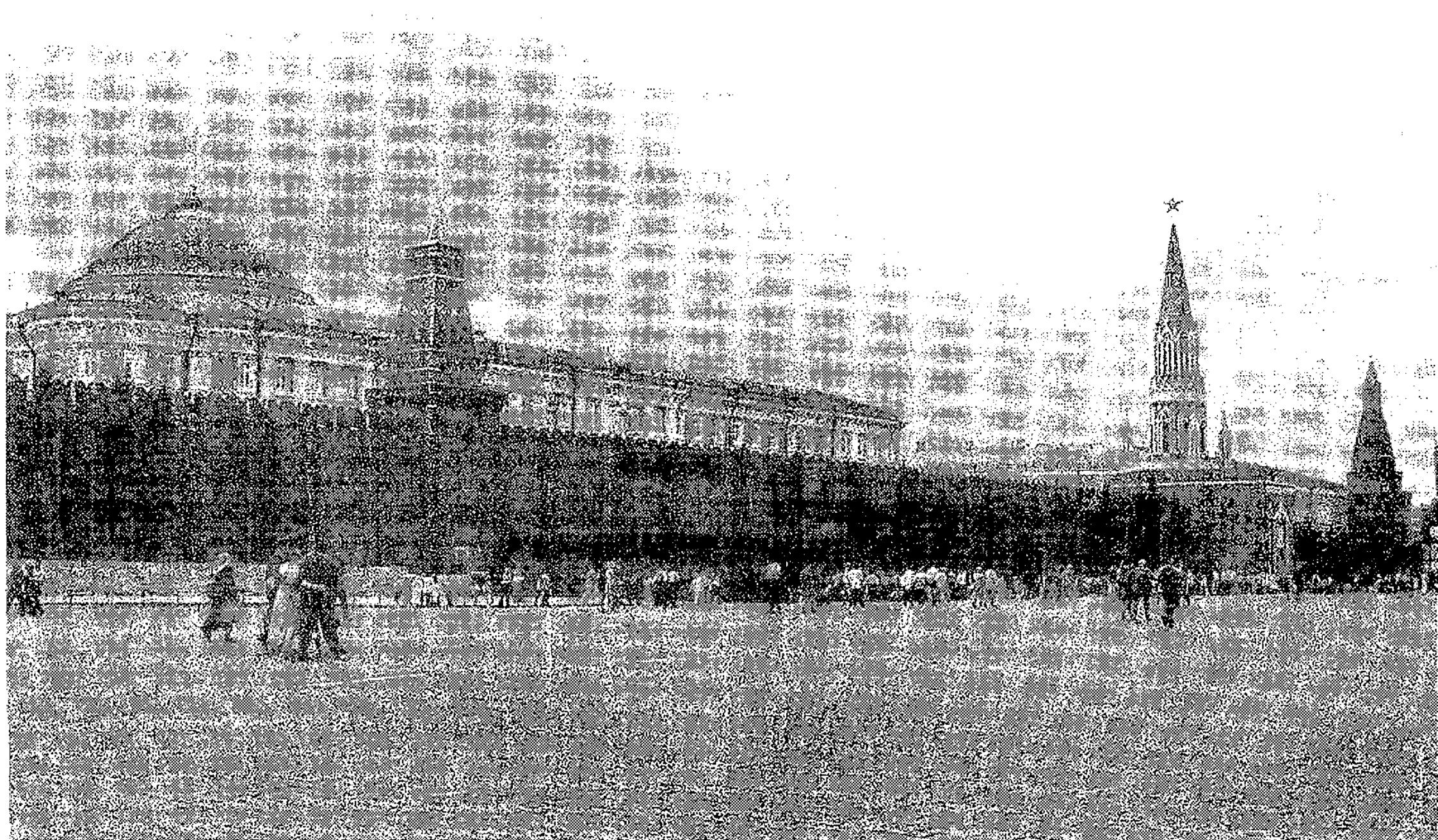
63. 戈尔巴乔夫缘何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959)
64.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 (978)
65.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外经济体制进行了哪些改革? (993)
66. 戈尔巴乔夫是怎样当上最高领导人的? (1005)
67. 戈尔巴乔夫缘何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022)
68. 所谓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美国大学讲话的真相如何? (1034)
69. 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1042)
70. 戈尔巴乔夫在中苏关系正常化中起了什么作用? (1057)
71.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如何变化的? (1070)
72. “8·19”事变的前因后果如何? (1081)
73.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联盟解体中起了什么作用? (1114)
74. 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 (1134)
75. 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与苏联剧变的关系? (1144)
76. 邓小平是如何看待和应对苏东剧变的? (1165)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

77.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179)
78.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1187)
79. 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1204)
80. 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1216)
81. 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1227)
82. 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1246)
83. 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1263)
84. 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1277)
85. 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1288)
86.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1299)

87. 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1314)
88. 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1337)
89. 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1350)
90.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1376)
91.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1390)
92. 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1416)
93. 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1425)
94.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1435)
95. 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1446)
96.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1457)
97. 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1465)
98.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1474)
99. 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1483)
100. 《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1522)
101.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1559)
 苏联大事记	 (1579)
本书作者简介	(1658)

第六编 苏联剧变的原因 与教训



77. 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陆南泉

对于 1991 年苏联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各种提法，如演变、解体、制度倾覆、联盟消亡等。这里笔者用“剧变”一词。所以用这个词，主要考虑到苏联变化的巨大、突然、内容广泛、深刻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重大。苏联剧变所包含的内容有：（1）列宁亲手缔造的、有 93 年历史和拥有 1800 万党员的、在苏联已执政 74 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在短短的时间被冲垮，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2）存在 69 年之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原有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3）苏联解体后宣布独立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地宣布彻底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决裂，朝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方向的体制转轨；（4）俄罗斯和其他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各共和国，不再坚持原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发展方向，体制改革也不再是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是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至于具体目标模式，对于俄罗斯来说也绝不是一次剧变就能最终确定的，至今，俄罗斯体制转型尚未结束

苏联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标志着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和以美苏两极的旧世界格局的结束。

关于苏联剧变的原因问题，很多人已作了不少论述，但是，至今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从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也不相同。

苏联剧变的原因十分错综复杂，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种种问题。在现有的有关论著中，分析剧变原因的侧重点亦各不相同，有的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有的强调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有的强调经济因素，有的

强调民族问题，有的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的作用，有的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加以分析，有的则强调体制或制度因素的作用，亦有人把苏联的剧变归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失误的结果等。

应该说，以上各种因素，对苏联的剧变都起了作用。问题是，如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找出苏联剧变的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说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① 因此，在分析问题时，不能简单地把各种有关的因素，甲乙丙丁地加以罗列，不分主次，更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苏联剧变过程中呈现出的种种现象，任意夸大或缩小某个因素的作用。

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从时间来讲，苏联的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时期——1991年。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并且还应看到苏联的剧变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在体制改革政策方面的失误有联系。但笔者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②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② 本文就这一问题提出观点，考虑到如果详细论述，与本书其他文章会有很多交叉，因此，只作简单分析，主要是提出一个基本看法。

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① 我们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四部分，专门论述了加强制度建设问题，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强大的工业国，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到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改造。但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这种模式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一是高度的个人集权，在党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斯大林时期，苏共成为个人集权的政党。这样，苏共在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从而把列宁创造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殆尽。二是严重破坏法制，滥杀无辜。斯大林往往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与消灭任何一个政治反对派，实行个人专政。三是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成为有名无实的形式。四是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五是长期忽视党的建设，苏共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从而很难保持苏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而是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六是在对外政策与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国主义与大党主义。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是：第一，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第二，实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到1932年在工业中99.5%是国有企业。第三，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利益难以结合，从而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约了企业与生产者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第四，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化与管理方式的高度行政化，不可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必然排斥市场的作用，缺乏竞争，从而长期使产品质量不能提高，改变不了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浪费，而伴随浪费而来的则是低效率的经济，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

斯大林执政的30年，从政治上讲，斯大林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再拿经济来说，斯大林时期大规模的饥荒就发生两次，一次是30年代初集体化时期，一次是二战后。每次饥荒饿死的人数以数百万计。1950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为6480万吨，1913年沙俄时期为7250万吨，同期，肉类分别为490万吨与500万吨，人均谷物为447公斤与540公斤，畜产品为27公斤与31公斤。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牛、马、绵羊的头数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粮食产量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斯大林作为苏联高级领导人，只有1928年到西伯利亚农村去过，目的是推行以强迫的手段征收农民存粮，在后来的长达20年里再也没有去过农村。这能搞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吗？由于超高速的工业化、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使经济结构严重畸形，严重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而苏联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进行一些修补，这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失去了动力机制，最后走进死胡同。正如普京讲的：“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① 所以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②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胡绳同志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

① 《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①

我们仅从上面对有关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体制简单分析可以看到，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因此，我们可以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方面不反映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因此，这一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正如胡绳同志指出的“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②

对几个质疑问题的回答

第一，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有人引用邓小平 1992 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无疑是重要的科学结论，我们党应该遵循这一教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

① 《中共党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② 《胡绳全书》第 3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5 页。

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拿苏共来论，它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苏联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这里还应指出的是，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上述讲话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这两个社会主义“叛徒”，这并不符合史实。有人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 2000 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 74 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作者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不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

第二，有人撰文质问笔者，为何把“苏联解体的罪过往已去世达几十年之久的斯大林身上一推了之”。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第一，笔者从来没有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反映这模式的体制。笔者一直强调要从制度、体制层面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第二，斯大林逝世已达几十年，为何还要归罪于斯大林。这里，前面已说过，不是归罪于斯大林个人，而是由他建立的制度与体制。这是因为，斯大林逝世后虽然历次改革，但按斯大林观点建立的苏联模式，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只要对苏

联问题稍有研究的学者，都会看到这一历史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考察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必须从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寻找，否则不可能说清楚问题，抓住问题的实质。在保加利亚主政 35 年的日夫科夫，谈到苏东剧变原因时指出，最让人失望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为像斯大林著作中所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死后一直保留下来。这里指的是斯大林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原则。而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①

第三，有人质问说，“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我国也产生过巨大影响，我国也长期实行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也没有发生类似苏联剧变的悲剧呢？”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已讲得很清楚，主要是由于：一是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同志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就指出：“如果现在不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② 他还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③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④ 二是改革体制过程中，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排除“左”的与右的两方面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在理论上与时俱进，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设想，不搞改革，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按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一套走下去，那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坦率地讲，有人提出的上述问题，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应该说，斯大林模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中国要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从理论上与斯大林模式基本上划清了界限，在实践上对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了重大突破，是对这一模式的根本否定。中

① 参见（保）托尔多·日夫科夫著、吴锡俊等译：《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6—229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学术界围绕改革正进行深入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苏联模式，如何认识它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一直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正当中国深化改革来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之际，正当十七大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际，正当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之际，如果有人不顾历史事实，竭力颂扬、美化早已被历史证明已失败了的苏联模式，并为斯大林美容，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我国深化改革、干扰我国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步伐的作用。这是十分值得我们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笔者深信，只要我们客观地、认真地分析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本质特征及存在的种种弊端，从中吸取教训，并坚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与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等思想，只要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以苏联模式与中国改革前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为标准，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础把以人为本视为最高价值取向，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如富裕、民主、自由、人道、公正、文明、和谐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创新社会主义作为继续深化改革为目标，把握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那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顺利实现。中国将以良好的、“够格的”、显示强大生命力的、对世界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不同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这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解脱，一种解放。

78. 究竟是何种制度性因素导致苏共垮台？

李 凌

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近2000万名党员、独掌大权74年的大党轰然倒塌，苏联国家也因之瓦解。举世各界人士在震惊之余，纷纷提出猜测，进行研究：是什么原因使这种事情能够发生？

对苏共垮台、苏联发生剧变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有人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是他背叛社会主义的结果，有人甚至把戈尔巴乔夫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这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执政开始，几十年的高压控制及长期的腐败，像火山喷发后结成的熔岩，积累起来，压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虽然发现了问题，但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即1989年前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曾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只有4%，而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项调查说明苏共已严重脱离了群众，尽失人心，遭到了普遍的唾弃。

应该说，这才是使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

造成这种情况，苏共历任的第一把手们当然不能辞其咎，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应从制度上去找。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①

那么，究竟是何种制度上的因素促使苏共遽然垮台呢？

正如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久加诺夫指出的，苏共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

何谓“三垄断”？

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下面我们通过苏联的情况对此作一些分析。

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苏共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只有在一党专政或变相的一党专政情况下才能发生。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期间发生的一些劣迹就是这种垄断的恶果。

由于苏联和第三国际对舆论的控制，过去人们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以后才初步揭开了帷幕的一角，以后又陆续暴露了一些真相：

在十月革命期间，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并负责军事指挥的主要是托洛茨基，此外其他领导人还有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而斯大林只是该领导集团中的一人。但当他一旦掌权并坐稳了江山以后，就以种种借口，逐一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些革命元勋。托洛茨基虽已流亡国外，斯大林也没放过他，1940年还是派特务暗杀了他。还在“托派”的罪名下，苏联国内外包括中共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均被无辜杀害和残酷迫害。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也被诬陷为“托派”在苏联被整死。

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举总书记时，斯大林有300多张反对票，而基洛夫却只有3张反对票。卡冈诺维奇向斯大林汇报了投票的结果，斯大林下令只保留3张反对票，其余的反对票就地销毁，并向全党全国隐瞒了真实情况。为此，斯大林对苏共十七大的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怀恨在心，在之后的1937—1938年大清洗中，十七大1961名代表中竟有1108名被捕，而十七大选出的139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人（占 70%）被枪杀。30 年代 767 名包括有元帅衔在内的陆海军高级军官中，被镇压的有 512 人，占全体人数的 66%，其中大清洗运动开始前的 6 名元帅中，有 4 名被处决，195 名师长中有 110 名被杀掉，220 名旅长中有 186 名被杀掉，海军舰队司令员只留下 1 人。另外，航空国际委员会和化学委员会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清洗，一大批科技人才和社科人才被杀掉。从 30 年代初到 50 年代初，肃反运动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从戈尔巴乔夫时代（1987 年开始）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有 2000 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天才的学者维尔纳茨基院士说是 1600 万，而我倾向于 2000 万。全部问题在于，在这些数字中目前还没有把那些尚未正式恢复名誉的人计算在内。例如那些被从其居留地流放到遥远地区的农民。”同时，大清洗还严重毒化了社会气氛，也毒化了人的心灵。社会上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感。连身任政治局委员高位的赫鲁晓夫，每天早上出门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回家。不少人为了自保而捕风捉影地向当局告密，也有人在刑讯逼供下，提供伪证。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并频繁地大规模更换干部，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改革方面取得某些成就，其领袖地位也渐趋稳固，勃列日涅夫便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在报刊、书籍和广播中，大量传播他的语录和指示，任意拔高领导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肆宣扬当前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状，掩盖和粉饰种种失误和缺点。对涉及国内外局势的重大问题也只有极少数人专断独行。像 1979 年底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这样的大事，也只由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和乌斯季诺夫（国防部长）等几个人作出决定。此外，勃列日涅夫晚年在挑选和任命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存在严重的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现象。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他包庇重用其女婿、前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丘尔巴诺夫，此人长期以来受贿和滥用职权，欺压干部、群众，却一直未被追究，直至勃列日涅夫死后，才受到法律的制裁。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

很专断。

在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也比比皆是。苏联著名学者阿法纳西耶夫在《别无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苏联“在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的口号下，领导者们事实上自我宣布为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地区的‘家长’，他们取得了不受任何监督、高居于法律之上和处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里，称勃列日涅夫时期为“停滞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

高度集中的体制导致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盛行，人身依附普遍存在。

在个人崇拜条件下，斯大林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他的一言一行都被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他的独断专行、滥用权力被看成是合理合法的。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在她的记述中有两段话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在个人崇拜形成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她写道：“临到末了，他（斯大林）周围只剩下一些噤若寒蝉的、忠实的、害怕得两眼发滞的契卡们和那随时准备‘不假思索就跳进火里去’的‘谦虚的’同谋者们。”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苏联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斯大林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周围的人大多对领袖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求保全既得地位，或谋求信任与提拔。阿利卢耶娃在《仅仅一年》一书中说，当她的父亲斯大林在世时，从贝利亚到马林科夫、米高扬，“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

质还是委派。许多地方和部门未能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的现象。斯大林对此曾指出：“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的总结报告也指出，干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是：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些正直的、通晓业务的工作人员，因他们对缺点不肯容忍而使领导感到不舒服，结果便在各种借口下被排挤出去，而代之以品质可疑或者完全不称职但被一些领导者认为随和可亲的人”。于是，“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这说明，包括斯大林、马林科夫在内的领导人，对这种制度的缺陷是认识的，但他们无法也无意加以改变。

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前面说的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项目……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人民公仆”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而绝大多数被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应当说，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和苏联建国初期，苏共领导人还多少能保持一些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特权现象较少。斯大林本人在生活上也保持着简朴的作风，他女儿阿利卢耶娃说：“父亲只穿一件寻常的夏布军衣过夏，而过冬就是一件寻常的毛料军衣和一件已穿了15年的大衣，还有一件怪模怪样的皮领大衣，革命后就穿着它，再加上那顶帽子。”一件大元帅服也打了补丁。斯大林的妻子娜加·阿利卢耶娃去一个工业学院学习时，不仅不坐汽车上学，甚至还不让其他学生知道她是谁。1932年她自杀去世后，女儿回忆说：“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朴素的。”

但是，领袖个人一时的朴素改变不了整个制度。因为斯大林掌握着对他的下级干部的升降、任免、赏罚以至生杀之大权，因此许多人就千方百计巴结他、讨好他，以便自己能得到提拔和多种好处。渐渐地斯大林就习以为常，认为理应如此了。

斯大林手下的人为他在南方“建过好几座别墅”，斯大林有许多兼职，每个兼职每个月都会送来一袋钱，多到斯大林“连封条都懒得拆开”，反正整个国家的财富都几乎等于是他的，所以负责管理他的家庭生活的人为了讨他欢心，开支毫无节制，“犹如是把政府的钱往阴沟里倒”。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于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立即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阿利卢耶娃说，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除了斯大林及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之外，30年代初期开始，高级干部包括汽车、别墅、仆役在内的一切家庭生活费用由政府开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

这里以一位中央某工业部部长及其家庭在生活上所享受的特殊待遇为例。部长月薪是27000卢布，据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沙图诺夫斯卡娅说，这大约比教授的薪水高6—7倍，比工程师、医生、熟练工人的工资高20—25倍。此外，还会经常得到“红包”。因为不便于无限制地提高干部的工资，于是当局想出了发“红包”这样一个巧妙的办法。所谓“红包”就是一个封好的装钱信封，这里头装了多少追加的钱，按什么样的秘密名单分发，出自哪一项基金，普通老百姓是无从知道的。关于这个“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在1976年8月18日对一位采访者曾经谈到过。他在谈话中不仅证实了这种“红包”制度确实存在过，而且指出这一制度是在二战后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实行的，也就是“用封口的小包给党内和军队领导干部送一大笔钱”。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成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40—50人之多，他家里

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曼·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苦奋斗的状态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他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在得势的几十年间，一些掌权者把国有资财变成了自己的家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据1962年5月19日的苏联《红星报》报道，列宁格勒一个军用工厂的领导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工厂所有关键性职位上，把国营企业变成了“私人企业”。3年内，仅出售自来水笔一项就贪污了120万卢布。另据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队伍更加壮大。据俄罗斯学者最近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万—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

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做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苏共蜕变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权力异化”。

所谓“权力异化”，概括地讲，就是：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在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入党者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如果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就会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权力欲越膨胀，思想信仰就越少。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特权，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苏联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1）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靡费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2）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和其他商品。（3）特教权。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4）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6) 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峰的官员还在国家银行有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而且“高级官僚已经形成一个特定的阶层，甚至是一个由那些具有自己的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人们所构成的帮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个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特别是在 70 年代，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许多官僚和企业领导，在党政机关和外贸部门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银行经理的宝座。他们依靠手中权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敛财富。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这一阶段，苏联的权贵阶层以通过权力支配国民财富，加速对国有资产的隐性占有、权力人格化为基本特征。从 1987 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1988 年又通过企业法等文件，使这个时期的部长、副部长合法地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

为官僚支配。同时，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权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对此，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曾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反对苏共特权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便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的国家制度消失了，造成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他们利用苏联集权体制为他们占有财产所创造的便利，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从权贵阶层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

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实际上是一种对思想的钳制，它的最初表现形态就是宣称：只有党的理论、理想、文件才是真理（进而又发展为凡是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言论、指示都是真理），必须无条件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朕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

这种情况，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斯大林极端专横、粗暴，导致受迫害者以千万计，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几十年以后还能察觉到。但是当时斯大林被奉为神，他的一言一行对苏共、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神圣的指示，是绝对正确的真理。

赫鲁晓夫虽然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自己当权后也培养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让自己的女婿阿朱别依当上苏联政府报纸《消息报》的总编辑，并掌握了苏联的新闻局，以求严格控制舆论。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用阴谋的手段，搞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登上了第一把手的宝座以后，也继续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前苏联《真理报》主

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工做好像十分光荣，但是“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真诚坦白。但就是这种与现实不符的所谓“领袖的文件”，却要全国官员和人民当作真理，当作教条一样顶礼膜拜，不许有半点怀疑，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苏共也是采取垄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

斯大林的许多观点和做法，完全是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但是却被认为是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多次发动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出击”，批判德波林学派，到了30年代中期，配合政治上的“大清洗”、“大屠杀”，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进行“大清洗”。到战后初期（1946—1952年），在文化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的大批判、大斗争，使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否则，各种批判和打击会接踵而来。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说，“战后进行意识形态运动，如反对西方的‘卑躬屈膝’，反对‘世界主义’，反对文学、电影、音乐、遗传学、语言学和其他领域中的各种‘偏向’，一个接着一个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看到，一些全然无辜的人如何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挞伐’，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经验已足以理解这些事情。许多人对这些事情深感难受，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公开表示反对——这几乎就等于自杀”，“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只能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引用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多五六倍）的、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慎重——要审，不然就可能遭遇到很大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

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① 迫于强大的压力，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扮演“夜间人”的角色。他们白天处处注意与官方保持一致，到夜间则过自己的生活，与家人和朋友议论时政，揭露时弊，抨击权贵，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私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生活的不满。

在苏联，很长时期内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给社会主义、共产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群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群众无可奈何，并且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于是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因为苏联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任何敢于揭露问题真相的公民或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满足于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自己升官的目的。

由于垄断真理和对思想的钳制，对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就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和剥夺公民权等，这引起一系列灾难性恶果。

第一，思想僵化，教条盛行。列宁逝世后，苏共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进而又将它变成了“宗教”。以后，则把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文集》当成“宗教”教科书。由于领导者思想僵化，容不得任何新思想、新理论、新见解，“御用”学者们看领导者的脸色行事，以照抄教条，编造大话、空话、假话为能事；广大学者则慑于专制的恐怖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在十月革命后的70多年中，尽管世界上和苏联社会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① （苏）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但在思想理论和社会科学学科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仅就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来说，殖民主义崩溃了，发生了两次科技革命，高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阶级的面貌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可是对于这一切，作为本应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老一套。

第二，禁锢思想，毒化氛围。斯大林逝世后，那种动辄镇压的恶行收敛了一些，但指导思想和专制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没有丝毫改变，仍然实行文化专制，压制不同意见，毒化政治气氛。

对于一些在政治上与官方持不同意见者，除了动用充当“思想文化警察”的宣传部不时地打压外，还动用专政工具克格勃，指令基层党组织和居民区的群众予以监视，鼓励“揭发、检举”，检查私人信件，窃听、监控电话。这样一来，一方面造就一些小特务、告密者，他们为一己私利，不惜昧着良心，陷害那些敢讲真话的公共事务代言人，其影响便是社会道德沦丧；另一方面是广大干部和群众随时提防遭人揪到辫子，害怕被监视、告密而噤若寒蝉。同事、朋友间乃至家人之间也不敢讲真话。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一起按着上面定的调子唱颂歌，说空话、套话、废话。表面上，好像风平浪静，高度一致，实际上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后面，掩盖着即将喷发的火山。邓小平说得好：“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①

第三，扼杀精英，庸才辈出。由于领导者拒绝逆耳之言，听不进不同意见，自然就会对各路精英和有识之士或拒之千里，或压制扼杀。人们看到，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或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提拔到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局成员，其智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都很低下，与他们担当的职务要求很不相称。这样的人之所以能爬到党的领导高层，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或有什么显著业绩，而是由于能够紧跟上司，亦步亦趋，在多次政治风浪中能够巧避锋芒，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因为他们压根儿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领导者之所以喜欢这种平庸之辈，除了听话、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外，还因为免除了强者对自己权力的挑战。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145页。

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也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苏联的垮台，不正是这样的吗？由于思想僵化，生机磨灭了，社会停滞不前了。而领导者还不愿意承认这一严峻的现实，转变思路，探索改革，激活生机，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抵制改革，维持现状。社会上经济停滞，民族矛盾，生态破坏，教育和健康状况恶化，很大一部分人群陷入贫困等等，在领导者眼里似乎都不存在。于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联崩溃于一旦。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使问题无法解决

“三垄断”使苏共获得了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布尔什维克突然从被压迫者变成了领导者。但是如何治理好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庞大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并没有做好治理国家所必需的思想、组织、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准备。由于文化和政治素养不高，许多党员没有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观念；不少干部在政务活动中不断表现出了诸如专横跋扈、骄傲自满、争权夺利、腐化堕落等历代统治者常见的恶习。为此，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的国际工运活动家卢森堡曾经不无忧虑地指出：“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它们中间实际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②

对于上述严重情况，列宁也早有察觉。为了有效制约政治权力的过分集中，列宁曾于1920年9月4日苏共九大召开的前夕，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党发出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② 卢森堡：《论俄国革命》，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一封公开信，提出设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的建议。几天后，此建议在苏共九大获得通过。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违反党纪现象以及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它独立于中央委员会，直接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同年，列宁又提议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会”（又称工农检查院，由斯大林领导），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它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很快又变成一个有浓厚官僚习气的机构，因而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列宁逝世后，苏共十四大在斯大林的操纵下，作出了削弱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的决定。大会规定只有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各5人有权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且仅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央监委委员可以参加“一切”党的会议的规定。

1929年，苏共开展了“清党”活动，这本应是一个打击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一切腐败行为的活动，但却在斯大林领导下，利用监委去打击不同意见者。许多敢说真话的党员被清除出党。

1934年1月，苏共召开了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对斯大林的崇拜空前高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撤销了以往历届《党章》中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章节，取消了监察机关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决议的规定，致使监察机构完全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再也无法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权。而且新《党章》还规定，它（中央监委）对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定均无权参与和监督，而只能对这些决定的贯彻和执行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列宁所倡导和设计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党内监督体制已被完全“修正”，致使党内民主气息越来越少，封建家长式作风和官本位现象日益盛行，党内官僚主义极度泛滥。

1953年，赫鲁晓夫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后，曾为克服斯大林专制的后果，恢复正常的政治制度和党的监察制度，作过一些努力。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合并。但由于赫鲁晓夫逐步以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取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往往不顾别人的意见，专断地发号施令，党的监督对他本人来说，仍是空白。

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掌权后，也曾对党和国家监察机关进行过一些形式上的变革。但由于勃列日涅夫不仅安于现状，而且实际上更热衷于旧的体制，使腐败现象更加大规模地泛滥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苏共实行的是“老人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没有多大的革新，尽管从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

一直存在（1981年各级监察机构共4600人，人民监督员达1000万人），但实际上这些监察机构已形同虚设，只是为某些人就业提供了不错的“饭碗”。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起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他能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健全法制，强化党的监察体制以遏制腐败。1986年2月25日，苏共二十七大通过决议强调：“党内不应当存在不受监督和拒绝批评的组织。”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监督不应该有禁区的原则。1988年，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大会指出：“建立一个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是非常重要的。”1990年3月，苏共郑重讨论了恢复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即使中央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地位平等，并制定了《中央监察—检查委员会条例》。随后又规定，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能同时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能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苏共二十八大还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条例》，并详细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

从表面上来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监察制度，特别在苏联解体前夕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制定的监察制度，似乎又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察体制。但监察工作从来都不是脱离整个党的工作，以及党的一贯主张和政治路线的，特别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孤立存在的。由于苏共长期削弱党的监督体制，党内民主和监督很不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太深的伤害，大多数党员和群众对苏共迟到的监督体制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步骤，致使党的队伍涣散，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导致政治局势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监察制度，也挽救不了苏联党和国家垮台的命运。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苏联的官僚阶层长期以来已经通过种种不正当甚至不合法的手段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这些人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绝对不会赞成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因为民主改革就会限制他们的特权和权力，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如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等借口，顽固地阻止民主改革。于是，他们就彻底丧尽了人心，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很少有群众出来支持苏共。解散苏共并没有遇到任何抵制。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了。

当年列宁把遏制腐败的希望寄托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以为，由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可以和执掌党权的中央委员会长期平起平坐，并监督制约

它。但列宁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总书记掌握无限的权力。”正因如此，总书记（以及各级党委的第一把手，下同）可以操纵选举，使选出的代表不代表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的意志，而成为总书记的驯服工具，这就是监察委员会逐渐成为总书记的“下级”的原因。苏共长期坚持一党专政，任何不同声音和发表不同声音的人，很快被镇压下去。执政党和官员们即使违法违纪，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有效制约它。人民群众长期积压起来的愤怒，一旦爆发，便会摧毁整个旧制度，使国家改变颜色！

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本文写作时得到中央党校刘鹏教授提供的帮助，特此感谢。）

79. 为什么评价苏联历史要坚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

黄宗良

近年来，苏联问题的研究又有点热闹起来。出现不同声音本属正常现象，而且不同“学派”之间也不是没有共同语言，但分歧是十分明朗的。

中国的“热”也可以说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但两国的“热”的背景却不一样。当前，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正处在关键时期，近年来时隐时现的争论集中起来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如何搞好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不管争论“双方”自觉与否，实际上恐怕谁也没有游离于这个大背景。

苏联剧变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论，才能逐步求得靠近真理性的认识。

促使苏联剧变的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 复杂系统，但根本上是体制问题

多年来，在评价苏联历史问题上的不同见解集中在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的问题上。促使苏联剧变的是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综合作用的总的“合力”。这里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对外政策、民族传统、历史因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大林体制（后来演变为苏联体制）的问题。其中有内因与外因，基础性、决定性的因素与非基础性的非决定性的因素的区别。

现在，研究苏联剧变根源的著作和文章很多，一般都会谈到上述种种因素，深入探究，就可以看到对根本的、决定的、关键性的因素的看法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个分歧涉及持什么历史观的问题。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特别突出强调的有：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个别领导人的背叛，背离马克思主义等。这些都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吗？当然是，而且是重要的。

西方，特别是美国向来有一些人视苏联为竞争的敌手，不论是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还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制度的层面上都是如此。确实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并且在苏东剧变中起着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对此仍然要有高度警惕。这里的问题是：第一，为什么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能在苏联起作用？根本问题还是苏联民主和民生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民众对此都满意，西方还有空可钻吗？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是否有利于民生不断改善的经济体制和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这是普通民众都理解的常识。第二，过分地强调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作用，很容易导致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怀疑和否定，而改革开放正是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战略。为什么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中国一些人得出对外开放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呢？原因就在这里。有的大部头文稿专门总结苏共亡党教训，什么都点到了，就是没有讲对外开放问题。这样如何同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划清界限呢？

我们的确面临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我们要否定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的观念，要坚持改革开放，因为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在同国际接轨中，又要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国家利益。任务是艰难而复杂的，但是倒退是不可能、也是没有出路的。

强调防止丧权亡党就必须使最高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自然也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培养和选择出这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斯大林的体制没有培养出这种人？说到底还不是一个组织制度和权力体制问题吗？还不是因为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缺乏、甚至遭到粗暴践踏的结果吗？在党员和民众缺乏切实的民主选举权利（委任制到处被滥用）、监督权薄弱、参与权、知情权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在干部严重脱离广大党员和民众，而且越

往上越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利益的“接班人”吗？还能有效杜绝那些口是心非、阿谀奉承、跟风赶浪、趋炎附势、心术不正的小人、奸人吗？还能避免出现脱离广大民众凌驾于社会之上、垄断国家经济、垄断真理的官僚特权阶层吗？十分明白，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就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充分的良好体制和环境。这里并不否认苏联各个时期都有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好干部。但是，就算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者呢？这里显然有着十分复杂的体制原因。我们当然不是简单地说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是什么“历史的必然”。就拿戈尔巴乔夫最后的独断专行，个人决定和建议苏共解散来说，难道不也是苏共长期存在的个人集权的必然延伸吗？

从苏共丧权亡党中得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是很正确的。共产党如果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其生命就会完结。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怎样丧失马克思主义阵地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制度和体制问题。试想想，在权力高度集中、个人高度集权、少数人垄断真理、个人崇拜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各个学科的学术是非问题也要由个别人、甚至最高领导人来裁定的体制下，在理论阵地到处是棍子、帽子、绳子，任何与传统观点或现任的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稍有不同的提法也会被打成“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还能指望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群众实践的深入而向前发展吗？在这种政治思想氛围中，唯上唯书保险，深入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危险，而少数善于察言观色、跟风赶浪、“左”右逢源、品德低下的不良“文人”则可以喊着马克思主义口号平步青云。经历过极左祸害的中国人，这种情况见得还少吗？没有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实践、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的体制和环境，还能坚持和发展反映社会规律、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吗？

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在唯物史观基本问题上的错误

应该看到，在研究苏联剧变的教训中，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用的倾向。这里涉及我们理论工作者熟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的 ABC 问题。在苏共搞社会主义的传统思路中，一直存在着如何摆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位置的问题。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都十分突出。从十月革命后开始就存在着搞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经济建设又以满足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出发点，政治建设在总体上说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进行，并以扩大民主为基本方向。列宁领导的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就是这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把政权、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夸大到总体上成为“决定”作用的地步。尽管苏共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抓的还是经济，在认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则基本上是倒置的，这就自觉不自觉地吧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权史观”、“唯政史观”，实际上是唯心史观了。当斯大林宣布“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通过强化无产阶级专政来使国家消亡时，他就违背了唯物史观；而赫鲁晓夫提出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反映的正是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这后一种思路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常常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政治”又被归结为“权力”；“权力”又被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①

“唯物史观”、“唯意志论”本来就是苏共搞社会主义中一个基本的观念错误，如果对此缺乏了解和认识，就难以全面总结苏共教训。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导致全面失控，全线崩溃，教训更为深刻。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由此引起的“问题”，的确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起因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在其上台3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政治体制方面。由于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的错误导致苏共丧权、苏联瓦解。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致使苏联广大民众对执政党完全丧失信心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此时期经济

^① 这种思路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极左猖獗的年代被推到极端。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就是典型表现，而“四人帮”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更是荒谬绝伦。现在，这种思潮不能说毫无市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老话重提。

连年滑坡，物资、特别是基本生活资料供应全面紧张，严重影响广大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

总结苏共的教训，很有必要牢牢记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最基本、几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懂的常识：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都首先要吃要喝、要住要穿……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一切从历史事实出发， 才能全面地评价苏联历史的事件和人物

在对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中，对几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重要历史事件（特别是对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问题）看法上也存在明显分歧。

在俄国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上，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也很突出，这与上述文化传统观念和缺乏民主的体制关系极大。但这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关于领袖与党、个人与民众的关系的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主要“领袖集团”的问题，把一部苏联史描绘成“两尊神”几个“鬼”决定了历史命运是极不恰当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领导卫国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工业化为苏联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奠定基础。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则不仅对苏联、也是对全人类的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两大错误即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则是不能轻描淡写的。这不是为追究个人责任，而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的教训，甚至可以说是总结人类文明建设的教训。

全盘农业集体化极大地破坏了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当然负主要责任。有人引用联共（布）十五大的决议和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说明全盘农业集体化是“苏共领导集体决定的”[此时不称“苏共”，称联共（布）]；引用莫洛托夫后来的谈话说明肃反运动中党的决定“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显然，作者对这段历史

有些事实太不了解。

1927 年联共（布）的十五大决议提出“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十五大后来被称为“集体化代表大会”，实际上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着重讲的是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很少提及集体农庄，此后斯大林还多次承认小农经济仍然存在发展的潜力。并且集体化采取什么形式，是一个重大问题。是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逐步地、自愿地从供销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呢，还是采取急速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庄运动，这是有重要差别的。1928 年 1 月，斯大林西伯利亚之行把建立集体农庄提到首位，并且提出要让集体农庄布满全国各地。^①然后把个人做出的这一重要方针的改动用电报的方式通知中央。1929 年 12 月，斯大林又在一次谈话中，提出“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而此前党的政策是“限制富农”。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人都明白，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意味着什么？这算不算“方针性指令”？但是如此重大的政策转变的提出，不是党代会，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总书记个人。

这种急风暴雨式的、违背自愿原则的全盘集体化运动，背离了马恩、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方针，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苏联农牧业长期陷于停滞和危机之中。苏联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谷物年均产量均低于 1927 年。1953 年，粮食和肉类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沙皇时代的 1913 年。对于全盘农业集体化，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必须承认历史事实。有些专门谈论苏联问题的文章不承认这种事实。其实，斯大林本人当时对此就有过反思。他在十七大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就公布了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前后的牲畜头数比较。他提供的统计表表明，1933 年苏联的马、牛、猪比 1929 年减少一半左右，羊减少了约 2/3。^②如此严重的情况，还不能视为“严重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吗？有的文章认为这样评价苏全盘农业集体化是“把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截然对立起来”，是“不科学的”。文章的逻辑是既然肯定工业化，也就要同时肯定全盘农业集体化。这样评价问题虽然省事，却是简单化了。“两化”当然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碰到的两难的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我们可以理解急速全盘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第 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285—286 页。

农业集体化的原因，却不能回避其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难道我们不应从总结历史教训中探索一条尽量使农民少受罪、农业少受破坏的道路吗？我们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只有从历史事实出发。半个多世纪以前联共（布）领导人那种结论表面上似乎能自圆其说，实际不能令人信服，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实际。

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是在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基洛夫被刺之后进一步加剧的。大清洗运动（有人叫“肃反运动”，不确。俄国人自己没有用过这种说法）有一个重要法律，即苏联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决议为把反对派定义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依据；把侦察过程缩短为“不能超过十天”；“被告者不能上诉和请求赦免”；“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① 据此法令，在基洛夫被刺后的几天内，列宁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等地先后枪决了一批人。如此重要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令是怎么产生的呢？基洛夫被谋杀后的当天，斯大林匆忙奔赴列宁格勒，亲自主持审讯，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写出来的。斯大林的“建议”既没有经过政治局，也没有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而是两天以后用个别征求意见的方式办了手续的。

上述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决定算不算方针性的指令呢？有的文章竟通过引用当时上层领导人物的话来证明这次重大清洗运动的“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些作者是怎么想的？！其实，作为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上述事实理应知道，当然更应该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斯大林开创了不好的先例：个别领导人用自己的权势，“先斩后奏”，然后由权力机关来“追认”、“补办手续”。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在这种领导人权威极大的情况下，“领导集体”能否否定其指令呢？二是如果这指令已造成严重后果又怎么补救、谁来负责？我们当然不能把“民主程序”完全绝对化，在某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先斩后奏”（如1976年10月中共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是无可非议的，广大党员、民众会从社会效果做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果成为一种“惯例”和“潜规则”，则祸害无穷，只能视为应该坚决杜绝的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蔑视权力机关权威的个人

^① 《社会主义刑事法规史资料集》，莫斯科1938年版，第314页，转引自（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赵洵、林英译：《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

专权行为。现在人们难以想象，联共（布）召开十八大的通知，竟是斯大林以个人的名义发出的。

评价斯大林问题有两点是应该考虑的：一是所谓“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和客观需要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出发？二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顺理成章地导致中国人的评价不能不有别于俄国某些人。特别是中苏关系问题，对于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自然要有捍卫国家利益的鲜明立场，同时也不否认苏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主义援助。二是我们评价斯大林不是单纯地、孤立地评价其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还要从更宽阔的视野，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的角度进行评价。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不断地颂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行为中取得的。大镇压的罪过绝不是美玉上的瑕疵，不能只是一笔带过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有多少人能够认同呢？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① 有人问：这个说法根据在哪里呢？第一，我这里讲的是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发展道路开辟是不能用几百万人作为代价，而不是发问者所指的苏联大清洗中镇压的人数这个具体概念；即使从苏联 20 世纪 30—50 年代初开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说付出“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也不是言过其实吧？这对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苏联问题研究者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第二，马克思、恩格斯也好，列宁也好，他们主张的革命，其根本目的，无非是寻求一条使广大工农大众少受痛苦的发展道路，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明白的道理。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难免用数以几十万计、几百万计的生命来交学费的观念是很难找到多少支持者的。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保护人权，不正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正常心态吗？

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他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现代修正主义的总代表，未免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冷静思考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了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恶化了、后退了还是提高了、改善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① 《科学社会主义》（京）2007 年第 1 期，第 32—35 页。

了吗？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实事求是地说，赫鲁晓夫是一个犯有不少错误的改革者。

在中苏大论战中，我党定性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根据是其“三和”、“两全”的理论和路线。“三和”是什么性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的实践又提供了新的经验，可以也应该提出新的看法了。“和平过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无先例，但“武装过渡”在这些国家同样没有先例，尚难定论。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于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似无详述的必要了。“两全”是我们难以认可的理论观点。但这里也有几个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地重新思考：第一，在宣布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只能沿用老的提法，否则就是“叛变马克思主义”呢？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仅仅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和党的性质的提法已经开始发生某些变化。第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实践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第三，可否考虑把“两全”同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不能说不清道理就扣个帽子了事，那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也要做具体分析。总的说来，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模式总体上说来是继承多于批判，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他的改革前期效果好些，后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主观随意性。他左右摇摆，前后矛盾，轻率冒进，先放后收，虎头蛇尾，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地说，他的各项改革中，有的是方向正确，措施较得当，并能坚持下去；有的开始正确，后来退回去，如对家庭副业由鼓励到限制，对领导体制由强调集体领导到实行个人专权；有的是方向正确，但措施失当，如干部更新制度；有的是有一定合理因素，但走向极端，导致失败，如工业和建筑等管理体制的改组；有的方向不对，措施也不当，如划分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有的是方向对，但来不及实施自己就被赶下台，如在和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和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改革。如果非要说赫鲁晓夫到底是“左”还是右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总体上说还是“左”，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就是明证。

一些文章说，有人谈到斯大林就追究领导人的个人责任，一谈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就主张不能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事实并非如此。当有人想说明苏联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是联共（布）中央集体的决策时，我们只是根据历史事实

说明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是斯大林个人发出关键的方针性指令的，如此个人专权的危害是历史性的，不能轻描淡写地看成“工作作风不够民主”的问题。至今仍有人持半个多世纪以前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时，我们认为应该把根据历史发展新启示重新给以客观的评价：他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探索者，尽管有不少错误。他的改革实践其实还没有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框架。

对于戈尔巴乔夫，有的文章甚至认为他是苏联解体的第一个“历史罪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分析此时苏联为什么出现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方针的；分析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怎样把苏联引向绝路的。我们不赞成在他被骂为“叛徒”的材料被证明是不实之词时仍然一个劲骂他是“叛徒”，谁要讲事实，就骂谁是“为叛徒辩护”。这种连逻辑都不顾的、强词夺理的不良文风还是改一改好。当前在苏联历史的研究中出现一种新的动向。有人认为，“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因此，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自然可以提出来，但必须用历史事实来论证。起码必须回答：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有什么发展变化，哪些变好了，哪些变坏了；它是否突破斯大林的体制框架？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基本上是在原来框架里改来改去，那么最后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又说明了什么？提出重大观点不难，摆事实，讲道理，让人信服就不容易了，总应该自圆其说吧？比如，既然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那么文章又用了大量材料说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作者到底要说什么？一个严肃的学者，总是要考虑自己的观点是否经得起论证和时间的考验。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史上的大飞跃

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只有斯大林模式才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只要稍有改动，就是“非斯大林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根据这一标准，斯大林之后苏共几十年的历史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按此逻辑，东欧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改革自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了。同样的逻辑，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应该戴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吗？有人断定，中国国内所谓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

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问题如此严重，就该举事实加以抨击，不能光有结论。否则读者会觉得你这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中国理论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用人们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左”的右的思潮都存在，都在表现自己。“左”的思潮有个共同特点：从总体上不承认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实验，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这些人不能平心静气地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作一客观的比较。在他们看来，现在这一套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原理的。而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家，那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简化为几条原则，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哪怕是稍有变动，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思潮，实际上并不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20 多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认真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每一项成果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明显存在距离。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有先进文化来引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尽管这些理念的践行，这些方针的落实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其提出本身不是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吗？而它们同苏联模式下曾经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同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

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不同的方针和理念吗？这是革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的重大成就，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在中国的伟大发展。

80. 为什么说“文化统制主义”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

马龙闪

近年，人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苏共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夜之变”，其惨痛的结果是：苏联“全国众多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基地”；“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间掉转了枪口”。这里所说的，大体是一个客观事实。与此同时，也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经济制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后者发生了变化了，前者并不一定马上随着变化，它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规律，在它所依赖并为之服务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们通常并不会立即消失，还会继续存在、稳定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较之于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即使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灭亡了，与之相应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继续存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消亡，却几乎是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步发生的，具有突发性、剧变性的特点。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就几乎溢出了这个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了解苏共文化意识形态政策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苏共意识形态所以消亡如此之快，主要是由它的极端封闭性和脆弱性所决定的。

过度管制造成苏共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

苏共的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过度监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严密封锁造成的。

苏共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采取意识形态批判，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批判运动”，或者叫“大批判”、思想清洗等。

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出版和传播实行适当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所以，当时出于回击反革命报刊疯狂反扑的需要，查禁资产阶级报刊的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①

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②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

^①（美）约翰·里德著，郭圣铭译：《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② СЦАЛИ（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Л.8，Л.9.

内，就必然衍生出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必然造成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的监控，不是什么一般的封锁，打上一般的“封印”，而是变成了牢固的“漆封”、“铅封”，甚至是像“罐头”一样的“密封”。这就变成了对社会、对党内实行的书报信息封锁，变成了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甚至变成了密不透风的文化统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①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以想见，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范围何等狭窄、内容何等贫乏的地步！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近5000人。^②

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③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④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33.

③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74.

④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125.

12588 条信息，还查出了 23512 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所谓“歪曲”。^①

不仅严查现行出版物，还对图书馆馆藏图书进行了大规模清查。根据出版总局局长 1936 年 1 月 10 日《关于从图书馆和书库清除不准在苏联传播外国文献》的命令，集中在两周时间内，由检察官会同内务部代表，仔细对各大图书馆的库藏进行了清查。清查出来的成千上万种外国图书和报刊被归入特藏书库，严禁外借。

随着控制的加强，订购国外文献越来越难，而人文类图书尤甚。几乎所有这类外文的和俄国侨民的出版物都被自动移入特藏书库，其中有许多还遭到了全面销毁。据一名负责人员 30 年代向中央报告：“目前我们销毁的外国文献达 10%，价值折合 25 万美元。”仅 1938 年一年就销毁英文杂志 869 种、报纸 5451 种，法文杂志 640 种、报纸 33620 种，德文杂志 7620 种、报纸 3450 种，其他文种杂志达 5000 种以上，报纸近 5000 种。^②

除日常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外，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进行大规模清理。在斯大林时期，确切地说，从 2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 1941—1943 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 20 多年间，苏联经历了 3 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进行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 30 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过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 1946 年到 1952 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

①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38.

②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127.

《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3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展开了对一批哈萨克斯坦史学家的批判。

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过度监控，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这种极端封闭性铸造的意识形态，必然伴随另一特点，即极端的脆弱性。

苏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和它的极端脆弱性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所信奉并遵循的一整套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有自己一整套不同于过去一切政党的崭新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就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于俄国，创造性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产物。它代表了进步的历史潮流，反映了俄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的合理历史要求。但是，斯大林执政后，从抵制到抛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至根本拒绝列宁的晚年思想，再通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完全转变到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上来，先后经历了一个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即斯大林个人理论权威的过程。所谓树立斯大林的个人理论权威，就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唯斯大林独尊，以斯大林判断是非的标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为最高真理准则，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判断真理的标准为依归。从1929年以后，特别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定之后，长期以来，苏共就是以这个判断理论是非的标准、分辨社会主义的准则，进行意识形态禁锢的。

自此之后，苏共的意识形态就完全充满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和崇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解释成了斯大林化的理论教条。

斯大林的策略是，先是依凭“列宁学生”的身份，来神化和崇拜列宁；而神

化和崇拜列宁的现实目的，正是为了神化和崇拜斯大林自己。当其达到这个目的之后不再需要依凭列宁时，便直接树立他自己被神化了的形象。

从30年代初开始，联共（布）中央实际上是用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代替了列宁主义，甚至也通过斯大林对马、恩思想的垄断性解释，代替了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30年代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伪造俄国革命的所谓“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①，把斯大林神化到党和苏维埃国家创建者的地步。到30年代后期，特别到战后初期，斯大林已经被当做了可以代替马克思和列宁的“最伟大”的理论家，斯大林被称为“天才导师”、“科学的泰斗”、“永不犯错误的理论家”；提出“斯大林就是真理”，“谁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真理”，“斯大林的指示就是法律”，等等。这时，被斯大林解释的列宁主义，斯大林的思想，成了当时最高、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虽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并未着眼于从体制上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对它进行清理，最终还是留下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浓厚残余，不仅其各种思想理论影响和体制模式依然存在，而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后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的复发和回潮。所以，纵观苏联大部分时期，对领袖个人的崇拜乃至神化，可以说是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特有方式。

苏共意识形态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从此，苏联社会成为不断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分裂”的社会。在苏联大部分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一般党、政、军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终日惶惶然，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有被扣上“信念不坚定”、“机会主

^① 所谓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就是以列宁为首的“国外中心”和以斯大林为首的“俄罗斯国内中心”。所谓“两个领袖”，就是列宁与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才刚刚成为中央委员，进入党中央。也正是这个缘故，斯大林才把布拉格会议夸大到极为重要的地位。

义”、“投降主义”、“叛徒”、“逃兵”、“工贼”^①的帽子，遭到清洗或镇压。

苏共意识形态第三个主要内容是，崇尚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奉行一成不变的、不思改革的、死板僵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的、缺乏效益的理论模式。它造成的是短缺的、贫穷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第四，苏共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方面，是遵循“自我中心主义”和“霸主”心态。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②

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第五，苏共意识形态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的理论。从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时起，这种“超阶段”论支配着苏联几乎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斯大林从二战后就提出开始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高调，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全系发源于此。这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社会的理论。一边是大街上排长队抢购黑面包，一边却吹嘘集体农庄庄员餐桌上摆的是“乳酪烤小猪”；一边是日用品全面匮乏、供不应求，一边却报道苏联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一边是教授购买一台14英寸的彩电，就被视为一种了不得的“奢侈”，一边却连篇累牍，大谈推广“发达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一边是连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都承认，职工对公家财物的“顺手牵羊”，是对工薪的一种“补充”，一边却大肆鼓吹，要在全民中“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更明显的是，在七八十年代，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的暗流在社会底层汹涌澎湃，舆论中却宣扬苏联社会“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民”已经形成。这种“牛皮论调”吹得愈高，人民群众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就愈深。马克思主义本来是认识现实、改造社会的锐利武器，对现实生活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共的这种意识形态却脱离苏联的社会现实，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其实，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达社会主义论”更像一曲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理想当做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而人们一觉醒来，心头袭来的却是严重的失望和空虚。

苏共的意识形态支配苏联达半个多世纪，给苏联人民炫耀的其实只是一个偌大的画饼，而面对实实在在的现实，却是匮乏贫困的物质生活，受到种种限制的精神文化活动；唯一可宽慰的，是一个可以炫耀武力的、奉行扩张政策的超级军事大国，但它所消耗的却是人们本应用于衣食住行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苏共意识形态给人们描绘的画饼，同现实生活相距太远，人们对它由失望、冷漠，转而抛弃，是必然的结果。

苏共脱离现实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原本就是建筑在沙滩上的，很不牢靠。这种靠封锁禁锢、造神和镇压维系的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队伍”，又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理论教条，又难以折服人，因此，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最不能强制、强迫的；而太多倚重于书报管制、查禁和行政压力，只有短期之用，而无长远之效。苏共正是长期依靠了行政压制措施，采取了“武器的批判”，因而不仅没有说服广大人民群众，就连一些“理论精英人物”本人也没有被说服而真心服膺于苏共僵化的理论教条。

苏共严控文化意识形态的后果

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采取的严厉监控措施，并没有顾及近期安全与长远安全的辩证统一。它只片面注意了近期安全，而却严重忽略了长远安全。这种对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过度封禁、过度控制，不可避免会对国家、社会和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后果。概括地说，这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造成的封锁和禁锢，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历史证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闭关锁国政策，都将导致落后和愚昧。苏联党以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为借口，查封、清除、禁锢、销毁国外和过去时代的大量书报文献，其数量和范围是惊人的。除上面谈到过的有关情况外，仅 1938 年宣布为政治上有害的图书就达 10375706 种、招贴画 223751 件，又有 55514 种外文报刊被销毁。^① 最初，资深研究员经批准，还能阅读有限的外文资料，后来这些研究人员连这一点权利也被禁止，加上出国学术文化交流对绝大多数科研人员在当时几乎谈不上，这就完全封绝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科学文化信息，造成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无知。所以，直到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苏联主导舆论还认为生物遗传学、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它们进行大肆批判，甚至还把有机合成化学列入“反科学”、“非科学”之列，不准发展。这便造成了苏联科学理论甚至应用技术的落后，跟不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给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被动局面。

(2) 苏联过度控制新闻书报造成的封杀和禁锢，造成教条主义盛行、思想理论僵化，使屡次改革受阻失败，对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造成相当影响。斯大林对书报信息监控之严，实际上也监控、限制了马、恩、列文献的发表。众所周知，列宁晚年的著作和文献就曾遭到粗暴删改和禁止。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不利于斯大林的文本更不许发表。1934 年，斯大林曾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对发表马、恩文献控制之严，连恩格斯给母亲的家书，也要由马列主义学院院长打报告给斯大林，由其亲自批准方可发表。笔者在苏联档案馆就曾看到斯大林对该报告的这一批件。对马、恩

^① 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339.

文献控制尚且如此，那么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任意封杀列宁“老近卫军”的著作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学术理论著作，一切透出改革萌芽的思想，都遭到镇压；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违背无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倾向”和“无思想性”作品的地步^①，——这一范围是极其宽泛的，按当时的标准，几乎是无限扩大的。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千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 and 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这样的学术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理论队伍”是什么样子，可想而知。他们实际上代表了极端保守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学术思潮。这种思潮同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相结合，形成了阻碍改革的思潮和扼杀改革的巨大力量。这正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苏联过度控制书报文献信息、封杀精神文化产品，并随之进行的批判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一批体制内改革派转向体制外改革，这样就造就了持不同政见者以至发展成为运动，为埋葬苏联培育了“掘墓人”。苏共长期不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吸引人，以其思想理论的严密逻辑说服人，而太多倚重了书报管制和行政压力。要知道，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力压人；压，往往是压不服也压不住的。在这里使用行政强制和暴力，只能适得其反。压的结果，只能“压”出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群体。苏联的反对派思潮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苏共在几十年间用这种方式“压”出来的。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历史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中期，不正是为了打压、禁止两位作家在国外出版书籍，对他们进行关押逮捕，引发了知识界的广泛抗议，而造就了最初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吗？

实际上，苏共通过封锁禁锢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刻意制造的意识形态“温室”和“无菌环境”，培养出的是一批弱不禁风的“理论战士”。他们在知识信息上的“封闭性”，形成了理论上的“脆弱性”，所以，他们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用外界思想理论武装面前，以及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后涌入的五光十色的西方理论学说和文化思潮冲击下，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所以，苏共意识形态发生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苏共长期严密封锁外来书报文献信息

^① 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тпетер. 2000. С. 29.

造成的必然结果。

苏共意识形态的弱不禁风和极端脆弱性，在思想文化信息无国界大量传播的全球化形势下，必然抵挡不住外来思想文化的浸染和进攻。这样，苏共意识形态的败退和剧变，就成了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和重要原因之一。

81. 苏联在文化建设中有哪些经验教训？

马龙闪

在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史上，苏联的文化发展，历程非常曲折复杂，也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它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十分丰富，教训也极为惨痛，并且它在文化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实现我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文化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列宁的初创开拓时期（1917—1928年）、斯大林的独断时期（1929—1952年）、赫鲁晓夫的改革时期（1953—1964年）、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1965—1985年）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混乱时期（1985—1991年）。在苏联文化发展的这5个时期、共计74年的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革命后头十年，在物质极端困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形势下，苏联文化反而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而且这一发展还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的质量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文化反倒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而在30年代物质基础增强以后，反而严重受挫，遭到重大损失？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目光首先注视到由列宁提出、尔后主要是由布哈林忠实继承和发展了的文化领域的方针、路线和政策。

十月革命后，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和战后百废待举的恢复时期，列宁在日理万机中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及其极左文化思潮的斗争。列宁病重和逝世后，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在1923—1925年的文学争论中，又继续领导了同“岗位派”和“拉普”等极左文化派别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依据列宁思想起草、制定并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5年6月18日

通过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这个文件是对十月革命后革命文化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集中体现了列宁在文化方面的理论、方针和路线，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都是一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所具有的深刻内容和重大意义，正如一位著名的苏联学者所说，“就连我们今天也难以对它做出重新估价来”。^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这一文献也极为重视，《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8日曾全文刊载并向全党推荐过这一文献。但由于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党在实际文化工作中并未吸取并实践这一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精髓。

从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凡是较好吸取或体现1925年《决议》精神的，文化就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凡是违背这一文献精神的，就会损害或阻碍文化的发展。我们总结苏联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只有在认真研究这个文献的基础上，根据苏联文化发展的史实，才能做出深刻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

纵观苏联半个多世纪文化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苏联文化潮涨潮落、起伏发展的曲线，是同党的文化政策路线变化的曲线相吻合的。当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决策机制较为合理，行政命令措施较少，而有内行按文化规律办事，能较好团结知识分子，有利于发挥知识界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时候，科学文化就发展得较快，局面就较好；反之，科学文化进步得就缓慢，情况就变得较糟。透过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即，文化是如何受制于政治，随政治的清明开放程度而曲折演进的。当然，一定社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该社会的经济条件，但经济并不能直接决定文化的发展，而是通过政治的中介同文化发生联系的。但科学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却较为明显，不过也仍离不开政治的中介。在苏联文化体制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生动具体的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化、政治和经济三者交互关系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上的失误怎样影响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挫折又如何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由于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又怎样导致了苏联的垮台。

^① C·舍舒科夫：《狂热的追求者——20年代文学斗争史纲》第2版，莫斯科1984年俄文版，第114页。

回顾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纵观党和国家领导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概括起来，这些经验教训可分为以下几方面：

能否把文化建设提到重要地位，把它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之一，是关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这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进行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争论。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曾以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必要的文化前提为借口，预言布尔什维克革命必然走向失败和破产。苏联剧变之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提到了人们面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前苏联各国一些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人，这几年利用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似乎俄国的社会主义选择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本该在二月革命后走西方的道路，你看，重又搞一次十月政变，到底错了！”这是苏联剧变后俄罗斯舆论界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论调。

毋庸讳言，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但教训不在于上述舆论所说的，俄国该不该做出社会主义选择，而在于苏联在30年代以后没有正确领悟并坚持列宁晚年的教诲，把文化建设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列宁在晚年曾倾注巨大心血，集中思考并研究了这个问题。列宁敏锐地看到俄国文化落后给苏联革命和建设，给党和苏维埃机构带来的诸多困难和局限。他在晚年的5篇著作，即通常所说的“政治遗嘱”中，几乎每一篇的中心思想都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痛感俄国文化的落后，认为在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状况也是很差的”。^①这对农民的“合作制”进程，对苏维埃机关的改造等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列宁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②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作为“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在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1页。

实现前者之后再回过头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① 因此，列宁提出，在取得政权，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要把工作“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用“整整一个时代”来进行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② 列宁在这里是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提到战略高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纲领提出来的。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全面、精辟地阐述了列宁晚年的这一思想。这在他1928、1929连续两年写的纪念列宁忌日的两篇文章中集中体现了出来。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反“右倾”斗争中通过批判布哈林，差不多全面抛弃了布哈林阐述的列宁晚年思想，并且以他自己对列宁文化革命思想的曲解，在30年代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简单化为只是解决读写认字、普及教育，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列宁晚年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苏联这个半东方式的落后国家，没有像列宁那样将文化建设提高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来对待，并切实解决文化革命的一系列广泛任务，其后果正像后来所表明的，造成了强制集体化，机关官僚化，抛弃传统文化，严重摧残知识分子等严重问题。这给后来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深远的后果。斯大林背离、抛弃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没有用“整整一个时代”狠抓文化建设，而且在对待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政策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不能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党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到空前的战略地位，不仅是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赋予文化发展在当代之极端重要性的时代特色。

在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上，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能否经常重视克服“左”的倾向，是关系文化建设成败的重大关键之一。

历史表明，在落后的农民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左”的思潮和派别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东方和半东方的落后国家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它们长期处在封建和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薄弱，无产者数量较少、年纪较轻，又主要来源于破产的小生产者，因而同农村小生产者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它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束缚。加上这些国家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4页。

的无产阶级受旧制度压迫甚重，生活很苦，由此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强烈仇恨，往往因其文化水平的限制而表现出思想眼界的狭隘性，容易把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体现者——旧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及其制度一并加以摒弃，因此，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在主观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性。

同时还应看到，恰恰在这些落后和半落后的国家，解决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问题，对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又极为重要。这不仅是因为这些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由于经济文化上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因而更加迫切需要文化和知识分子，而且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旧制度下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上的无权地位，造成他们在文化状况上的极端落后，因而使之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时期内，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技术力量；加之文化成果是人类世代经验的积累，其本身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这就使继承文化遗产，包括利用知识分子，成了所有国家无产阶级在掌权后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迫切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连不断地遇到了“左”的思潮和派别的干扰。强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建立“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否定人类文化的普遍价值，排斥、打击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对苏俄的文化建设造成严重后果。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内各种各样的派别——“军事反动派”、“工人反动派”和“民主集中派”等，也都这样那样地同“无产阶级文化派”存在着思想联系。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同这些“左”的倾向和派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反对这种“左”的倾向的斗争中发表的。列宁逝世后，苏联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包括20年代中期以前的托洛茨基，仍继续同“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进行斗争。俄共（布）中央1925年那个著名的文学政策决议就是主要同这些派别的斗争中制定的。但从1929年初开始，斯大林写了《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公开转向支持“拉普”，从此，在苏联思想理论界和整个文化界，“左”的思潮和派别开始抬头，迅速发展，并且得到联共（布）党和斯大林本人的支持，一发而不可收。在30—50年代初，斯大林和联共（布）党从本质上说不仅几乎从来没反对过“左”的文化思潮和派别，而且可以说总是推波助澜，任其泛滥。这就造成思想理论的

简单化、教条化和庸俗化。其影响之深远，波及整个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在苏联国内直到 50—80 年代中期都未能得到有效克服，以致对苏联文化、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严重后果。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在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上，不断注意克服“左”的思想情绪，对落后和半落后国家发展文化事业也是极端重要的。在落后和半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尚未得到足够发展，阶级分化尚不充分，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人数很多、思想复杂的社会阶层。代表并反映他们思想情绪的中间思想形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是十分周到和细心的。在俄共（布）中央 1925 年文学政策决议中说，在过渡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问题便是：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使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①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对待非党“同路人”作家的问题，也是如何对待中间思想形态的问题。因为非党“同路人”作家大多是反映并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的，而他们所代表的就是这种介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思想形态”。俄共（布）中央《决议》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规定：“一般的方针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即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的态度。”^②而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时候，决议指出，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并予以耐心帮助，这些思想形态将在与共产主义各种文化力量日益密切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消灭。^③

这种周密对待、耐心团结“同路人”的政策，“以容忍的态度”对待其“中间思想形态”的政策，造成了 20 年代比较宽松的、有利于合作的思想政治气氛，这正是许多来自旧俄时代的老作家，如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等，在苏俄时期仍保持旺盛创作力，能继续写出了一本本大部头作品的原因。

而“大转变”以后，在 30 年代，斯大林采取了不能容忍、甚至消灭“中间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18 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 319 页。

③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 319 页。

思想形态”的政策。他在1934年十七大《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政治任务之一”，就是“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其表现就是以“我国城市和农村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为滋长“土壤”的“不健康情绪”。^①这实质上是提出了“克服”和“消灭”“中间思想形态”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部分党内领导，早在1925年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100%纯洁性”或“100%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30年代主张消灭“中间思想形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非无产阶级思想”等，就是上述口号的继续，也是对党的1925年《决议》精神的背离。在“意识形态100%纯洁性”的口号和30年代极端政策的支配下，一方面，加强了对新闻出版和书报发行的严密检查，禁毁了大量书报。另一方面，在知识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斗争，严重摧残了数以千计的作家、学者和文化人，这就造成三四十年代苏联文化的大萧条、大衰退。这个深刻教训，是值得深深吸取的。

能否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针对文化本身的特点及文化各部门的特性，采取相应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法，是党实现对文化事业内行领导的关键

文化事业不同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它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非但如此，在文化事业内部，各个文化部门也有各自的规律和特点。文艺具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科学又有不同于教育的规律，而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也各有其本身的特性。指导文化建设，能否针对不同的部门，按照它们的客观发展规律办事，是能否实现正确领导，推动其顺利发展的关键。

列宁一向很重视文化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文化任务不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要取得文化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表现出“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②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又说：“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0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00—201页。

是最有害的。”^① 这些，都是告诫全党，要认真考虑文化事业的特点，按照文化本身的规律领导文化事业。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对文化的内行领导，他在十月革命之初就把文化教育的行家里手，党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卢那察尔斯基和著名史学家波克洛夫斯基，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正副手，还让“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主管文化意识形态，是有深谋远虑的。

列宁不仅注意文化本身的一般特点，而且对各个文化部门的特点和规律也特别予以重视。比如他认为，在文学“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②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在制定政策时尤其注意在艺术创作方面采取不同于其他文化部门的指导方针。譬如1920年秋在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时，他特别指示政治局在拟订决议时要“更准确地表达下述主要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同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省国民教育厅的工作合并，在艺术领域（音乐、戏剧、造型艺术、文学）则保持自治，而保留由俄共严格控制的人民委员会各机关的领导作用，完全是为了同明显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③ 列宁在这里把艺术领域的工作同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加以区别，给艺术创作以更为广阔的活动天地，不对它施加“繁琐的管束”，这就充分照顾到了文学艺术事业的特点和规律。

如果一般来说，列宁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都要实行内行领导，那么，由于文化所属各部门都属于专业性很强的知识领域，这就尤其要求这样做。列宁在指导文化建设当中极为重视专家的意见和作用，就同他的这一要求直接相关。他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曾对该部特别是职业教育总局在吸收专家“参加中央工作的事情”上处理不当，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党员领导者的合作……”^④ 他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有计划地吸收专家“担任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4页。

③ 郑异凡编：《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114—115页。

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并且特别强调指出，“没有这些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的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① 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是非常重视专家意见，十分重视内行领导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知识，尊重客观规律，按规律进行内行领导。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 年文学政策《决议》，是根据列宁的思想和政策，按照文化艺术事业的规律，实行内行领导的卓越典范。它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维护了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善于从文化艺术的特殊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状况出发，在适当范围和限度内实现这种领导。党自始至终坚持文化艺术的特殊规律性，认为不能“要求党像解决政治和其他细微的生活问题那样来解决文艺政策的一切问题”。^② 在阶级社会里，艺术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固然有其阶级性，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③ 这就决定了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任务比之于其他方面的任务要更为复杂。

鉴于当时无产阶级仅仅握有衡量文学作品社会政治内容的标准，而对艺术形式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确定的答案，《决议》要求党在文化艺术事业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应当是极为谨慎的、周密的，灵活而有弹性的，要严防对文学艺术“专横的外行的行政干涉”。

所以，俄共（布）中央在《决议》中对党在文学方面和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问题作了周密、准确的阐述。

党同“拉普”的前身——“岗位派”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而在于应该怎样对待和怎样取得这种领导权。“岗位派”不顾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主观状况，也无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固有规律，狂妄自大地企图通过棍棒政策，强行夺取文学领域的领导权。党对他们这种“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对他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和在整个科学文化领域取得领导权，要比在其他领域困难、复杂得多，这既是由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状况所决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 1 版，第 32 卷，第 110—111 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 143、317 页。

③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 317 页。

定的，也是由科学文化（包括文学）本身的特点造成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一个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抱里，在同旧制度的斗争过程中，它只可能给自己铸造出政治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不可能、也没工夫钻研自然科学和技术问题，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及其形式和风格。因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而“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①这就决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只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握有充分的领导权，而在科学技术和文艺领域则还不能这样做。因此，在布哈林看来，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无产阶级只应给自己提出争得领导权的“历史性权利”，而不应提出马上掌握领导权的问题。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领导权问题既有相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又有不同于政治领域的一面。相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及其评论家有“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领导权”，在这方面，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性领导权的程度”；而不同之处则是，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各种专门性的问题”上，“尚未完全成熟”，在这里还面临着一个使无产阶级走向成熟并争得领导权的问题。^②

由于这种情况，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的政策应是谨慎小心的、周密细致的。因此，布哈林反对“岗位派”简单粗暴的做法，主张讲究分寸。他认为，党在文学领域“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而只能就“一般路线”实行总的领导，正像党不能在新生活领域对家庭形式作出具体规定一样，党也不可能对文艺领域的专门性问题，如风格、形式等问题作出具体的结论。布哈林的这一思想，同列宁关于在艺术领域应“保持自治”^③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

《决议》全面采纳了布哈林的这一思想，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权”，要在思想战线的许多新领域“占有适当阵地”，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在文学领域取得领导权的任务“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决议》告诫说：“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46—347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上册，第346—347页。

③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莫斯科1976年第5版，第447页。

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① 因此，无产阶级对待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工作要谨慎小心，反对共产党员的“高傲自大”，反对不顾艺术规律的专横粗暴和包揽一切。

正是由列宁奠定、由《决议》阐发的这个方针，促进了20年代苏联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30年代初的苏联文化。

“大转变”以后，斯大林和从1934年开始主管文化、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基本上抛弃了这一方针，把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变成了对科学文化事业的粗暴的外行的行政干涉。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前提

列宁在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是极为谨慎的。前面在讲到对待文化遗产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时，已部分涉及了这个问题，即对于落后和半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有特别的重要性，同时也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性。恰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尤其要谨慎小心。

列宁从文化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客观继承性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发展不可能离开人类文化的一般轨道和普遍价值，必须在吸收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和斗争条件，而对它加以发展。

在阐述这一思想时，列宁首先强调必须继承过去的文化遗产，即过去时代的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他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② 列宁对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全部文化成就，无论是劳动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一般文化技术水平，还是资本家广泛运用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和高度的经济管理技术，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同时，他也教导人们必须在资本主义文化中

①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

“区别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①而对前者，则要给予必要的批判和改造。

列宁对待过去时代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这一思想，是在十月革命初年同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斗争过程中得到阐述的。由于列宁和继列宁之后的布哈林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所以在20年代，无论对待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还是对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文学，苏联官方都是允许其存在的。列宁个人虽然并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但作为政策并没有对它加以否定和禁止。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各种文学艺术流派和风格的包容、宽容和开放的态度，正是给文化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因而使20年代的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类似“无产阶级文化派”这样的极左文化思潮，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度里源远流长。有史料表明，早在1905年革命以前，俄国社会思想中就存在这种思潮的踪影；而在列宁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之后，这种思潮及其形形色色的变形，依然长期在苏联存在。而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日丹诺夫甚至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全面腐朽”的理论，不加分析，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全面批判”、“全面进攻”，以至发展为战后初期，即1946—1952年声势浩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甚至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把相对论、控制论和量子力学等统统囊括其中，这就一反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实际上又重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所以，在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思想文化路线指导下，三四十年代发生的文化萧条和萎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错误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

在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个人独断专行的决策机制，给苏联文化发展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其经验一正一反，是应该认真加以吸取的

苏维埃时代头十年，苏联已具文化体制的雏形。这是由列宁在世时奠定、主要为1925年《决议》发展并确定下来的。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9页。

党原打算在文化教育领域建立分权制，最初没有建立教育人民委员部而设国民教育委员会，就曾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后因国内战争等复杂因素而逐渐形成了权力较为集中的领导体制。但除以集中命令为主的一面外，这一体制中还包含有某些权力分散的成分和民主决策的机制。当时召开的各种文化教育问题专门会议，由各方面代表和专家组成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为文化问题提供决策，带来了各种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的普遍活跃。

按照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要逐渐发展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成分，而把专政引向民主的方向。革命初期文化体制中的集中和强制命令成分，是当时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只是为当时条件所决定的中短期行为，在其产生之日并不打算将其长期化、固定化。比如书报检查制度，只是针对当时存在私人出版社和私人出版物而制定的，在制定的当时就把它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曾经说过，革命者是要为言论的完全自由而斗争的，但实现这个理想只有在革命取得对反革命的更大胜利时才有可能。事实正是这样，列宁去世后，布哈林主持制定的1925年《决议》恰恰是大大发展了文化体制中民主的和权力分散的成分。正是20年代文化体制中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和适当的权力分散，使20年代各种文化问题的决策较少失误和片面性，而形成了这十年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

“大转变”以后，斯大林不仅完全沿袭、强化了20年代文化体制中集中、命令的一面，而且将其固定化、长期化、绝对化，同时取消了其中民主的、权力分散的成分，把整个体制引向了高度集权和专横命令，最后导致个人独断。个人独断的决策造成了许多错误，给三四十年代的科学文化带来了严重后果。三四十年代个人独断的决策机制和传统，也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后斯大林时期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数事实表明，凡是在采取科学民主决策的地方，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凡出现个人专断之处，事业就发生挫折和失误。苏联文化体制史上的这一经验教训是深刻的。

对各学术文化流派和团体是引进竞争机制，还是强行集中统一，是关系科学文化能否繁荣发达的重大政策问题之一

科学在争论中才能进步，艺术在竞争比较中才能发展。这是科学文化的发展规律之一。要展开争论，就不能只有一家观点，只有一个学派；要进行竞争比较，就不能只有一种流派，一个团体。所以，允许多学派、多流派的合法存在，

让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展开竞争，切切实实地而不是言行不一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世界文化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凡是科学文化繁荣发达的时代，必是各流派团体层出叠起，竞相活跃的时期。文艺复兴时代是这样，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这样，苏联的20年代也大体是如此。

在苏联文化史上，20年代是学术派别和创作流派最多，最活跃的时期。党和政府不仅允许各流派、团体的存在，还在党刊党报上组织各种学术文化问题的自由讨论，召集各派别的代表参加各种专门会议和专门委员会，吸引它们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20年代的学术文化团体，成了苏维埃文化体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30年代初期以后，联共（布）中央以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为开端，改变了对社会团体特别是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当时的基本做法是，解散绝大多数社会团体，强行集中统一。到3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采取封杀禁绝政策，除极少数为官方批准的准政府式社会团体外，绝大多数被查封或被迫自动解散。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社会文化团体的政策虽程度不同地有所放宽，但基本上没有越出集中统一的轨道，这给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以上两种对待学术文化团体的政策，产生了两种结果。这一经验教训也是应当认真吸取的。

在对学术文化的指导上，处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与争取、团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政策性极强的问题，应当周密研究、慎重对待

有关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首先取决于科学和艺术最终对社会的发展起何种作用，而这在一些领域是不容易一眼明了的。对于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技术，这种作用比较显而易见；对于自然科学与世界观相联系的方面，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复杂。其次，这种阶级性并不直接决定于科学家、文化人和艺术家的社会属性，即阶级出身。列宁把知识分子看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认为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①因此，只要政策得当，就能引导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86页。

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这个论断，对于界定科学文化工作者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他们只要能为新社会服务，其阶级性便不言自明。但艺术反映出来的阶级性更为复杂一些。对此，卢那察尔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对于艺术的阶级性，人们所应关注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关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①他说：艺术家是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是用和政治理论不同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的”，“我们决不能要求艺术家的多数同时又成为政治家”；“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具有才华，都能独特而鲜明地反映社会，因此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和我们的倾向不一致，就马上认为它是有害的”。他说，一部作品只要没有反革命性，而只是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或者比方说只是不关心政治，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作品存在。^②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用“纯政治”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警告人们不能轻易采取查禁作品的做法。

正是同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思想相联系，《决议》指出：“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的多种多样。”^③

因此，对于科学和艺术的阶级性问题，对待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思想性问题，是不能直观视之、简单处置的，在这里应该坚决反对乱贴、遍贴阶级标签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否则，错误就不可避免。苏联1957—1958年对帕斯捷尔纳克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处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凯尔代斯·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在匈牙利所遭遇的命运，^④都先后引起轩然大波，提供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史上，以简单化、庸俗化的观点看待科学文化问题，混淆学术同政治、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混淆一般理论问题同党内倾向问题的界限，曾严重伤害和摧残科学文化干部，这个教训也是极其沉痛的。

①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②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162—163页。

③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第317页。

④ 苏联和匈牙利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在各自国家命运都不佳，分别遭到封杀和碰壁冷落的待遇，但都先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事实上，能不能正确区分上述问题的界限，关键是个对待科学艺术探索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问题的症结在于，是以倡导科学探索、鼓励艺术创作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化领域的问题，还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眼光看待这方面的问题。以第一种态度处理问题，就要真正坚持科学研究无禁区，艺术探索少加限制的政策，对待上述一些政策界限要缜密研究，谨慎对待。遇到复杂问题，一时难于弄清的，应该首先抱着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按学术问题和一般理论问题处理。只有解决了这个态度问题，才好正确区分学术和政治、艺术与政治的界限问题。否则，像斯大林那样，遵循“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无处不寻找阶级斗争，把一切学术理论问题统统看成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存在所谓区分上述界限问题。

1930年12月，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就德波林学派问题发表谈话过程中，一个支部委员曾向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可不可以把理论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党内的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明确回答：所有理论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同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联系起来”，“任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①这一答复表明，他十分严重地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一般理论问题和党内倾向问题混淆了起来。按照他的这种逻辑，实际上任何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理论上发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背离”都是党内政治倾向问题。这样混淆两类问题的界限，实质上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政治上治罪任何人。也难怪斯大林把进行抽象政治经济学问题争论的经济学家鲁宾，把连“反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上的根据”也不曾提供的德波林，甚至连斯大林不同意或不甚了了其理论观点的众多自然科学家，统统视为具有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甚而当成“人民敌人”加以治罪。

混淆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问题，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不可能做到争取和团结知识分子。伤害科学家和文化人、作家和艺术家，在许多场合是由于对上述界限问题处理不当引起的。只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抱着百倍爱护科学文化人才的态度，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一般理论问题与党内倾向的界限

^① 见米丁笔记。藏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党务档案馆，第14库，第24卷。

问题，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党和国家能否满足文化所固有的属性，即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是能否保证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发展的事实都证明，文化具有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也可以说这是文化的特有属性和客观规律。执政者只有满足文化的这些属性和客观规律，文化才能得到顺利发展。

文化具有包容的属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需要包容人类在过去时代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成果，因为只有在过去人类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文化才能进一步发展。文化也有宽容的属性。这就是说，文化的发展也需要允许社会上其他各种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只有许可它们的存在并与之展开自由竞争，才能相比较而发展，优胜劣汰，推出优秀文化来。文化也有多样化的属性。文化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不仅门类多样、品种多样，而且流派、风格和形式无不多种多样。只有实现多样性，文化才能繁荣发展，否则，单调划一，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文化也有开放的属性。只有在社会开放的条件下，实现本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信息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吸收，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不争的事实。

只有满足文化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才能使文化实现创造性。因为文化包含的创造性是从它的包容性、宽容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否定和抛弃人类过去时代的文化成果和文明价值，不容许各个思想文化流派的存在和自由竞争，大搞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可人们自由思想和自由争论，搞万马齐喑，制造文化沙漠，或者大搞封闭主义，对外来的东西统统视为洪水猛兽——这一切，是万万谈不到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创造性的。

苏联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当党和国家实现或满足了文化发展的这些条件时，科学文化就发展，否则，科学文化就萎缩和萧条。这也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民族文化问题上不能急躁冒进，要照顾民族文化特点，严防伤害民族感情

民族是千百年来以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十分稳固的社会群体。这种社会群体一方面以其特定的结合方式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文

化的发展，同时，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厮杀，自史前社会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生战争、动乱的最重要根源之一。所以，自古以来人类向往和平、安定生活的理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包括没有民族矛盾和冲突在内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崇高理想，不仅包含着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的理想和信念，也意味着最终消除民族隔阂和差别，实现民族一体的“大同世界”。

苏共在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为将沙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运动纳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轨道，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理论：各民族有权按自愿原则，以平等资格加入或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随着各种语言“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①，各民族也将走向融合和统一。在革命初年，列宁曾坚持民族自决权原则，在解决芬兰等问题上将此原则加以兑现。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及其后来者把“维护苏联”看成国际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去兑现自决权原则。况且民族自决权即“民族分离权”原则，也同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相抵触。加上联共（布）领导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左”的急性病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实践中导致对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特点的漠视。少数民族干部一讲民族权益或民族特点，往往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而遭到镇压。革命初期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过多许诺和日后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严格限制，造成巨大反差，给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许多隐患。

斯大林体制的高度集中，从许多方面剥夺了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力，加上诸多民族镇压之举，种下了许多民族问题的恶果。后斯大林时期对这些问题或者未能彻底纠正，或者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问题遗产。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加紧推行民族文化“统一”和“民族融合”政策，在体制上收回民族文化自治权，强行推广俄语，伤害民族感情，这就使民族矛盾越发严重，最后成了苏联解体的一把悬剑。

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有三：（1）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严重估计不足，犯了“左”的冒险主义；（2）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上认识僵化，以为消灭剥削制度和消灭阶级，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不合实际的空想主义和教条主义。（3）在体制上没有充分考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4—585页。

虑民族文化的特点，过早地抛弃了文化自治原则，在联盟中央过多地集中了属于各民族区域的权力。

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利用民族的文化艺术、文化运动，搞民族分裂主义。南斯拉夫就曾发生过所谓“文化民族主义”问题。民族文化要保留，要发展，但要防范在其背后潜藏的分裂国家、分裂联盟的苗头。

社会主义在苏联 74 年的实践，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这一实践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极为深刻、极为丰富的，需要经过跨世纪的研究，由数代人来进行反复思考和总结。这一实践的规模是空前的，它是经过几代人努力奋斗，由数千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价值之高昂，财富之宝贵，是亘古至今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我们应该十分珍视这一伟大实践所得来的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而切实地吸取过去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有力地、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将必能为未来的世界奠定一座巍峨的历史文化丰碑。

82. 对外扩张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左凤荣

苏联剧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一个超级大国，在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自行走向解体是世界史上仅见的。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可以从多侧面、多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苏联对外战略失误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苏联走向衰落与解体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其兴盛的背后始终存在危机。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自己定位于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并长期以此为出发点确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这一超出实际可能的战略目标决定着苏联国内的发展战略，苏共长期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增强军备上，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运行体制也是与此相适应的，这背离了社会主义要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宗旨。在这一战略目标指导下的苏联外交具有两重性，也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建立一种互利互惠、相互信任的关系，而外部环境的紧张，又制约着苏联国内的改革与发展，进一步使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的军事化得到强化，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失去了对人民的吸引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不切实际的对外战略目标

在 20 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社会主义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已存在，资本主义曾企图把社会主义这个新生儿扼杀在摇篮里。尽管社会主义曾有过辉煌，建立过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从总体上

看，外部世界仍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赢得过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上建设社会主义，力量相对弱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如何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努力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家的富强和发展，成了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重要问题。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一直以“世界革命”为名，追求靠军事实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以便早日完成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在全世界实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以一国之力走上了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之路。这种目标选择是苏联国力所不及的，最后，苏联在这种对抗中耗尽了国力，走向衰落，被人民所抛弃。

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过“世界革命”理论，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但是，他们所说的革命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他们看来，这种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历史没有按经典作家的预测发展，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就提出了怎样处理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

列宁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国际主义者，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胜利起，他们便把消灭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真诚地想推进世界革命，当时列宁曾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没有世界革命，苏俄无法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对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敌视与干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明显的革命形势，因此，列宁倡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并在结束国内战争后向波兰进军。1919年3月，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满怀信心地说：“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①在稍后举行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说：“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坚定不移地相信，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共产国际将作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联盟而取得胜利。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布进行革命战争。首先在本国夺取了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在本国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506页。

社会主义红军的帮助下已经开始了这场战争。”^① 1920年6月，苏俄收复被波兰占领的乌克兰后，没有接受对自己比较有利的边境线（寇松线），没有与波兰签订和约，而是继续向波兰进军，把正义的防卫战争变成了阶级进攻战争，力图帮助波兰工人建立苏维埃政权，并激起西欧的革命，结果遭到了失败。波兰人民没有把红军看成是解放者，他们担心的是再次落到俄国人的统治之下，奋起保卫自己的国家。列宁从中看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接受了更为不利的和平条件。

1921年春苏波签订和约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国家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调整与修正，他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努力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提出苏俄要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输出革命的方式影响世界革命进程，党的工作重心从与资本主义进行实力较量和“唤起世界革命”，转到了国内的和平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列宁努力让人民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制度，通过榜样的力量，吸引其他国家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列宁的继承者们并未发展列宁这一正确思想。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重新开始强调世界革命对苏联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革命胜利，才能最终保障苏联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即“最终胜利”。他明确说：“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主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② 1925年4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对俄共来说这一任务就是：从直接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起，直到为本国农民生产印花布，也就是说，要努力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也要尽力援助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作为国际革命的主要基础的工人专政的国家，应当把自己看做国际革命最强有力的杠杆和助力；另一方面，在这一国家内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全力去建设社会主义社会。”^③ 斯大林的战略目标有二：最高和长远的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

① 季诺维也夫著：《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5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第43、48页。

命，尽快打破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建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最低目标是保证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有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使战争不在苏联领土上进行。在斯大林看来，这两个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在全世界扩展“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理想，变成了以苏联为中心不断向外推广苏联模式的过程。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首领与中心，世界革命进程就是从这个中心逐渐向外膨胀，而被纳入这一范围的国家必须在内政、外交上服从苏联。苏联的利益高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其他国家的革命利益必须服从于苏联一国的利益，苏联所支持的革命也都是符合苏联利益的。支持世界革命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都是为保卫苏联、加强苏联和扩张苏联这一对外战略目标服务的。斯大林围绕这两个战略目标来诠释他的理论，形成了其独特的逻辑，他的这一理论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所继承，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苏联总的长远的战略目标是推进世界革命，它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展和壮大自己，与此相适应，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两项基本原则：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苏联强调双方和平共处；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苏联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所谓和平共处，在不同时期含义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只是策略手段，限于不与资本主义发生军事冲突，而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与联系。和平共处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理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从1928—1953年，苏共只召开过四次党代会，斯大林在这些党代会的讲话中，一句都没有提到“和平共处”这个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共同威胁，苏联与英美等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但由于双方战略利益不同，战争结束后，这一同盟很快被“冷战”所代替。在紧张的“冷战”背景下上台的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当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不同制度国家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还应该往前走，加强信任与合作。他改变了斯大林不让步、不谈判的做法，提出为了和平的利益应该相互妥协、相互让步，应该考虑对方的利益，“对于我们苏联人，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这不只是在两大体系间没有战争，而且还在于它们之间和平的经济竞赛和经济、政治、文化

领域的接触与合作”。^① 赫鲁晓夫并不否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也不认为两种制度可以“永久共居”，他的最终目标还是“埋葬帝国主义”，只是手段变了，主张两种制度在和平竞赛中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然仍说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与西方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是，苏联领导人对苏联及美国的实力对比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加强了对外政策的攻势，1965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对外政策的实质，如果简单地说，就在于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也正在这样做。我们尽力使我国的外交成为积极的进攻性的外交，同时，我们也表现出灵活性和审慎态度。”^② 苏联“对外政策旨在为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全力支援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斗争，巩固和平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③ 也就是说，和平共处的地位下降了，与美国争夺的势头增强了。苏联的积极进攻和扩张军备政策，恶化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促使美国对苏联实行“新的遏制战略”，双方在80年代初又开始了新的“冷战”。

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质是世界革命口号下掩盖的民族利己主义，苏联要求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服从和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④。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基本上都按这一原则行事，后来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被勃列日涅夫发展成“有限主权论”，他们公开宣称：“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无论谁忘记这一点，只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就有片面性，他就背离了他的国际主义义务……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

① 《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方针》载（苏）《共产党人》1957年第11期，第5页。

② 《真理报》1965年9月30日。

③ （苏）索科洛夫斯基主编：《军事战略》，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400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① 这一理论成为苏联控制、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以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以阶级利益代替国家与民族利益，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与联合国宪章相背离的。

尽管苏联学者曾努力宣传这两项原则的协调性与有机联系，实际上其矛盾性十分明显：苏联一方面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一方面又不放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直接支持，不放弃扩大社会主义地盘的努力；苏联一方面强调不干涉内政，一方面又领导和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即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信任关系，也难以为本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1926年5月3—12日英国发生煤矿工人罢工（部分罢工者坚持了7个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天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决议，动员了一切能动员的力量支持罢工，并要求英国共产党把这一斗争引向政治轨道，在合适的时机，提出打倒保守党政府，建立工人政府的口号。英国政府多次抗议苏联对其内政的干涉，并于1927年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② 苏联据此认为自己面临战争威胁，开始大力加强国防。这种恶性循环在苏联时期一直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其国际威信与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斯大林利用军队留驻东欧之机，在东欧建立安全带，实质是在东欧建立听命于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成为西方国家对苏联发动冷战的重要借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增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勃列日涅夫把这看成是推广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好时机，便在全世界采取了积极进攻战略，到处伸手，甚至直接动用武力，去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影响。

苏联想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一国革命的长治久安，事实证明，行不通。革命是一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不能从外部输入的。苏联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通过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活动，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既影响了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产生对苏联的依赖心理，加重了苏联的外援负担，

① 《真理报》1968年9月26日。

②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转引自（俄）《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

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又常常把这些党看成是苏联的代理人，从民族感情出发反对它们。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和军事干涉曾经严重损害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东欧的剧变对苏联的剧变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为对外战略服务的国内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与水平，外交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一宗旨与原则，苏联却没有这样做。由于苏联对外战略的大目标是取代资本主义，苏联要当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助力，它长期把发展重工业、加强军事力量放在了首要的、突出的地位，保持以行政命令方法（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领导经济的这一动员型经济体制，因为这种体制最适合备战的需要。当经济军事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一个有实力的利益集团后，他们又影响着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苏联的对外战略、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军事战略交互作用，决定着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说，为了战胜世界资本主义，首先必须努力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生活、科学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使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制度。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正是据此制定苏联国内发展战略的：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吸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成果，积极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努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通过榜样的力量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但是，从斯大林开始，苏联便把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目标实物化为钢、铁、煤、石油、电力等几项指标，赶超资本主义变成了军备赶超。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时期形成的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在这一战略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了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军事工业是发展的核心，“重军抑民”、“国防优先”是其基本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战略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世界在变化，以军事赶超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模式与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战略则不合时宜，与历史发展潮流相背，也违

背了人民的愿望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苏联取得了在这方面赶超美国的成果，成了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但并没有因此增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竞赛中的优势，反而暴露出了劣势，成为苏联共产党、苏联式社会主义被人民所抛弃的重要原因。

苏联没有不顾自己国家的存亡去发动世界革命，但在确定国家的发展目标时，始终不忘推进世界革命这一大目标，在斯大林的意识中，加强军队建设和发展国防力量，既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也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如他所说：“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①“红军不是狭义的民族的军队，它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红军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这一军队的祖国……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某些条件下能够指望得到以红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苏维埃联盟的武装帮助。”^②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领导人坚持的实际上就是这一战略思想。苏联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它必然把发展国防力量放在重要地位，保持着强大的军队。苏联的军队建设走的是一条裁了扩、扩了裁的道路，在和平时期保持着并无多大必要的庞大军队：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很快过渡到和平时期，军队人数锐减至56万人，1927年苏联红军和海军有58.6万人。随着工业化成就的取得，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具备了发展军备的实力，加之当时国际环境比较紧张，苏联开始大幅度扩军，1937年发展到143.3万人，1941年达到53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法西斯，苏联军队人数剧增，1945年5月达到1136.5万人，战争结束后，军队开始复员，1948年裁减到267.4万人，冷战开始后又开始扩军，到1955年苏军达到576.3万人。赫鲁晓夫上台后，从1955年开始裁军，到1958年裁减了214万人，1960年苏军有362.3万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苏军有33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军队又恶性膨胀，

①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4页。

②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莫斯科1932年版，第20页。

1984 年有 530 万人。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开始裁军，1988 年减至 425.7 万人，1990 年减至 376 万人。

苏联的军费负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居高不下，是世界上最高的，表 1 反映了在 20 世纪世界大战和冷战中各大国的直接军费支出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情况：（以 1993 年价格计，单位：10 亿美元，误差 ±4.0%）^①

表 1 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各国军费支出：

	1914—1918 年	1939—1945 年	1947—1991 年	总计
美国	18.2—334.8 14.0%	285.1—3107.5 38.4%	4620.5—9471.0 5.6%	12913.3
英国	12.7—233.6 24.5%	62.4—680.1 55.1%	791.1—1661.1 5.3%	2574.8
法国	12.9—237.3 36.2%	15.0—163.5 18.3%	518.9—1113.7 4.1%	1514.5
德国	21.0—386.4 31.3%	221.4—2413.3 67.8%	560.1—1008.0 3.8%	3807.7
意大利	4.4—80.9 48.8%	27.0—294.3 58.0%	168.3—319.2 3.5%	694.4
日本	0.0—0.7 0.0%	27.2—296.5 49.7%	277.5—512.4 0.9%	809.6
俄国（苏联）	13.3—244.7 44.0%	107.6—1172.3 55.0%	1333.3—10039.2 12.6%	11456.7
总计	87.9—1610.4	745.7—8128.0	8283.4—24149.1	33887.5

苏联的军费支出到底有多少，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苏联官方的资料，从 1969—1987 苏联每年的军费支出只有 177 亿—202 亿卢布，不包括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军费支出。1989 年 5 月 30 日，戈尔巴乔夫首次承认苏联的国防开支为 773 亿卢布。苏联官方说，1989 年军费开支，不包括用于军事宇航的部分（39 亿卢布），为 770 亿卢布，1990 年为 710 亿卢布。1990 年 4 月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裁军的理由时说，国民收入的 18%—20% 被用于军事耗费。实际上，苏联的领导人对于苏联用于军备竞赛的开支，也没有明确的概念。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翻译

① （俄）《21 世纪的俄罗斯》1994 年 11/12 期，第 91 页。

说：苏联的一些科学家承认苏联的军事开支的“实际数字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或者甚至还要高。而这只是为了在核武器上同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装甲装备、炮兵以及某些类型导弹的数量上大大超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据西方的某些估计，为了制造这些导弹，苏联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0亿美元。大约5000家军工厂继续在费力地制造成堆的武器”。^①

阿尔巴托夫说，根据不同的估计，8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在世界上占第二位，12%—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50%（美国为25%—27%），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亿—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一时期的军备开支。^②

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国家用于军事的开支不下于年度预算的20%—25%；但是用于军事工业、用于宇航及对同盟国家的军援，用于军事科研工作，用于情报机构以及国家安全系统的直接和间接支出不下于国家预算的50%。^③

伊戈尔·皮尔曼认为，苏联的官方数字与实际不符，差别在于耗费，特别是用于国防部门的大量投资没有直接进入苏联的军事预算（国防部的预算），甚至国防工业有各种“特权”，无法按价格来衡量。他认为，准确地估量苏联的军事耗费是困难的，苏联常常通过人为地降低价格和给国防部门以特权来减少军费支出，这一项每年不少于500亿卢布，按现行价格计算，苏联的实际年军费支出不低于200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这2000亿卢布中，用于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不少于1600亿，其余400亿卢布用于军人的教育、医疗、退休金、燃料、军事基建、情报机关、交通等。^④

军工产品的唯一订货者和需求者是国家，各国都是如此，西方国家在现代武器和宇航系统的生产安排上也很少考虑市场原则，但是，西方国家既有“大炮”

①（俄）伊戈尔·科尔奇洛夫，达洲译：《首席翻译眼中的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②（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5期，第15页。

③（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④（俄）《苏联的军事开支》，载《十月》1991年第9期，第153页。

又有“黄油”，苏联却为了“大炮”牺牲了“黄油”，其原因除了苏联用于发展军工生产的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外，更重要的还是体制上的原因。与美国不同，美国存在着强大的舆论监督，总统、国会、五角大楼间也存在相互监督与制约的关系，美国增加多少经费，要发展什么类型的武器，都是公开谈论的，政府的决策要通过国会的认可才能实现，它不可能动用全国的力量只为军事工业服务。苏联则不同，在苏联，军事是保密领域，其技术是保密的，投资也是保密的，军事投资不需要最高苏维埃的认可，只要最高领导人点头就行。很多军事投资都是在国家计划外运行的，没有监督。苏联可以用损害和限制非军工生产部门、削弱其他部门的办法，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和现代化的武器系统。从经济运行的机制上看，美国由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大量军事科技成果很快就会被追逐利润的老板用于民用工业，而在苏联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企业没有主动性，做不到这一点，结果，军备竞赛大量消耗民用生产部门的物质资源，使民用部门陷于衰退。

在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种成就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苏联经济的最大问题是经济结构失调、经济军事化程度严重。国民经济结构失衡——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得不到纠正，重工业过重被认为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造成苏联这一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军备竞赛，以及由军备竞赛导致的苏联经济结构的高度畸形化。据官方资料，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从 1928 年的 40% 增加到 1990 年的 73%，而整个消费品生产的比重则相应降至 27%。而事实上，消费品所占比重还要低，考虑到营业税主要是加在消费品上的，那么可以确信，国家工业潜力的 4/5 是满足生产需要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 1/5 直接用于居民必需品的生产。^① 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 60% 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② 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 5%—6%。国家 75% 的发展科学的拨款用于军事科研的需要。^③ 国民经济中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 1/3 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

① （俄）《经济问题》1991 年第 8 期，第 4 页。

② 《真理报》1990 年 9 月 1 日。

③ （俄）《论据与事实》1989 年第 33 期。

产，而美国为 12%—14%，西欧各国为 6%—7%。^① 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 70%。”^② 很难准确估计苏联军事经济的规模，不管怎么说，苏联的经济都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战时经济。

苏联在世界上扩张势力，也是不计经济效益的，用尼克松的话说：“帝国使克里姆林宫变穷而不是致富了。越南使苏联每年支出 35 亿美元以上，古巴 49 亿多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共 30 亿美元以上，尼加拉瓜 10 余亿美元。莫斯科的帝国领土使克里姆林宫每天耗资 3500 万美元以上。”^③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苏联取得了在经济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的军事均势和优势，不计任何代价地发展国防实力，耗尽了自己的力量。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据说苏联的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④

1913 年俄国的 GNP 即为美国的 39%。苏联具有制度的优越性、在人口和面积方面比美国大一倍多，但经过 70 多年的建设，苏联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方面，其成果令人失望。表 2 反映了苏联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对比情况（单位：亿美元，按 1974/75 年价格计算）：

表 2 苏联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

年代	1950	1960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1
苏联	2180	3800	6260	7510	8560	9420	9920	8780
美国	6570	9020	13280	15290	18700	21260	24210	23920
苏为美的%	33	42	47	49	45.8	44.3	41	36.7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译丛》1994 年第 1 期所载法国《国际经济学》1993 年第 54 期材料。

① （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9 年第 8 期，第 13 页。
② 普里马科夫：《俄罗斯应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俄新社 1998 年 4 月 13 日俄文播发。
③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88 页。

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1990年苏联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16969.8亿美元,美国为42772.74亿美元,苏联是美国的39.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苏联为6000美元,美国为17615美元,苏联为美国的34.06%。^①1985年苏联人均GNP在全世界的排名位居第38位,不仅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苏联的人均GNP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强。苏联人民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现代化生活设施方面,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戈尔巴乔夫说,在经互会国家中,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也是最低的。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需求,概括为“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②为什么苏联自己并没有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但在生活水平的较量中,苏联却败在了德国的手下,苏联人感到不平的是,为什么其手下败将生活得却比自己好许多,不仅如此,在人均产值和工业效率方面,苏联还被日本等在苏联人看来很落后的亚洲国家超过。苏联的经济体制固然有很多问题,这种体制内没有刺激生产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体制也能充分动员各种力量,去实现所确定的目标,如果苏联不是把大量的财富浪费在与西方国家进行军事实力的较量上,而用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话,其结局未必会这么惨。正是人民生活水平与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相称,造成了苏联社会的矛盾与危机。

造成苏联对外战略目标错位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本质上应该是防御性的,其主要目的是为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苏联却不是这样的,造成苏联战略目标发生这种错

① 转引自陆南泉、姜长斌主编:《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② 《斯大林文集》,第628页。

位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两点。

首先，苏联对国际社会和自身都没有科学的认识。认识国际社会，了解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掌握本国国情，是研究和制定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苏联存在的 70 多年时间里，苏联的决策者们基本上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处的外部世界、本国的国情、本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苏联领导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时代的判断、对世界形势的估计方面有许多偏差。苏联对外战略理论总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资本主义进入了总危急时期，而且这种危机在不断加深，很快会被社会主义取代。

从工业革命起，世界便开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今天把这称为“全球化”。在这一历史大趋势下，任何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与文化交流，都要吸取人类社会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文明成果，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但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它诞生起，就把意识形态的利益置于国家经济利益之上，实际上拒绝了世界相互依存的思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土壤——沙皇俄国，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列宁称它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仍保留有这一特色，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公众对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苏联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文明，当苏联宣布自己已建成社会主义之时，西方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甚至一些共产党、工人党成员，并没有认同苏联的制度。因此，苏联把自己定位于现存资本主义“替代物”的“中心”、“领导力量”，过高估计本国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强调苏联与外部世界在各方面的对立，总想通过扩大自己的实力改变外部世界，是极不现实的。

1928 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一直被沿用到 80 年代初。苏共的每一次党代表大会都在重申资本主义总危机在进一步加深，强调资本主义的战争本性。实际上，资本主义在不断变化，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军事手段争夺原料与销售市场并常常导致战争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相互渗透的情况更为突

出，它们之间相互投资额超过了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额，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也在其对外贸易中占了主导地位。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使它们之间的战争不再有任何意义。同时，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出现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把它们之间的竞争纳入了有序化的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变化，苏联却仍坚持把资本主义与战争画等号，依然把国际形势看得很严重，强调备战，希望借战争之机扩大社会主义，是无的放矢，只能白白浪费资财。

苏联在制定对外战略时，看不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过分强调两种制度的对立性。苏联长期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把它们机械地对立起来，把国家之间的关系只归结为阶级关系。对国家之间长期和平共处缺乏耐心，总在盼望世界出现革命形势，到处扩张，与美国争霸，不能埋头做自己的事情。世界发展的潮流除了政治方面外，还应该包括更重要的经济方面。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他们就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进行扩张，把整个世界都联系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列宁也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看到经济力量高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提出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发展社会主义的思路，明确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势头更加强劲。而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却把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位在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然也曾强调过要加强与西方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70年代缓和时期，苏联从中尝到了不少甜头，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苏联应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正因为没有这种意识，所以双方的经贸关系发展也是十分有限的。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使苏联的经济改革、企业发展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物，这也是苏联经济体制几十年不变的重要因素。苏联最终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所抛弃，其政治目标也化为乌有。

苏联对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作出清醒的估计，教条主义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分期。列宁开始把过渡到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看得很短，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提出过渡时期要经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1938年宣布要在五年内“完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已处于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赫鲁晓

夫继承并发展了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宣布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从这一空想后退，但退得并不彻底，仍是夜郎自大。对本国发展阶段不能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自然影响到苏联确定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促使它总想把对方“埋葬”掉。

第二，历史传统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侵略性，苏联以世界革命为名推行扩张性的对外战略，一个重要根源是历史传统的影响。如果说英法等殖民帝国对外扩张的动力是商业与资本，那么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则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安全利益。俄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帝国文明，帝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在摆脱蒙古人统治的同时，也从它那里继承了扩张的特性，马克思对此作过入木三分的总结：“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① 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已由一个小公国发展成一个拥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列宁曾对沙皇的扩张政策提出过尖锐的批评，称俄罗斯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俄国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沙皇把注意力放在开疆拓土上，把矛盾都集中于国内，而广大人民除了勒紧裤带、当炮灰外，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从斯大林开始，他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仍把注意力放在扩大领土和势力范围上。斯大林甚至还为沙皇的扩张辩护，1934年当有人建议在党刊《布尔什维克》上发表恩格斯于1889年2月所写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斯大林不同意，他在就此问题给政治局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说：“十分卑鄙龌龊的侵略政策决不是俄国沙皇所独有的”，“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由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② 斯大林后来为扩大苏联版图所做的种种努力正是对这种传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苏联对马克思这篇揭示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著作讳莫如深，不予发表。

② 《斯大林文集》，第5页。

统的最好继承。苏联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赋予它以新的内容。斯大林强调，只有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才能保障苏联的安全，这样就把苏联的安全利益与在世界上推动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了。扩张领土的传统、东正教的救世思想与世界革命思想在苏联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如果苏联能像列宁在苏波战争后所说的那样，努力树立自己的和平形象，与扩张传统决裂，苏联的国际环境会好得多，也会更有利于它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其社会主义将会更有生机和活力。苏联没有这样做，反而为对外扩张找到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是苏联社会主义走向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苏联主要是通过军事力量来支撑其对外政策，从其所支持的对象那里，苏联得到更多的是政治、军事、心理上的满足，其影响的范围越大，经济负担也就越沉重，难以维持长久。

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当俄国发生这样的一种转变，使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本身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① 换句话说，只有当俄罗斯放弃追求世界霸权，专心于自己国内事务的时候，俄罗斯才会走向富裕与繁荣。

在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因素仍起很大作用。加强国防力量是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武装力量是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领土完整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一个国家的安全绝不仅仅是军事安全。苏联的超级大军在国家发生剧变时是无能为力的，强硬派发动的“8·19”事变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苏联人已经不能接受用武力解决社会问题了。决定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人民的选择。“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其武装部队，而且存在于其经济和技术资源；存在于用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预见能力和果敢性；存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民族中；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他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② 为了更好地促进 21 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善于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苏联问题的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3 页。

② 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5—246 页。

83. 民族问题对苏联解体起了什么作用？

赵常庆

自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关于解体原因的探讨始终未断，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不同角度加以诠释，还不时有新说出现，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超级大国，一个对世界政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不能不引人深思，以求其索。而在苏联废墟上建立的 15 个新独立国家，独立近 20 年后的不同表现，特别是作为苏联主要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其他 14 个国家的复杂关系，可使人们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和启迪。可以预料，今后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

多年来，尽管对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不同的诠释，但有一点却达成共识，即民族问题在苏联解体中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特殊的联邦制潜伏解体的制度危机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它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个自治共和国、8 个自治州和 10 个民族专区组成。这样复杂的联邦构成为世界少有。15 个加盟共和国既有宪法和除军队和外交机构以外的所有国家设置。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宪法还明文规定，共和国有自己的“国语”和“主权”。苏联宪法也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

苏联这种特殊的国家构成与 1922 年苏联成立时的国内形势有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形势，伴随发生的还有民族独立运动。在民族地区各种势力趁中央内乱纷纷揭竿而起，建立政权，宣告独立。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后，沙俄帝国实际上已分裂成若干个国家，其中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这些新诞生的国家有的是无产阶级掌权，有的是资产阶级执政，但同时各国政权都存在对立面，存在所谓“红”“白”对垒的局面。1918 至 1920 年间，逐渐站稳脚跟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红军，一方面帮助本国和其他国家巩固红色政权；另一方面，派人到资产阶级掌权的“白色地区”发动工农群众起义，或者直接派红军“协助”夺权。在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甚至在乌克兰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1922 年初，经过内战洗礼的各民族共和国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形成 6 个独立的红色国家，它们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当时这些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如何生存的共同问题。在加强一般性联系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各国提出了建立联盟的设想。当时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种是将乌克兰等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即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另一种是列宁主张的各共和国以平等身份结成联盟的方案，即联邦制方案。结果采用了列宁的联邦制方案。1922 年 12 月 30 日苏联正式成立。在关于苏联成立的文件中规定，“保证每个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力”。^①

应该指出，苏联所以能够成立，除存在求生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以及国家发展方向共同性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有统一的俄共（布）的存在。在苏联成立前，尽管各共和国是独立的国家，但共和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却是统一的，即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俄共（布）党组织皆隶属于俄共（布）中央，它们只拥有相当于俄共（布）区域委员会的权力。俄共（布）如同一条纽带把各共和国捆绑在一起。如果没有统一俄共（布）这个重要条件，苏联或许不能成立，即使能够成立也不会十分顺利，或许不是当时那个样子。

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当时组成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是以主体民族命名的，因此，苏联的联邦制是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与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3 页。

地域为特征联邦制有所不同，苏联学者认为这种联邦制是列宁的“创造”。^① 苏联对加盟共和国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规定相当宽松，声称可以“自由”退出。在稍后通过的苏联几部宪法中仍保留了这个规定，苏联领导人没有料到，若干年后这一条款竟成为加盟共和国谋求独立的法律依据。

在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之所以要从苏联的成立说起，是因为苏联的联邦制和宪法对加盟共和国退出权的宽松规定潜伏着易引起苏联解体的制度性危机。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上述联邦制形式组建苏联是顺应形势的需要，符合大多数民族的愿望和利益，体现了他对“民族平等”理想的追求和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憎恨。正是由于苏联的成立，使一批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小国得以生存下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在组建苏联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看到，列宁提出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并未经过历史的检验，列宁的过早病逝使他无法看到以民族为特征组建的联邦制的局限性。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苛求列宁。只是在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人们才逐渐看到这种联邦制的弊病所在。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版图上建立的新独立国家没有一个采用联邦制国体，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另外，苏联的成立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如果促成苏联成立的诸条件发生变化，比如，各加盟共和国已不担心本国生存会受到外来威胁，加盟的共和国感到在联盟内已经不平等，经济发展因为现行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而受到阻碍，特别是在维系苏联存在的统一的共产党本身发生了变化，已经起不到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时，其结果又会如何呢？简言之，当初苏联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主客观原因变化了或丧失了，苏联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呢？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民族工作中的错误为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列宁之后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先后掌管苏联大权，其中掌权时间最长的是前三位领导人。他们在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赵常庆等译：《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8页。

苏联民族工作中有成就，也有过失，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民族工作的错误较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纠正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也有不少过失。民族工作方面的错误为尔后某些人攻击苏共和制造分裂提供了口实。

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就有：

第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产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一些经济十分落后的民族地区，例如中亚 5 个加盟共和国，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超过 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

第二，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据统计，1984—1985 学年，在 14 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中有普通中小学 6.84 万所，在校学生 2430 万，占全苏 54%；中等专业学校 1924 所，在校学生 201.84 万，占全苏 45%，高等专业学校 392 所，在校学生 223.89 万，占全苏 42%。^① 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 8 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基本形成。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除苏联中央党政领导机关中一直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干部外，各加盟共和国及其所属州、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基本为当地民族人士。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实现干部民族化。

第四，社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1979 年农民在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仅为 6.5%，农牧业人数最多的土库曼斯坦也只占 33.4%。

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民族理论方面出现了偏差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的看法有误。斯大林夸大民族关系的阶级性质，一度将民族问题作为敌我矛盾对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人则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夸大成绩，粉饰矛盾，认为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加快

^① 参见《苏联东欧问题》1987 年第 3 期，第 41 页。

民族接近和统一，甚至称“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完全、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① 苏共民族政策主要是实现各民族全面接近和完全一致。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承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因此对民族问题往往报喜不报忧，竭力掩盖事实上存在的各种民族问题。一旦掩盖不住，就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结果使大量民族问题积累下来，或失去最佳处理时机，或处理失当，这些都形成了积怨。

(2) 高度集权体制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

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通过“一平二调”帮助落后民族地区发展的一面，但也存在剥夺作为联盟主体的加盟共和国应享有的权利的一面。联盟中央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和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产值只占共和国产值的6%^②。共和国能支配的资产数量极其有限，连修建一所普通学校也要得到联盟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生产计划的安排、产品的销售完全由中央一手控制，共和国无权过问。然而，共和国却又要承受由于各种企业兴建而带来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共和国并未因为在其境内大量兴建企业而使当地人民受益。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他还说，“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700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万吨石油、50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③

(3) 大俄罗斯主义挫伤民族感情，影响民族团结

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例如，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合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343页。

② 果洪升主编：《中国和前苏联民族问题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③ （土库曼斯坦）萨·尼亚佐夫，赵常庆等译：《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155页。

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不满，苏共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是从斯大林时期起始终把反对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少数民族，而很少甚至不提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美国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谈到苏联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作用时写道，“非俄罗斯民族的怨恨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纵向上是反对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的中央统治；横向上是公开表现出的非俄罗斯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和行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削弱以至最终割断莫斯科的大俄罗斯人强加给他们身上的纽带关系”。^①

（4）犯过给少数民族留下惨痛历史记忆的错误

例如，“大清洗”运动使很多少数民族干部包括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含冤而死，对民族干部造成巨大伤害；二战期间对12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涉及440万人，不少人在迁徙途中和新居住地死亡；“一刀切”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重大损失，例如，在哈萨克斯坦，1928—1932年间，不仅畜牧业遭受严重破坏，还造成230万居民死亡，90多万人因不堪忍受饥饿和被硬性改变生活方式迁徙国外；对波罗的海地区强行扩张，由此留下后患，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突破口等。

（5）教条主义的后果

勃列日涅夫本可以利用1977年修改宪法机会，接受某些人建议修正双重主权国家原则，并制定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法、加盟共和国退盟法等法规，以完善国家体制。但苏联领导人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在宪法中继续保留各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的规定。这既为后来民族分立分子攻击苏联当局破坏联邦制提供了口实，也为他们搞分立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

总的来看，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的成绩与错误并存，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倾向与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并存，民族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苏联民族工作的错误在一些民族中产生积怨，有些共和国中潜伏着离心倾向。不过，由于这一时期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壮大，多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经济和

^①（美）布热津斯基，姚云竹译：《大失败》，军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页。

文化发展较快，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联盟国家对各民族人民的凝聚力要大于离心力，特别是有统一的苏共的存在及其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对苏联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存在还不构成重大威胁。

戈尔巴乔夫的最大过错在于剪断维系苏联统一的纽带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在他上台前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积怨，但如上所述，他上台的1985年时民族问题并不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最重大和最危险的问题，国家亦未出现即将解体的先兆。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仍能一呼百应。尽管当时苏联已经陷入困境，不过人们还是相信在年轻的领导人的率领下国家会渡过难关，迎接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苏联绝大多数人对他提出的改革和使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战略持欢迎态度。当时不仅苏联人自己不会料到，就是对苏联持有敌意的人也不曾料到，一个能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竟在他执政后不到7年解体了。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过错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一人，但他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难辞其咎。苏联解体后我曾访问过曾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今已经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独立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当年的一些做法仍贬多褒少。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的解体仍持遗憾的心情，特别是普通民众。至今，前苏联国家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怀好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他当政时期苏联解体了。

戈尔巴乔夫在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与导致苏联解体有关的哪些问题上存在过错呢？

第一个过错表现在他不了解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因此，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比较草率。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共和国的情况，特别是对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起码有以下几点可以证明他忽视了民族问题：（1）他只注意到苏联经济和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却认为民族领域是“顺遂”的；（2）由他主持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重申“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在谈到苏共民族工作的新任务

时，仍无视长期以来苏联存在损害民族利益的事实，继续把“反对地方主义和民族局限性”放在首要位置，^①在民族政策方面并无新意；（3）在调整民族地区干部时较少考虑民族因素，甚至改变各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由当地民族人士担任这一传统做法，派俄罗斯人科尔宾出任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导致1986年12月发生轰动一时的“阿拉木图事件”；（4）他未料到，由他倡导的“不留历史空白点”的政策使多年民族积怨火山般爆发，并演变为民族战争和民族分立运动。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个问题（指民族问题——作者注）的意义，没有及时看到这其间所包含的危险性”，当严重的民族问题出现时，“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②曾作为苏共中央第二把手，与戈尔巴乔夫一道掌管苏共大权后被废黜的利加乔夫，199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演时也承认，苏共领导层没有及时看到苏联那时面临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立运动。^③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执政前期说得轻些是忽视了，说得重些是不懂得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潜在的危险性。

第二个过错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民族关系之间的问题，以至于错误的改革方针引发棘手的民族问题。

戈尔巴乔夫说得最多的是改革。从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以后，改革贯穿在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其中包括民族关系领域。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就认为苏联已处在停滞状态，如不进行改革国家会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④根据1987年的苏联实际情况，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问题并无大错。在民族关系方面，1988年之前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使各民族真正平等、民族精神繁荣和相互充实的一种制度，^⑤“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从族际主义立场出发处理民族问题”，^⑥一切“与族际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② 《真理报》1990年7月3日。

③ 参见《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第6页。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⑤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1987年一月全会上的讲话，载《真理报》1987年2月28日。

⑥ 对苏联新闻界领导人的讲话，《真理报》1987年1月14日。

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苏共都不会接受。^①这样看问题也没有错。

那么，错在哪里呢？现在看来主要错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等口号。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提出这些口号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提法会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带来什么后果。今天人们看到，正是借助于这些口号，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提出了当年苏联吞并它们的合法性问题，并要求脱离苏联。也正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条件下，因领土和其他问题一些共和国或共和国内民族地区爆发战争，有的纷争持续多年，各国独立后还得不到解决。也还是受到上述口号的蛊惑，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出现了形形色色要求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导致苏联出现激烈的动荡。这为尔后民族主义泛起和民族运动遍及整个苏联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经济改革进展不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主张。改革的主要对象：一是制度，即他所说的“兵营式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其制度的制定者和具体推行者——苏共。如果说，这种改革产生的后果当时人们还看得不十分清楚，那么在苏联剧变和解体已成为现实的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苏共从此走向内乱和分裂，并直接影响到苏联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关于苏共的变化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论述。

第三，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另一项内容是改革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向共和国适当分权。

应该说，这项改革是被动进行的，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而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原因是：其一，戈尔巴乔夫在猛烈抨击前领导人推行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无法回避联盟中央对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及共和国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其二，从1986年起民族纠纷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寻找产生民族纠纷的原因时，他也无法回避多年来苏联背离了联邦制原则这一事实。

由于是被动进行的，缺乏深思熟虑，因此在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分权问题

^① 戈尔巴乔夫：《在奥廖尔农业问题闭幕会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11月16日。

上具有仓促应变的性质。从 1988 年提出分权到联盟解体的短短三年时间中，分权的提法发生多次重大变化，起码可以举出四种：第一种是联盟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加盟共和国，但联盟居于主要地位，用一句话表示就是，“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第二种是在上述提法遭到反对后，1988 年 9 月他又提出另外一个说法，“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表示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不分主次，同等重要；第三种是这一提法仍不为加盟共和国所接受，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通过“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的情况下，他又推出成立“主权国家联盟”的设想，这时联盟已退居次要地位；第四种是在联盟仍搞不下去的情况下，最后想用“邦联”来维持残局。戈尔巴乔夫在分权问题上作出如此大的修正和让步，固然同国内形势变化有关，但也说明，他在分权问题上并未吸取其前辈的教训。事实表明，以民族为特征形成的共和国一旦出现与中央争权，而中央软弱无力无法控制的时候，共和国的政治期望就可能演化为谋求分立的行动。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这种危险性要远远胜过个别民族之间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一班人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日益削弱苏共，并最后丧失了领导地位，这样也砍断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苏共，并最终葬送了苏共。这对民族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苏共变化与苏联民族关系特别是与苏联解体有重要的联系。

苏联从诞生之日起就表明，没有苏共就没有苏联。多年来，苏联各项工作的成绩是在苏共领导下取得的，各种问题也与苏共息息相关。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民族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冲突迭起，既与苏共工作失误有关，也与苏共当时的变化分不开。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要改变苏共几十年来的“专横的官僚体制”，包括更新领导层和修正苏共的建党原则、活动方式及其在国家中的地位。显然，这些改革是需要的，但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与步骤，一下子要改变长期积累下来的苏共存在的严重问题，就难以达到目的。事实已经证明，改革的结果是造成党内派别林立、丧失宪法规定的执政地位、威信急剧下降、退党人数猛增。“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辞去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中止共产党的活动，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实行全国“非党化”，使共产党陷于瘫痪状态。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被迫或独立，或更名，或解散。苏共的变化对民族

关系的致命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苏共中央领导自我否定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共和国党组织无法理直气壮地工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改革几年收效不大，甚至出现全面危机，于是人们对苏共的作用和领导能力产生怀疑。民族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央路线的执行者，因此，也成为各种反共势力攻击的对象。中央无能、朝令夕改，共和国党组织无所适从，工作十分被动。

（二）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使民族地区的共产党遭到严重打击，有的丧失了执政地位。民族地区成立的新党普遍具有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共产党若与之抗争，保住执政地位，也不得不突出民族因素，甚至求助于民族主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实施，一方面为政治反对派上台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内的民族主义滋长和泛滥创造了条件。

（三）尽管苏共声称不接受联邦制原则，但戈尔巴乔夫改革却助长了共和国党组织谋求联邦化的倾向。苏共二十八大报告承认，随着改革联邦制，党内出现了联邦化和从苏共分裂出去的倾向。^①

苏共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暴露了以往苏共建设中问题很多。苏共的变化是从中央开始的。共和国的广大党员，包括一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尽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存在看法，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当然，民族地区苏共的工作软弱无力，形式主义盛行，官僚主义严重，贪污腐化，严重脱离群众，也是苏共在关键时刻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原因。

“8·19”事件前，尽管苏共已经明显削弱，但仍然是维护苏联统一的一支力量。1991年3月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表明，凡共产党掌权的共和国，一般都支持保留苏联；凡非共产党执政的地方，大多数反对保留苏联。如上所述，1922年苏联能够成立起来，其重要条件之一在于有统一的强有力的共产党的存在。“8·19”事件之后，统一的苏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年苏联得以建立的最重要条件不存在了，维系国家统一的纽带被剪断了，苏联的解体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了。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叶利钦对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联邦起了重大的作用，其领导人叶利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俄罗斯联邦反对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就很难实现。相反，如果俄罗斯联邦主张解体并加以推动，那么苏联解体就在所难免了。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面积约 1700 万平方公里，占苏联的 76.3%；人口 1.48 亿，占苏联的 51.3%。该共和国拥有苏联 63% 的固定资产，其社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约占苏联的 60%，农业产值占 47%，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占苏联的第一位。俄罗斯联邦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也是苏联最大的民族。俄罗斯联邦对苏联的存在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没有俄罗斯联邦，苏联根本不能存在。如果俄罗斯联邦当局不与苏联当局合作，苏联也休想稳定。

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由于政见不同，曾将叶利钦逐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而叶利钦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结束。1990 年 5 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翌年当选首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利用俄罗斯联邦内部不断膨胀的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在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于 1990 年 6 月 12 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其中提到“俄罗斯法律至高无上”。对于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出：“正是在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联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权后，苏联解体就具有了不可逆转的性质。”^① 事实证明，正是在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宣言》之后，其他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也纷纷通过《独立宣言》。也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一再受阻。纳扎尔巴耶夫曾这样问道：“俄罗斯向何人要主权？为何要主权？俄罗斯本来是苏联的核心。”^② 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俄罗斯联邦，确切地说是叶利钦，在向戈尔巴乔夫要主权，或者说是与他争权。因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总统仍在领导苏联。从法律上讲叶利

①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陆兵 王嘉琳译：《站在 21 世纪门槛上》，时事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 页。

②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陆兵 王嘉琳译：《站在 21 世纪门槛上》，第 27 页。

钦应该服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苏联框架内叶利钦取代戈尔巴乔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利用俄罗斯联邦这块构成苏联核心的阵地，向戈尔巴乔夫频频发起攻势，使戈尔巴乔夫改革联邦制设想成为泡影，使苏联的存在呈现岌岌可危之势。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总统，而不是构成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任何一国的总统，只要苏联不存在，或者不像以前那样可对所有加盟共和国行使权力，戈尔巴乔夫这个总统也就形同虚设了。叶利钦正是用这种手段联合某些加盟共和国与戈尔巴乔夫明争暗斗，使戈尔巴乔夫在斗争中节节败退。如果说“8·19”事件之前戈尔巴乔夫尚可依靠苏共的影响控制一些由共产党掌权的加盟共和国，勉强维持统一的苏联的外壳，那么，“8·19”事件之后，由于统一的苏共已不存在，维系统一苏联存在的纽带已被剪断，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影响共和国的最后手段，苏联分裂成 15 个加盟共和国已迫在眉睫。1991 年 12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从形式上打破了“统一苏联”这个外壳，变相废黜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尽管还想进行最后一搏，然而同年 12 月 21 日，由苏联 11 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的《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书》使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苏联而进行的最后一搏也彻底失败，存在 70 来年的泱泱大国从此成为历史。应该说，最终打破苏联躯壳的是各加盟共和国，而其领头羊无疑是以叶利钦为总统的俄罗斯联邦。

苏联解体内因为主，国外敌对势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苏联民族关系问题上，明显可看到国外势力在起作用。多年来，美国通过欧洲自由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对苏联播音，每周累计播音时间长达 460 小时，在苏联各民族间进行挑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西方人员自由出入苏联，在少数民族地区大肆活动。凡有民族闹事的地方，都有西方人员的身影，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群众团体中还有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顾问”。美国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分立活动。乌克兰尚未独立之前，美国即放风说可以考虑承认它。西方敌对势力把苏联的民族关系领域看成是苏联的“软腹地”，积极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

国外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方经济在科技革命带动下的发展对原苏联

东欧国家产生的冲击作用。苏联后期经济发展缓慢，与西方国家发展差距拉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与西方国家形成很大的反差。经济竞赛的落后给民族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应该说，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影响超过了它们的宣传作用。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在沙俄版图上建立的一些国家害怕帝国主义进攻而趋向联合，那么，在90年代初，苏联一些共和国并不惧怕外来影响，相反却争相脱离苏联向西方靠拢，这说明，在苏联民族冲突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用什么模式改造共和国之争。苏联在与西方经济竞赛中吃了败仗，丧失了凝聚力，这是外部影响的重要力量所在。

数十年来，西方一直在反对苏联，同样，苏联也一直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苏联和美国同为联邦制国家，结果，苏联解体了，美国却没有。这说明问题主要在国内。另外，国外影响一直存在，为什么苏联早没解体，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解体了？这里我想借用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1971年在一篇题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意义》的文章中写道，像苏联这样的大国，仅靠外力是无法使它解体的，分立主义在苏联能够实现，必须是在苏联国内出现危机和国际灾难相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国内危机是指：苏联领导瘫痪，社会上层分裂，是非混乱，思想败坏，进退失据，无所适从，此外还包括经济停滞。国际灾难是指因国际冲突引起的某种重大崩溃，使整个苏维埃面临挑战。^①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国际冲突方面并未发生苏美大战和其他重大国际冲突。国内形势则展现了布热津斯基所描绘的情景。这说明，虽然存在国外影响，但关键还在于自己内部，即我们常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戈尔巴乔夫接过的是处于颓势的苏联，他本人又治国无方，苏联在他手中解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需要指出，苏联解体并非是民族问题一种因素造成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模式长期未能得实质性改革的结果。但从国家解体角度来看，民族问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值得深入研究，其教训深刻，值得后人吸取。

^① 译文载《民族译丛》1989年第2期。

84. 如何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问题？

陆南泉

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效如何评价，这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它不仅涉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指导思想与一些重大政策，还涉及与苏联剧变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中，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亦不尽一致。本文提出一些看法，以借此机会听取批评意见。笔者认为，通过讨论，可以对 70 多年的苏联经济建设的评价，达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事实的目的，以便我们从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搞好。

经济建设的成就

苏联经济经过 70 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 1937 年 3 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居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苏联通过实施超高速工业化的政策，使其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苏联在二战前的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不仅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斯大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方面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如果 1928 年私人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为 28% 的话，那么到了 1933 年已降至 0.5%。在农业中，私人经济在同一时期由 97% 下降到 20%，零售商业则由

24%下降到零。^① 到 1937 年，社会主义经济在全苏生产固定基金、国民收入、工业与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分别占 99%、99.1%、99.8% 与 98.5%。^②

由于取得以上的进展，1936 年苏联公布了新宪法。斯大林指出，新宪法的基础是“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这样，在苏联建立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二战后，苏联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斯大林逝世后，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苏联成为能与美国争霸的军事、经济超级大国。

对苏联 70 多年经济建设的评价问题，之所以至今在我国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的看法，这里可能与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有关。如果从发展速度来看，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特别在斯大林时期）比西方大多数国家快得多；如果从整个工业来看，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如果从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发展来看，苏联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不少部门与重要产品赶上和超过了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军事力量与军备竞赛来看，苏联的赶超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军事实力不仅与美国达到平衡，并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美国，从而成为超级大国。这些能否说明苏联经济建设是成功的，苏共把经济建设搞好了呢？

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果我们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苏联在 70 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严重的问题。可以认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

（一）经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危机

苏联经济并没有实现持续与稳定的发展，而是到后来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出现的经济危机。

① 参见（俄）T·M·齐姆希娜：《俄罗斯经济史》俄文版，2000 年，第 244—245 页。

② 参见（苏）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陆南泉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5 页。

随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即出现了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详见表 1）。

表 1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0 年
社会总产值	7.4	6.3	4.2	3.3	1.8	-2
国民收入	7.8	5.7	4.3	3.2	1.0	-4
劳动生产率	6.8	4.5	3.3	3.1		-3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编制。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出现危机，导致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 1980 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 67%，到 1988 年下降为 64%。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看，1990 年约为美国的 40%，而十月革命前的 1913 年俄国这一指标为 39%^①。据俄一些学者分析，按人均计算 1989 年苏联的 GDP 为美国的 30%，工业产值为 42%，农业产值为 3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990 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苏联的实际 GDP 为美国的 39.67%，人均 GDP 为 34.96%。

这里要指出的是，7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和大量生产与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② 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在 4 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以上情况告诉我们，对苏联经济发展速度要客观地加以分析，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很难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积极评价苏联经济的一个重要根据。

① 就是从斯大林执政高速发展的 30 年来看，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仍未超过沙皇时期。

② 据保守的估计，1974—1984 年苏联获得的石油美元约 2700 亿—3200 亿美元。

（二）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

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

苏联自 20 世纪 30 年代消灭失业后到 80 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 200 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占国民收入的 30% 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 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 1961—1987 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5.4%，而基建投资为 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 70 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 90%，耗电量多 20%，耗石油量多 100%，水泥用量多 80%，投资多 50%。

70 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 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由于整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 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 年苏共二十七大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

苏联一直到 1991 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 1970 年的 55 戈比下降到 1990 年的 28 戈比。80 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 1—1.5 倍。

经济增长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的综合素质。落后的苏联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它不可能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当发展经济的粗放因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日益受制约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乃至发展到危机。我们在分析苏联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就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这一情况。

（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

长期来，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的发展战略、政策主要是为扩军备战和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的。从斯大林执政开始，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军事力量的赶超。这样的结果

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期难以平衡，而且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 间的1.04:1 扩大至1971—1980 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 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1.7 倍。苏联工业的80% 与军工有关。由于偏重发展重工业，牺牲农业，把农民挖得很苦，使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苏联时期“三农”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给苏联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苏联“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4—5 倍”。^①“没有任何敌人能像军国主义化那样吞没一切，给经济造成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在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②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世界大国中苏联经济结构畸形与比例失调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70 多年来，苏联经济从来都是不协调地、不按比例地发展着，因此，给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在调整经济结构时带来极大的困难，也是阻碍俄罗斯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半封闭的经济

长期来，苏联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 左右的对外经贸合作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苏联与经互会成员国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其国内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延伸，市场经济机制并不起作用，经济不是走的开放式发展道路。这样，使竞争机制基本上不起作用。因此，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水平大大低于西方一些国家。1988 年，苏联对外贸易出口额占其 GNP 的 7.7%，而 1980 年，世界贸易出口额就已占世界 GNP 的 21% 以上。^③ 至于苏联在国外的投资与国外对苏联的投资，那更无法与西方一些国家相比。这些因素，决定了苏联经济素质难以提高，其竞争能力一直处于低下水平。

（五）不少经济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

苏联发展经济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苏联大力发

①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1 页。

②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9 页。

③ 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 页。

展军事工业，与美国搞军备竞赛，是在经济实力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受到严重影响。长期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1950年苏联居民年均肉消费量比1913年少3公斤，粮食少28公斤。^①1952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收入所购买的食物数高于苏联3.6倍，美国则高于苏联5.5倍，^②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这也说明，长期来，苏联治国的主导思想是强国而不是富民。

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苏联经济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从客观上讲，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建设经验，加上不利的国际环境，难免在发展经济过程中产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能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缺乏经验，更不能把缺乏经验说成是全部原因。70多年来苏联经济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它是受一系列的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

长期来，苏联一直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先是斯大林搞超高速工业化，接着，于1939年3月又提出，苏联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考虑到赫鲁晓夫过于强调速度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所出现的问题，不得不注意解决经济的“质量与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问题。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提出了“加速战略”。

苏联实行的赶超战略，不只是脱离客观实际，而追求的目标也主要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

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在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提出：要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这是

① （苏）《1970年苏联国民经济》俄文版，莫斯科1971年，第561页。

② 转引自左风荣著：《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斯大林在 1936 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之后提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 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设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不得不退到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又从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降至“起点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又进一步降至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改革。

在超越发展阶段思想指导下发展生产，其严重后果是不顾生产力的水平而不断地改变与折腾生产关系，以最快速度消灭私有制，建立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不相适应，从而对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

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是明显的例子。1953 年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未达到沙皇时代 1913 年的水平。这一年，人均占有的粮食和肉类的数量分别只有 432 公斤和 30 公斤，比 1913 年的 540 公斤与 31.4 公斤还低。另外，发展生产是通过阶级斗争与各种政治运动的办法进行的，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且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阶级敌人”与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

这种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通过所有制改造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讲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① 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建立“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到头来，还得通过改革退回去，退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方式上去。所有转轨国家在改革过程中，都面临着打破“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这一复杂的任务。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模式就建立不起来，也难以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对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② 对这个问题苏联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制定与实行了一系列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政策。这是个根本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1995 年版，第 3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3 页。

（三）背离革命与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

革命与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人所共知的最简单明了的道理。苏联为了追求霸权地位，在进行大力扩充军备时，由于受其经济实力的制约，它往往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去花大量资金发展军事工业。所以，根本不可实现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要“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要求。

这里讲一个苏联的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后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

（四）不能适时地改革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建国初期，这种体制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特别在战后，传统的体制日益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体制反映出来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日益明显，并且变得越来越尖锐。这种体制又不能适时地进行改革，排斥市场的作用，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效益也很难提高。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苏联经济是长期被束缚在这种已缺乏动力的体制下发展的，最后出现社会经济危机。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这说明，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

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①应该说，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不能及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是苏联经济建设未能搞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五）苏共在理论上缺乏创新，不能与时俱进。

苏联长期来不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作出科学判断，并及时地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与根本改革其已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经济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没有注意改造自己，没有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从而，没有保持自己思想、理论的先进性。就是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没能根据客观变化的情况去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不能与时俱进，而是长期思想僵化，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潭。从苏联经济发展道路来看，根据苏联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把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经济，苏联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对外贸易垄断等，都写进了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集中体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内容，并上升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从经济体制改革来看，长期来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使苏联历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是修修补补，最后以失败告终。

苏共没有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在理论上没有与时俱进，因此，它不可能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回答与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种种新问题，而只是用强大的宣传机器和强制的方法向广大群众灌输，这不可能让人民信服，不可避免地产生“信任危机”。

苏联经济理论长期僵化，不能创新，与时俱进，这与苏共党内与整个社会缺乏民主以及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

另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持不同观点的人动辄扣政治大帽子，进行“批判”，许多学者遭逮捕、被非法审讯，被送进劳动营、精神病医院甚至被枪决；对人类历史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往往加以排斥与否定。这种条件下，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往往只能是领导人著作与言论的诠释者。

理论的僵化导致体制的僵化。不能及时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第2卷，第333页。

就不可能及时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这说明，保持思想、理论先进性是加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邓小平说得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

苏联经济建设并没有搞好，苏共不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因此，苏联经济的发展亦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邓小平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的1990年3月3日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② 后来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苏联发生剧变后，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③ 胡耀邦同志谈及苏联问题时说：“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都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看来主要问题有：第一，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日用品至今还解决不了，集体农庄粮食产量仍然很低，工人农民不满，都有意见；第二，外交政策很失败，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以‘老子党’自居，还在国际社会中实行大国霸权主义，把革命强加于人，企图统治全世界；第三，民族团结问题也没有搞好，实行大俄罗斯主义，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口号掩盖民族间的矛盾，但是掩盖不了；第四，民主问题、领导作风问题、‘家长制’、专制独裁，等等。问题还有不少。”^④ 很清楚，在这里，胡耀邦同志把苏联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归结为经济建设没有搞好。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与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些已是世人公认的。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页。

④ 转引自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第2页。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在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决定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政策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笔者深信，只要我们不走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老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85. 法制建设的缺失与苏联剧变是什么关系？

左凤荣

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关的论述也不少，但很少有人关注法律问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法不依是普遍的现象，法律成了想用就用，不想用则弃之不顾的东西。在苏联制度演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苏联的剧变是不遵循法律、没有法制的结果。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法制缺失现象

考察苏联的历史，我们发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苏联并没有建立起法制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后，近代国家与封建时代国家的明显差别在于治国手段的变化，权力制衡原则代替了个人专断，权力任期制和轮换制代替了终身制与继承制，权力选举制代替了任命制，而这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在夺取政权和革命胜利初期，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① 列宁强调革命的暴力性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稳固的领导地位之后，则应该制定出适合新政权特点的法律体系，苏联共产党也应该在无产阶级自己的法律制度下执政。但是，苏联领导人把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594—595页。

无产阶级民主具体化为法律形式的意识比较淡漠，许多好的政策、目标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作保障。

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列宁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内容的同时，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重视不够，他曾说：“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①从实质上讲，无产阶级政权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的，苏俄的许多措施也证明了这一点，有完备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比无产阶级民主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的话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民主同样也离不开体现其内容的形式，一概抛弃民主的形式也是不行的。苏联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相应的形式，民主内容也难以实现。苏联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国家，应该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但是，由于苏联长期实行的是无选择的“民主”，干部是党组织层层任命的，苏维埃的代表也都是党指定候选人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人民的民主权利没有相应的民主形式予以保障，苏联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不民主的体制。当国家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的需要发生矛盾时，民众毫无办法。

在法律制度建设上，苏联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许多好的想法没有相应的法律形式保障其实施。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说过：“做生意吧，发财吧！我们允许你这样做，但是我们将加倍严格地要求你做老实人，呈送真实准确的报表，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②但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并没有详细的规定和具体的实施办法，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所以新经济政策后来被斯大林轻易地改变了。再比如，1921年俄共（布）十大通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指出，“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党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626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428页。

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① 但是，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定来贯彻这个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变成了一纸空文。

斯大林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后，他个人逐渐成了党和国家的化身，他的话就成了法律。对农民的全盘集体化政策是斯大林改变党的决议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斯大林和党代表苏维埃制定国家的法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这是斯大林个人的决策。按照苏联宪法的规定，苏联的立法权属于苏维埃，但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过程中，苏维埃的作用十分有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党的十六大通过的；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苏维埃机关也没有参与。斯大林强调，“我们布尔什维克是执政党，执政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种政党的口号不是单纯地鼓动性的口号，而是一种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因为这些口号具有实际决定的效力，具有法律效力，应当立即予以执行”。^② 这是苏共长期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思想根源。

苏联宪法中规定人民有权罢免苏维埃代表，但在什么情况下，怎样才能罢免代表，长时间都没有具体规定。这一问题直到1959年10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罢免代表程序法》，1961年又通过了关于罢免地方苏维埃代表程序的法令，规定了罢免苏维埃代表的具体程序，这一法律条文才完善。

1936年的新宪法在扩大公民权利方面比1924年的宪法更民主，它用平等的选举代替不完全平等的选举，用直接的选举代替多级的选举，用无记名的选举代替记名的选举。宪法规定，“一切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自村和市的劳动者代表苏维埃起至苏联最高苏维埃止，都由公民直接选举。”凡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信仰、教育程度，不问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过去职业如何，都有权参加选举，只有按照判决被剥夺选举权和患精神病者除外。凡年满23岁的苏联公民，都有资格参选最高苏维埃的代表。^③ 但事实上，他们只有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5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8—59页。

③ 姜士林、陈玮主编：《世界宪法大全》（上），中国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2—1063页。

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因为候选人是由党组织决定的。

苏联宪法第124、125条规定：法律保障苏联公民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第127条规定了苏联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任何公民，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得逮捕。第128条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及通信秘密，均受法律之保护。遗憾的是这些权利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所谓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及示威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居民甚至没有迁移的自由。1932年底苏联开始实行身份证制度，身份证只发给城市居民，市镇、中心区、新建筑工地、国营农场等地的工人，农村的居民（集体农庄庄员）则拿不到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连一张火车票都买不到。在30年代“大清洗”中，连有法律豁免权的苏维埃代表都未经法院审判就被处死或被关押，何况普通的干部、知识分子？

在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树立起尊重法律的意识，也没有建立完备的法律系统。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是有法不依成为普遍现象，在决定事件发展的过程中，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和权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法律系统不完备，留有许多空白，法律“治民不治官”，随意性强。苏联也没有法律监督系统，宪法和法律不落实或者出现争议，没有仲裁机构裁决。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的“修宪”问题

戈尔巴乔夫从1985年开启了苏联改革的闸门。随着改革的深入，苏联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修宪”问题便提了出来，这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推动的结果。同时，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来的体制，也需要有法律基础。

苏联的宪法改革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8年到1989年，是进行议会制改革，其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第二阶段从1990到1991年，改行总统制，加强总统的权威。从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开始，在2年半的时间里，宪法多次被补充和修改。

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这个法律系毕业的领导人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注意了用法律巩固改革成果、规范改革的行为。但是，戈尔巴乔夫也有许多改革措施与宪法和法律并不相符，只是事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修改法律，做合法性追认。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宪法的修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体制改革推动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是打破原来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模式，许多改革措施与原有法律相悖也并不令人奇怪。如，1986年11月19日通过《苏联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从事个体生产经营活动，但不得经商、不得雇工、不得搞非法劳动收入或损害其他公共利益。1988年5月通过、1988年7月1日生效的《合作社法》规定，不仅农业，而且在商业、服务业、饮食业、小商品生产、旅游、医疗保健、法律咨询等方面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所有制结构更趋多样化，实际上承认了私有制，与宪法并不符。

从1987年苏共一月中央全会后，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关注的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次代表会议后，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8年7月底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苏维埃工作的计划，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有法律的基础，因此，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决定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以便对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准备新的选举法律文件。1988年9月底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新的选举法律草案和宪法修改与补充法案，10月份提交全民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加强苏维埃的威信，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维埃代表由公民选举产生的原则，似乎是将宪法中规定的“苏联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作为苏联政治基础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行使国家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条款付诸实施，但戈尔巴乔夫以党的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而且地方也如此行事，显然加强了党对苏维埃的干涉，仍然是党政不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

1988年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12次非常会议第11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通过了两个法令：关于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关于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是各级苏维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选举其中544人组成常设的最高苏维埃。最高

苏维埃由权力相等、人数相同的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一部分从选区和社会团体中直选，一部分由民族选区和社会团体推荐。“各级人民代表按单名选区或多名选区、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选举产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部分人民代表可根据共和国的宪法规定由社会团体选举。”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代表都普选产生。在后来的实践中这种做法遭到了许多批评。

既然苏维埃成了差额选举产生的机关，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6条。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和干部任命权实际上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组成。

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苏联第一届人代会召开，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起初有150人，1989年夏天发展到388人，其中286人来自俄罗斯联邦。这实际上打破了苏联长期实行的一党制。萨哈罗夫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宪的问题，没有得到响应。人代会通过了《关于内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和《关于建立宪法委员会》的决议，提出一个重要任务：立即开始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领导，共有107名成员，其中55%的成员都是党的高级领导人——苏共中央、共和国中央、州委、边区的书记们，苏共中央及其机关的成员。将近44%是从事科研和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库德里亚夫切夫教授，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所长、通信院士多波尔宁。还有四个反对派、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和索布恰克。^①

1989年12月第二次人代会召开，萨哈罗夫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激进的苏联宪法草案，否定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大会没有对此进行讨论。此届人代会讨论了宪法的补充和修改问题，通过了“关于准确解释苏联宪法（基本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机构的活动制度的问题”，“关于苏联宪

^①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XX век. М., Изд - во Моск. ун - та. 1999. С. 238.

法选举制问题的修改和补充”，“关于对宪法第 125 条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国家权力代表机关体制是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人民代表苏维埃直接地或通过它所建立的机关来领导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通过决议，保障这些决议的执行，对决议实施进行监督。这次人代会对宪法的补充和修改，原则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质是使国家的权力逐渐从党转到苏维埃、从苏共中央委员会转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但是，最高苏维埃本质上的功能是议政、立法和监督，不能有效地作出决策，它也缺乏有效地贯彻其决策的系统，因此，出现了权力真空和失控的现象。

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失去了对苏维埃的控制，它导致政治家和党员不再对苏共中央负责，而对选民负责。地方分离主义开始迅速发展，联盟中央失去权威。苏共开始联邦化，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1989 年 12 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1990 年 6 月 19 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 62%。“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① 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实际上就打破了 1977 年苏联宪法规定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苏联政治体制框架。

为了弥补最高苏维埃议而不决的缺陷、摆脱党对戈尔巴乔夫的阻碍作用，权力归苏维埃没多久，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提出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思想，同时还陆续派出一些团体公开或秘密地前往美国、法国等地考察西方的议会制和总统制。1990 年二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在苏联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予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便将改革的政策付诸实施。同时，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使政治多元化不可避免。1988 年结束了书报检查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出现，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其代表于 1988 年 8 月 13 日在雅尔塔进行工作会晤。到 1990 年初，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苏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虽然戈尔巴乔

^①（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 页。

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议会制以权力制衡和政治竞争为前提，不可能建立在一党制的基础上。苏联党内的民主纲领派和激进改革派要求实行多党制。这些因素迫使苏共在1990年2月中央全会上完全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第六条。苏共中央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取消关于苏共是政治核心，是社会领导力量的提法。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标志着苏联体制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分权制过渡。这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对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和补充”。规定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第一任苏联总统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期5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统是国家的元首，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总理、内阁成员、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公职人员的提名权，签署苏联法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解决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争端等；苏联最高苏维埃只享有立法和监督职能，卢基扬诺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人代会还通过了《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修改了宪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一切政党、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在履行其纲领和章程所规定的职能时，应在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进行”，“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社会团体，参加有助于发挥政治积极性和主动性、满足他们多种利益的群众运动”。苏共成了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地位一样的政党，苏共开始从一个执政党向一个在议会中活动的群众性政党过渡。“我们应当毫不含糊地声称，苏共将毫无保留、斩钉截铁、毫不妥协地摒弃践踏社会主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斯大林的思想 and 实践。党坚决支持苏维埃拥有全权，人民当家做主；党不再赋有政权职能和经济职能，不再奢望垄断地位，不再谋求意识形态上的强行一致。党将通过说服工作，通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参与议会辩论，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活动，去争取社会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支持。”^①在法律上苏联完成了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原则是：建立强有力的

^①（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2页。

总统机构、苏共不再是政治体制的核心、实行多党制。在人代会上，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联第一任总统。

《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还改变了苏联的经济体制，承认了公民个人所有制、承认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租赁制和股份制，克服联盟国家在所有制关系中的垄断地位，规定“国家所有制包括全联盟所有、加盟共和国所有，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区和其他行政区域单位所有”，取消了联盟对自然资源的独有权，规定“土地及其矿藏、水流、处于自然状态的植物界和动物界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由人民代表苏维埃管理和提供给公民、企业、机关和单位使用”。^①如果说政治体制方面的规定是规范下一步的改革，关于经济方面的修改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确认了前一阶段改革的成果。

1990年12月26日，第四次人代会再次加强总统的权力，通过了“关于完善国家管理体制的苏联宪法修改和补充法”^②，决定设立隶属于苏联总统的苏联内阁，苏联内阁对苏联总统负责。苏联内阁有权解决隶属于苏联管辖，而根据苏联宪法不属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联邦委员会权限范围的国家管理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作用只限于参与表决。设立了副总统职位，建立隶属于总统的国家检察机关、安全委员会、联邦委员会。

到1991年关注的不再是修改宪法的问题，而是制定新的联盟条约的问题了。戈尔巴乔夫享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权，但是，他没有力量实现这一权力，1991年“8·19”政变者试图肩负起总统的职责，遭到了失败。1991年9月2日苏联总统和10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发表声明，事实上停止了苏联宪法的效力，宣布进入准备新宪法的过渡时期。^③1991年9月苏联人代会第五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两个法令确认了这一声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代会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了。

从以上可以看到，苏联宪法修改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些条文是事后修改，以确认既成事实，如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第七条的修改；有的则是规范下一步的改革，如关于实行总统制和内阁制的条文。戈尔巴乔夫“修宪”

①（苏）《消息报》1990年3月16日。

②（苏）《消息报》1990年12月27日。

③（苏）《消息报》1991年9月2日。

的实质是改变苏联原有的体制，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命运与此前的法律并无多大差别，对于当权者来说，可以任意取舍。

法律的无效性及其严重后果

在苏联改革时期，苏联的各级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法制国家的意识，在决定苏联命运和改革的问题上，决定一切的仍是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是不遵循法律、没有依法行政的结果，是法律无效性的结果。

苏联是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联盟，其三部宪法都有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规定，但实际上只是当个招牌，并未真正打算实行。直到90年代初，面对波罗的海三国欲退出联盟，需要解决如何退出、怎样退出的问题，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才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脱离法制的结果。一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对法律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对于违背宪法和法律的人与事，没办法制裁。1989年建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由苏联人代会从政治和法律专家中选举组成，其成员有主席1人，副主席1人，委员21人，其中包括每个加盟共和国的一名代表，其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完全独立，只服从于苏联宪法。但这一机构没有执法的手段。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苏联境内立法调整的统一，制定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纲要”，“在发现文件或文件的个别条款与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相矛盾时，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向颁发该文件的机关寄送自己的结论，以便取消所产生的违法现象。委员会制定的这类结论终止执行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文件或文件的个别条款”，“苏联总统根据并为

执行苏联宪法和法律颁布命令，该命令在苏联全部领土上必须执行”。但是，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俄罗斯主权宣言，宣布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俄罗斯联邦法律高于一切，这明显违反苏联宪法，从此开始了“主权大检阅”，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宣称在共和国内本共和国的法律高于一切。这是明显违反苏联宪法的行为，苏联宪法和法律制度在这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代表的眼里，一文不值。在这一分离运动中，没有人想想是否合法。

“8·19”事件在加剧苏联解体进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事件发动者的行为显然是违反苏联宪法的。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总统，“为了确保苏联公民的安全，提出关于在个别地区宣布实行紧急状态的警告，而在必要情况下，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相应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请求或者同意，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在缺少这种同意的情况下，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立即将所作出的决定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由不少于其成员总数2/3的多数通过”。代总统亚纳耶夫关于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显然与此项条款不符。

在苏联宪法中，就重大事件进行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的结果是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叶利钦等人却置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于不顾，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便宣布了苏联这个由15个成员（当时还有12个）组成的联盟国家停止存在。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是权力，而对这种严重违法的事件没有任何制约的手段。

当一个国家的法律从上到下都没有人执行的时候，有宪法监督机构也是枉然的。现代化的文明国家同时也应该是法制国家，公民遵纪守法，官员依法行政。苏联共产党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但在政治上离现代化国家还很远，权大于法，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这种现象长期存在，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改革建立一个法制国家，他也很重视立法，但是，这些法律或者不合时宜，或者缺乏执行的手段，大多成了一纸空文。可以说，法律建设的缺失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原因。

86. 苏联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及对苏联剧变的影响是什么？

戴隆斌

苏联解体至今已有近 20 年，但是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

这个特权阶层，近 20 年来俄语用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这个词来表示。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系列，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作为集合名词，也可以指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个术语最初是指在各个领导机关之间进行的职能分配。^① 在进行职能分配时，这些机关必须进行任命的高级职务也被分别作了登记。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这一部分干部担任一定的

^① Михаил Восленский.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91. С. 82.

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由此，苏联也就产生了一个封闭的特权阶层。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官员名册”制度，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本来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曾多次讲过，党内必须实行广泛的定期的选举制度，选举出来的党组织负责人员必须汇报工作并且可以撤换。为了避免选举流于形式，列宁还强调党员有权利了解党的干部，了解他们的全部活动，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由在野党变成了政权党，但是一开始党就陷入党外党内、国内国外深刻巨大的危机之中，既有国内战争，也有外国武装干涉，还有因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而带来的国内不满情绪，因此，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保持党的思想、组织的高度统一，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凭借暴力，驱散立宪会议，取消普选权、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用卢森堡的话说，“取消一切民主制”^①。那时党内实行的是“战斗命令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上采取了任命制，派往各地的干部大多是直接任免的。在俄共（布）党的八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俄国共产党既然执掌了政权，掌握了全部苏维埃机构，自然应当使自己数以万计的党员去管理国家”。所以，“目前合理地分配党的力量，是取得胜利的主要保证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党的工作人员全部分配工作由中央委员会掌握。它的决议大家都必须执行。最坚决地反对各种地方主义和分立主义”。^②这里说的数以万计，究竟是多少？俄共九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写得很明确：“全党的主要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正确地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个决议还明确指出：“每个城市、省和工厂在调整党的力量的时候，都应当从如何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力量着眼；首先应当把工人党员分配到最重要的企业，而在这些企业内部分配党员时，则应当考虑使一切工厂都能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有主动精神的共产党核心”，“每一个下级组织每月一次或每两月一次向党的上级组织呈交一份包括该组织5%—10%人员的名单，注明他们过去担任过什么工作，该组织认为这些

①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65、568页。

同志适于做什么工作。这样的名单应当定期地由工厂支部呈交区委员会，区委员会呈交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呈交中央委员会。”俄共九大决议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①这实际上就是“职务名册”制的雏形。但是，随着国内战争的临近结束，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危机的不断加剧，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就要求向党内民主过渡，决议要求尽可能经常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公开讨论问题；展开对地方机关和中央机关的批评；在干部制度上以推荐代替任命，但在特殊情况下仍然可以实行任命制。^②在1921年党的十大上，列宁坦承当时民主实行得不够，并领导制定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决定改革党的组织体制和领导方法。其具体措施是：第一，强调党内实行“工人民主制”，把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制改为民主制。第二，要求排除干部委任制，“从上至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第三，建立有效的监察体制，决定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③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俄共（布）十大的决议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干部登记、任命工作并没有停止。负责这一工作的是1920年在俄共（布）中央和各省委会成立的登记分配部。它专门负责提拔和调动党的负责工作人员、干部登记等方面的工作。中央登记分配部隶属于俄共（布）中央书记处。1922年，中央登记分配部进行了10000多项任命。斯大林在1923年4月俄共（布）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对登记分配部进行改革，扩大该部的权力。他说：“登记分配部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仅限于登记和分配县委员会、省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的同志。登记分配部除此以外，说句俗话，就啥事不管了。现在，由于战争已经结束，群众性的一般动员已经用不着，并已失去任何意义（去年中央委员会负责动员1000人而遭到失败这件事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在目前条件下，工作已经深入，我们正在实行专业化的方针，

①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27、41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8—45页。

③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54—56、71页。

并且必须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一般动员只能于事有害，对地方没有任何好处)，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已不能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了。”“我应当谈谈中央委员会在登记工作人员的过程中在登记分配部内所实行的改革。我已经说过，从前登记分配部的工作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现在，由于工作已经深入，建设工作已经普遍展开，就不能仅限于县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了。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决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使局长在经济方面和苏维埃方面都有副局长协助他工作，使正副局长在登记企业和托拉斯的指挥人员、地方和中央的经济机关的指挥人员以及苏维埃和党内的指挥人员方面也有自己的助手协助工作。”^① 大会根据斯大林的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要求扩大和加强中央和地方的党的登记分配机关，“以便毫无例外地掌握所有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中广大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作人员”。并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在挑选“苏维埃机关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工作中加强党的领导，认为实现这一任务应该依靠正确的、全面规定的登记和挑选领导人和苏维埃、经济、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负责的工作人员的制度”。^② 这一决议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历次大会的肯定。

因此，从1923年起中央登记分配部改组为组织分配部（由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领导），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委员会，准备起草《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及其实施细则。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③ 1923年，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登记一统计局局长会议，有党的统计专家参加，会议不仅制定了总的统计方案，而且制定了有关统计技术特别是对各方面负责的领导人员进行个别考察的详细方案、格式和细则。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② 参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303页。

③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62，卷张32。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型：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① 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一项《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的详细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官员名册”。^② 所有这些诸如此类的文件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这实际上开辟了苏联“职务名册”制历史的新时期。从此任命制开始变成了党领导国家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职务名册”最初有两份：第1号“职务名册”和第2号“职务名册”。列入第1号“职务名册”上的职位任命要有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要列入第2号“职务名册”须得到中央组织分配部的同意。后来，把人民法院院长或者工会的、共青团的工作人员等也列入了第1号名册，这份名单由专门的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以便由相应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通过，并由中央委员会批准。没有进入第1号和第2号名册的职位选拔与任命，必须按照每一个国家机关确定的、征得中央组织分配部同意的名单来进行。它们就被称为主管机关3号“职务名册”，或者就叫第3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1925年11月16日的决议还有一份附件，即《关于同意任命和调动地方机关领导工作人员的方式的细则》，这份决议和附件责成各省、各边疆区党委和各民族地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各号‘职务名册’，着手编制地方机关职位的‘职务名册’，职位的任命要征得该地党的机关的同意和批准”。其中有一条规定：“各地党的机关所有有关调动和任命被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工作人员建议，都必须由中央组织分配部提交给党中央来决定，各地党的机关不得擅自任免工作人员。”

未列入第1号和第2号“职务名册”的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由相应的管理机关来任命，但在该机关党组织否决的情况下，则最终由“一个中央书记或者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来决定。各地（边疆区、州、省）机关领导人的任免须

① 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莫斯科，1996年，第313页。

②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136，卷张167—169。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按相应的地方党的机关的决议”来进行。^①

职位名单是经常变动的，几乎每年都进行重新研究，各年的职位数也不一样。通过中央组织分配部任命的官员，在1922年4月—1923年4月间（也就是决议通过前）有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间有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间有12227人。1925年根据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有297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013人），任命到国家银行的是92人（按照三个“职务名册”共计任命了130人），任命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是291人，任命到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11人，苏联政治保卫总局的是78人。^②在1925年这一年，按照第1号“职务名册”任命的官员有5723人。这样看来，“职务名册”就是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领导职务的清单，也就是充任这些职务或者候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名单。其职务充任不是由本部门的长官来负责进行的，而是由上级机关来进行的。

随着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不断膨胀，干部数量也大量增加，这就使得登记任命工作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1930年中央组织分配部不得不分为两个部：一个是组织指导部，其职权是管理特别的党员“职务名册”，另一个是任命部，其职权是编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包括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职务名册”。随着这种“职务名册”制度的全面推广，随着斯大林在苏联实行“大清洗”，原来在各级领导岗位的“列宁的近卫军”被关押甚至枪毙，随着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的确立，苏联的特权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末也最终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1946年，联共（布）又对“职务名册”制度进行了修订，补充完善了确定“职务名册”的程序，实施了新的“职务名册”，建立了后备干部储备以及对后备干部的政治素质进行审查和检查的制度，并规定要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和考察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1953年7月，苏共中央曾通过决议，削减进入“职务名册”的地方干部的数量。此后，官职等级名册

①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9，卷宗136，卷张167、170。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② 俄国现代史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68，卷宗459，卷张7—17；全宗69，卷宗142，卷张2。转引自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制干部的数量虽也经常变动，但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变动不是很大。据П·奥尼科夫（机关工作人员，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中央工作，达30多年）证实，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光党员在“职务名册”中的人数（不包括许多大的国家机关的职数）就达50万人，其中包括领导机关（从各农村区委到各共和国中央）人员439000人，党委书记和各部部长35500人，苏共中央机关在职人员2500人，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监察委员会委员720人。^① 随着戈尔巴乔夫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务名册”制原则也开始被触动。1989年10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个终止执行有关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②，“职务名册”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年“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建议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被彻底取消。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从产生到最终被取消，其间经历了60余年。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伴随着苏联“职务名册”制度的确立而逐渐形成的，可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而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有和斯大林模式共性的内容。具体来说，苏联特权阶层的特点可以概述如下：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从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

①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Фигатнер Ю. Ю. Советская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ы действия.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7. 1993.

② 《真理报》1989年10月16日。

层手中。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号名册，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册。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

由于这个阶层是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走向各级领导岗位并没有经过选举，而是上级任命的，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得阿谀逢迎、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唯上级命令、指示是从，而对普通群众、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等要求视而不见。另一方面，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在斯大林时期，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又完全集中在斯大林一人手中。本来在列宁时期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享有和中央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有发言权；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不得加以撤销，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把问题提交联席会议解决，如果同级党委会不能取得协议，可以把问题提交代表大会或本级代表会议解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专职，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和其他行政职务，等等。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逐步缩小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使之逐渐从一个与中央委员会的平行机构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并且改变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得兼职的方式。监委会主席改为任命制，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监委委员改为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它的指示进行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的修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能被一步一步地削弱，到最后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了。因此，造成了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与职位挂钩的特权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后改称部长）、总局局长等等，每一级都有一套专门的特权。按照级别享受各种特权：黄金地段的高级住房，免费占用别墅，专用汽车（领导人和妻子、儿女都有，有时甚至一人几辆供选择），专职司机，免费早餐与午餐，假日去修养所，往返休养所、疗养所的路费均由公

家开支、“医疗费”补助，阔气的狩猎，在特供商店里购买紧缺的商品和进口奢侈品（仅在莫斯科就存在数百家这样的商店），以及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特殊供应。另外，从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从1945年起，苏联政府规定，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特定工资制。除正式工资外同工资一起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的所谓“红包”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谈话时也证实：“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① 数量“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②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免费的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等。他的这一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在这一时期，苏联的这个特权统治阶层就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同时又把科技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地加以降低，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工资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处长虽不享有专用的小汽车，但他有权替自己预定用车，副局长享有一辆专用的‘伏尔加’，而局长则有另外一种更好的带有专用电话的‘伏尔加’。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③

需要指出的是，官僚特权是与官僚本人的职位相挂钩的。一旦失宠，官僚就

① 参见（俄）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夫的一百四十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2—613页。

②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2页。

③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不再能享受这种特权。被称为“斯大林的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在失去其职务之后，就再也享受不到任何特权，每个月只能拿到120卢布养老金，不能再进特供商店，和普通人一样排队购物，休假也只能去普通工人的疗养所。甚至卡冈诺维奇到仅供高级领导就诊的医院看病，都遭到追查。^①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众所周知，斯大林本人担任党政领导工作直到去世，其他领导干部或是终身任职，或是长期担任领导工作。

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规定：每次例行选举，苏共中央委员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和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还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关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2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2届，每届任期1年；如果超过上述规定长期地连续当选，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除了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以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赫鲁晓夫的这一干部政策取得了一点成果：它防止了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利于加强集体领导；可以使新老干部结合，防止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和干部队伍的老化；可以使得年轻干部较快地进入领导层，从而为党培养一支后备队伍。然而，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犯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实践中推行起来也很困难。改革干部任期制度是赫鲁晓夫被党内政变推翻的原因之一。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一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成员的做法，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第一年，地方党委书记只更换了9%，14个加盟共和国书记只更换了2个。从苏共二

^① 参见张建华著：《推倒红墙》，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4页。

十三大到二十六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 90%。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担任了 20 年党的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也当了 20 余年第一书记；格里申于 1967 年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被换下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则在这个岗位上干了 17 年，直到退休；领导仪表和国防技术的部长级官员 K·H·鲁德涅夫任职 22 年（1958—1980 年），Б·Е·布托玛担任船舶工业部部长 28 年（1948—1976 年），Е·Е·阿列克谢耶夫斯基担任土壤改良部部长 16 年（1963—1979 年），А·А·伊什科夫担任渔业工业人民委员、渔业工业部部长达 39 年（1940—1979）。1981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竟是苏共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不仅中央机关如此，加盟共和国和州一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变动也是很少的。1976—1981 年两届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大会期间，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除去世和正常的工作调动外，没有一人被撤换；1978—1981 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 名州委第一书记中只撤换 5 人。1974—1981 年，在 80 多名政府部长中只撤换 14 人。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 25 岁就当上了将军。二战胜利后还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А·А·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之后，研究所所长这一职位就被归入苏共中央书记处的“职务名册”。这样的例子很多。

（4）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按规定，选拔任用干部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用斯大林的话说，“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能够理解指示、能够把这一些指示当做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这些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否则，政策就会失去意义，就会变成空谈。因此，登记分配部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严

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①

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对领袖是否忠诚。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疏漏，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的人却飞黄腾达。贝利亚就是靠肉麻的吹捧得到斯大林的赏识而调到莫斯科并进入最高领导层的。由中央委员会制定和批准的“负责人考察条例”确定了负责人的各种类型：保留现职者，适合提拔者，能力差需要撤换者，需要派去学习者，需要降职、去做群众工作或者不降职调往另一个组织的人，等等。^②但是实际上，在决定干部任用时却是采取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实际工作能力。在各个时期参加过反对派或者与反对派多少有些联系的人一概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成为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这种方法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相反，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均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的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盲目自大，隔绝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丧失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的状况中。二战后苏联在农业领域的工作队承包制就是一例，尽管行之有效，但最终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标准而被迫中止，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安德烈耶夫也被迫去职。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举措因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的反对，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全部取消。1965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主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扩大企业自主支配利润权力，强调要利用

^① 《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57页，《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172页。

^② 卡冈诺维奇：《回忆札记》，第313页。

商品货币关系，但改革推行后，也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扰，经过前后几年不断的修正、调整，到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时最终偃旗息鼓。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职务名册”制度在苏联存在了将近70年，它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职务名册”的逐步确立，苏联形成了数量不小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原则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为了能让上司看中，或者为了保住自己已有的官位甚至性命，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在斯大林时期，很多人正是因为有自己和斯大林不同的观点或者对斯大林不那么俯首帖耳，而遭到贬黜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而一些人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等人，则因为唯斯大林马首是瞻而飞黄腾达。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也正因为个人崇拜盛行，个人权威变得至高无上，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的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讲集中，不讲民主，致使党内缺乏民主，同时也使全社会缺乏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集团、集中于斯大林一人手中，其结果不仅削弱了国家政权机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工具的作用，而且造成了党的专权，斯大林个人的专权。正是因为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武断地处理民族问题，出现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表明他们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于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正像格·阿·阿尔巴托夫所说的那样：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国家物质上的损失，“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

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①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正如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的：“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②

有一组调查数据也清楚地表明，苏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了。据 1990 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 7%，代表工人的 4%，代表苏共党员的 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 85%。^③ 这是在苏共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中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严重败坏苏共的声誉、消解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信任和支持的作用，并从根基上动摇着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这个官僚特权阶层，趁着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正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所分析的：“70 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 80 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

①（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 178 页。

②（俄）鲍利斯·叶利钦著，朱启会、荣合译：《我的自述》，第 50 页。

③ 参见王长江著：《苏共：一个大党衰弱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0—271 页。

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① 因此，苏联解体、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作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② 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在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有一个统计数据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详见下表。^③

苏联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

最高领导层	政党首领	议会领导	政府部门	地方领导	商界精英
75.0	57.2	60.2	74.3	82.3	61.0

可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权贵阶层大多数人所向往的。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但是回过头来看，苏联干部制度中的“职务名册”制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权阶层“在册权贵”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结果，其教训是深刻的，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深思。

① （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② 参见（美）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③ 参见张树华著：《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87. 东欧剧变与苏联历来的 东欧政策是什么关系？

郭 洁

“东欧”，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模糊而政治身份又非常特殊的概念。米兰·昆德拉曾说，这是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就其政治身份而言，“东欧”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有特定所指的概念。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东欧明确界定为：“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并“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欧洲部分。^①具体即指二战结束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8个欧洲国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1945至1947年间曾实施过短暂的联合政府政策。此后随着欧洲冷战拉开帷幕，便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首先从华沙开始，东欧各国发生了连锁性制度崩溃。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同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谈判，此举标志着党最终放弃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接着，其他东欧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匈牙利，是年夏，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9月，匈牙利当局决定开放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崩溃。继柏林墙倒塌后，紧接而来的是

^①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中译文参见《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3—88页。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此后，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发起的“宫廷政变”将日夫科夫赶下台。接着，风暴继续南移，最后，长期坚持独立自治道路的南斯拉夫和20世纪60年代脱离了苏联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亦均遭席卷。

毫无疑问，政治剧变是积蓄已久的东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年后的今天，回顾起东欧发生的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历史巨变，仍然令人不由深思：建设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大厦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一幸免地发生集体坍塌？^①是什么因素使得东欧民众向往逃离现实社会主义的束缚？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多米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谓“示范效应”、“扩散效应”、“传染效应”等分析概念，固然对于问题的理解有启发作用，但仅停留在此层面上的解释未免浅显。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探讨，除需关注邻国事件的刺激以及国内各种危机的累积之外，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容忽视，即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施行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一方面，不仅需要考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支柱；另一方面，还需对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每任苏联领导人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和趋向作具体分析。

苏联把东欧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从二战后期到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其同苏联“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二是通过将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使其同苏联“结为一体”，进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正是以上两种一体化，将东欧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并从而确保了苏联对东欧长达四十余年的控制。

毋庸置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二战紧密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① 依照牛津大学蒂莫西·阿什教授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波兰用了10年，在匈牙利10个月，在东德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仅10天，而在罗马尼亚，“历史的结束与圣诞节当日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处决一同到来”（参看 Timothy Garton Ash, *The Magic Lantern: The Revolution of '89, Witnessed in Warsaw, Budapest, Berlin and Prague*, New York: Random Press, 1990）。

后者的必然结果。战争期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与苏联携手联盟。1944 年春，苏联军队开始向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挺进。眼看着该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作为未来欧洲舞台上的两个主要大国，英国和苏联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明确各自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力量与活动的区域、范围和程度。1944 年 10 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就战后东欧和巴尔干局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共同签署了后来举世震惊的“百分比协定”。^① 根据双方最后议定的结果，英国承认苏联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详见表 1^②）。

表 1 苏、英两国关于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1944 年 10—11 月）

苏联在东欧的影响	丘吉尔与斯大林协定 (10 月 9 日)	莫洛托夫第一次修改意见 (10 月 10 日)	莫洛托夫第一个“一揽子计划” (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二个“一揽子计划” (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第三个“一揽子计划” (具体时间不详)	莫洛托夫最后提议获得接受 (11 月)
匈牙利	50%	50%	75%	50%	75%	80%
南斯拉夫	50%	50%	75%	50%	60%	50%
保加利亚	75%	90%	75%	90%	75%	80%
罗马尼亚	90%	90%	90%	90%	90%	90%
希腊	10%	10%	10%	10%	10%	10%

① 过去很长时间里，学界一直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百分比协定存有质疑。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学者以档案文献为据证明确有其事 [详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И. В. Сталин и М. Торез, 1944—1947 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 1996. С. 19。另参见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Европа: 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 (1939 – 1947) //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 №3. 1998. С. 82 – 93]。关于百分比协定的具体协商过程以及相关俄国档案可参看温斯顿·丘吉尔著，斯祝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 6 卷（下部：铁幕），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337—339 页；1944 年 10 月 9 日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记录、1953 年 6 月 3 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记录，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 Источник. №2. 2003. С. 45 – 56。

② 表中数据来源：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

1945年2月4—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确立了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经过激烈争论，三巨头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雅尔塔协定》。其中就接管德国、波兰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关于德国问题，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共管；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确定以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而西部边界是否以奥得—尼斯河一线为界，留待日后再议。出于对苏联意图的担忧，西方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还极力推动通过了一份涉及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战后政治安排的文件，即《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立即对从法西斯占领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成员的现有政府进行改组，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政治经济问题。^① 斯大林签署了此份文件，不过在他看来，“民主”有多种，“苏维埃民主”则是最高类型的民主。^② 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毫不隐讳地声言：“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③ 显然，使苏联军队尽可能地向西推进并将红军“所能到达之处”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是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对战后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各有其打算，整个协议过程也充满了妥协的色彩，不过，对于苏联来说，会议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

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

① 详见（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亚·菲舍尔注释，北京外国语学院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44—248、177—179、246—247页。

② *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 1944—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С. 94.

③ 参见（南）密洛凡·德热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81页。

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相反，为了维护同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确保在其西部边界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以及利用战后初期有利的形势进一步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选择了暂时支持东欧国家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①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沃罗基京娜等人的研究，始见于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连，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②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照匈牙利学者查尔斯·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③。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种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④

遗憾的是，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并未能走多远。一方面，如上所述，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力量组合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46年秋，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斯大林在谈话中讲道，保共有必要“最低限度地”联合其他“劳动者政党”，组成一个新党。这个党可以取名为“劳动党”

① Мурашко Г. П. , Носкова А. 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 – 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 – 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 89 – 90.

②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 Мурашко Г. П. ,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 – 1948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С. 3.

③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p. 35.

④ (匈)雅诺什·科尔奈著，张安译：《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8页。

或“工农党”等，但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斯大林特别强调，此种安排“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并有助于推动保共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①此外，东欧人民民主道路仅实践了不过两三年便被迫中断，还与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紧密相关。比如，东西方大国间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愈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意两国左翼力量内部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等。面对以上种种局势发展，苏联开始对东欧的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久，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其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此后，摆在东欧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47—1948年可以称为“去人民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多党制、快速国有化等激进措施，结束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人民民主时期，从而为苏联模式的移入扫清了道路。此后，斯大林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东欧各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1949年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为苏联模式在东欧全面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东欧各国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上，以一党执政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

^①（保）季米特洛夫著，马细谱等译：《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87页。

解释权，同时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总之，所有的制度、组织、社会活动、单个的人，都必须符合一套预设的规则，如果违背规则便要承担后果。用另一位匈裔学者舍普夫·捷尔吉的话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①

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东欧。在这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每个国家都堪称“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原型，苏联加紧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内务机构以及经济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后，通过对各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和渗透，借助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东欧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从而实现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同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然而，苏联模式这种强制政治同一化模式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同东欧的传统多样性和历史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民众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苏联模式就像一个被错误移入机体内的器官，成了东欧不断频发“排异反应”的根源，并为此后几十年间东欧的曲折发展直至最后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东欧国家冲击苏联模式的尝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称之为“解冻”的时代。^②“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① George Schoepflin,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1945—1992*,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 76.

^② 许多历史学家将“解冻”时期等同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事实上，二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整个“解冻”过程实际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斯大林逝世后以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所谓集体领导时期（1953年3—6月）；形式上由马林科夫执掌权力的“新方针”改革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赫鲁晓夫最终排除阻碍走向权力至高点的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个人领导以及党内反对派形成并最后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世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作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①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等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作了公开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共同一致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处理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②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希望以此缓和同西方的对抗，改善其内外环境，以此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错误地执行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约50万民众被迫逃往西德，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③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

① （俄）奥本金：《马林科夫政治肖像素描》，《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5期，第45页。

②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 *Uprising in East Germany 1953: The Cold War, The German Question, and the First Major Upheaval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xxxii.

③ Christian F. Ostermann, “New Documents on the East German Uprising of 195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以下简称：CWIHP Bulletin], Issue 5 (Spring 1995), p. 10;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09, p. 270.

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和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大使基谢廖夫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以及匈党领导人拉科西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等情况。^① 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缓解各国内部的紧张局势，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于是，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从1953年6月起，先是东德（6月11日）、匈牙利（6月27日），而后是波兰（7月21日）、罗马尼亚（8月22日）、保加利亚（9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9月15日）等国，分别宣布采取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举措。客观地讲，莫斯科所设计的这套“新方针”，就其初衷来看，主要意在“纠偏”。换言之，它所针对的是苏联自身以及东欧各国所共同面临着的种种紧迫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却并未对准引发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更未触及背后苏联模式这一深刻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此时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马林科夫还是其后赢得了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而言，现有模式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所需的只是对它的完善和发展，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改变。尽管如此，在个别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新方针”的实施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领导人纳吉的推动下，超出了莫斯科原有的设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许多改革举措，比如在自愿基础上解散合作社、废除富农名单、鼓励并支持个体经济、扩大地方议会的权限、重建对国家政治生活实施民主监督的群众性组织等，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由得警觉和惊恐。^② 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理解及其为匈牙利的“新方针”所设定的目标，照历史学家约瑟夫·罗斯柴尔德的话说，可算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③ 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

① János M. Rainer, "The New Course in Hungary in 1953,"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WIHP Working Paper, No38, 2002, pp. 9 - 10; János M. Rainer, "Stalin and Hungary: A General Overview of Contact 1944 - 53", paper present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53", September 1999, New Haven.

② 有关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及纳吉的改革思想，可参看拙文：《纳吉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140—143页。

③ Joseph Rothschild, *Return to Diversity: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54.

也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实际上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开始。^①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及随后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相应地，东欧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亦戛然而止。在匈牙利，由于受到党内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加之改革进程蕴涵着对苏联模式的内在挑战，纳吉最终遭到罢免。此次苏联对东欧“新方针”的叫停，可以说，不仅标志着东欧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尝试的失败，同时也为日后东欧频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不过，较之此后发生的数次重大危机，后斯大林时代之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容忍底线还是相当不明晰的。这一状况在随后到来的1956年发生了改变。

对于东欧来讲，1956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②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对于苏共二十大，东欧各国党的反应颇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则表现得茫然失措。^③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情势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在二十大闭幕不久意外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因莫斯科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

①（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5页。

② 详见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之三），《人民日报》，中共中央，1956年2月18日。

③ 沈志华、李丹慧著：《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自称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不仅置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于不顾，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实行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当局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先后引发了危机。6月28日，首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推举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闻讯后极为震怒，当天即令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亦率团飞抵华沙。波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波兰事件尘埃尚未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其后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骚乱。就其初衷来讲，事件本身是一场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民众所提出的实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法制、平反一切历史冤案、真正尊重和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等要求，以及包括“我们要纳吉”这样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希望党真正成为立足和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代表苏联的利益、服从莫斯科的旨意来管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党。在此基础上，人们希望看到匈牙利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符合匈牙利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任何民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偏激性以及运动本身所带有的“危险性”，最终招致了苏联的武装镇压。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对于其后东欧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使得东欧各国政权对有别于苏联体制的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推行改革的基础。同时，1956年的东欧危机也使得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摆脱了摇摆不定，大体方向基本确定下来，即给予东欧各国党在处理内外事务方面以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自主地对国内压力作出反应以及发展对外交往等），但所有一切均不可逾越苏联所能允许的范围。简言之，寻求灵活与控制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此种政策之下，东欧各国开始慢慢地重现出“多样性”的色彩：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改革拉开了帷幕（尽管其后渐渐复归保守）；在匈牙利，卡达尔通过“静悄悄的改革”创造出了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罗马尼

亚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从反对经互会的经济整合计划开始，逐渐将其独立行动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因反对苏南修好，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以上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①

总的来讲，较之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着对东欧的控制，但其所依赖的基础已不再完全是恐怖或武力。同样，在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东欧对苏联模式的激进改革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制和阻挠，但“适度地”改革这种令其水土不服的模式获得了允许。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注脚。

勃列日涅夫摧毁了东欧的改革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后漫长的18年中，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东欧的政治发展依然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中盘旋、打转。

如同1953—1955年克里姆林宫围绕着斯大林继承权展开斗争的那几年一样，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莫斯科的权力归属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东欧局势亦随之出现了变化。此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柯西金对工业管理方面创新思想的鼓励，相应激活了东欧阵营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与尝试。苏联经济学界继1962年“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后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新一轮探讨，同样为东欧探索改革之路注入了活力。60年代中期，东欧如十年前一样，再度出现了一股革新热潮。当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经济都十分感兴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从战后直到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戈登·斯基林所说，危机是

^① John C. Campbell, “Sovie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Sarah M. Terry,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Europ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

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轻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① 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② 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

① 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6.

② 从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几乎陷于停顿，1962—1963年，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处于下跌状态的（参看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 57）。

主义理想”。^① 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

^① 伍仁译：《禁止公布的文件：捷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关于1949年至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审讯和平反工作的报告》，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退。到了 70 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愈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早在 1956 年，伴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 14 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 年 12 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 70 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 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 29%。^① 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1980 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久、政治色彩最浓、影响也最为深远。

与 1970 年 12 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较之以往，此次罢工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工人们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其二，罢工以与政府谈判并成立一个不受当局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工会组织为主要诉求。结果，波兰政府最终被迫同意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条件。1980 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 11 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 900 万，约占全国人口的 1/4，据统计，90% 的波兰工人、1/3 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瓦文萨当选为

^① Iván T. Bere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44 – 1993: Detour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9.

主席。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① 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领导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② 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5000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200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益形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③

①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版，第599—601页。

② 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给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引自 Andrzej Paczkowski and Malcolm Byrne, eds., *From Solidarity to Martial Law: The Polish Crisis of 1980 - 1981: A Documentary History*,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401 - 404。20世纪90年代雅鲁泽尔斯基在多次访谈或回忆中亦表示，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一直受到外部的压力”，“克里姆林宫代表们”与波兰领导人的谈话中常常施加压力并不断“检测这种压力的有效性”[参见雅鲁泽尔斯基对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有关1980 - 1981年波兰危机档案的注译文章“The Anoshkin Notebook on the Polish Crisis, December 1981”一文的评论，CWIHP Bulletin, Issue 11, Winter 1998, pp. 32 - 39]。

③ 1982年彼得·威尔斯首次提出了“波兰病”这一概念，用以表示20世纪80年代初波兰的灾难局势（参见 Peter Wiles, “Introduction: Zero Grow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the Polish Disease,” in Jan Drewnowski, ed., *Crisis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y: The Spread of the Polish Disease*, London: Croom Helm, a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p. 7 - 17）。

80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再次证实了两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一，苏联无法稳定东欧的局势，无法为紧迫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二，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试图自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或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时，如其行动达到了对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苏联会以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方式确保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①

戈尔巴乔夫修正历史错误，给东欧以选择的自由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任何调整，依然严格奉行布拉格事件后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主权论”。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

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危机重重，苏联自身也面临巨大困难，在石油降价、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背景下，苏联已无力再在财政上支持东欧各国。另外，苏联要进行改革，需要与世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也必须放弃帝国政策，于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987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进一步推动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强华约各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在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方面更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② 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③ 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

① Campbell, "Soviet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An Overview", in Terry, ed., Soviet Policy in East Europe, p. 1.

② 详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详见苏联与南斯拉夫公报，《真理报》，1988年3月19日。

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发言中，他说道：“新思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主权和独立，平等权利和不干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反对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客观历史进程的对立面。”^① 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适用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借此次会议向联合国作出重要承诺，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驻守了40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② 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被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所取代，西方将此新方针称为“辛纳屈主义”。^③ 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是年2月，戈尔巴乔夫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告诉对方，包括匈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苏联对于匈牙利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事务将不予以干涉。^④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⑤ 东欧国家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一直水土不服，早就想改变，苏联不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给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② Charles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Soviet - East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form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6 - 167.

③ 辛纳屈主义 (Sinatra Doctrine)，又译西纳特拉主义或仙纳杜拉主义，该说法取自美国歌手法兰克·辛纳屈 (Frank Sinatra) 20世纪60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为“My Way” (《我行我素》或《走我自己的路》) 的歌曲，意指苏联允许每个东欧国家走自己的路。

④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p. 527; Vladimir Tismaneanu, *Reinventing Politics: Eastern Europe from Stalin to Have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 217.

⑤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前后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第二份文件则有条件承认了团结工会,从而为随后双方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① 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举行的圆桌会谈是东欧多米诺骨牌连锁式倒塌的重要一环。长达两个月的会谈不仅对波兰后来的和平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东欧的政治多元化开了先河。1989年6月,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波兰分两个阶段举行了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结果,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在两轮选举中均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公民委员会代表身份参选的团结工会候选人一举赢得了参议院100个议席中的99席以及众议院中所有开放议席。两个月后,波兰议会正式任命著名的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这样,东欧出现了40年来首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② 紧随波兰之后走上剧变道路的是匈牙利。1988年5月,卡达尔在以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斯和爱国人民阵线主席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由格罗斯接任。此后,匈党改革派内部继续分化。1989年1月,在格罗斯外出之际,波日高伊擅自在电台采访中宣布,1956年匈牙利事件并非像官方史料所定论的那样,是场“反革命”,而是一次“人民起义”。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波日高伊此举将格罗斯即刻置于被动防守境地。2月10—1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并且宣布同意实行多党制。^③ 6月13日,匈党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

① 刘祖熙著:《波兰通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4—545页。

② Mark Pittaway, "From Communist to Post-Communist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Judy Batt and Paul G. Lewis, eds., *Developments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politics 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8—29.

③ Andras Korosenyi, "The Decay of Communist Rule in Hungary," in Andras Bozoki, Andras Korosenyi and George Schopflin,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Emerging Pluralism in Hungary*,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2, pp. 6—7.

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在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至此，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二个在没有发生社会震荡和政治紊乱情形下走向政治转型的国家。

1989年9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10月6—7日，在东德举行40周年国庆庆典期间，德累斯顿、莱比锡、东柏林等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改革呼声无动于衷，矛头直指昂纳克。随后，昂纳克被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赶下台。^①克伦茨上台后表示，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此后东德时局的急剧变化却令当局除了作出一个个让步之外，别无作为。11月9日，竖立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在这道被喻为“有形铁幕”的红砖瓦墙被推倒的那一刻，东德局势也被推向了无法逆转的境地。12月7日，当局与其他16个党派、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谈。会谈结果，各方同意于次年5月举行大选。1990年3月，在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联盟”以超过48%的选票赢得大选，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得票率仅为前者的1/3左右。由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990年10月3日，东德正式并入西德，自此从东欧这块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消失。与东德相似，1989年在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改革尝试而反对派力量又相当薄弱的保加利亚，事态的戏剧性变化，与莫斯科的“干涉”不无关系。11月10日，保共召开中央全会，日夫科夫在会上意外地宣布辞去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过，局势的这一发展并非反对派组织施加影响的结果，而是由政治局内部以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为首的反日夫科夫力量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努力策动所致。此后，姆拉德诺夫一上台，立即承诺实施改革。起初，同苏联一样，保共并不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也无意实行多党制。但当东欧变局的冲击波袭来时，保加利亚的政治风向也迅速发生了逆转。12月7日，由十几支反对派力量联合组建的“民主力量联盟”，提出修改宪法、实行多党制、举行竞

^① 参看 Ash, *The Magic Lantern*, pp. 65 – 66; (俄)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王尊贤译：《我与东西德统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

争性选举等要求。1990年1月—3月，经过两轮圆桌会议，保共同意了反对派的要求。1991年10月在保加利亚举行的新一轮大选中，由保共改组而来的社会党遭到惨败并被彻底赶出政府。自此，保加利亚政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①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不干涉主义”，或是一种在他看来用意良好的“干涉主义”，促使东欧各国接受“新思维”，将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事与愿违，在东欧，无论是每每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还是始终故步自封、拒斥革新的国家，最终都未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对于这一结果，苏联选择了接受而未予干预。事实表明，一旦莫斯科容忍了任何一个华约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他国家都会随之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东欧历史呈现出的一幕。

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东欧为何剧变、苏联何以解体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就前者而言，如果仅将目光锁定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动荡迷离的那几年，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表象，亦即所谓的“循环影响流”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辛纳屈主义”解开了东欧身上的缰绳，获得了“松绑”的东欧各国最后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归欧洲的路程；东欧获得自由的结果，鼓舞了一直试图摆脱联邦、寻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的相继独立，最终一步步地导致了苏联自身的解体。^②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即东欧剧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放任自流、未予干涉造成的结果，因此，是他“葬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自身的解体，也是他自当吞下的一杯苦酒。不可否认，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有关，然而，如同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所言，苏联干预的威胁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只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

① Gati, *The Bloc That Failed*, pp175 - 177, 182 - 183; (美) 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353页。

② 有关“循环影响流”这一说法及其分析，请参看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pp. 563 - 565.

水就会一泻而出。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①

因此，透过表象，应当看到东欧剧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前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与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实行的政策不无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择其要者而论：

首先是斯大林时期强迫东欧采行统一的苏联模式、禁止各国探索符合现实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一政策是导致此后四十余年东欧政治发展崎岖曲折的根由。如上所述，苏联模式是苏联强化对东欧控制的一个工具。且不论这一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疾病和内在的缺陷，^② 仅只这种简单外科移植的方式本身，就很可能引发持续不断的后遗症。诚然，历史不可逆推，但不妨设想，倘若 40 年代末斯大林没有将其模式强行输出到东欧，如果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能够顺其自然地走下去，那么战后的东欧很可能走上一条更符合自身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不是，但无疑将是符合东欧多样性特点的，因为 1945 年以后东欧各国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变化多样的，这种多样性自身便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化方式的潜在保障。

其次是屡屡阻断（甚至不惜以武力的方式）东欧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尝试的问题。在东欧，由苏联模式引发的危机几乎从其引入之时就开始显现。梳理 1945—1989 年间东欧社会主义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后东欧的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对苏联模式从机械植入、调整适应、排异反抗、重新解释到最终弃离的历史，是一部危机——改革——危机交错更替、循环演进的历史。从长远来看，苏联对东欧改革的遏阻政策结果造成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不断地放大，进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持续地累积。换言之，“堤坝”中的水越涨越高，却找不到引流的出口，以至最后危机已无法在现有制度范围得到解决。

再者是苏东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始终是将其视为保障自身西部安全的屏障地带，确保东欧始终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确保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一直是苏联对

① （美）亚当·普沃斯基著，包雅钧等译：《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② 有关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出色的分析评述，请参看李宗禹等著：《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年版；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下），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东欧政策的两大支柱，而支撑这两大支柱的“基座”便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起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联盟结构”，或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苏联为圆心，东欧国家为圆周的形式来运作的。与通常国际政治上所讲的联盟结构不同，在这一联盟中，“非对等”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苏联与东欧各国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非对等性既使苏联得以在双方联盟结构存续的四十余年间，维系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也激化和加深了东欧民众的反苏情绪，并推动东欧最终摆脱了苏联、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是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苏共与东欧各党间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早在共产国际时期就已形成，战后双方国家关系也是在这种党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苏联正是借助对各国党内精英的控制来实现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对于东欧各国党内精英而言，其命运和前途，首先取决于是否服从或忠诚于莫斯科，而非其国内民意，这样便造成了各国党成了苏联与本国民众之间的一道“缓冲”，政治精英们成了苏联在本国的政策执行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为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而非为本国劳动人民代言的特殊阶层（或特权阶层）；同时，由于党对国家权力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权力的竞争过程便出现在党的机体之内，于是便出现了一党制下林立党派间的持续不断的隐性对抗和竞争，从而又使这个阶层缺乏团结与统一。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个阶层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没有自我捍卫能力的。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夕，东欧各国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但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能够促成“一推即倒”的因素，这便是：无论哪国的民众，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状况均深感不满，他们渴望不适合它们国情的斯大林模式能发生根本的变革。造成人们不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主要仍是由于长期实行斯大林模式而导致政治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承诺同具体现实之间的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些，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原因。

东欧剧变已过去了20年，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也已经过了20年，今日东欧较之此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着崭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转型仍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继续主导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未来如何，依然是一幅有待东欧人民自己用心绘制的画卷。

88. 苏联所有制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陆南泉

关于所有制的理论误区

长期以来，不论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理论误区：即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并把这个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实际上，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斯大林主义，或者说是苏联化了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而马克思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建立在协作和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手稿》中，把这种所有制称之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② 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劳动者在联合占有的生产资料中享有一定的所有权。进一步说，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含：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8 卷，第 22 页。

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

在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这理论误区的影响下，长期来影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在苏联时期的历次改革，有两个问题是不允许触及的：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显得尤为突出，这个时期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会冲垮国有制经济。中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特别在股份制推行的起始阶段，不少人就认为是“走向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倒退”或者称之为“和平演变”。产生上述问题亦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国家所有制是高级形式，或者像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1954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彻底的”，^①那么，任何对这种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是一种倒退。而实际上，国家所有制也好，还是全民所有制也好，都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而是存在着严重的异化。

在斯大林有关所有制的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建立了国有制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在苏联工业企业中，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农业中，虽然存在集体所有制形式的集体农庄，但在管理上，也像对待国有企业一样，通过大量指令性指标把它统管起来，所以，苏联模式的经济，也叫统制经济。

安德罗波夫时期所有制理论开始松动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仍是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他急于消灭手工业合作社，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赫鲁晓夫的倡导下，通过合并集体农庄，使农庄规模扩大到无法管理的程度。1958年他还砍掉了农村个人副业。这些做法与他“左”的超越发展阶段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密切相关。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与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不涉及改革所有制形式问题。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在他执政后期，很多学者提出，要解决苏联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只有在劳动者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时学者在理论

^①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28页。

上开始讨论民主管理与社会自治问题。但要指出的是，作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所有制理论方面提出新看法，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他认识到，苏联的状况不论在斯大林领导下，还是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都是不正常的，应该进行认真的变革。为此，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在所有制理论方面出现松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多方面的、不应该简单化的过程”。“把‘我的’，即私有制的，变成‘我们的’，即公有制的，并非易事。”劳动者“取得做主人的权利同当家做主——成为真正的、聪明的和勤勉的主人——远不是一回事。”^① 这就是说，在苏联所有制的变革远未完成，需要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第二，强调要从理论上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占有方式是说明生产发展的方向、生产目的和社会结构，它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内容；经营方式是揭示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通过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从经济上实现这种占有方式。苏联建立了公有制，这就可使占有形式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了。但是，这种适应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要通过不断改造经营方式和方法，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能主动地相适应。因此，完善经济机制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实现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这一规律的一种形式。

以上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为改革提供了更大的可能，免受所有制理论禁区的束缚。因为按这种观点，改革经济体制，只是改革经营方式，而不是改革占有方式。

第三，批判超越生产力水平而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强调苏联现阶段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应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第四，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不少学者写文章指出，现在该是更坚决地取消为居民服务的各种个体劳动活动限制的时候了。^② 建议把修表、照相、理发、修鞋等行业交给个人去干。一些小商店可以试验在合同的基础上租包出去等等。一些学者还认为，考虑到服务部门是个体劳动这一特点，最合适的办法是租赁制。租赁时间三年左右为好。租赁时，应该采用招标的方法，只租给那些能

①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② （苏）《劳动报》1983年9月4日。

保证完成服务项目和质量要求的人。

在安德罗波夫时期，在所有制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持以下的观点：所有制关系的重要问题并不在于不断地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而在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所有制关系成熟程度的表现。

应该说，安德罗波夫时期，联系经济体制改革，对所有制的理论进行的探索，提出的看法，更接近于苏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实。

与所有制理论的变化有关，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一再强调只有在每个劳动者参加管理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当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从改革体制角度看，这一年多来，苏联在探索民主管理问题时，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把民主管理与改革体制紧密联系起来，认为管理的进一步民主化，使劳动者感到自己是生产的主人，这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作用的客观前提；二是把发展民主管理与发展社会自治联系起来。不少学者强调，在当前苏联的条件下，生产管理的民主化不仅要向广度发展，而且要向深度发展，最后导致质变：把劳动者参加管理变成生产自治。关于这一点，安德罗波夫也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在于找出现阶段苏联社会与共产主义自治理想的差别，而是要探索不断完善发扬民主、扩大劳动者在生产中，在所有社会实践中主人翁权利及作用的新方式方法。这正是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自治。^①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随着所有制理论的松动，在农业中着力推行集体承包制。为什么要在农业中着力推行这一政策呢？对此，美国格拉斯哥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亚历山大·诺夫教授，在1983年5月访华时，在其所作的讲演中，较多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近20年来，苏联在农业上投资相当大，但效率相当低，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是劳动者缺乏积极性。旧俄时，每个农民在抢收时每天劳动达16个小时，而现在只劳动7小时；二是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报酬同生产成果没有有机地联系起来。只要完成定额不管质量如何，都可以得到报酬和奖励；三是在农业计划中，苏联地方党政机关对农业生产干涉太多，这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四是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道路、仓库和必要的包装材料。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食品价格偏低影响农业生产，工

^① （苏）《共产党人》1983年第3期。

业对农业缺乏帮助和农业生产本身的组织等问题。”^①

安德罗波夫为了在农业中大力推行集体承包制，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各级党政领导与学者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强调推行集体承包制是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是召开一系列会议，如1983年3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关于加强在农庄、农场中推行集体承包制的组织工作问题。为了落实这次会议的有关指示，在同年3月18—19日苏联召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州（边疆区）委书记、农业部长（局长）以及许多农工综合体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推广农业集体承包制问题。接着，公布了《关于在种植业组织集体承包单位的建议书》（以下简称《建议书》）。这个《建议书》为各地实行集体承包制规定了统一的原则与实施办法。文件规定，种植业集体承包单位的建立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主要是：按最终成果支付集体劳动报酬，根据个人贡献在承包组织成员之间分配集体工资；承包组织的规模不宜太大，以发挥集体工资的刺激作用；必须保证给承包单位提供技术设备和其他资源；在自愿基础上建立承包单位，通过选举产生其领导人；承包单位同农庄、农场领导通过签订合同建立经济核算关系；承包单位有解决生产问题的自主权等。文件规定在种植业中可以建立专业化单位、综合性单位和机械化单位等三类别的集体承包组织。给承包单位规定的产品生产任务应有充分的根据，年度生产任务的计划工作应从编制或修订工艺图表开始，在规定各类作物的单产和总产时既要考虑到土地质量，还要考虑到种子质量和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给情况。由承包单位领导人定期登记本单位完成的农活量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情况，每月填写工作时间登记表，作为计算每月预付数额的根据。文件详细规定了计算劳动报酬和进行物质刺激的具体办法，包括产品工资单价的计算、计时预付款项的确定、按产品计算报酬和发放奖金等。承包组织在年终分配集体工资时可以采用劳动参与系数。在确定劳动参与系数时，把“我”作为基础系数，每个工作人员的实际劳动参与系数按其劳动情况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基础系数。《建议书》具体罗列了提高或降低劳动参与系数的各种因素和相应的数额。该文件还明确规定：因发生自然灾害而引起单产急剧下降、庄稼枯死的情况下，可按照承包组织

^① 转引自陆南泉：《西方学者评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苏联经济》（见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

种植农作物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向承包组织成员支付全数工资。^①

据一些材料分析，在种植业推行集体承包的小组，其单位面积产量比一般要高20%—30%，其他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投资回收率等，也体现了优越性。但农业集体承包制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少地方流于形式，集体承包制本身很不完善。因此，在推行高潮的1983年，在种植业中实行集体承包制的单位占30%左右。这些承包单位中大约有1/3的组织缺乏承包的必要基础，随时都可能解散。我们上面提到的诺夫教授访华报告中，对苏联农业中推行集体承包制难以取得进展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是：

(1) 由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规模很大，这给各组、各小组如何完成合同计划、各小组种植哪些作物等造成很多困难。

(2) “按劳分配”是分配劳动报酬制度的原则，但是由于各个小组的工作量不同，劳动强度不一样，因此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比较合理，这是一个难题，地方政权一时难以解决。

(3) 农庄、农场的领导人在心理上有一个适应过程。因为在过去一切遵照由上级下达的指令执行。而现在，对下，要对每一个庄员、农场职工负责；对上，要对区级领导和更高一级领导负责。

(4) 成立包工小组后，物资技术供应问题如何解决，也就是说，农用机器设备、化肥等如何供应，由谁供应等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②

安德罗波夫执政期间，虽然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83年工业产值出现了回升，增长率为4.2%，国民收入增长了3.1%，这均好于1982年。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特别是体制改革进展十分有限。在他逝世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尽管有矛盾，但总体上是肯定的。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改革到来之前的序幕和序曲。安德罗波夫走上岗位后，国家开始觉醒，开始从停滞年代的政治休眠状态中走了出来”。^③

①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6页。

② 转引自中国苏联经济研究会编：《1983：苏联经济》，第230页。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重新认识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对所有制理论的探索，在不少方面与安德罗波夫时期提出的观点相似，如安德罗波夫提出，“所有制方面的变革绝不会是一次性行动”，而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它是处于运动之中的”，需要“经常的调整”。^①又如，安德罗波夫强调，在现阶段的苏联集体所有制不是“过时的”所有制形式，而戈尔巴乔夫一再提倡要发展合作社，在合作社所有制问题上，应有完全明确的认识。他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由于过去把苏联合作社所有制看做是某种“二等的”、没有前途的，因而产生了“严重后果”，“造成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不小损失”。有的学者还提出，合作化已经结束的结论做得过早了，现在应该在城市真正地开展合作化运动。^②与此相联系，各类租赁承包形式也得到发展。过去是急于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而现在相反，已出现了把长期亏损的农场和农庄，改为合作社经济，由劳动集体加以租赁。为了发展合作社所有制，1988年5月，苏联还通过了《苏联合作社法》。再如，安德罗波夫提出要放松对个体劳动的限制，戈尔巴乔夫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数量的个体劳动活动是“符合社会主义经营原则”的“有益于社会的劳动”。这一问题的理论变化，其直接结果是，苏联于1986年11月通过了《个体劳动法》。该法从1987年5月1日起生效。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个体劳动的法律，也是经济改革中的一项重大措施。该法规定，在生产和服务行业中可以从事29种个体劳动，对搞活苏联经济，缓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起不小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新观点的主要特点是与发挥人的作用、落实人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紧密连在一起的。

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解决人的问题与向市场经济过渡密切相关，而向市场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

^② 参见（苏）《文学报》1986年4月16日。

经济过渡必须改革所有制，改革所有制又必须对传统所有制关系进行再认识。他认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只能在深入批判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形成，而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是所有制关系。

从解决人、发挥人的积极性、使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等角度来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除沿袭安德罗波夫有关所有制的上述论述外，还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完善经济管理体制与完善公有制是同一个过程，是不可分的。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后，生产者取得主人的权利同成为真正和有主动精神的主人，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还需要长期熟悉自己作为整个社会财富最高的唯一的所有者的新的地位，这就需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熟悉、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 and 行为。另外，要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真正的主人，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完善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做大量工作，即只有在那种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经济管理体制条件下，才能做到。因此，必须认识到，要完善和发展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必须完善和发展经济管理体制。这两者是紧密结合的同一个过程。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自治，亦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第二，对所有制的一些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新看法。例如越来越多的学者论证，全民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不是一回事，这两者就其物质内容、形成的来源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有决定性的差别。全民所有制是由于当初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实行国有化而形成的，后在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发展巩固。从经济意义说，就形成的根源而论，全民所有制是第一性的。从狭义上讲，国家所有制作作为“国家机关系统的所有制”是这样形成的：从第一性的所有制中拨出一部分，用以满足国家机关的需要，因而从经济形成意义上说国家所有制是第二性的。

把全民所有制理解为国家即国家机关或者某个机关所有，这是广泛实行行政命令管理，压制企业主动性和对企业进行琐碎监督的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向市场经济过渡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日益明确所有制的改革方向是非国家化、民营化和私有化。认为这一改革方向是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与管理相结合最重要的途径。戈尔巴乔夫指出，“当前所理解的市场否定了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垄断，要求有多种所有制，经济与政治的平等”，“在向市场过渡时，需要订出一些首要措施。搞国营企业股份化，

创造现实的经营自由，将小企业和商店出租，把住房、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及一部分生产资料纳入买卖领域”。^①在以戈尔巴乔夫总统名义提出并在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基本方针》这一文件中指出，使财产非国有化和民营化，实行土地改革，应是在向市场经济的第一阶段一开始就应实行的一项非常性措施。该文件还就如何实行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另外，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还力图通过企业自治与承包制等途径来改善所有制关系。长期以来，苏联在企业领导体制方面，一直实行一长制。苏联的一长制，体现了企业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企业经理根据国家计划和上级各项指示作出决定，广大职工无权参与，他们给经理的决策所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企业领导体制下，必然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两者分离，生产者并不感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是一个雇佣劳动者，这大大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苏联经济的发展，成了生产过程中造成大量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一直反复强调管理民主化和企业自治的重要性。企业自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企业法》第一条规定，企业“实现劳动集体的自治，从而使每个工作人员个人深刻地关心以主人翁态度使用全民财产，使每个工作人员有机地参与集体和国家事务”。第二条规定：“企业的活动根据社会主义自治原则进行。劳动集体是企业的全权主人，独立自主地解决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企业工作的成就和损失直接影响集体的经济核算收入和每个工作人员的福利水平。”以上内容反映了企业自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

(2) 劳动集体作出企业最重要的决策并监督其执行。《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劳动集体的全体会议（代表会议）是行使劳动集体全权的主要形式。劳动集体的全体会议（代表会议）的权限有：

选举企业领导人和劳动集体委员会，听取他们关于工作情况的汇报；

审议并批准企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收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维护和加强全民所有制，加强作为企业日常活动基础的生产物质技术基础的途径；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13 页。

赞同集体合同并授权工会委员会以劳动集体的名义同企业行政机关签订这一合同，承担社会主义义务；根据行政机关和工会委员会的提议批准内部的劳动规章；

审议企业活动的其他最重要的问题。

企业行政部门与劳动集体委员会意见不一致时，把问题提交劳动集体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这样使权力的中心由企业行政转到企业劳动集体。苏联计划 1988 年在全国各企业组成劳动集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企业集体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任期 2—3 年。委员会由工人、作业队长、工长、专家、行政、党、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行政代表不得超过劳动集体委员会总人数的 1/4。

(3) 企业领导人由选举产生。选举制度适用于企业、联合公司、生产单位、车间、工段、工区、牧场和班组的领导人，以及工长和作业队长。企业和联合公司的领导人由劳动集体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或公开投票方式选举，一般要采用竞选制度。选举的经理、厂长要经上级机关任命，任期 5 年。如果上级机关不批准劳动集体所选出的候选人，则进行重新选举，但同时上级机关必须向劳动集体解释不批准的原因。上级机关根据劳动集体全体会议或劳动集体委员会的决定，提前解除企业领导人的职务。

(4) 企业管理仍实行一长制，但性质和内容与过去不同。一长制的原则被纳入企业自治体系。正如上面提到的，企业的重大决策是劳动集体作出，不再是经理说了算。由于企业领导人由选举产生，因此，经理对企业活动的结果既对国家负责，又要对企业劳动集体负责。

(5) 关于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和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企业法》规定：“作为集体的政治核心的企业党组织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它指导整个集体及其自治机关、工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工作。对行政机关的活动实行监督。”这说明，在基层企业党组织不起领导作用，只起监督作用，即不能干涉企业行政与经济业务活动。苏联建国以来，在企业这一环节，从未出现过以党代政、党委书记负责制做法。

在自治条件下，企业工会的作用日益提高。它可代表劳动集体与企业行政签订集体合同。另外，它有权参加制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确定经济刺激基金使用办法、劳动报酬制度等。未经工会同意，行政领导不得解雇职工。在社会福利

劳动保护等方面，工会拥有决定权。工会权利的扩大，亦反映了管理民主化和自治的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农业企业推行承包制。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强调：农业的改革，要“为用经济手段进行经营管理开辟天地，大大扩大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自主性，提高它们对最终成果的利益的关心和责任感”。^①改革的主要途径是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关于这一点，他在1987年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举例论证实行承包制后效益大大提高的情况。如佩塔洛沃区的农庄和农场的8个畜牧场在1987年初实行了家庭承包，在5个月的时间里，用同样多的饲料使牲畜重量增加1倍，每昼夜达800—1000克。该区近40%的大田作业改为小组劳动组织形式。春播6天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平时15—18天的工作量。区组织和农庄、农场的领导人不再用发布命令和指示，也不用对工作进程进行严格监督的方法进行领导工作。又如，布列斯特州布列斯特区纪念伊里奇集体农庄是个落后农庄，两年来，组织了一个6人承包小组，这个小组承包了100头奶牛、50公顷牧场。这两年来，每头奶牛的挤奶量从2917公斤上升到5580公斤。^②

苏共二十七大之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制开始在各种正式文件中具有合法的地位。1986年3月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国农工综合体经济机制的决议》中规定，允许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根据自身的具体条件，在种植业和畜牧业中采用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制，并把它作为集体承包制的一种形式。1988年5月26日通过的《苏联合作社法》中规定：集体承包或家庭承包是农业企业内部生产——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1988年1月公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草案》，是苏联继1935年和1969年先后通过的第三个《集体农庄示范章程》的草案，已由第四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通过。该草案对1969年的章程作了很大修改。从农业体制改革角度看，主要变化反映在：恢复了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性质。章程草案明确规定，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合作社形式；国家对农庄的经济领导，由过去通过一系列以指令性指标为基础的行政强制方法改为通过经济杠杆和刺激施加影响的经济方法，集体农庄成为在完全独立自主和自我管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② 参见《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51页。

理的条件下的农业企业；章程草案第26条还明确规定：“集体农庄采用集体承包制作为劳动组织和劳动刺激的基本形式，同时还可采用家庭承包、个人承包和其他承包形式。”^①

后来，承包制发展为租赁承包，这是承包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农业中的集体承包还是家庭与个人承包，承包人的自主权是很有限的，即只是有权自主安排生产活动，而生产资料和生产的产品仍直属于农庄、农场，承包人无权独立支配。土地虽固定给承包人，但时间短，承包人不可能对改良土壤有兴趣，而是只顾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简言之，承包制尚难以使承包人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从而也难以克服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的弊端。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把农业中的承包制分为集体承包、租赁承包、家庭承包和个人承包4种。后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重视租赁承包。他在198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上，有关租赁承包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租赁承包是较为彻底的一种承包形式，因为租赁承包人租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时间长，25—30年，有的甚至达50年，这样，租赁者就会关心对租赁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会关心生产效益的提高。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各种形式的租赁承包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发展。截至1991年3月1日，苏联实行内部租赁承包的农庄、农场共有31882个，占农庄、农场总数的61%，实行内部租赁承包形式的农庄、农场在某些共和国中更为普遍，如哈萨克和土库曼分别高达93%和90%。与此同时，私人农场（家庭农场）也有了发展。到1991年3月1日，按各共和国已有的私人农场数量计算，居第一位的是格鲁吉亚，有20750个，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联邦，有8931个。在全苏每个私人农场平均占用的土地面积为22公顷。私人农场共占农用土地面积为102.3万公顷，仅占全苏农用土地面积0.17%。^②当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农业的改革，还涉及其他方面。后来，随着农业问题的日趋尖锐，使得市场的食品供应更加紧张。针对这一情况，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解决农业问题三项基本政策：“第一，应当在完全自愿选择的基础上，给农村各种经营形式以充分的自由。第二，确立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合

① 参见（苏）《经济报》1988年第2期。

② 参见《世界经济》1992年第3期。

理交换，这种交换将会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促进农村振兴。第三，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促进解决农村的迫切问题，首先是为我国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只有这三点能使农村获得复兴并使国家的食品得到保证。”^①

尽管所有制理论在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亦力图加以改善，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建立起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更没有解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社会的主人，这都成了难以实现的空话，这是严重影响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苏联长期来存在大量旷工、怠工的主要原因。据苏联报刊透露的材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每年因旷工、怠工与停工造成的工时损失约占全国总工时的 20%。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8 页。

89. 苏联商品经济理论在改革过程中有何变化？

陆南泉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 1991 年底发生剧变前，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来运行和管理其经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亦普遍采用这种体制。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朝着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方向发展，有其深刻的理论渊源，即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关。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有关在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社会经济性质等问题的看法，大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相似。就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几年，其观点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在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列宁关于未来社会经济性质的看法才发生根本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

马克思（1818—1883 年）和恩格斯（1820—1895 年）都生活在资本主义初期的 19 世纪，并没有见到社会主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是在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主义设想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首先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① 他接着指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21 页。

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① 恩格斯认为：“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②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③ 这就是指必将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

那么，未来的社会如何消除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呢，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首先要消灭一切罪恶之源的私有制，即改变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如《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④ 其次，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在未来社会商品生产也应消除，价值关系必将消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⑤ 而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书中曾断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⑥ 他往下接着说：“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生产 100 平方米的布，譬如说需要 1000 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 100 平方米的布具有 1000 劳动小时的价值……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2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2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28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303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33 页。

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① 从上面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看到，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自觉调节的，即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的、没有商品生产的与自治的社会。这样，社会可以十分简单地直接计划生产与计划分配。这就是计划经济理论的渊源。在这种产品经济观支配下，就出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可以立即地、全面地实现“一个国家=一个工厂”的设想，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可以按照预先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

20 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的否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的设想，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如何看待这种认识上偏差呢？

首先，正如上面一开始提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提出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一种预测性的，在考察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往往带有一般的推论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一部分理论尚属于‘未来学’的范畴”。^② 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在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时作出明确无误的理论结论。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经济弊病，一般都与私有制及在这个基础上存在的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等范畴有关，并把它们视为产生各种罪恶之源，因此，要想方设法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摆脱它们，不再受市场经济有关范畴的纠缠，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决定性目的剩余价值等所带来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之所以否定市场经济，还有其历史原因。在 200 多年前，社会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因而，正如熊映梧教授指出的，这引起一场全球性的误解：市场经济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专利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时，必须消除商品（市场）经济。^③ 十分遗憾的是，这个历史误解延续的时间太长了，一直到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才得以消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660—661 页。

② 熊映梧：《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7 页。

③ 参见熊映梧：《中华民富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1 页。

列宁的设想

从考察苏联模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体制来讲，研究列宁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非常重要的。

在十月革命前夕的 1917 年 4 月 3 日，流放瑞士的列宁回到了俄国，次日，列宁发表演说，后被称为《四月提纲》，4 月 7 日《真理报》发表了这一演说的提纲，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中除了分析当时俄国形势的特点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等问题外，还提出了布尔什维克的经济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1.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办法是：“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 100 俄亩至 300 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①

2.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②

3. “……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③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列宁上述经济纲领在十月革命前也发生了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在土地问题上放弃了把没收来的地主大田庄改建为由原雇农领导的国营农场，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所没收的土地，按劳动或消费定额在劳动者中间平均分配。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月革命胜利后 1917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第一个《土地法令》中。^④ 在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变化，集中反映列宁 1917 年 9 月 10 日—14 日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当时列宁看到“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情况，^⑤ 加上“资本家一直故意在暗中破坏（危害、停止、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15 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16 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16 页。

④ 1918 年 1 月 27 日，苏维埃政权公布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详细法令。

⑤ 《列宁选集》中文第 3 版，第 3 卷，第 232 页。

破坏和阻挠)生产”,^①因此,为了对工商业实行真正的监督,列宁提出,要把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银行,并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者说实行银行国有化;采取步骤对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最大的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辛迪加)收归国有;取消商业秘密;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所有企业主辛迪加化(即逼迫他们参加各种联合组织);国家调节消费,规定消费定额,实行面包配给制等。^②

应该说,上述经济纲领是列宁针对当时情况提出的对俄国旧经济制度进行改造的初步设想。

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赢得的和平喘息时间是很短的。1918年春,俄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武装干涉,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样,致使刚刚开始和平经济建设停了下来。当时,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

在这一时期,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军事共产主义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原因。

从思想理论上讲,十月革命前一直到俄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为止,列宁一直赞成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的观点。列宁早在1906年就提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③这里可以看到,首先明确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在1908年列宁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④十月革命后的初期,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应该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观点变得更加巩固。特别要指出的是,由列宁制定基本原则并经1919年3月俄共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32页。

② 参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238、254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124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111页。

(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共(布)党纲草案规定,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采用最激进的措施准备消灭货币,并把上述措施列入纲领。1921年第1—2期的《国民经济》杂志文章中说:“社会主义是实物经济,它的发展不需要货币。”这种提法当时被认为是不可争辩的真理。在俄共(布)第二个纲领中写道:“在分配领域,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是,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以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分配产品代替商业。目的是把所有居民都组织到消费公社的统一网络之中……”^①为了更快地消灭货币,列宁还拟定了下列的措施:“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做好准备,首先是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领物证等等来代替货币,规定货币必须存入银行等等。”^②在俄共(布)纲领中提出了把银行机构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总簿记机构的任务。“随着有计划的公有经济的建立,这一切就会导致消灭银行,并将银行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部门。”^③1918年11月21日颁布法令把商业收归国有,并用强制性、国家有组织的分配来取而代之。1920年1月取消了人民银行,而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系统建立了预算结算局。^④

在否定与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的同时,产品生产与分配中的实物化得以迅速发展并日趋扩大。

1920年底1921年初战争结束,苏维埃政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期间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为此,1921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这样,使苏维埃俄国转入在整个苏联时期显得最符合客观实际与富有成效的新的经济体制时期。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须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贸易、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流,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活跃经济和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的目的。

①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第2卷,莫斯科1970年版,第55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91页。

③ 《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决议和决定汇编》,莫斯科1970年版,第56页。

④ 转引自尤里·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等译:《别无选择》,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观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他们都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一种产品经济。但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也有不少争论，但总的来讲，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和承认价值规律、市场对经济起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牢牢地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也就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斯大林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我们在前面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没有商品货币设想时，就指出，这种设想，带有一般的、大概的、草图的性质。列宁在总结军事共产主义后，果断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并认为，新经济政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在货币、商品等问题上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列宁一开始就从允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做起，而对大资本的生产资料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一些原则，要求国营企业实行商业性质的经济核算制。但后来很快被实践证明，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小生产者占优势的俄国，必须后退，从而“……在国家的正确调节（引导）下活跃国内商业”。^① 这里可以看到，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与发展商业，主要出发点是当时存在大量小生产者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了建立国营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的一种联系方式，那么在所有制改造任务完成之后，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后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与商业等问题，列宁没有作出明确回答。但列宁毕竟否定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的观点，这不能不说是个重大进步。这也为党内坚决拥护新经济政策的领导人正确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14页。

理解与对待市场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如布哈林指出的，“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①“市场关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这是确定新经济政策实质的重要标准”。^②

但斯大林不从俄国实际情况出发，积极主张取消商业，他说：“国家、国营工业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农民的商品供应者，而农民也不经过中介人直接成为工业、国家的粮食供应者，这有什么不好呢？”^③很清楚，斯大林这里说的取消“中介人”就是指取消商业，商业没有了，就不存在商品流通了，那也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了。这种思想是他对商品经济的错误看法的必然反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的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④也正是这个原因，斯大林也急于结束新经济政策，急于搞农业全盘集体化，尽快消灭在他看来迫使苏维埃从事商业和商品流通的小生产者。就这样，斯大林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坚持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以此理论为基础，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斯大林坚持产品经济观，竭力限制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也是为其在这一期间推行的经济政策服务的。

(1) 为了保证超高速工业化需要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斯大林认为，必须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控制经济的目的。因此，就不能通过市场，不能通过批发贸易，而是通过集中分配的办法来实现对整个经济的控制。这样的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商业原则自然就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2)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农业全盘集体化是超高速工业化合乎逻辑的产物，是从农村榨取资金与粮食的重要办法。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客观上就要求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等价交换，取消集体农庄向国家的义务交售和向拖拉机站交付的实物报酬，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1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2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6页。

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这是斯大林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情况。

(3) 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商品经济，积极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苏联经济应该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而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从实际经济生活来讲，经济联系的实物化趋势在发展，国家正想方设法直接控制经济，特别像对粮食等农畜产品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控制手段，为此，甚至不惜造成大量农民的死亡。另外，还实行配给制。在理论方面，这一时期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似乎苏联经济已进入了商品货币关系不断消亡阶段。有的学者甚至说，在苏联价格不是价值规律的表现，而是自觉的计划领导的工具。^① 大多数人确信，社会主义是一种没有货币的实物经济。十分自然，在实物经济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生产规律的地位。

(4) 强化计划原则与计划权力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虽然涉及一些理论问题，但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一击破，在这一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来说，从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来讲，就必须解决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即谁是生产的调节者。主要有两种观点：是价值还是计划性。从官方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是计划。一般是这样解释这个观点的：既然有把计划发展看成是市场自发势力的最明显的对抗者，那么，计划也就被宣布为苏维埃经济的调节者，首先在社会主义成分中能起最大的作用。同时，计划不仅同自发势力相对立，而且还同价值规律本身相对立，因为这一规律只能是自发的。为了使计划性（或计划原则）在调节经济中得到强化并赋有理论色彩，因此，经济学家们把计划性变成规律，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样就可以与它的对立面——价值规律处于同等地位了，就是说这两者都是客观规律了，并且在理论上可解释为：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

^① 参见（苏）A·H·马拉菲耶夫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3 页。

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对斯大林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也是防止出现价值、货币的权力压倒计划权力的可能性。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不断地把计划原则绝对化，产生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主观主义的唯意志论得到大大发展，所谓计划调节实际上变成了按一些经济领导机关、少数领导人乃至个别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调节。

（二）斯大林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的最后结论

尽管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但是，对这一观点持反对的或者不完全赞成的看法，也不时出现过。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苏联经济界对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讨论曾明显出现过一段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这方面理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是：第一，在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期，因此，常常有人认为，在经济中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因素，即计划性和自发的价值规律；第二，在过渡时期，一方面要允许商品经济自发势力的存在，但这并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计划原则，如有的学者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放手让自由市场的自发势力活动应当同加紧把计划因素引入我国经济活动的工作结合起来”；^① 第三，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商品货币关系所强调的是“利用”，即利用它来为发展经济、克服当时存在的经济困难与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服务。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下半期，特别是在废除配给制后，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有了新的变化。在 1932 年 1 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对战胜商品关系和取消货币的思想提出了批评，强调有必要巩固苏维埃卢布和开展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排除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主义可以并存。

在联共（布）中央为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于 1941 年 1 月召开经济学家和党的领导者的会议之后，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观点在会上受到批评，实际上开始承认社

^① 参见章良猷编：《苏联经济思想史论文选集》，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363 页。

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事实。

战后，在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又作了两次大的修改后，于1951年4月完稿并提交全苏经济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性质与存在的原因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应该说，讨论气氛较活跃，在克服教条主义、发表新看法等方面都有所进步。会后，斯大林将讨论会的结论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汇集在一起，出版了被认为是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经典著作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此书中的观点，又成为1952年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基础，成为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人人必读的（包括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著作。这里，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作些简要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的基本观点是：

（1）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还存在或者还需要保留商品生产，原因是存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与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形式。斯大林解释说，“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这种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以及种子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尽管它们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①

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比他的资本主义根就“藏在商品生产里”与要消灭商品生产等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也说明，不管斯大林手中有多大权力与对消灭商品生产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还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需要商品生产，这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应看到，斯大林对存在商品生产原因的论述，在理论上是肤浅的和不彻底的，远不是全面的。后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0页。

来，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不少苏联学者提出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之所以存在商品生产，除了由于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两种形式这一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如社会分工；个人所有制；给社会主义工作者的劳动以必要的物质刺激；由于劳动条件的不同，在通过劳动产品交换活动时必须保持等价和使用劳动产品彼此相等，这种相等要求利用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等价物；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要保持其等价性就必须有商品形式。还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的有偿性视为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最根本原因；另外，苏联与外国进行对外经贸联系也需以商品形式进行；等等。总之，较为普遍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两种形式去说明，那么，一旦集体农庄所有制发展成全民所有制之后，商品生产的命运为何呢？按斯大林的说法，那就不存在了。他说，“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①

（2）苏联存在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斯大林说：“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② 斯大林在这里强调“特种”商品生产，其主要用意是坚持在苏联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有的经济范畴，如“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剩余价值、资本、资本利润、平均利润率等等”^③。并且强调，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一看法，是前面有关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直接引申，既然主要是因为集体农庄只能接受商品交换形式才产生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那么国民经济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在内部运行时所有者不变，仍然是国家，这样一来，生产资料只是形式上是商品，保留着商品的外壳而已。

（3）有关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的看法是：价值规律“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④ 价值规律与其他规律一样，不是“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规律。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46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1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57页。

“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①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性看法是：“不容置疑，在我国现今的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规律不能是各个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方面的‘比例的调节者’。”^② 在这里，斯大林有两点是正确的：一是明确说，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价值规律，二是说，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但极为重要的是，他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起调节作用，这样，就把这个规律的作用从生产领域驱逐到流通领域。在斯大林看来，价值规律对生产调节作用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被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这一规律的作用限制着的，因而，也是被大致反映了这个规律的要求的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限制着的。”^③

斯大林的上述看法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与价值规律是不能改造的观点又是矛盾的。生产是个统一的过程，价值规律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斯大林怎么能把它的作用主要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领域呢？在他看来，编制的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换言之，在苏联的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主要领导人意志的指令性计划，实际上成为生产的调节者。但是正是这种调节者的作用，才使苏联经济畸形和比例失调发展到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步。

斯大林上述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讲，其目标是要使苏联朝着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发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坚持产品经济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在斯大林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理解的出发点是：直接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而商品货币关系是被迫利用的形式而已。至于谈到市场经济，在斯大林时期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概念。有些学者批判说，“各色各样的‘市场’观点也同样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真正需要格格不入。不管主观愿望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56 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52 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52 页。

如何，这些观点必然同右倾修正主义观点合流”。在这方面应特别指出，以上分析的产品经济观是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理论基础。

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经济理论的重新审视

从客观条件来看，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垄断理论的局面结束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由他定稿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再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真理了。赫鲁晓夫为了推进改革，要求在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克服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言中强调，“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科学的阶段了”，“由于部分经济学家和哲学家脱离实际，书呆子习气和教条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书呆子习气的坏毛病的实质不单纯在于染上这种毛病的人所作的引证是否恰当，而在于他们认为真理的最高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人士对某一问题的言论。他们丧失了研究具体实际情况的兴趣，他们用选择引文和巧妙地搬弄引文来代替一切。他们认为稍微违反引文就是修改原理。书呆子们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害处。”他还批评说：“经济学家没有好好地研究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我们的建筑师一味奢侈浪费，不考虑人民的戈比，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中还是常常不计算生产一公担谷物、肉类的费用，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也反映出经济学家没有研究价值规律如何具体在我国经济中起作用这个问题。”另外，赫鲁晓夫执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对农产品采购价格制度的改革，对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广泛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在确定国民经济各种比例时，开始考虑到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实施各种经济政策时考虑到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实践中已突破了斯大林的一些经济理论的束缚。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经济理论界，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对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已进行了相当广泛的讨论，并对推动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十分有益的先导作用。下面我们就一些主要理论问题，根据这一期间苏联报刊和一些论著的材料作一简要

的介绍。^①

（一）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问题

人所共知，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都以斯大林的生产资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为理由解释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后，1957年5月，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关于价值规律及其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利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苏联经济理论界联系实践展开了广泛讨论，对发展商品货币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会上，广泛讨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问题。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院士作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及其特点》的报告。他坚持这样的论点：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同时，他批判了这样的理论：生产资料在实质上似乎不是商品，而只具有商品的纯粹的外壳。

在会议发言者中间，只有少数人（斯皮里多诺娃·H·C·、阿洪多夫·B·Ю·、维亚齐明·И·А）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所有制形式这一解释。其他接触到这个问题的人则注意到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在逻辑上的混乱，因为他以为下面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即在国营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是商品；但同时，他又认为商品生产之所以必要，是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形式。

按照季亚钦科·B·П·的看法，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和性质作如下的解释才是正确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们决定着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而社会劳动又决定着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的各種矛盾的特殊性。

在1957年会议后，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问题，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在1959年10月顿河罗斯托夫市高等院校的会议上，在有关报刊和书籍中继续进行讨论。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新的关于商品生产必要性的观点，其内容已由普拉

^① 以下两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与必要性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一些观点的材料，除了脚注注明的外，笔者引用了苏联学者有关介绍（见（苏）马拉菲耶夫·А·Н·著，马文奇等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理论今昔》，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20页）。

沃托罗夫·Г·Б·汇编成册，并作了说明，普拉沃托罗夫得出的结论是：其中每一种观点都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综合，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因为每种观点的维护者们在其他的理论体系中都能找到不论是立足点、论据体系或最后结论方面的缺点。作者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表明有必要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而马拉菲耶夫·А·Н·认为，对商品生产必要性的各种解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的个别方面联系起来，可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主要原因，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中，即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寻找。但是这样的回答仍旧很一般，因为商品货币关系本身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因素。在我们看来，商品生产的直接原因在于，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社会分工和社会主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多种多样的。以国营企业为一方，集体农庄为另一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关系，彼此是独立的。各个集体农庄，作为不同的所有者，是彼此独立的。各个国营企业，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在副业经济中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就是它们的个人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是他们所获得的收入的所有者。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社会分工和国民经济各个不同环节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并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存在。

绝不能以为通过纯粹逻辑的论证来解释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在1957年的讨论会上，温热尔·В·Г·在论证商品生产的必要性时，援引了“来自实践”的理由。他说道：“苏联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没有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可思议的。”帕什科夫·А·号召正视事实。他说，现在也许是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在地、严肃地对待在苏维埃经济中存在已不止一个十年的商品生产，承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早已为实践本身所证实的时候了。他接着说：“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全部实践令人信服地、不容置辩地证明：没有商品生产，没有使城乡、工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相联系的市场形式，无论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营活动都不可能顺利地展开。过渡时期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早于1921年已在列宁的著作、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得到了证实。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实践上和理论上也早已于30年代

初期，在同所谓‘左派空谈家’的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证实，由于新经济政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左派空谈家’们便硬说贸易、货币、银行体系以及商品生产的其他因素和杠杆似乎在当时已面临末日”，“以后的全部实践也表明，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对集体农庄农民，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贸易、市场仍然是经济联系的必要形式，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党也不可能向劳动人民提出更好的形式来代替这个经过人类几千年实践的考验和检查的联系形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应该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特点”。

（二）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末，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是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也是一直存在争论的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这个时期，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它只存在商品关系的外表形式，商品货币关系的空虚性表明，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有的学者对此解释说，社会主义生产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直接上不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只要有商品生产存在，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不是通过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商品货币关系，而是通过广泛利用价值范畴而向前进步的。在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中，价格、利润、工资等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范围。之所以说社会主义生产是新型的商品生产，因为这种商品生产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不是以劳动工具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形式。社会主义集中计划制度不仅包括商品生产的经济杠杆，而且是合理地利用它们分不开的。第三种观点是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主张对商品货币关系要充分利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那种只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仅仅是产品的商品货币形式，而不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不存在没有形式的内容或没有内容的形式。商品、价格、货币、利润以及与价值规律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其他范畴，并不只是外表形式，或只是简单的核算劳动和计算成本的工具。这些范畴和经济杠杆具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它们本身是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在固有的，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分离的。^①

从苏共二十二大前这一时期的讨论情况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必要的。但也应看到，还有不少的学者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形式并不反映商品的内容，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作用。195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赫辛·H·和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之间就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赫辛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制度，所以在书籍中所碰到的诸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这样一类提法，应该说是错误的。按照他的意见，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商品关系的形式，但是不可能明确地说出这种关系的实质。商品形式的空虚性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并不发生作用，而价格政策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全部规律的要求为基础的。

在其他一些学者的发言中，也往往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针对赫辛等人的发言说道：“我听了赫辛同志的发言，之前还听了科尔加诺夫同志的发言，使我想起了1951年的经济讨论会，我似有‘车到现在还没动’之感。我忽然想到，否定苏维埃经济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说法，在我国1941年以前曾风行一时，正像解释商品生产的核算分配观点在我国曾一度占优势地位一样，但都早已成为历史的档案。”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还指出赫辛·H·等人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以反历史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在于使形式脱离内容并学究式地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实际上，赫辛·H·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名副其实的商品生产。持赫辛相同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阿特拉斯·B·教授，他在1959年的会议上说：“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商品货币形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决不能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看作商品经济制度的变种，即使加上‘特种’两个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直接社会生产，它本身在实质上并不是商品生产。”阿特拉斯说不是商品生产，而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继承下来的商品货币形式。这种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认为阿特拉斯把形式同内容割裂开来，因而不止一次地自相矛盾。他错误地把直接

^① 转引自陆南泉等编著：《苏联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6页。

社会生产同商品生产对立起来，企图以此来加强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生产非商品性质的结论。

莫斯科大学讨论会之后，在苏联出版的学术专著中，还不断出现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等人，也在自己的论著中不断批判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任务不相容的。

总的来说，苏共二十大后，围绕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展开的理论讨论，使苏联经济理论前进了。特别是1957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这次讨论会，在推动经济理论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地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物质福利而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这一原理得到了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人的支持。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它为运用经济核算、赢利、价格形成和基建投资的效率等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理论上提供了基础。例如，有的学者在这次讨论会上，提出在价格形成方面研究的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苏联的价格动态；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与消费品价格的关系；第三，生产资料的价格体系；第四，国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如何正确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又如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就基建投资效率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通过讨论，在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苏联经济学界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只包括消费品生产领域，还包括生产资料生产领域。承认这一论点是以后接着而来的对基建投资和新技术效率问题开展讨论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1958年6月举行了这些问题的全苏科学技术会议，会议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科学技术协会全苏委员会经济与生产组织委员会召开，参加者约800人。会议承认，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实质在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即降低产品价值。这在解决效率问题时考虑到价值规律作用方面跨出了一步。会议认为，将国民收入实际额的增长同为此所必需的基建投资进行对照的原则是确定国民经济范围内基建投资经济效率的基础。为了选择最有效的投资方案，会议建议将追加投资回收率的期限同这一指标的标准值进行对照，并利用其他的技术经济指标，也包括生产的赢利。

根据会议的各种建议，制订了《确定苏联国民经济基建投资和新技术经济效率的标准方法学》。该方法学提供了比较效率的标准系数（回收率数值、回收期

限)。

(三) 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苏共二十二大之前多次举行的经济理论讨论会，总的来说，学术界对斯大林有关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缩小商品流通、用产品流通代替商品流通和忽视价值规律作用持批判态度，强调要在新的条件下，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61年10月，不论是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还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的报告，都强调要重视经济科学的研究，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物质刺激和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苏共纲领》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正确结合，是争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和社会主义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在这方面，运用经济核算、货币、价格、成本、利润、贸易、信贷、财政这些发展经济的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核算，力求做到严格的节约、减少损失、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赢利。应当经常改善价格制度……价格应当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反映必要劳动消耗，保证能补偿生产和流通费用，使每一个正常工作的企业得到一定的利润。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产品成本的基础上，不断地、有经济根据地降低价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把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当社会处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时候，不要按劳分配，不要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像价格、利润、财政、信贷这样一些范畴是不行的。”他接着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我们应该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为了更好地完成计划，应该给予企业以更多的可能性来支配利用，更广泛地利用利润来奖励自己集体的良好工作，来扩大生产。研究和采用集体刺激的形式，使每个工作者不只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而且关心全部集体劳动的成果，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勃列日涅夫时期商品经济理论停滞不前

列宁以后的苏联各届主要领导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也就很难根据变化的情况发展理论，提出新看法。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理论问题关系到体制政策的总目标和总方向，决定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在长达18年之久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像灭火队灭火一样很快把它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已处于“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本来是充满生机、丰富多彩、不断发展与变革的社会，它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最终规律”可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①他还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他看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28—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443页。

宁主义。”^①但遗憾的是，苏联在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把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固定化，把苏联二三十年代搞社会主义的一套做法，都视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律”和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准则。在这种条件下，苏联要通过改革来改革苏联本来就非常需要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非常困难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但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观点是：

第一，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属性，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直接社会关系，商品关系是处于从属地位的。

第二，直接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容，而商品关系是形式。

第三，在强调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同时，又强调它的“新内容”、“新特征”。就是说，市场机制的一切作用都要通过计划来实现。

第四，与第三点相联系，不恰当地强调商品货币关系的特殊性，忽视共性，从而导致否定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可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其主要含义是：

第一，承认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统一，因而也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统一。但上述矛盾不再反映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无论具体劳动还是抽象劳动都是直接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社会性。这种社会直接性还处于比较低级阶段。它不能直接以劳动时间表现自己，还必须通过非本质形式——货币形式来实现。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直接社会劳动之外，而应当从直接社会劳动内部来寻觅。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是存在于计划之外，也不是与计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划并存，而是社会主义阶段有计划发展的一种形式。与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论”相适应，价值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范畴也都具有了计划性，市场也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新内容论”也是官方接受的一种观点。当时的《苏共纲领》中指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商品货币关系在我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固有的新内容。”

在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有所发展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应在一定程度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观点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市场社会主义”。柯西金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作用的各种错误观点。”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国家计委副主席巴秋林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各个集体的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做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计划服从市场；（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巴秋林批判这一理论时指出，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决定生产过程的主要比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效果提高的不是计划，而是自发作用的市场。计划的作用仅仅被归结为消极地反映市场行情，使经济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他强调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的人用各个企业的互相作用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领导作用。按照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当同国家分离，而经济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他还尖锐指出，主张“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修正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即所有制关系。右倾修正主义者提出三种人为的所有制形式的构想：国家所有制（运输业、邮电业、动力、林业）、企业所有制（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和私有制（小型的和中型的私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侵蚀”，它孕育着资本主

义因素的复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① 十分明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理论仍然是：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比例的是靠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而不是利用市场调节。计划与市场是两个对立的東西：一个是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计划化，另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机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不能凑合在一起。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② 另外，在苏联官方看来，主张市场调节作用，企业就会要求过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导致企业自治，脱离国家轨道，因此认为，正是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问题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垮”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断言，这些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展开批判之后，少数学者如利西奇金、列昂捷夫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也就销声匿迹了。在这种理论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有重大进展。只能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范围内进行修补。鲍文提到1965年改革以失败告终及原因时指出，是不坚决、措施不彻底和不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的做法害了我们。我们用一只手给了权利，却又用另一只手收了回来。我们通过了新的法律，可是旧的指令还照样保留。^③

戈尔巴乔夫时期从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 偏见到认同市场经济

苏联在历次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

① 参见（苏）巴秋林·A·著，陈慧等译：《计划经济管理方法》，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3、136—138页。

② （苏）《经济报》1979年第26期。

③ （苏）《新时代》1987年第5期。

论问题。应该说，在理论认识上都未取得实质进展，都没有摆脱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这一基本看法。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上，有较大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从领导到学术界，都强调要克服长期以来的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应该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成见。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又指出：“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偏见，以及往往把它们当成某种异己的东西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中的唯意志态度，导致了对经济核算制估计不足，以及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在价格形成中产生了主观主义原则，破坏了货币流通，不重视调节供求问题。”

第二，普遍认为，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列入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关系，没有这种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和运行。

第三，在《企业法》中明确指出了“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观点。

第四，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应该从整个管理经济体制中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补充出发来考虑计划性与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另外，从这次全会通过的有关文件来看，苏联的经济改革是朝着形成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市场、资金市场、合同价格方向发展，并扩大自由价格应用的范围与加深市场关系。

第五，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竞争的必要性。苏联强调，要限制垄断和开展竞争，不能把“竞争”这个词与“私人资本主义”紧紧联在一起，竞争不是恶语。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除了有其无人性、危害社会的消极作用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起着积极作用，它促进科技的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在苏联，竞争必将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

第六，随着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方案的讨论，苏联终于在1990年结束了“市场经济”是个禁区的局面，而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活力和效率的。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由人的利益决定的，目的在于建立起面向社会的经济，使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需求，克服商品短缺和排长队的耻辱，切实保证公民的经营自由，为鼓励热爱劳动、创造性、主动性和高生产效率创造条件”，“向市场与我国人民

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市场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能保证在全体生产者活动十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使经济保持平衡，保证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要求生产具有灵活性，并能迅速接受科技进步的成果”，“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同世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我国公民得以利用文明的一切成就”。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苏联改变经济理论，实行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

90.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开放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

马龙闪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同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经过克服“左”、右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才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艰难，丝毫不亚于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如果说从1911年算起，到1935年最终找到正确领导的话，经历了24年的时间；如果从1921年算起的话，则经历了14年的时间。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1949年算起，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则经历了几乎30年的时间。在这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由遵循新民主主义论到放弃新民主主义论，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到着手探索自己的道路；在探索自己道路时，原以为自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上了苏联走过的工业化“大跃进”和“赶超战略”的老路；紧接着，满以为我们在吸取苏联教训，“反修防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创造”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革命形式，实际上又不自觉地步了苏联30年代“大清洗”和战后意识形态大批判以及“草木皆兵”、大搞阶级斗争的老路。30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作出了种种巨大努力，其间也取得了不少调整和局部改革的重大成就，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严格说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最终都没有摆脱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窠臼。

只是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峰回路转，找到正确途径，把中国建设的列车开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

邓小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对斯大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突破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正像布哈林所说，是逐渐趋向缓和的。但是，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性片面化、绝对化；同时，又几乎把所有矛盾斗争都解释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 1927 年底—1928 年初因计划和管理错误而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将其直接原因解释为“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激化；对 1928 年春主要由偶然技术原因而引起的沙赫特煤矿事故，斯大林却解释为是资产阶级专家同国际资本勾结，而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的“严重进攻”，导致进行了 50 天审判，最后 5 人被处决、40 多人被判刑的“沙赫特事件”。从此，便开始了对“富农”和资产阶级专家、知识分子连续不断的斗争。此后，继续扩大阶级斗争，不仅把同党内一系列反对派的分歧和争论统统视为阶级斗争，还把同老布尔什维克、被列宁称之为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的意见分歧同样看成阶级斗争；不仅把文化界、学术界人们所持的不同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一律政治化，上升为阶级斗争，还把经济领域和工业战线在“大跃进”、劳动竞赛中，因设备超负荷运行而发生的机器损坏、残次品增加，统统视为“人民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样，草木皆兵，敌人越抓越多，最后发展为 30 年代的“大清洗”和战后持续进行的一系列政治镇压运动。斯大林这样搞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连续不断进行的各种形式的社会政治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大批判、大斗争。原本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即应由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到和平

的“文化”组织工作”方面，即经济建设上来。^①但斯大林当政后，却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实际上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搞成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尽管在社会主义探索中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曾多方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但在1957年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也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自觉地采用了斯大林的这一社会主义模式。

邓小平吸取了苏联和中国的深刻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地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使党的工作方针发生战略性转变，可以说是对苏联模式的一个巨大突破。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苏联社会主义 “超阶段论”的突破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斯大林提出的完成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并在1936年的宪法中对此作了郑重宣布。按照这一基本思想，仅仅过了三年，在1939年的联共（布）十八大上，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②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实行共产主义“完全可能”，^③因此，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要进行一系列“共产主义建设工程”。按照斯大林这一思路，赫鲁晓夫进一步宣称，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虽然有所保留，但仍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整个苏联时期，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的几乎所有脱离现实的“左”的倾向，大都源自这一“超阶段论”的思想。仅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提出达到“发达社会主义”的前提，其“经济条件”，是要求“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要求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共同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②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282页。

③ 《斯大林文集》，第510页。

体”业已产生，“民族共同体”的友好关系已“牢不可破”；而“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得到“普及和树立”。这些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状况的要求，实际上掩盖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端和危机，延误了对社会问题的认识 and 解决，从而酝酿了未来更大的危机。

毛泽东同志曾接受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因此，继“三大改造”后立即倡导并发动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是把人民公社当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提出来的，因此就出现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认为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离实现共产主义已近在咫尺了，只要几年时间就可到达。如果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基本建成”，是从1917年夺取政权到1936年，是经历了19年的话，我们宣布实现社会主义，则仅仅经过了从1949年到1956年，花费了7年时间；如果苏联宣布从“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1936年到赫鲁晓夫宣布实现共产主义的期限是1980年，前后为44年，我们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建立人民公社和“不太遥远的”共产主义，时间则缩得更短。后来我们的说法虽然大大后退了，放弃了那种过火的狂热宣传，但对社会主义阶段性问题并没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从1958年到“文革”期间，康生、张春桥等人对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仍不断进行狂热宣传，并一度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从这种情况来看，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性的标定还是蛮高的，尽管不像当时苏共那样，明确确定为“发达社会主义阶段”。

邓小平同志从来主张“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采取这些“左”的办法，“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①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明确确定为“初级阶段”，这才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切实明确了当前阶段的历史任务。我国各种文献和著作对“初级阶段论”作了大量阐述，但无论怎么说，归根结底，它是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创造性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思想的吸收和继承，是对苏联社会主义“超阶段论”的突破和否定。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对封闭禁锢、 因循教条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

斯大林对苏联闭关锁国方针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被资本主义包围”。但列宁时期“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状况，比起斯大林时期来显然更加严重，而列宁却是实行了比斯大林更加开放的政策。这样看来，单单用“资本主义包围”的理由来解释封闭禁锢的方针是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从理论到实践完全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才是斯大林采取闭关锁国方针的最重要原因。列宁历来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脱胎于”资本主义而向更高文明阶段的发展，因此，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个原因，列宁主张派人到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管理。列宁时期还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研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成就。斯大林则完全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了，不仅解散了列宁时期建立的“劳动研究所”等机构，还将资本主义的一切，包括文化、管理和科学，统统视为洪水猛兽。斯大林时期继承“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衣钵，提出了“资产阶级科学”、“资产阶级文化知识”等一系列错误的概念，从30年代起就开始批判生物遗传学，继而又批判“资产阶级优生学”等，以至到战后进一步批判“系统论”、“相对论”及有机合成化学等。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如此对待，而在经济贸易上，到战后斯大林则提出建立“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以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相对立。凡此一切，都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地步，实际上造成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封闭就意味着落后，这是必然的。

在紧闭国门，与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交往的同时，苏联还存在着因循教条，阻挠改革的体制性因素。这些体制性因素包括，对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模式论的理论教条，高度集权的机构体制，特别是苏联重工业—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存在以及在此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从斯大林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多次出现改革契机、改革尝试或改革的实践，但都被不事改革或阻滞改革、反对改革的保守集团和势力破坏殆尽，造成苏联改革命运多舛，屡改屡败，最后把整个国家带入崩解的深渊。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就深刻吸取了苏联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

列社会主义国家闭关锁国的教训。改革开放方针，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① 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这一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是总揽世界大局，深刻洞察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势所作的重大决策；同时，它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过的闭关锁国的深刻教训，是对封闭禁锢、因循教条，不事改革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

实事求是、从民众的需要出发发展经济， 是对苏联式经济发展模式的突破

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这对苏联有一定的必要性。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税”，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需要。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却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物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不敷人民群众的需要。这种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引起苏联人民的不满。

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往往脱离现实生活，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苏联上世纪30年代就实行过工业化“大跃进”（“большой скачок”）的方针，从那时起也长期采取“赶超”发展战略。^② 按照工业化“大跃进”的超高指标，要求每年度基本建设要扩大1倍，生产量增加30%，黑色和有色金属、汽车、农业机械和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② 马龙闪：《苏联模式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1期。

铁等品类的生产，必须比原计划多生产1倍。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巨大项目——库兹涅茨克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则要比其原设计能力提高3倍。^①这种冒险性指标，显而易见，是严重脱离实际可能的。

执行的结果是，苏联的这一“大跃进”指标远远没有实现，工业“大跃进”遭到了失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欲速则不达”，这是苏联当年工业化“大跃进”得出的严重教训。

斯大林实行的这一工业“大跃进”方针，是他赶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大林在论证超速工业化时强调：“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②这种由于落后而急于快速发展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说法也颇有号召力，因此，在民众中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响应。

问题不在“赶超”本身，而在于严重脱离了现实可能，脱离了现有的实际发展水平，而提出不切合实际的指标，最终使国家和人民浪费人力财力，遭受巨大损失。

对苏联上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从亲身经历中得到过深刻体会，并因此吃过苦头。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十分强调我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事求是，要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出发，要从民生需要出发。为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含义。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意义的新的阐发，对发展模式的新的选择，是对苏联国民经济以重工业化和重工业军事化发展模式的突破，也是对苏联“大跃进”和赶超发展战略的突破。

^①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 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

实际上，列宁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就运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杠杆，用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际上是提出了商品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

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变成一种反资产阶级性的、反商品市场的、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斯大林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的“祖训”超越历史条件地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思想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他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他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 30 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同志的革命胆略和高超睿智在于，他敢于冲破从苏联到中国几十年赋予计划经济以社会主义属性这一“铁律”，把市场和计划看做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将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

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问题上对斯大林体制的突破

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人们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只知道社会主义要消灭、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很少有人懂得，这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表层、一个片面。马克思主义不仅讲到这一面，还讲到社会主义是从高度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但是，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问题却是，它是首先在俄国和中国这样半东方或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出现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这个实践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的请求，在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对俄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言简意赅的回答中，要害是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要“双方互相补充”，而“相互补充”的前提，是西方能响应俄国革命，给俄国未来的社会主义提供援助，使俄国得到其国内所缺乏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以此来补充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其更深层含义，实质上还包含着俄国“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互补充”。但是，西方并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响应俄国革命的“信号”而发生革命，因此，不可能通过西方无产阶级之手来援助俄国革命，不可能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给俄国的社会主义以补充，这样一来，怎么来弥补并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问题呢？这正是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致力于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他用“公式”来表达这一看法：“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①这样，列宁就在理论上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实践上，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至市场来发展经济，也是着手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列宁晚年曾经说，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这就是说，新经济政策要利用资本主义经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发展，才能在未来把一个“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②但是，列宁没有能把自己的思想变成现实，就过早地去世了。

斯大林接手列宁的权力之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思想，看不到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遗产，社会主义具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性、一致性的一面，而只看到社会主义要取代、消灭资本主义，因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斯大林在理论上走向片面性的同时，在实践上又很快取消新经济政策，立即向资本主义发起了“全面进攻”，截断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斯大林把这一理论和实践的错误灌注在苏联模式，一直影响到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数十年，对中国的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前夕。

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其伟大革命家的无比胆略和高超智慧，在实践中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世界的广大范围内，吸收了经济现代化领域的诸多宝贵经验，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经验，也包括苏联和东欧社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29、6页；第34卷，第520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02页。

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经验。这里最根本的，是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把资本主义看成处处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祸水，而是在看到二者相对立、相矛盾一面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看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双方”的“互相补充”，因此，大胆利用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市场经济发展的成果——股份制、银行、股票、证券等。过去，人们向来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许多人没领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相继承，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补充的一面），从斯大林起，仅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同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搞纯而又纯的、100%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生产关系领域追求大而公、全民所有制，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层建筑领域大搞100%的“布尔什维克化”，要消灭资本主义残余思想、中间思想形态。影响到中国，就是要完全地、彻头彻尾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绝”资本主义的“种”；把“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阶级范畴，不承认“小资产阶级”思想形态的存在。在思想领域，倡导“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等。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总是“连体婴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也是“水火不容”。邓小平同志以其无比的胆略和智慧，突破了这一思想框框，把市场和计划看成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然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大胆的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契合点”，恰当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用先前被认为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惯常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来给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这既适应了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使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这样，尽可能利用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就大大突破了过去仅仅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看做对立、对抗的黑白二元思维模式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 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重大突破

从中国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以他对苏联和中国以往体制模式的深刻认识，从体制模式的层次上，高屋建瓴地思考和设计中国改革的。他深刻认识到，体制模式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和兴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就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① 1980年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他又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

他在1985年8月接见姆加贝时又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

从这些深刻的论述可以看出，在他进行改革思考和设计时，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苏联模式属于“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从中国和苏联的体制、模式和制度的层面上，着眼改革并进行突破的。

既是着眼于体制模式，就是从整体上、战略上、全局上着手改革的。邓小平同志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④ 这就是他进一步指出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在1986年有关谈话中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①

邓小平同志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置的目标，就是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实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②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极为复杂、极为繁难，需要较长时段实现的事情，加上1989年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剧变，致使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对此尚未大步落到实处，但他提出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和最终目标，已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体制划清了界限，并实现了本质上的决裂。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外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如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③。他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化体制改革”，但他讲到要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封建主义残余”时，曾提出应根除的“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④ 在这里，他实际上是把“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讲的，用他当时的提法就是，要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⑤，这实质上就是讲文化体制改革：在这里，不是指各个具体文化艺术门类的局部改革，即“小文化体制改革”，而是指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大文化体制改革”，即在整個思想文化领域，或者说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对其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样看来，邓小平同志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一系列改革，包括对内、对外总体战略的整体改革，就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不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的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无疑是对此前世界存在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

新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12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更加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上推向了新的阶段。在这里，必须强调说明，上述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脱离现实可能条件的发展；一切从国家出发，从强“国”观念出发，而不以“人”为念、不“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不是以市场驱动，而是以阶级斗争、社会运动为恐吓机制推动建设和发展的错误方针——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党的这些创新理论，同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所提供的建设实践，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更进一步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质性地突破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更大踏步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与其有质的不同，就不能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当前有些人却没有把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关于中国改革的整体思想体系和模式设计，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视做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将二者分离开来，加以割裂。他们用置换概念的手法，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混同于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框架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将二者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① 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比较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 我们今天应该用这一标准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不应该再继续使用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标准，即“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等等，来界定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改革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当前，正当我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有人却利用各种机会在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问题上做文章，无视邓小平同志有关苏联体制模式的一系列言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这一事实，千方百计对它加以颂扬，这实际上是同我国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91.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

蒲国良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内部发生了以中苏两党为主要代表、几乎席卷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论战。邓小平是这场论战的当事人，他对这场大论战的反思对于我们总结国际共运发展的经验教训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影响深远的中苏两党大论战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新观点，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中共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示了支持，但在内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之举是既“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并判定“此人有点实用主义”。^① 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示了对赫鲁晓夫与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1956 年 4 月 5 日和 12 月 29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从正面阐述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7 年 11 月，60 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乘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活动之机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和争取和平、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及各国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交换意见。莫斯科会议在协商和团结方面取得了一定

^①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的成绩。但会议未能弥合裂痕，相反，中苏两党在会上的发言和会下的交流中自说自话，实际上是把分歧公开化和深化了。此后，随着中苏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随着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表面化和激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1960年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在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回答苏共对中共的批评和指责，阐明中共的基本观点。苏共立即作出反应，批评那些固执地持有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和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①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的报刊上出现了不指名地对对方进行批评和攻击的大量文章。

中苏争论不断升级，双方敌意越来越重。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印象也越来越坏。1959年底，毛泽东还只是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是“实用主义”、“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②到1960年5月，毛泽东已经认定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虽然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③

1960年5月，中共基于对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的国际形势的判定，在6月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上公开宣传《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引起苏方的极度不满。^④赫鲁晓夫伺机报复，终于在随后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和围攻：苏共代表团突然向与会各代表团散发和宣读6月21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并指责中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假革命”、“疯子”、“纯粹的民族主义”等，要求

①（英）彼得·琼斯，西安·凯维尔著，郭学德译：《中苏关系内幕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2页。

④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5—276页；（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4页。

中共与苏共保持一致。结果招致中共代表团的激烈反应。^① 赫鲁晓夫压服中共、迫中共就范的目的没能达到。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生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共同赫鲁晓夫的根本分歧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② 显然，中共领导人已基本上不再对赫鲁晓夫抱什么希望了。

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对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的答复信中，回顾了两党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指出苏共二十大上苏联不经协商就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和平过渡理论，这是双方分歧的开端。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在宣言签字前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双方曾为原则问题进行过多次争论。中共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观点，但希望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问题，而苏共总是企图用压制的办法迫使对方屈服。这是中苏争论愈演愈烈的真正原因。

1960年9月，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结果不欢而散。11月，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活动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中苏两党的斗争在会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会前，苏共又向各代表团散发了一封粗暴攻击中共的长信，作为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9月10日复信的答复。会议虽然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中共在顾全苏共面子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意见写进了文件。中共代表团同时声明，只能再照顾苏共这一次，以后决不照顾了。莫斯科会议暂时缓和了一度激化的中苏两党的矛盾。但好景不长，随着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两党矛盾更进一步加剧，终于爆发了公开的大论战。

在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对应邀与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甚至公开号召推翻阿党主要领导人。大会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迁移到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重要领导人

① 参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42页；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89、290页。



米高扬、刘少奇、赫鲁晓夫、邓小平、科兹洛夫、苏斯洛夫、彭真（左起）在1960年12月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举行的招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者的宴会上。孟庆彪摄（新华社稿）

墓地。周恩来在向大会致辞时对一个党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公开片面地指责兄弟党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① 为抗议苏共再次掀起反斯大林高潮，中共代表团退出会场并到斯大林墓前敬献花圈。周恩来还以提前回国的方式彰显中共的立场。从1961年11月开始，赫鲁晓夫不断发表讲话，苏联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在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期间的保加利亚、匈牙

^①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2页。

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东德四国党的代表大会上，苏共又组织了对中共的围攻。

中共中央决定公开进行反击。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仍未点苏共的名字，但已从原来的只批判南斯拉夫扩大到了批判意共、法共、美共等。

在兄弟党的反复呼吁下，中苏两党决定再度举行会谈。为了阐明自己的看法，中共中央决定对苏共中央的来信作出公开答复。这便是6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于该信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二十五条意见，因此又常被称为“二十五条”。这封信是中苏争论以来中共中央发表的一个最充分的声明。虽然信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的名字而只是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些人”，但它事实上是对1956年以来苏共政策和理论的全面批判。苏共中央就中共中央复信发表声明，认为该信“对马列主义政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歪曲了这些历史性文件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对苏共的“毫无根据的攻击”。双方未能为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会谈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导致会谈最终破裂的是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进行了逐条批驳和全面回击。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

“公开信”和“二十五条”发表之后，苏联各报连续发表了《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社论，接着又发表了大量支持苏共中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消息、读者来信等材料。据统计，仅7月15日至10月底，苏联报刊就发表了近两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与此同时，苏共还操纵各种国际组织和会议，攻击中国，东欧不少国家也跟随苏共一起围攻中共。一时间，中共的处境极其艰难。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苏共“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中共中央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澄清和评论”。声明还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次发表中共中央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并且还要用多种语言广播这两份文件。“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声明希望尽可能多的人来学习这封信，因为它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①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在为此而写的“编者按”中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编者按”列举了在核战争、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和平过渡、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并指出，“类似这样的情况，通篇皆是，总共有78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情况，加以澄清”。^②

中苏两党随之开始了更激烈、影响更为深远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9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声明说，“从今日起，《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将陆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的公开信”。同日，第一篇评论文章发表。此后直到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它们分别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32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323页。

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这些文章涉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几乎所有分歧,系统地阐述了中共中央的观点,批驳了苏共中央的理论。除了上述几篇重头文章外,报刊上还刊登了大量批驳苏共或揭露苏联反华的文章和材料。这一时期,苏共中央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也发表了数千篇批评中共的文章和材料,并通过中央全会的有关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攻击中共。支持苏共与支持中共的各国党也通过各种形式加入了论战。由此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辩论。

1964年1月,毛泽东在谈到中苏之间的论战时表示,“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但“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①并誓言“要争论一万年”^②:除非苏共收回公开信,收回苏斯洛夫攻击中共的报告,取消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否则,就要争论一万年……^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中苏两党关系并未缓和。中共拒绝参加1965年3月苏共发起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23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指出,莫斯科三月会议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新领导人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的具体行动,是为了完成赫鲁晓夫想完成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分裂计划。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从政治路线、理论观点的分歧发展成了公开的组织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写信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予以拒绝。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基本断绝了。

中苏两党之间并波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场大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6—517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1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915—916页。

大论战首先影响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其一，论战的结果是苏共盟主地位的倾覆，由苏共控制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也不复存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分流发展的趋势。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的多样化发展。其二，论战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由于苏共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中苏两党又无法通过论战达成谅解并且分歧越来越深化，这就导致了以苏共为代表的一批党和以中共为代表的一批党之间对立情绪越来越强烈。双方相互指责和攻讦，直至彼此关系中断。在这两大对立势力之间，还出现了少数独立发展的党，对两方都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党多次出现了分裂。二战后出现的那种势不可挡、团结一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了。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党的关系恶化波及国家关系的结果是国家关系由紧张进而中断直至酿成冲突。同时，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论战的一个客观结果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了相当的困难，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其三，由于大论战的双方在指导思想上都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论战不仅没有削弱“左”的倾向，反而在许多方面加速了“左”的因素的进一步膨胀和发展。在苏联，它直接影响到赫鲁晓夫的冒险和勃列日涅夫的僵化。在中国，毛泽东在“反修防修”的方针指导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强化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

大论战也影响到此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大论战导致了中国“一边倒”的对外战略的终结。中国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大旗的同时又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发展到两国政治经济的矛盾，最终酿成1969年的边境冲突和整个70年代的军事对峙，苏联在整个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加强军事设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这是促成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随后出现了国际格局中的中、美、苏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走向。

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邓小平于1954年4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于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此

后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邓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说，“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①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说法，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应该从1954年4月算起，长达12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中苏关系复杂多变的一个时期。其中最大的事件便是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由于处在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的位子上，邓小平不仅亲历了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与论战，而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②

(1) 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直接听取苏方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通报，并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9月30日，毛泽东率中方主要领导人会见苏方代表团，刚刚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只是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视为当时众多副总理中的一个，中苏友协名誉理事之一，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注意。^③

1956年2月，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等到莫斯科与已在莫斯科的朱德、刘晓一起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任团长，邓小平任副团长。其间，邓小平的如下几点表现特别突出：其一，对朱德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要讲条约签订6年来两国的互相合作与支持；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④ 其二，在中共代表团内部讨论时，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发表了不同看法。^⑤ 其三，直接听取苏方向中方通报赫鲁晓夫作批判斯大林秘密报告情况后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⑥ 但在中方代表团私下议论时则明确表示：斯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③ （苏）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④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⑤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7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5页。

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人物。^① 其四，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下午，朱德应邀出席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二十大闭幕的群众大会。邓小平在对讲稿提意见时说：讲话不要对苏共二十大评价过高。^② 其五，苏共二十大后，朱德率团继续在苏联进行友好访问，邓小平回国，直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汇报情况，^③ 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表示反对。^④

此后，经过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即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⑤ 随后，毛泽东在一系列内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的不同看法。围绕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很快便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在这场争论中，邓小平不仅见证了中苏分歧直至论战的全过程，而且是争论中中方的主角之一。

(2) 以总书记的身份积极参加或主持对苏争论和论战的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起草工作

苏共二十大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针对性地写一篇文章，以表明中方的态度。该文后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邓小平直接组织并亲自参与了文章的讨论修改。在讨论中，邓小平认为，赫鲁晓夫的报告主要是从斯大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在这么长的时期内犯了一系列的错误。^⑥ 不能把斯大林的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还反复强调文章应突出中共历来提倡与个人崇拜相对立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⑦ 这些观点在文中都有明确的表述。

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撰文对赫鲁晓夫进行有组织的反击。纪念列宁的重头文章主要有三篇，即由胡乔木牵头起草的《人民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6页。

②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第88页。

③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496页。

④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28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7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8页。

⑦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8—19、21页。

日报》社论、由陈伯达牵头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和由陆定一牵头准备的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述工作都是在邓小平的直接主持下进行的。邓小平曾多次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编辑列宁文章小册子以及三篇文章的分工、撰写思路、中心思想以及初稿和定稿等问题。后来三篇文章又合编印成《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印成中、英、俄、德、日、法文公开发行，引起很大反响。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这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了。^① 同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中苏斗争空前激烈。彭真率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直接交锋，而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的，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最后作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②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以及会议前后，邓小平直接领导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0年6月21日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散发的通知书的答复，全面、系统批驳苏共的观点。答复信经过反复酝酿和修改，并在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讨论。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对赫鲁晓夫，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照他的办，跟着他搞修正主义；一个办法是顶住，坚持原则，即使只剩下我们一家，也坚持到底。^③ 答复信定稿后，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大使契尔沃年科，并把答复信给了他。^④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中方先后发表7篇答辩文章。邓小平主持或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修改。如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认为“写得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⑤ 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给毛泽东审定，并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在批语中认为“写得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⑥

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68页。

②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86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40页。

④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92页。

⑤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64页。

⑥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66页。

共运总路线问题。4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起草复信问题。邓小平是这项工作的直接主持人，这封复信的起草相当艰难，书记处进行了反复的讨论，最后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据邓小平本人讲，“这个文件，恐怕是搞文件以来最费力的一篇东西”，用了“将近七十天。这个文件，常委很多同志亲自参加，主席亲自参加，少奇同志亲自参加，北京也平行作业。总理主持开小组会修改”。^①这封信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1962年底，中共中央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于1963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批判苏共的一系列重要评论文章都是出自该写作班子之手。这个小组的组长虽然是康生，但实际工作是由邓小平主持的。^②也就是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直接领导着中央反修文件小组的工作。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写成的文稿一般都是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再送常委审定。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文章，即通常所说的“九评”，是投向论敌的重磅炸弹。这些评论文章一般都是由毛泽东点题，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和主持下由中央反修文件小组反复酝酿、修改写成的，文章初稿先送邓小平审阅，并在邓小平主持下由小组全体会议讨论。讨论的时候一般是逐段地边读、边议、边修改。这样反复讨论修改后的稿子才送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审议。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在主持“九评”工作中的关键作用。

（3）作为中方主角与苏方进行直接的、公开的争论和谈判

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先后就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进行会谈，批评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行为。

1957年11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随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就各国共产党共同宣言问题负责与苏方进行谈判。由于中方对苏方提供的共同宣言第二稿仍不满意。中共代表团在邓小平主持下日夜奋战，边起草边讨论，不到两天便拿出了一个初稿。该稿经毛泽东审定后交给苏共中央。^③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277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560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97—98页。

此后，邓小平率领中方团队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成员用长达一周左右的时间就宣言草案进行逐页讨论。^① 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争论激烈。例如，中共同意把苏共二十大写进莫斯科宣言，同时却在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等问题上得到了苏共一定程度的让步。但中共的妥协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邓小平后来在通报会议情况时说：在宣言上写“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是讲大会的决议。《宣言》中说，“不但对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这是肯定的；“而且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这个评价比较高，但也可以做各种解释。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短句，即“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把它扣死了，把它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这个短句上。当然，苏共二十大最好能够完全去掉，但在目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让步，又做了这么一个限制，就取得了苏共支持我们对苏共二十大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的修改。这还是值得的。^②

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邓小平建议中国工会代表团从正面广泛宣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在中共中央出面召集的世界工联理事会各国代表团共产党或工人党负责人座谈会上，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致辞中说明了中方的基本观点，遭到苏联工会代表团团长格里申的激烈反对。格里申拒绝邓小平的解释以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挽留，退出了座谈会。^③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在前后举行的5次会谈中，双方互不相让，最后不欢而散。10月在莫斯科召开26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邓小平再次以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经过3个星期的当面交锋。最后达成的协议终于删去了中方坚持要求删除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内容。^④ 11月，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正副团长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

① 《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53—154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76页。

④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093页。

表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达成妥协。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向全会作关于1960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的报告。^①1963年7月，邓小平再次率团赴苏与苏斯洛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团谈判。会谈期间中国代表团的发言，除在国内准备的一个综合性提纲之外，基本上都是临时准备的。工作方式是：代表团成员在邓小平主持下商定每次的发言要点，随后由顾问们集体讨论撰写，然后送邓小平和代表团审阅定稿。会谈仍是不欢而散。此后，中苏两党之间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锋逐渐为连篇累牍、铺天盖地的笔墨官司所代替。

对于邓小平在与苏方谈判和争论中的表现，中苏双方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的作用，“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②，“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③“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你这根棍子是出名了”^④，“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⑤赫鲁晓夫也承认邓小平“很厉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⑥

总体上看，邓小平在中苏大论战中是中方的主角之一。如果说毛泽东是这场论战的中方的主帅的话，邓小平就是中方的主将兼前方总指挥。邓小平在论战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得以东山再起的因素之一。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促使毛泽东作出这一判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⑦

①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1117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440页。

③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24页。

④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17页。

⑤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38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624页；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08页。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中苏论战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国际上的“反修”与国内“防修”是相互呼应、相互交织的。毛泽东把观察苏联社会所得来的结论用以观察中国国内的种种矛盾，认为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他的担心在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竟然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它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向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的动因。^①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年直接指挥中苏论战的主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 而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自己当年亲身经历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中苏论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1) 就中苏论战中反对“老子党”这一点而言我们反对得对了

在反思中，邓小平把当年的那场争论明确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当年的论战实际上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了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它经历了一个从特殊国家间关系到正常国家间关系的痛苦的蝉蜕过程。就中苏关系而言，以前中国以苏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凡事都要向苏联请教。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苏联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和帮助。虽然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屡有不满，但从苏联方面说，什么是正确的指导，什么是干涉内政，其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从中国方面而言，什么是应该共享的，什么是国际主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义援助，什么是苏联愿意提供给我们的，什么是苏联不愿意提供的，也并不是十分清楚的。新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建设中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许多重大项目也都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正因为如此，用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的说法：“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① 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苏联在重大问题上对中国有所隐瞒。但中苏关系首先是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这就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与摩擦。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这一全新的问题上，一旦遇到重大的问题双方如何进行沟通，遇到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这都需要长期的磨合，才能达成默契。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苏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

正是在这一磨合过程中，苏联急剧膨胀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中共的民族自尊心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扩张传统的专制帝国，它的沙文主义、大国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由来已久。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它制约着、影响着从沙俄这一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新制度——苏联。同时，苏共是一个大党，一个在世界上首先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树立了榜样。但它也极易滋生大党主义的思想意识。毛泽东后来曾非常中肯地指出过苏联党的要害：“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② 苏联党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了，在战后借助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这一特殊背景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膨胀。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理论上，就是把苏联领导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代言人，把苏联模式看成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任何人、任何党对此表示怀疑都会被视为离经叛道，都是不允许的。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试图把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都纳入到苏联的战略框架中去，并为此常常在一些重大政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主观随意地作出解释，实行双重标准。苏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326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8页。

联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是为了保证苏共、苏联的“盟主”、“领袖”地位，为了使其他党能够按照苏共和苏联的意图行事，肆意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加强对其他党的控制。

斯大林时期，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也犯过不少错误，从中国国家利益考量，毛泽东对于斯大林隐忍未发。但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斯大林那样的领袖，他的地位更多地来自他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而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心地位和领导角色则是长期积淀的产物。像毛泽东这样身兼理论家与革命家而又“打天下坐天下”、统领着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在赫鲁晓夫面前降尊纡贵，奉其为当然的领袖。而在处理苏中两党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显然又没有斯大林那么谨小慎微，更缺乏斯大林的圆熟老练。于是，当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以赫鲁晓夫式的赤裸裸的、咄咄逼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淤积在中国领导人内心深处的愤怒便勃然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事先不知会兄弟党的情况下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不管这种批判的后果是消极还是积极，都说明苏共骨子里还是以“老子党”自居，压根儿就没把兄弟党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随后接连出现的诸如联合舰队问题、台海危机问题、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问题，以及公开批评和指责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外交路线等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的颐指气使、信口开河一再触怒毛泽东。这样，随着中苏两党理论分歧的加深，意识形态的争论便越来越多地掺入了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的因素。对中共而言，愤然而起与苏共论战，所争的并不单单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是决不允许赫鲁晓夫染指中国的内政和主权，决不允许苏共以势压人、强加于人，决不允许苏共垄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专利权。从这个层面上说，中苏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其实质就在于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却“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①是“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②“中苏之间的问题说穿了就是赫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页。

② 吴冷西：《十年论战》（下），第734页。

鲁晓夫时期就想控制我们，把我们套在它的战车上，我们抵制并拒绝了。”^① 今天，我们只有把中苏论战放在当年特殊的国际关系与中苏关系背景下，才能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政治敏感和激烈反应。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② “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③

(2) 就意识形态争论本身而言我们的真正错误是用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去

就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后来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④

从邓小平的这些谈话中不难看出，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本身，邓小平表达了至少这样几层意思：其一，以“九评”为核心的理论观点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⑤，“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九评”，是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苏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制定“反修防修”战略的；是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世界大战迟早会爆发这一基本判断来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中苏大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贯穿于“九评”的“反修防修”的大思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九评”也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以及我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因此，“九评”的总体思路是不应

①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⑥ 1987年5月7日会见保加利亚日夫科夫谈话，转引自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当肯定的。

其二，苏共的根本错误在于以自己为中心发号施令，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在我们同东欧各国各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面，我们有相当的责任。我们在相当一个时候，对东欧各国各党所处的特殊环境理解得不够。”^① 中苏论战中，中共猛烈抨击苏共的“老子党”行径，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关系，但也应该看到，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国党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唯我独革”、以我划线的错误。邓小平承认，当年中共“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②。他后来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③ 我们“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样也要尊重别的国家、别的党的实际”。^④

其三，在大论战中，中苏两党“都讲了许多空话”。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尽管中苏两党在大论战中都信誓旦旦地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曾引经据典地搬出“老祖宗”以论证对方的错误，但事实上，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双方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邓小平后来曾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这一点，“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⑤，“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⑥ 对于苏联模式的弊病以及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中国虽然“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⑦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8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① 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② 也就是说，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中苏两党都是在懵懵懂懂中隔空喊话，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并不对症，当然只能是放空炮，讲空话。

其四，对论战中双方的具体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例如，就苏共方面来说，尽管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方式并不总是适当的，但揭露批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反对个人崇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合乎潮流的；尽管赫鲁晓夫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尝试没有成功，但这一尝试毕竟是有益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尽管不少提法带有绝对化的倾向，但赫鲁晓夫和苏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看到了世界发展的和平趋势在增强，提出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核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的认识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就中共方面来说，尽管毛泽东是站在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去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要时刻提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这即便是今天也不能说是错的；虽然毛泽东把苏联和南斯拉夫当时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刺激经济的措施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警惕“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这一论断背后蕴涵的东西要比那以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尽管毛泽东至死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但他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还是有启示作用的。也就是说，今天反思“九评”，不能在倒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婴儿一起扔掉。

（3）在反思与探索中汲取中苏大论战的经验教训

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民族，“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③ 邓小平说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④ 这里所谓的“苦头”，就是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其中就包括中苏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43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5页。

战。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针对许多相关问题提出的论点，就其本身来看，并不是直接针对中苏论战所作的评论，但显然吸取了中苏论战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对于这场论战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这一方，而是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高度对中苏双方言与行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首先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① 邓小平表示，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②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③ “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④ “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⑤ 不难看出，虽然邓小平没有明确提到中苏论战的问题，但他显然吸取了赫鲁晓夫处理斯大林问题的教训，并就中苏论战中双方的观点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谈到同外国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问题时指出：“政治问题上要维持和发展友好合作的关系。对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更不要像过去那样公开地批评他们。是对是错，由他们自己去判断。”^⑥ 邓小平后来曾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⑦。应该说，这一“发明”，不只是针对国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的，也是针对国际上兄弟党对我们改革开放政策的不同看法的。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当一些党对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时，我们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同它们进行论战。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一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7页。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7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政治智慧，一种政治艺术。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的实际绩效的说服力，远比隔空喊话的口水战要有力得多。“不搞争论”，是对大论战方式的直接否定。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①“永远不当头”，这也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教训。从两大阵营对抗的基点出发，毛泽东曾经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必须要有一个“首”，而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来考量，这个“首”只能是苏联。所以，毛泽东多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③等概念。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使用了“以苏为首”的提法，^④并对反对使用这一提法的波兰等国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后来，“以苏为首”问题成了中苏论战中双方争执的问题之一。毛泽东认为，“为首”不过是“召集会议”的人，并不意味着拥有高于其他党之上的领导权。而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共不能既奉苏联为首而又处处与苏共唱对台戏。实践表明，不仅中国人对苏共在“当头”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极为不满，苏共领导人的心情也并不愉快，感觉中共一方面主张“以苏联为首”，一方面“向苏联脸上吐痰”。^⑤客观地看，毛泽东当年提出让苏联当头，主要是中国“没有这个资格”，一方面因为中国经验少，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实力弱，“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经过深刻的反思，其认识显然更深了一层。在邓小平看来，“不当头”并不仅仅是一种韬晦之术。“力量不够”固然是我们“当不起”这个头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这一认识不仅是来自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也是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邓小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论的否定。争当“领导中心”的结果是使我们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陷入空前的孤立，到1976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626页。

⑤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6页。

年时，全世界 89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有 78 个先后同中共中断了党际关系或停止了交往。^①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心”总是以服从为前提的，是不利于各国党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的。邓小平在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党际关系的曲折发展时指出，“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任何大党和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② “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③ “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④ “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⑤

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中苏两党这场影响整个国际共运的大论战，其教训是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惨痛的。作为大论战的中方主将的邓小平，能够以其大政治家的勇气和魄力，公开承认中共在当年论战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并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彻底否定自己当年曾经坚持和捍卫的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实在难能可贵。邓小平的反思与总结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颠覆。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当时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下形成的，其总的指导思想是“左”，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当成资本主义或修正主义批判的东

① 孙泽学：《关于中共国际共运中心观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1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7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91 页。

西，有的直接来自“九评”的一些结论，有的是从这些结论中推衍出来的。如果肯定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那种社会主义理念，就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否定而且也不可能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反过来也可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根本上对以“九评”为集中体现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彻底否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弃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①邓小平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一褒一贬之间，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模式。“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③，因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④，“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⑤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也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⑥所以，必须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讲战争的危險，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⑦“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⑧“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⑨这个新的判断就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⑩这个判断修正了“九评”所坚持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传统战争与和平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⑦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3页。

⑧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2页。

⑨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3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页。

建立在这一判断之上的。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必须对总的国内局势作出新的判断。“九评”的一个基本支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① 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九评”所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一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它既“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九评”的自我封闭政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一种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其封闭性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社会主义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它必须在“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③ 这种“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一切资本主义的因素，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还是思想观念的，都要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以便建立起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对外，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世界市场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其“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以及“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④ 从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便不再有和平共处的可能。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中断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甚至在西方科技革命蓬勃开展之后，自身生产力已十分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拒绝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拒绝实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开放政策。封闭形态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认定搞社会主义必须绝对排斥资本主义，必须同资本主义体系绝对对立。这一认识严重制约了苏联及各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页。

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苏论战时期，我们甚至把赫鲁晓夫访美期间接见企业代表时所说的要在工业、农业方面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利润原则，要采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方法也斥之为“假共产主义”。^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在可以看到的将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还要发展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和平共处、合作交流、和平竞争已逐渐成为两种制度相处关系的基本态势。

①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29—43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92. 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黄宗良

苏联剧变的教训是留给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笔宝贵遗产。但对这一教训的不同理解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研究这个教训并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中。例如1990年春，即苏东剧变中，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表明我党中肯地认识到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理论。上述的决定和理论对推动中国2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政治体制）不改等死，改是找死。”“不改等死”是对的；但为什么不改死路一条？“改是找死”这要看怎么改。所有这些问题对中国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十分重要，有必要进行分析。

苏联长期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说，“基因”有问题。这体现在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各个方面。

先看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单独执政的刚性制度，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社会团体则完全成了执政党的“传声筒”和

执政工具，不能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众的权益，实际上也发挥不了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苏联在党政关系上则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方式。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或者成为表决机器，或者被撇在一边，无法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在人民民主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同时遭到破坏，形成了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制度。这种执政体制造成了像全盘农业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这样的影响苏联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错误，使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主要体现的民主、法制、人权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

还必须进一步指出，苏联政治体制的要害是普遍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制和监督制，在此制度下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或官官相护，维护其共同利益，或拉帮结伙，各成派系，争夺和瓜分权位和既得利益。这是一个高踞于社会和广大民众（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之上，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的统治集团和权贵阶层。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再看看苏联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其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是苏联的对外战略，即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实行对外的政治、军事扩张和经济、文化的封闭半封闭，与此密切相关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军火工业）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以及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发展战略造成影响民生改善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根本动力，长期推行这种背离科学性的发展战略必然使苏联制度越来越失去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正是苏联体制的致命伤。

以上说的是苏联体制的“基因”缺陷。但是“基因”并不完全决定寿命的长短，问题在于是否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中，苏共也先后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和政策调整，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一些扩大和改善。但是他们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没有打破原体制的框架。在政治体制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框架没有改变；党内外监督制度和机制薄弱的状况无大改变；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的状况没有改变；国家安全机关

过分干预社会和党内生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问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实行一元主义、文化专制、扼杀自由的情况依然存在。

这种制度和体制的状况同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步潮流，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同苏联广大民众要求民主、民富的愿望极不适应。它说明，苏联面临的是体制、模式转型的客观要求。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就丧失了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甚至连“改革”的词句也不提了。他们琢磨出一套新的“理论”，叫做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成熟”一方面意味着在旧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钝化和缓冲，又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控制精致化了，增强了。因此，它在掩饰和净化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潜伏着新的危机。

“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官僚特权阶层压制和扼杀改革的理论。这个阶层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利益攸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压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外军事扩张到了顶峰。但此时也是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开始。苏联体制就像其最高执政者一样，老态龙钟，百病丛生，活力丧失，潜力用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就是最主要的症状，不过还不是唯一的症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最为严重的是广大民众同执政党已经离心离德了。有民意调查表明，80年代，苏联工人有一半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者占2/3。^①而其突出的政治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几支分流：要求民族自主权，甚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信教自由的宗教运动；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共产党内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的“西方派”运动（又称人权运动）等。“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现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明苏联体制积弊甚重，政治体

^① 参见黄立弗：《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了，不改革苏联的体制的确是死路一条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哪里？

从道理上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不改革是等死，但改革不能说是“找死”。改革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确实难度极大。这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因为“成熟”本身就说明在苏联旧的体制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这必须是体制和模式转换的重大变革，因而并非易事。它既要同国际社会接轨，纠正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差错，又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既要改变苏共一党“垄断”全部社会权力的不正常状况，又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如何把握好其中的结合点和度，的确需要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做到既要逐步消除官僚特权阶层——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党和民众的紧密联系问题——又要组织起支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骨干队伍，这几乎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我们不妨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例，分析一下以上提出的一些难题。大家知道，不论在赫鲁晓夫时期，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涉猎不多。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先抓经济改革，但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政治体制，这样，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决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民主化”和“多元化”，具体做法有：

第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制度本来没有错；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这无疑是对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在采取对新闻、舆论工具“开禁”的方针时，没有注重相应法制建设，往往处于失控状态。

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如何把坚持苏共的领导与改变苏维埃的“橡皮图章”的形象，赋予其权力机关的地位，即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结合起来，是一项改变党独揽全部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措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题。把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武装起义决定前的这一口号重新提了出

来，意在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这样做的本意是让人民代表具有真正的权利，真正体现当家做主。但苏维埃一时难以担负起权力中心的任务，而同时党的权力又被削弱，从而，国家丧失了权力中心。

第三，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社会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至1990年8月，具有政党性质的这种组织就有900多个。他们大多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后退了，并随着权力斗争尖锐化，戈尔巴乔夫地位不断削弱，他最后被迫从宪法中删除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

第四，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制度，苏联在实践中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使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党恢复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没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造成两大致命的恶果。一是党内派别化，二是党的联邦化。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这等于砍断了民主集中制这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绳索。

由于整个改革的重心转到政治体制，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失误，苏联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商品奇缺，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笔者当时正在苏联做访问学者，亲临其境，看到的是商店货架空空；货源充足的就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小套人”。这些“小套人”一排排站着，以忧郁的目光望着待购商品的长长的队伍……苏联媒体普遍认为“苏联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对改革寄予厚望的苏联民众完全失望了，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

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找死”，而是振兴社会主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让这种改革长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使执政党陷于困境。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高层政治权力、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开始启动的。

有一种说法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即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这都不符合两个国家改革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4月，他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见成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阻挠的结果，于是在1988年，即戈尔巴乔夫执政3年之后才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组织、思想领域启动的。这段历史，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没有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先后进入高层领导核心，中国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法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第二，中国30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经济界、学术界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重点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原来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善也一直进行着。和改革前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例如：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执政方略进一步完善，执政体制进一步健全，执政方式更为科学，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上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和变化保证了中国30年来政局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这说明“改必找死”是缺乏根据的，问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属于渐进式的改革，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攻坚战”的胜利。

第三，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协调，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正是这个“滞后”，成为导致中国目前反腐败任务依然艰巨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正确地去人治、倡法治，不搞政治运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很不够。仔细了解和分析多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和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便是民主的体制和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或被违背，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为什么官员腐败下水“前腐后继”？因为民众和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例、规章还不足以落实中央一再主张的选任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群众公认”的原则。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清廉还是腐蚀，其周围群众、党员心里最清楚。组织部门在考察和选任干部中是否重用群众心中那杆秤呢？一些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实际上是“官选”、“官评”、“官定”。一些在民众中名声不佳者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一些“带病官员”为何一再得到提拔？一些中高层当权者和各级领导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为何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地气”，基层组织 and 广大党员群众早已“管不着”了，群众怎么“公认”？

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什么措施？普通党员群众反映、举报，真起作用吗？为什么不少人敢于“顶风作案”？“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怎么结合？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制度似未细到这一步。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那可能是向社会公开，认真吸取相关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形成的决策吗？一哄而起的、后来多数被撤销的“开发区”^①、互相攀比的超标超豪华型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休闲中心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大广场、大草坪等，有多少是“民心工程”？决策失误和腐败是怎么产生的？糟蹋了多少国家和社会财富、人民的血汗、纳税人的钱？没有民主，能有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吗？

为什么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远比其他很多国家为高？^②“公务”用车、公款“招待”、出国“考察”的“三公消费”为何长期居高不降？“公仆”们怎么花钱，作为“主人”的广大民众何从知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体制性问题。由此引起的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三公消费”高估的是9000亿，一般估计是6000亿。不唱高调，一年省2000亿是完全可以做到的。2000亿是什么概念？浩大的三峡工程自开工建设至2009年，总投资也就是1863亿元。按一年省2000亿计算，省5年可以抵上1993—2003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欠账——9391亿元；省4年就相当于2009—2011年3年的医改的投入（预计为8500亿元）；省1年就够全国农村1亿老人3年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60元）！民主监督对民生、廉政意义何等重大。而没有民主监督，一些“公仆”就会成为败家子，“主人”则只能当破落户。

为什么党员和民众难以履行民主权利？关键是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可见度仍然不高，腐败者往往是专权者，习惯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垄断信息，惧怕阳光，拒绝提高政务可见度。一些“问题官员”正是在不透气、不透光的舞台上干着不光明正大、不敢示人的坏事，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

① 截至2005年，开发区70%被撤销。

② 2003年日本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为2.38%，美国比较高，也只是9.9%，我国是19.03%。此后大约在20%—25%。

正如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指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上情况说明，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得到充分切实的保障，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腐败问题越来越警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但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最为突出的是：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在国外被当成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武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中国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质疑和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深深忧虑。

不更加坚决积极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来遏制腐败，逐步消除特权，就会重蹈苏联共产党变质、国家制度改变性质的覆辙，那真是“死路一条”！

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什么东西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呢？这就是腐败。所以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① 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②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②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93. 科学发展观与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有何异同？

黄宗良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理论创新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广大民众的幸福安康。因此，在取得政权以后，执政的共产党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寻求正确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就成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

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不同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新的社会制度，当时世界上的被压迫者对这个新制度寄予很大希望，希望这个新型国家能够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完成了工业化，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战后许多国家效仿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的长期竞赛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技术革命时代之后，苏联明显落后了，其经济发展速度呈下降趋势，而到了 80 年代末出现了负增长，苏联人民的生活与其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不仅落后于许多欧美国家，还落后于韩国等亚洲国家，人民花费排队买食品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发展？为什么苏联获得的强国地位不能持久？这与苏联的发展观念

和战略不无关系。

苏联模式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苏联，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这个发展观，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计划轻市场，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发展观念和战略？苏联是一个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斯大林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为此，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强国防建设；通过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用行政的力量，在短期内赶上资本主义强国；这样一来，重速度、重积累、重国家利益就成为必然的了，而忽视农业、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轻视市场作用，轻视经济效益，不重视个人利益、不重视人民的消费也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了。

当然应该看到，这里的“重”与“轻”是相对的。比如说，重政治轻经济并不是说苏联不搞经济，而是说，在对待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时，夸大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把巩固政治权力当成搞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经济建设变成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而不是真正的中心任务。问题在于是否“适度”。任何观念和发展战略正确与否，都要视其时间、地点、条件论定；过度了，绝对化了就要出问题、出差错。苏联一直坚持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发展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想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朝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方向安排国家的经济生活，其方案是：“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①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表明，这种做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要求。于是，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从着重生产关系的变革转入重视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一政策下，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及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其劳动成果的自由，个体工商业主获得了经营的自由，随之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很快克服了经济危机。看到这些变化，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生产力已经开始提高了，而这正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必须马上做的事。”^① 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学做文明商人，要求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出发制定政策，让民众感觉生活在苏维埃制度下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好，从而自觉自愿地建设新社会。

但是，列宁的转变并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和经济基础不是在人间创造“天堂”，使大家心满意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赖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② 也就是把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第一位。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相信军事共产主义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1928年在苏联发生粮食销售危机后，斯大林便把本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农民不愿种粮卖粮的问题归结为个体农民的生产性质造成的，于是，从1929年开始了政策大转变，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这样，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庄成了受国家支配的经济单位，把完成国家的粮食收购计划当成了第一要务，国家从集体农庄得到了为了积累工业化资金所需要的粮食，1932—1933年，在农村人口大量被饿死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在国际市场上廉价出售粮食，以换取外汇购买机器设备，完成工业化。在集体农庄体制下，农民没有积极性，苏联的农业长期停滞不前，1963年以后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其数量逐年增加，到苏联解体前夕出现了严重的食品危机。农业的长期落后制约着苏联整个社会的进步，由此引发的危机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苏联的实践证明不顾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二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苏联把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的重点放在了国防实力的较量上。从工业化开始，苏联所确立的重要战略目标就是准备与资本主义进行力争夺并且战而胜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被片面化为发展重工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34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1—22页。

业和军事工业。在苏联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坚持“重军抑民”、“国防优先”的基本原则，在评价本国经济发展时，总是以重工业的高速发展沾沾自喜。苏联这一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人民要求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之间的矛盾长期无法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

苏联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发展道路，导致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根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果以1913年指数为1计算的话，工业产值1940年是7.7，1970年为92，1980年为163，1985年为195（其中重工业相应是13、214、391、468；轻工业相应是4.6、30、50、61；农业总值为1.4、3.1、3.4、3.8）^①各部门之间的增长幅度相差多么悬殊！1940年重工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为61.2%，1955年上升到占70%，1960年这一比例达到72.5%。^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耐用消费品的比重仅占5%—6%。^③国家75%的科研项目拨款用于满足军事科研的需要。^④采掘和加工工业全部工人的1/3从事武器及军事技术装备生产，而美国为12%—14%，西欧各国为6%—7%。^⑤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70%。”^⑥很难准确估计苏联军事经济的规模，不管怎么说，苏联的经济都是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

到80年代中期，许多生产民用品的工业部门，其技术水平还停留在30年代中期，农业则相当于20年代中期的水平。^⑦70年代，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占2.5%—3%，而在苏联占25%。1970年苏联一个农民一年生产4.5吨谷物、320公斤肉和2.8吨牛奶，而美国一个农业工作者生产54.7吨谷物，4570公斤肉，

① 苏联国家统计局：《苏联国民经济七十年》，莫斯科1987年版，第7页。

② （俄）T·M·季莫希娜：《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2000年，第310页。

③ 《真理报》1990年9月1日。

④ （俄）《论据与事实》1989年第33期。

⑤ （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9年第8期，第13页。

⑥ 普里马科夫：《俄罗斯应当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俄新社1998年4月13日俄文播发。

⑦ （俄）谢·阿·巴伊巴科夫等主编：《20世纪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莫斯科1999年版，第379页。

11.8 吨牛奶。70 年代中期，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苏联高 3—4 倍。^① 苏联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都被用于军事工业综合体，军事工业体系与民用生产体系严格分离，使军事技术不能转化为民用技术，而社会财富一旦进入军事领域，便脱离了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除了少量军火交易能得到一些收入外，其余只能是财富的消耗，军工综合体的膨胀，破坏着社会再生产。军工生产优先，严重影响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这一趋势长期发展的后果只能是一个越发展，另一个则越萎缩。到 70 年代后半期，苏联除了军事外，其他领域的发展都陷于困境，国力衰落。1975 年，按当年的美元计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15163 亿美元，苏联为 8653 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 7098.7 美元，苏联为 3400 美元。^② 1980 年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美国占 21.5%，苏联占 9.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为 11360 美元，苏联仅为 4550 美元。^③ 1985 年苏联人均 GNP 在全世界的排名位居第 38 位，不仅低于所有西方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三是影响了民众的利益。1913 年俄罗斯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占第 5 位，1930 年底，苏联国民收入居于世界第二位。但是，食品短缺，票证制度重又开始实行。为了抑制消费，国家大量在居民中发行公债，1927 年年中为 10 亿卢布，1930 年达到 170 亿卢布。1913 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可买 333 公斤黑面包，或 21 公斤油，或 53 公斤肉，或 83 公斤糖；1936 年，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能买 241 公斤面包，或 13 公斤油，或 19 公斤肉，或 56 公斤糖。在新经济政策年代，工人用于吃饭的费用占工资的 50%，1935 年则占 67.3%。

苏联人在社会保障、医疗服务、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享受的福利高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但是，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住房面积、汽车拥有量、现代化生活设施方面，苏联远远落后于西方，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80 年代初，苏联在诸如彩色电视机、音响、录像机、小汽车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1979 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为美国的 31%，西德的 25%，法国的

① 《俄罗斯经济史》，莫斯科 2000 年，第 350 页。

②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苏联经济新剖视》（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8 页。

③ （美）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3 页。

29%，英国的40%。在苏联，住房和居民所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所占份额约为国民财富的30%；在美国则超过50%（不包括企业的物质储备）。^① 1989年，也就是生产发生危机性下降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苏联是美国的30%，人均工业品，苏联是美国的42%，人均农产品，苏联是美国的38%。1990年苏联的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20%。80年代中期，苏联人饮食消费占工资的40%，而美国人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美国为51平方米，西德为41.5平方米，俄罗斯为16.3平方米。1985年，每千名居民中电话的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西德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1990年）。小轿车的拥有量则分别是552、230、428、291、55。苏联的人均寿命，1975—1980年，男人为65岁，女人为74岁；日本相应为75岁和81岁，美国为72和79岁，法国为71和79岁。^② 为了国家的强大，苏联人民牺牲了个人利益，但这种情况永远持续下去，民众很不满。因为住房条件恶劣、食品不足、工资低、劳动定额高等原因，人们多次公开表示不满，如1969年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72年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1980年在高尔基城，1981年在陶里亚蒂市等地都发生过群众的抗议示威。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动荡和苏联共产党最后失去政权，也是群众不满使然。

苏联的发展战略不能体现“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使民生的改善受到影响和限制。重政治轻经济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政治镇压，严重限制和破坏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因而这种发展难以持续。这也是苏联终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

从苏联模式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发展观念和战略在不少方面是学习苏联的。尤其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主导下，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上，从理论到实际执行的方针、政策都同苏联十分相似。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① （苏）《经济问题》1991年第8期，第5页。

② （俄）《自由思想》1993年第13期，第39页。

提出了以苏为戒，处理好重轻农三者关系，加重对农轻投资比例，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一系列关系问题，提出“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①翌年，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和“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②这是对发展观和战略的一次调整，后来由于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又偏离了社会发展常规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实行了发展观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这主要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里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基础、发展动力作了不同以往发展观的回答；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乡镇企业等办法，逐步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调整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实行承认差别、允许“先富”、尊重人权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但此时我国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因为首先要解决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不能不首先强调总量的增长，强调多和快，“效率优先”。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被集中到GDP的增长速度上。而GDP的增长并不能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社会公正程度。这样，在世纪之交，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以及国外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集中表现在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同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统一起来。

何谓“科学发展”？就是经济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怎么表现的？

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政、经、文、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2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会、国防等方面。每一个方面在整个系统中都有其客观的、特定的地位，某一方面越位、错位、不到位，都要造成不良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比如，离开经济工作的中心，把“政治”、“意识形态”置于压倒、决定一切的地位，社会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倒退；反之，把政治和思想文化工作看成可有可无的，社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政治保证和精神支持而不协调不健康和紊乱，其后果也不堪设想。科学发展观正确地规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是发展的中心，其他各方面也要全面协调地发展。

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关系，如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要求总揽全局，统一筹划，分清轻重缓急；全面安排，寻求最佳结合点，兼顾各方利益。

在经济领域中，农轻重及各自内部的各部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客观上都要求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合理安排，全面、协调才能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规律是通过有自觉意识和意图的人们的实践来实现的，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讲社会发展规律自然不能对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置之不顾。人的作用主要和首先是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它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无所作为。这里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把实现、维护、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坚持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很好地统一起来，使科学性和“革命性”一致起来。

科学发展观同苏联模式发展观的比较

这两种发展观都是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中，为了强国富民而形成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但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实践经验不同以及经济文化基础的差别，两种发展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

并起保证作用的。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也重视经济建设，但在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决定性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使国家消亡等理论影响下，^①实际上把搞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统率一切工作的纲领，把唯物主义变成“唯权主义”。

第二，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国计和民生的关系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中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并不错，但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优先发展重工、军工而牺牲农民的利益，忽视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发展；过高的积累率限制了人民消费水平的应有提高（1989年苏联职工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同年美国为62%）。

第三，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他们尽管承认存在商品经济，但认为劳动力、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承认存在价值规律，但认为价值规律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苏联把指令性计划作为整个经济机制运转的轴心，用行政的力量通过计划来运转整个国民经济。科学发展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重视用“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实行赶超战略，而赶超主要是指产品数量和生产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实行粗放经营的方针，走的是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率的增长道路。科学发展观把“又快又好”改变为“又好又快”，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提高效益，注重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努力实现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五，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发展观常常只顾重点这一头，而忽视兼顾其他。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兼顾，要求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8—149页；《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等。这当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重点论，不唯重点论，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求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集中全国人财物力干大事。比如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建设中，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第六，在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方面，苏联模式观也讲应用客观规律，但常常过高估计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至犯唯意志论的错误，急躁冒进。中国大跃进时期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典型，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的重大损失。科学发展观的最突出意义就在于把遵循客观规律同发挥人的能动性结合起来。

当然，科学发展观提出才几年，从观念到实践，从战略到具体政策，其间还有一定距离，还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这里只是从总体上、原则上来加以论述的。

94.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

郑异凡

世界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多数现代国家通过选举推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一些王国通行王位继承制度，一些国家实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国家通过政变来解决国家的最高权力问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的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呢？

列宁没有制定权力交接机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 年底 1922 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 1922 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列宁本人逝世时也才 54 岁。所以那时并没有制定一个权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没有确定党内最高职务。列宁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领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党所默认为的。在列宁所担任的职务中哪一个是关键的领导位置，那时并不明确。列宁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会

议时，主持会议的是加米涅夫。列宁去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难说他们中哪一个是列宁的接班人。

1922年12月底，列宁写了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对6位党的领导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6人应当是列宁优先考虑的继任者。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党的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团中分别口头传达，代表们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1922年党的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①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主编”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1923年1月4日，在《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明确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②两个

① 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月后，1923年3月5日列宁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①由此可见，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已经明确无误地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他的只能是一个集体。对接替列宁来说，当时更没有一个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个集体。看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6名中央委员进行评论，目的就在于此。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作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虚情假意地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作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因为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唯一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这样，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①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②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③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④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②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 285—286.

③ 波利斯·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④ 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

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60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①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年），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

^① 阿·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① 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

^① 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2页。

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人也曾有退意。1979年4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为这个病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

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

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格里戈里·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罗曼诺夫的官运就此结束。1980年5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

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博得勃列日涅夫欢心，于是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圈椅说：“沃洛佳，我走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①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卡皮托诺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坐椅说：看到这张坐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都要据此安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

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党内元老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过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表决通过。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们也没有发言权，摆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

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

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多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1983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

“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①

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75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曾属意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合适。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引者注）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引者注）嘛，正好合适。”

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宣布开会，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

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说：“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引者注）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引者注）啊。”^①

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老朽的领袖来。

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

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284页。

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3年死去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顺便说一下，列宁正是在54岁逝世的！

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①

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执政74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民主、有序的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其接班人选是在上一届领导人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决定，有时甚至是通过党内政变解决的。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302页。

95. 苏共执政合法性是如何丧失的？

周尚文

所谓合法性 (legitimacy)，从政治学意义上讲，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①“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②概言之，合法性是民众对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对于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来说，它都必须拥有一定的合法性资源，这是这个政权进行长期而有效的政治统治与治理、保障国家持久稳定的政治基础。因此，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忽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西方国家多党制的情况下，一个政党能否上台执政，通常是以选票多寡来决定的，因此，竞选活动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功能和内容。迄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往往通过革命或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合法性。20 世纪俄国和中国相继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不管以哪种方式取得政权，执政合法性问题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俄国布尔什维克从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至 1991 年 8 月苏共解散、同年 12 月苏联解体的 74 年间，苏共历届领导人，以及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虽然处于执政地位，却普遍缺乏执政的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以致在苏共执

① (美) S·M·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5 页。

② (法) 让-马克·夸克著，佟心平、王远飞译：《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 页。

政过程中，不能自觉地根据形势的变化，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苏共也不注重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培育、开发和维护，不警惕合法性危机对执政党执政地位的侵害，使执政理念陈旧僵化，执政体制弊端日显，执政能力不断衰退，执政方法简单死板，导致苏共最终失去党心民心，丧失执政的合法性，也使苏共自身走向败亡。

布尔什维克党的“先天不足”

布尔什维克党〔后称俄共（布）、联共（布）和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民主政治传统缺乏的俄国，共产党如何执政，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遵循。在执政合法性意识问题上，它存有两点“先天不足”。

第一点先天不足，是苏共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执政理论的缺失。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质上揭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逻辑，他们都强调，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这种国家只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① 经典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执政党与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关系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论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如何执掌政权的问题在当时尚未提上日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认为这个政权必须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当国家还需要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依然是被剥削劳动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随着阶级对立的消除，国家也逐渐走向消亡。因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权和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着“天然的”合法性。不难看出，无产阶级国家里的执政合法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

第二点先天不足，是俄国长期的沙皇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俄罗斯传统思想中合法性意识的缺失。皇权主义的核心是“君权神授”，君王统治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任何人不得忤逆。皇权主义观念渗透进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中，就是沙皇

^① 参见列宁著：《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30—163页。

(政权)在民众心目中的“父亲”形象。恰达耶夫指出：“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①我们知道，父亲既可以是仁慈的，又可以是严厉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不论何种情况，父亲总归是父亲，这种天赋的“家长”资格是子女无法在“后天”更改的。同理，作为俄国政治统治者的沙皇以“父亲”的形象出现在子民面前，子民当然也无法撼动沙皇的统治资格。也就是说，沙皇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这是无须用统治的有效性和正义性来证明的。这种无须证明的传统型的“天然合法性”统治，产生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患上了一种合法性意识缺失症。而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传统思想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打天下就能坐天下”的类似皇权主义的“天然合法性”思想。

以上两点“先天不足”，不能不对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各个时期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应当指出的是，苏共历届领导人普遍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但这并不等于执政合法性问题不存在。在一党制条件下，作为执政党，苏共无法回避它所执掌政权的兴衰成败问题，也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面对有关合法性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怎样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如何培育和开拓合法性资源，如何避免合法性危机，等等。这些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

(1) 列宁时期

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一举取得了政权。在夺取政权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成为执政党，它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下来，一开始就面临着立宪会议存废问题的考验。

俄国二月革命是一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程序，先成立临时政府，再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通过选举确定某个政党执掌政权，成为执政党。因此，二月革命

^① (俄)达耶夫著，刘文飞译：《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后，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各党派几乎都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政治诉求，并批评临时政府故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也就是说，各党派都曾寄希望于召开立宪会议，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将政权争到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应当说，列宁对此深有体察，也深感忧虑。布尔什维克领导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后，作为对俄国政治现实体察的反映，就是在革命胜利的当天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宣布成立新政权，宣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避开立宪会议，也使新政权具有某种合法性。但是，让列宁忧虑的是，苏维埃毕竟是个阶级组织，不是全民性组织，不是代议机构，而立宪会议在当时则被视为全民的代议制机构。因此，怎样对待立宪会议，就成为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的一道难题。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在要不要召开立宪会议问题上遇到了两难的选择：开，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力量对比显然不利于布尔什维克，并可能“合法”地丧失政权；不开，由于召开立宪会议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政纲的重要内容，它在取得政权后也曾立即宣布将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这样就会变成自食其言、不守信用的政治力量，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经过艰苦的思量，他们决定利用革命权威和策略来解决这一难题。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召开立宪会议，但认为立宪会议必须服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起草了一份显然要被立宪会议否决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给立宪会议通过。在遭否决后，便下令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不是阴谋，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阳谋。这一谋略，可谓用心良苦，但又包含着许多无奈。

这件事在当时俄国引起许多非议，直到今天俄国史学界还将这一事件作为布尔什维克“消灭民主”的罪证。然而，十月革命是一场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创举，没有理由要按照西方国家的革命模式和程序来限制和束缚革命无产阶级的手脚。事实上，任何一场正义的革命，在胜利初期必然遭到众多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人运用手中的国家机器维护自己的革命权威，是无可非议的。不过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曾多次承诺召开立宪会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做法，不管怎么说，仍然给舆论留下了指责的话把。

解散立宪会议后，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正式确立，其执政的合法性通过国内战争的胜利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总的说来，列宁时期俄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有：一是来自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沙皇统治使俄国国弱民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希望和通道；二是来自对共产主义

理想的憧憬，共产党纲领中主张社会平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被广大工农群众接受和向往；三是来自胜利初期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榜样作用，赢得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信任；四是共产党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符合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也顺应民心民意，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也无可否认，解散立宪会议留下了后遗症，主要表现在一党制的形成，阻遏了现代政党政治和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进程。

列宁生前，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直接论证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但他对共产党能否在俄国牢固地执掌政权，执政的共产党是否有丧失政权的危险，还是有很多思虑的。在列宁看来，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有失败的可能，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人执政以后，也会出现官僚主义的弊病，官僚主义是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腐蚀剂，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所以列宁严肃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① 列宁晚年，即使在病中，也念念不忘向全党指出要同官僚主义进行系统的顽强的斗争。他在最后一批书信中，专门强调要对“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认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②

（2）斯大林时期

列宁逝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成为党的最高领袖。此时，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日程，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对这一点，斯大林是比较清醒的，这最突出地表现为他致力于苏联实现工业化的努力。通过1928—1937年头两个五年计划，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在短短的十年里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在根据斯大林理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成就，成为俄共执政合法性的雄厚基础和重要来源，它增强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体认。斯大林还制定了新宪法，实行劳动保障和福利制度。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以执政的有效性来证明俄共执政合法性的典型事例。尽管斯大林没有执政合法性的自觉，但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②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43页。

他却一定程度上为俄共执政开发着合法性资源。尤其是在斯大林和俄共领导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也为苏联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大大增强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

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合法性意识的缺失，3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史称“斯大林模式”）以及日益蔓延的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等的错误做法，埋下了俄共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在斯大林头脑中，关于俄共执政的“天然合法性”意识十分强烈。早在1917年12月他所说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做是这种意识最好的说明。他说：“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①革命的合理性固然可以赋予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民众权力向俄共的让予并不等于一次性地、永久性地转让。俄共在革命时期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也并不等于它在未来的执政实践中永远拥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然而，斯大林显然认为，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旦取得了政权，打下江山，“坐江山”也是天经地义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国家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绝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②后来，他在会见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时又说：“在苏联没有合法的资产阶级政党，这里只有一个党即工人的政党共产党是合法的。”^③在他看来，苏联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小私有者阶级，所以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法存在；由于没有了利益敌对的不可调和的对抗阶级，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个“互相友爱”、“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阶级，所以，在苏联“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没有政党自由的基础”。^④按照这个逻辑，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俄共是天然的唯一的执政党，而且将永远执政下去，理论上不需要去论证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实践中也不会遇到执政合法性危机。

但是，俄共作为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应对执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内外矛

①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7年12月27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注①。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94页。

④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0页。

盾，才能取得人民大众对其执政地位和治国方略的认同和支持。在俄罗斯的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使斯大林有可能将民众对皇权的无限敬畏转移到对党的无限崇敬和神化上来，而这个党就由斯大林一个人所代表，这样，斯大林就成为党的化身，成为无所不能的“神”，这是苏联20年代末30年代初刮起“个人崇拜”之风的重要认识根源，也是斯大林试图借助个人崇拜以确立党和领袖政治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地位的一种尝试。在倡导民众对领袖盲目崇拜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控制社会的威慑机制，既铲除异己，又对民众起震慑作用，于是“大清洗”成了与“个人崇拜”并用的必要手段。一边是盲目迷信，一边是恐怖镇压，表面上看，两者使执政党空前“团结一致”，领袖威望“崇高无比”，党和群众之间“和谐一致”，从而维护了俄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实际上留下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的严重隐患。一旦神像倒塌，就会暴露出俄共内部的种种弊端：个人集权、民主缺失、法制破坏、思想僵化等体制性障碍，从而对俄共的执政造成深重的潜在的合法性危机。

（3）后斯大林时期

赫鲁晓夫上台后，为了挽救因体制弊端和领袖个人错误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例如，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通过对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清理和平反，消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酿成的严重后果，健全民主法制，消除安全部门的特殊权力等。此外，赫鲁晓夫还通过取消义务交售制、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取消领导人的终身制、缓和国际局势等举措，改革内外政策，推进国家发展。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为克服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开拓合法性资源的积极之举。但是赫鲁晓夫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在主观上仍然处于缺失状态。赫鲁晓夫只是对斯大林个人及其做法进行了批评，而并未对苏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加以检讨。因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继续着斯大林遗留下来的政治体制，尽管赫鲁晓夫剥离了体制的残暴性质，但党政不分、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等结构性缺陷没有解决，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突破。总之，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解决斯大林遗留下来的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停滞”、“稳定”而著称于世。李普塞特认为，长期的

稳定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① 由此观之，似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勃列日涅夫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之后，并未对原先的体制进行过任何改革，反而将原先一些改革成果丧失，这无疑加重了体制性的腐败和危机，也使得以前潜在的合法性危机有了“显化”的可能。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合法性危机并未爆发，仍然处于潜伏状态，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假象。但这种“稳定”——我们暂且称之为“勃列日涅夫式稳定”——是依靠当时独特的社会结构、体制安排、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苏联和外部世界的紧张关系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种停滞下的稳定，犹如地震发生前的寂静，一旦条件成熟，便将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思改革、僵化保守、老人政治、官僚统治集团以及对外的扩张称霸，这样的内外政策几乎吃空了苏共所有的执政合法性资源，为其继任者留下的只能是一个难以收拾的政治危局。

戈尔巴乔夫接过了勃列日涅夫以来所留下的“烂摊子”。面对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的困境，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改革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以维持苏共的执政地位。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倡导实施“加速发展战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挽救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所做的努力。然而，正是改革使得长期累积下来的体制性的弊端获得了释放能量的机会，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给病人膏肓的苏联以致命的一击。当戈尔巴乔夫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政治、民族危机，其改革又受到重重阻力，到处碰壁之时，他已无力应对这种局面，于是便把西方的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嫁接过来，试图以实行多党制来缓解危机。然而结果是，危机没有得到缓解，苏共的执政地位日趋削弱乃至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群众包括广大共产党员对苏共执政丧失信心。“8·19”事件标志着苏共的合法性危机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苏共已经走到尽头，它的败亡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苏共的败亡，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失败和苏联作为联盟国家的解体。

^① （美）S·M·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9页。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后果与教训

在苏共执政的 70 多年里，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意识的自觉，不能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执政权力的来源，不注重合法性资源的开发和培育，不能及时察觉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拥有 1900 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一朝倾覆。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执政的共产党要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苏共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经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的。由于旧俄时代缺乏政治民主，所以共产党只能以严格的甚至极端的集中制组建自己的队伍，并把一切力量组织到夺取政权这一目标之上。革命年代共产党的地位是在野的，党的任务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打碎一个旧世界。然而，共产党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地位就变了，任务也变了。执政党的任务是要领导国家走向富强，人民走向富裕，社会得到进步。可是，苏维埃初期面临严酷的国内外环境，迫使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实行“红色恐怖”和“战斗命令制”，镇压一切反苏维埃的活动，直到党的十大通过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规定，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对付内外敌人的侵扰。如果说这样做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苏维埃政权逐步得到巩固，执政的共产党要带领人民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就要建立和健全党内外民主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共产党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认识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并自觉地适应这种变化，将以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为首要任务的革命党转变为以领导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如果说列宁由于逝世太早，来不及完成党的这一角色转变的话，斯大林却根本没有想到要实现这一转变，而是强调要承袭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同敌人、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尽管斯大林也抓工业化建设，实施五年计划，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国外的帝国主义、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以及国内各种反对派的残余势力，始终强调与“人民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后斯大林时期虽然停止了“大清洗”这类严重践踏法制、破坏民主的做法，但在一党制的条件下，许多人把执政党看做可以获得名利、地位和特权的工具，却从不思虑党的执政地位的安危问题，反映了苏共长期以来由于执政合法性意识

的缺失造成对执政理念的重大扭曲。

第二，执政的共产党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应该承认，共产党不但从本质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在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的时候，也都以维护劳动人民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年布尔什维克所以能战胜其他政派夺取政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适时地提出“自由、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共产党执政以后，人民群众要从执政的业绩中，从执政党制定的各项政策中，以及执政党干部、领导人的言行和作风中，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政党在革命年代是“先锋队”，在执政时期未必一定能保持“先锋队”的性质。然而，斯大林在论述苏共的性质时，反复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等，却闭口不提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于是，苏共就被制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形象：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永远是正确的，也永远是先锋队，民众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在既定的环境下生活和进行有限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执政党通过国家机关对民众（包括广大基层党员）的政治情绪严密控制，政治生活中出现大量冤假错案，使党和民众间产生严重的隔膜，在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冷漠情绪。民众和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国家、政府的面貌合神离和离心离德，构成了一种病态的政治文化环境，这是执政合法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苏共对此却麻木不仁。美国学者悉尼·胡克的话就是对民众出现政治冷漠现象的忠告。他说：“最明智的政策，在民众的漠不关心或敌意面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认为必须由职业上明智的人们或专家们来实行统治的人，要是排斥他们的意见，也得冒自己覆灭的危险。”^①后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在“公开性”、“民主化”旗号下打开闸门，长期压抑的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犹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水汹涌而出，冲垮了原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堤坝，民众不再认同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这个百年老党也因此遭到灭顶之灾。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要深入研究执政规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

^①（美）悉尼·胡克著，金克、徐崇温译：《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7—288页。

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革命时期，革命阶级的利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革命党也易于将革命力量统一意志、统一步骤，共同从旧社会统治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可是，当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它固然要依靠工人、农民这些基本的劳动者阶级，但不可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即使工农阶级内部也会不断发生分化，因此，执政党只有承认各种阶级阶层的差别，学会调适社会矛盾，整合各阶层之间的利益，才能协调好党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奠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可是，从30年代中期开始，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起，理论上进入一个误区，即“无矛盾、无冲突”论。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苏联劳动者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旧的阶级特殊性正在消失……于是就造成了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一致的基础。”^① 苏共领导人宣称苏联是一个高度同质的、没有社会与政治分化的、公平的社会，这样就使不满意的意见没有表示的可能，因为在一个公平而又和谐的社会里，任何不满意的表示将都会被认为是反社会的，甚至是叛国的罪行。这样的事例在苏联历史上屡见不鲜，特别荒唐的是，试图通过“大清洗”将各类异己分子消灭，使社会得到“净化”，使社会归于“整体一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不可能有政治妥协和协商的应有位置，因为任何妥协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阶级敌人的姑息，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事实上，社会成员之间一致而又单纯的关系，只是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假象，并不符合社会的真实面目。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类社会只要存在分工，就会存在不同职业、领域、阶层、阶级之间不同的地位和利益。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任务不是闭着眼睛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应运用强力手段人为地消灭社会差别，而应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前提，在承认差别和矛盾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政策，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促进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得到培育和增强。苏共合法性意识的缺失造成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妥协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矛盾调适机制的缺位，也造成社会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这是导致苏共垮台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9页。

96.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叶书宗

苏联共产党^①早期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在尔后的 74 年里，它历经各种风雨，把苏联建成世界超级强国之一，却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顷刻自行解散。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笔者从苏共自成立至结束的历史演变，阐述它后来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对其自行解散作一历史诠释。

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随情势变化进行自身的变革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苏共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实为圆俄国的富强之梦做了很多事情，唯独忘了自身的变革，后来变成了以控制政权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政党和国家，无论从含义和职能来说，都是不同的范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建立的；而政党则是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国家以行政力量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

^① 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 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 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 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 年改名苏联共产党。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时期一律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

特定的秩序范围之内；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在政权机关里表现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和意志。执政党则是代表社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自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终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背离政治文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以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是和它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方针分不开的。

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从资产阶级创造典型的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党政治的一般特点。

17 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并没有政党。1679 年 5 月，国会讨论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出现了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到 19 世纪 40 年代，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到 20 世纪初，又演变成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尔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近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和政坛纷争，到 1875 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民议会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党政治。

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家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19 世纪 20 年代，国会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西部农业资本家、北方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由于奴隶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有了变化。

如果撇开具体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法国共和制等不同政体，也不管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就典型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来看，都是：（1）先立国、制宪，后建党，各政党都在宪法的规范内通过公平竞争来建立和活动；（2）政党是相对稳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重构，政党的名称、组织也有所变化；（3）某一政党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就不能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要素。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性、决策的民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利益的协调性、秩序的法制性。这几乎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苏共成立于 1898 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 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

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 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1918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

1924年1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②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③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 and 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45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

② 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页。

③ 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纵观苏共 93 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 93 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

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

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

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意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1931—1933 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 年 4 月 16 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 2000 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

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①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②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

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③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

①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696页。

③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

在战俘营中的 21857 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 1988 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

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

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苏共成立之初，有意创立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造福桑梓。但是当苏共完全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种种条件之后，它已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此，引起生产管理、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关于发展苏联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全面前进的方案和建议。可是，这些方案和建议被锁入保密柜不见天日。

此时，苏联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局比较稳定，某些科学技术，尤其在某些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还领先于美国。人类社会的第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贡献，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年代掀起的。此时的苏联已完全具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为的条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敛起来的财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用于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生产，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推行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世界革命”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坦克的年产量是美国的 4.5 倍，大炮年产量是美国的 9 倍，核潜艇年下水量是美国的 3 倍。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员工，美国约 220 万，苏联是 500 万—800 万。勃列日涅夫在核竞赛和争霸世界中确实取得成绩，达到俄国有史以来的鼎盛，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却基本上原地踏步，生产管理及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国家经济状况连年下滑。与此同期，西方国家，甚至某些原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势，强劲地发展和崛起了。1970 年，苏联在煤、焦炭、拖拉机、水泥的生产水平方面都超过美国，铁矿石的采掘量是美国的 6 倍，可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只有美国的 1/6。战后时期，苏联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的 2 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相

当于美国的 1/14。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难以在苏联从事研究和创造，纷纷移居国外。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证明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相比之下，本来就已庞大得吓人的官僚队伍则更加膨胀起来。仅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就达到 50 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赶紧把赫鲁晓夫规定、尚未切实实行的领导干部、苏共中央委员的任期制、轮换制予以废除。于是，自 1965 至 1984 年，高层党政机关干部层几近凝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的任期超过 15 年，中央委员大多数任期超过 12 年，其中像波诺马廖夫已有 34 年，齐米亚宁已有 25 年。1981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政治局会议一般是 15 分钟左右；勃列日涅夫连读几分钟读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党员数字虽然已达 1500 万，但党员和党的决策毫不相干。党代表大会是一种装饰，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以“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①

由于苏共已是个只要权力、不要活力的政党，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被用于装饰，而被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了。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早被苏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苏维埃社会》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是“对任何变动，无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强暴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全毁灭的危险”。毫不奇怪，在现已解密的堆积如山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未见一纸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文字记载。

写到这里，应该对本文的主题，即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作出明确的正面回

^① 统计数字引自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Отв. ред.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М., АСТ. 1996.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917—1991. Под ред. В. В. Журавлева*. М., Терра. 1997.

答了。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① 苏共不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为了政权，拒绝自身的变革。苏共在它存在的历史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坚持一党专政。从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一党专政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之间，很难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许，它们之间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统一，就如苏斯洛夫所说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可以这样说：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

这样一个党，到20世纪末，在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朝轰然倒塌，应是俄国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

^① 《斯大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

97. 苏联领导人的收入是多少？

郑异凡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立即实施这些原则，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使纳税人的钱不被用去供养大批于国于民都一无用处的官僚。

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①

列宁申报收入

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329页。

收到邦契－布鲁耶维奇提交的资料后，9月20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了说明。说明不长，现摘录如下：

我1918年的收入包括以下两项：

（第4项）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1918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上。

（第5项）稿费：我定期从负责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根据1918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的证明。

对第4项的补充。实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内得到一套住房，内有4个房间，1个厨房和1个保姆间（家庭人口——3口人，加上一个保姆）。这套住房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清楚。^①

列宁向邦契－布鲁耶维奇了解薪金和稿费数额，是为了缴纳1918年的所得税。从他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3个项目：薪金、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683卢布33戈比。

稿费：15000卢布。

住房：1套共4间，加1间厨房和1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① 中央编译局编印：《马恩列斯研究》2003年第4期，第5页。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100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① 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500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② 不过，在是否给予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约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主要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大不一样。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代笔，或者某写作班子创作的。在列宁的60卷著作中，没有发现他人代笔的文字。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2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三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唯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去南方休养过，虽然医生一再建议他到气候宜人的南方去疗养。

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党员领导干部——引者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①

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这一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通过专门决定。“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页。

3 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 50%，有兼职工作的加 50% 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 645 卢布起征。由此可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 430 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 50%。而 1922 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 10 卢布。^①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国家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 1922 年夏每月获得 12 公斤肉、1.2 公斤糖、4.8 公斤大米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 公斤肉或鱼、1 公斤油脂、400 克糖、162 支香烟、3 盒火柴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供领导干部休养之用的休养所网扩大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经济部主任亚·杰·梅捷列夫在 1924 年的工作报告中统计，为维持供领导干部休息之用的郊外房产，一共花了 6 万卢布。他在报告中写道：“我觉得在我们这种贫穷状态下，在农民难以缴纳粮食税（这是我们的预算收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无可逃避的职责是思考一下，如何减少这些开支……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②

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1 至 3 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 1922 年 5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 100 金卢布作为去国外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 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 100 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 100 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 7.774235 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 金卢布大体相当于 1922—1924 年币制改革后的 1 切尔文卢布。

1923 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 3 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概念明确化了——这就是登记在册的那批领导

① 《俄共中央通报》1922 年第 8 期，第 11—12 页。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 68.

② ЦГАОП, Ф. 1235, ОП. 133, Д. 11, Л. 28, 30.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 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 69.

干部，其人数起初大体在 10000 名左右。1922 年 4 月—1923 年 4 月为 10351 人，1923 年 4 月—1924 年 5 月为 6088 人，1924 年 5 月—1925 年 12 月为 12227 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这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1932 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2003 年 1 月俄《总结》周刊发表一篇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1921 年到 1935 年为 225 卢布。1935 年 500 卢布。1936 年翻一番，1200 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 5 倍。卫国战争末期为 2000 卢布。1947 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 10000 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 8000 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 480 卢布，最低工资为 220 卢布。文中 1921—1935 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 1922 年规定的 430 卢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 1—2 倍。这一制度，直到 1956 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 30 年代初开始工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本人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 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的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旧价值，那时候给 100 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

给女儿 2000 或 3000 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 100 万呢。他让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开销，包括他的吃穿、别墅和服务人员，等等。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斯大林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本人并不知道。^① 对斯大林来说，早已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了！

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还有苏联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职位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 4 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共产主义”伊甸园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先每月养老金是 120 卢布，1967 年提到 250 卢布，后来又增加到 300 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经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 26 天。有食品卡，每月付 60 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干的食物，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品实际上大大超过 60 卢布，至少超过 1 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②

赫鲁晓夫执政后曾经想改变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状态。他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月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 800 卢布

① 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 20 封信》，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国外作品选译》第 3 期，第 183 页。

②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13—615 页。

(币制改革前为 8000 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 800 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巨额稿费 and 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 18 年共获得 50 万卢布的收入，这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 500 年的工资！

自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书记或总书记的工资一直保持 800 卢布的水平。1990 年确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工资为 2000 卢布，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 5—20 倍。

工资外的物质特权

工资的数额是明的，关键是还有许多隐性的收入，或者说“灰色收入”，这就是作为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物质特权，这些物质特权使某些领导人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自传中详细地谈了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特殊服务和优待，如专门的别墅、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职位的阶梯越高，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克格勃的第九局负责供应这一切。叶利钦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配有 3 个厨师、3 个服务员、1 个清洁女工，还有 1 个花匠。你如要去电影、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里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你才能在这些地方露面。不过别墅里就有电影院，有放映员给放专场电影。医疗设施是最现代化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影院有各种精美的设施。莫斯科设有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送到这里来的都是精选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 4 万。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上面有好几个医生签名。休假时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里有专门的别墅，过了假期，这些别墅就闲着不用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4 或图-134 出行的，乘机时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①

^①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0—151 页。

每一个高级领导人都有一座甚至几座别墅，有的在莫斯科周围，有的远在南方海滨。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南方有好几处别墅，有的是他指示修建的，有的是手下主动为他修建的。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先临时被安置在哥尔克 10 号别墅，以后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别墅也换了。他自己说，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要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的别墅豪华阔绰。^①

所有这些特权享受都没有计入领导人的工资之中，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一个戈比。这些开支都来自国库，归根到底，都由纳税人支付。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体力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惜在他去世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终于荡然无存！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9 页。

98.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左凤荣

苏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也面临着如何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列宁重视监督工作，初步建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监督机制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失去了监督作用。

列宁的监督思想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

对权力进行监督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少的。列宁监督思想的核心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列宁最初设想通过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举与撤换实施监督，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①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便广泛推行工人监督。列宁也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1918年5月成立了专门实施监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一部门当时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对决议和命令、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但是，这一机关并没有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1919年5月，又在国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6页。

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了中央申诉局和地方分局。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列宁想让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构，检查国家机关的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但是，无论是群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还是直接监督国家机关，都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对此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①党代表人民成了国家的管理者，工农群众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列宁转而注意在体制上保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1920年9月，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② 俄共（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局，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地位，由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足见列宁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③ 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监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44页。

③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

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同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委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同级代表会议解决。这标志着俄共（布）党内独立监察制度的正式建立。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重申了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各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

随着独立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列宁进一步在理论上完善其监督思想。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列宁反复强调建立可靠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提高监察委员的素质、扩大其权限，“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①，“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②“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③“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④列宁要求改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查院，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4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④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

使之能够真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即成立二者的联合机关，统一行使监察职能，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把其人数从 12000 人减至 300—400 人，这些人应该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其工作人员要通过有关考试选拔，他们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检查，给检查员以较高的报酬。

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列宁所要建立的是独立行使监察职能的党内监督机制，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削弱

1923 年 4 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没有忠实执行列宁的主张，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至 50 人，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合作，但把监察工作的目的确定为，“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保证党的路线能在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得到贯彻”。^① 这次大会还作出了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才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应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般的党的工作者的决议。实际上没有采纳列宁关于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和职权的建议。

斯大林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1924 年 5 月俄共（布）十三大（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到 150 人；其中许多是仍坚持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帮助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机关统一和纠正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同时完成建成工人专政的国家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总任务”。^② 1925 年 12 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是全体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只有中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 296、299 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 434 页。

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中央、共和国、区（边区）、省和专区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古比雪夫的领导下，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党内斗争激烈的联共（布）十四大上，古比雪夫表示中央监察委员完全支持斯大林。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奥尔忠尼启泽还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违反了中央监察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也不利于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

斯大林重新把国家和党的监察机关分开，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分别成立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删掉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章，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政策的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再拥有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能，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939年1月党的十八大最终完成了对苏联监察体制的改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经过斯大林的改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各级党委的下属机构，其职能也从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和党的决策，变成了主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其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了，对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监察机关（1940年成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责也主要是检查国家机关和合作社、企业对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不是监察领导者的行为。监察机关的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委任制，其权力来源于上司而不是代表。斯大林滥用职权、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与监督机制的萎缩不无关系。

60年代以来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调整

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针对人民的不满，试图恢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统一监督的原则，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其职能是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和州委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决定的上诉；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强调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企业、建筑队、集体农庄、车间等都成立了协助党和国家监察机关工作监督小组和监督岗。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机关的地位、扩大了其职权，但是并没有实现列宁所强调的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监督，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局面，人民群众仍然不能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个人也仍然高居于党之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取消了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再次把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分开，他一方面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名为“人民监督委员会”，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其职权仍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党委，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处于监督之外了。党的监督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

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几点思考

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看到，苏共在长达70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体制，党内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是苏共犯错误、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因此，在党的监督机制不起作用的同时，国家监察体制也没有独立发挥过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苏联缺少民主的传统，个人的自主性、公民意识缺乏，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好皇帝，而不是自己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中，缺少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意识和机制。

第一，最高领导人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列宁打算建立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接受监督的监察体制，但是，列宁没来得及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就病逝了，苏联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与列宁不同，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强调的是集中、统一、纪律和服从，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党是意志的统一，他形象地把党看成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斯大林一再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应当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

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应当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露党、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①他认为党内民主并不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而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②在党内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和处罚，失去了发言权。斯大林改变了党的政策的广泛的公开性，强调保密，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在20年代末，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国家的代表，监督机制对他不可能起作用。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比斯大林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但他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同样在思想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机制仍然是对下不对上，监督机制对于掌握实权的领导仍然不起作用。

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任命制度，是监督机制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斯大林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监督者的权力都来源于领导者。这种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察自己的体制，使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监督机构本身也逐渐官僚化了，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并没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投票权，公民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到苏联解体前夕，有85%的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民众自然要抛弃这样的党。

第三，苏联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从20年代末开始，斯大林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加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依靠国家生活，各级领导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对之进行监督。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96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9页。

诺夫所说的那样，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苏共包办一切的情况下，社会不存在任何批评机制，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领导人出了问题，就难以得到纠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这恰恰是苏共缺少党内外监督机制带来的恶果。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深刻的。

99. 历史教科书问题如何纠缠俄罗斯？

张盛发

俄罗斯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存在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国家之一，但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频率之高和争论之激烈，恐怕俄罗斯是独此一国。在俄罗斯独特的景象是：现实纠缠着历史，历史变成了现实。

历史教科书写什么和怎么写？由谁来写？是统一的教科书还是可供选择的多元教材？是仅仅陈述史实还是另加论述和讨论？是否必须把历史上的可怕篇章告诉学生们？是学校自己选择教科书还是由官方审查后圈定？等等，让俄罗斯人争论不休和莫衷一是。

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早产生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 90 年代中后期，只是当时的俄罗斯一片乱象，加上叶利钦政权本身无意或无暇重建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因而局部性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尚未发展到如今天这般举国上下关注的程度。自普京 2003 年亲自干预历史教科书以来，一直到今天的梅德韦杰夫总统，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纷繁复杂的俄罗斯历史问题本身，始终困扰着俄罗斯社会。

笔者曾经在 2007 年撰文论述过当时因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 年俄国现代史》教师参考书而引起的争论。^① 本文将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阐述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争论的主要原因，介绍 2003 年至今历史教科书争论的基本情况。

^① 参见拙文：《俄罗斯历史和社会学教科书争论》，《俄罗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历史教科书问题争论的原因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笔者以为下面三个方面的原因是值得注意和考察的。

俄罗斯社会对自己的历史首先是苏联历史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歧见和对立

这种分歧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受戈尔巴乔夫所倡导的“公开性”口号的鼓励，苏联报刊首次联系改革时期的现实竞相填补所谓历史的“空白点”和澄清“模糊点”。改革年代有关苏联过去的档案文件的披露和公布，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地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在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基础上，刹那间就出现了许多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解读。

苏联解体后，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废除、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增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再是苏联史学研究者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方法也已经被大多数学者所抛弃。从思想观点体系看，俄罗斯社会包括史学界活跃着各种主义和思潮。除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外，其他的主义和理论如民族主义、公民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各种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思潮等，都不同程度地占有一席之地。今天，在俄罗斯史学界，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学派可以享有一家独尊的垄断地位，也就是说，史学研究呈现多元状态和多元方向，没有明显的主流学派。

在官方理论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以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包括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历史在内的所有问题，不仅极难取得所谓的共识，甚至常常吵得不可开交。

历史问题争论的核心其实就是如何评价苏联时期的斯大林体制或斯大林主义，包括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本身。经常争论的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褒扬者认为，斯大林体制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且成为世界强国。贬责者则不以为然，或指出其让社会和人民付出代价过大。斯大林体制意味着什么？有人认为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则看到镇压和黑暗。斯大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崇拜者赞扬他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厌恶者咒骂他是暴君和独裁者。简而言之，在当今的俄罗斯社会，无论是学界还是民众，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企业家，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的

评价，可以说仍然是众说纷纭。

所以，就如总理普京在面对斯大林评价问题时都面露难色。考虑到俄罗斯各个阶层的情绪、感受和反应，普京在评价斯大林时不得不经常使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虽然，但是”这样的折中方式。

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同俄罗斯网民对话时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说是‘肯定的’，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说‘是否定的’，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所以，一方面，普京指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普京又说，“所有这些积极的东西无疑是存在的，然而这却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① 普京这种刻意保持平衡的回答显然是顾及俄罗斯社会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不同的看法。

而在这之前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斯大林直率的评价则引起了轩然大波。2009年10月30日，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梅德韦杰夫发表了题为“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的视频博客。

他写道：“我相信，对民族悲剧的纪念如同对胜利的纪念一样神圣。极其重要的是，年轻人不仅要有历史知识，而且要有公民的情感。要能够共同去感受俄罗斯历史上最为悲剧性的一段事情。而这里所有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无法去想象我们所有民族所遭受的恐怖的规模。恐怖的高潮是在1937—1938年。A. 索尔仁尼琴称当时的不尽的‘被镇压的人流’是‘人民痛苦的伏尔加河’。在战前的20年里，我国人民中的整个阶层和整个专业界遭到毁灭。哥萨克人实际上都被消灭了。农民们被‘剥夺了生产手段和土地’，变得毫无生气。

^① Разговор с Владимиром Путины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 3 дека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www.moskva-putinu.ru/>.

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到了政治迫害。所有的宗教界代表都遭到了迫害。”

他沉重地说，“我们只要想一想：几百万人死于恐怖和不实指控——那是几百万人。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人应有的安葬权都被剥夺了，而长期以来他们的名字就从历史上勾销了。”他强调，“国家的任何发展、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

梅德韦杰夫在讲话中以不同于普京的方式触及了俄罗斯社会最为敏感的“斯大林神经”。他强调了人民的历史作用：“确实，斯大林的罪行不能贬低人民的功绩，是人民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人民使我们国家成为强大的工业国。人民使我们的工业、科学和文化达到了世界水平。”^①

正如梅德韦杰夫自己所预料的，他的这篇视频博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博客发表后，赞扬和批评接踵而至。他后来在同记者谈话中回顾说：“我们有5000万人使用因特网。在总统网站上，对我所说的话有几千份评论。有人写道，国家领导人终于直率地说出了他对镇压时期和对斯大林的看法了。给出了所有的评价，那就是被我称作罪行的东西。有人写道，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使国家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我们有了发达的工业，有很先进的社会部门，那里许多产品是免费的，社会几乎没有犯罪。据说，俄罗斯当代领导人也必须取得这样的成就。”^②

网民为“格奥尔吉”的评论者甚至在总统网站上的跟帖中质疑总统所说的镇压受害者数字的准确性。他写道：“尊敬的梅德韦杰夫总统，我看了您的讲话，我有重要的异议。第一，（镇压的）规模。您说，数百万人死于政治镇压。官方的资料是：在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被枪决的是80万—90万人……第二，所有被镇压者真的是无辜的吗？他们中包括：弗拉索夫分子和‘大恐怖’的组织者叶若夫……第三，为何把主要责任加诸斯大林？斯大林撤销了叶若夫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任命了贝利亚。贝利亚逮捕了叶若夫，并且至少为10万人平反（按照另

① 梅德韦杰夫还说，“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将会使我博客的访问者感到不安。” Память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гедиях так же священна, как память о победах, 30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862/>.

② Интервью немецкому журналу “Шпигель”, 7 но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929>.

一些资料约为 80 万人)。叶若夫等其他许多人有意损害斯大林政策的信誉。我还认为,不能忘记和剥夺斯大林的功绩;而有关镇压问题,必须进行新的调查。”

网民“伊利努尔”对总统说:“您谴责了所谓的‘斯大林政治镇压’。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草率的,必须考虑苏维埃国家生存的情况。”

而署名“瓦莱里”的网民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一些评论者歇斯底里发作了。都安静吧。总统并没有触动您的偶像。他是评价那个时代和那些方法……为何只是必须计算被枪决的人?不要算几百万经历过强迫劳动制度的人?难道把他们计算到疗养院里休养者当中?”^①

对包括斯大林问题在内的苏联历史问题的辩论和争论既频频见诸大众媒体,更全面地反映在各类历史书籍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任何一位作者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在触及苏联时期重大问题时,都势必引起观点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人士的争论和非议。譬如,在苏联时期的“政治镇压”或“大恐怖”问题上,自由主义作者在教科书里严厉谴责斯大林乱杀无辜和草菅人命,而斯大林主义者或民族主义作者则认定它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理性。大凡苏联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对立双方几乎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因而具有不同观点的历史教科书出版后,几乎必定受到对立方面的口诛笔伐。

与上述原因紧密相关的是,俄罗斯国内不同政治集团和力量以历史问题为背景在现今发展和未来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和斗争,特别是俄罗斯政府通过规范历史教科书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试图和努力

就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前后两位总统而言,出于治国安邦的需要,他们非常希望通过历史证明现在和寻找未来,因而他们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乃至历史教科书极为重视和关注。从普京的历史观来看,他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苏联历史,强调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要培养公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公民爱国主义情感、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自豪感,因而他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

普京在正式就任总统和就任初期的时候,曾经是充满历史批判精神和民主理念的。在 1999 年底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对苏联历史进行了概

^①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Тема: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http://blog.kremlin.ru/post/35/desc?page=17>.

括性的论述。他说,“或许主要是: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快速发展和人民获得自由。而且,用意识形态的方法处理经济使我们国家注定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是那么痛苦,但是,几乎在 70 年时期里,我们一直行走在脱离人类文明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他对俄罗斯未来的憧憬是:“我们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指望应有的未来。”^①

2002 年 1 月,普京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如果把建设民主和自由的基本原则理解为共同的原则,那么,我认为,并且我要重申,没有这些普遍公认的原则,我们就无法建立正常的民主国家。”^②

但是,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乱象却让普京选择了强人治国的方法。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加强联邦中央权威和重建俄罗斯大国形象,普京在国内外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取消州长直选,打击经济金融寡头,加强与西方的对抗等。也就是说,在现实面前,普京开始更强调秩序和稳定,突出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作用。这样的治国理念也必然让他产生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企图。

而历史领域恰恰是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历史一直是困扰俄罗斯人头脑的一大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俄罗斯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这些问题都是俄罗斯人在今天的发展道路上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时必须予以明辨并解决的。正如普京 2005 年在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开幕式讲话中所说,“……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历史掌握得越深刻,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就越能确定自己今天的位置和为我们的孩子们构建未来”。^③

所以,普京及其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兴趣愈益浓厚。他们评判历史不外乎两种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30. 12. 1999. 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nium.html#.

② Интервью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 В. Путина польской газете “Газета wyborча” и польскому телеканалу “ТВП”, 14 января 2002. http://www.czech.mid.ru/press-rel/05022002_rus.html.

③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откры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архива, 23 декабря 2005 года.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5/12/99432.shtml>.

考虑：其一，如何通过表达官方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来论证当局施政理念和治国方法的正确；其二，如何通过肯定先辈的业绩来树立普通民众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促进民众的公民觉悟和爱国主义热情，提振民众对未来发展道路的信心。这样，普京必然要着眼于历史的正面因素和积极因素，更希望历史教科书能记载正面的历史，以此培养青年公民对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2003年11月，普京在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的时候，专门讲到了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他要求，在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 and 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① 2007年6月，普京总统在同全俄历史教师代表会见中再次强调，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祖国的自豪感。^②

梅德韦杰夫总统上任后，对历史问题和教科书同样非常重视。他指出，如果不了解复杂的历史，那常常就不能知道我们许多问题和今日俄罗斯困难的根源在哪里。^③

同样，反对派政党和人士求助历史，也无非是试图：第一，通过批判历史特别是批判苏联时期的历史来证明当局在道路选择和施政方针上犯有与先辈相似的错误；第二，通过对历史问题的论述证明自己的政纲特别是对未来发展道路设计的正确。

早在普京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不久，反对党“亚博卢”联盟集团领导人 Г. 亚夫林斯基就指责普京在俄罗斯建立了警察国家。政论家 Ю·布尔京则断言普京政权是个人专权和独裁政权。^④

2007年12月，俄罗斯《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 А·罗金斯基在介绍《斯大林主义历史》丛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斯大林主义的遗迹在当今生活中是明显可见的。我们没有克服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克服而是因为我们未能理解

①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учеными – историками, 27 ноября 2003 года. <http://194.226.82.50/text/appears/2003/11/56326.shtml>.

②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007/06/21,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06/21/1702_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135323.shtml.

③ Память 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трагедиях так же священна, как память о победах, 30 октября 2009 года. <http://news.kremlin.ru/news/5862/>.

④ 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7 ноября 2003 г.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和认识它”。^①

2010年1月，在梅德韦杰夫主持的讨论俄罗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的国务会议上，亚博卢集团领导人米特罗欣尖锐批评了政党垄断现象。他指出，这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主要和关键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的垄断。第一，这是一个政党在各级政权机构和议会中的垄断，这个政党基本上代表官僚的利益并与大公司的利益相联系。垄断的第二个表现是，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行政权占据全面的优势，它压倒了司法权和立法权。第三个是在社会上的表现——这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强制，官僚们对我们社会的其他所有集团和阶层的强制。这样，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即，这种制度总体上是苏联制度的再生，而苏联制度的主要缺陷恰恰就是一党垄断……”^②

谈论现在和规划未来时必定要回顾和评述历史，这就是俄罗斯政坛的一大特点。但是问题就在于，俄罗斯当局与反对派之间对历史问题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前者主张撰写积极的和正面的历史，后者则强调要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遗迹。而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历史问题上同样也是众说纷纭。

专门描述和论述某个历史时期的综合性的教科书更是成为俄罗斯历史问题争论的重点。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育的范本对千百万学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千百万学生是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他们如何看待先辈的历史并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观念的问题，而是攸关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重大事情。当局试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使学生按照官方的引导来了解和认识历史，从而激发学生对历史的自豪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观。而反对派则希望在历史教科书里描述他们所认定的先辈的错误，让学生反省苏联历史的消极面，从而理解和接受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的理念。这样，历史教科书就成为争夺俄罗斯中小學生灵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各方都力图通过教科书把自己对历史的解读告诉学生们。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科书首当其冲地成为不同史学观点较量和斗争的重要领域。

① В России появится стотомная серия “Истории сталинизма”. 05.12.2007. <http://www.itar-tass.com/level2.html?NewsID=12150758&PageNum=0>.

② Заседание Госсовета по вопросам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22 января 201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6693>.

同西方国家以及同前苏联东欧集团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家关系经常因历史问题产生龃龉和争执

一直以来,为了重振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普京政府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特别注重维护苏联时期的大国形象,不容许和不接受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对苏联内外政策和行为进行任何指责和贬损。为此,俄罗斯经常同相关国家就历史问题争论不休。

在有关苏联解体问题上,俄罗斯对美国以胜利者自居的傲慢态度大为不悦和深感不满。2005年4月25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称苏联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①4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S. 麦克莱伦却明确表示布什政府不同意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这一评价。他说,“我们对苏联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并不感到遗憾。这是我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促进了自由和民主。”^②

在30年代初期乌克兰饥荒问题上,俄罗斯同自己的斯拉夫兄弟乌克兰表现出严重的歧见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006年11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认定1932—1933年的大饥荒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按照已经通过的法律,公开否定乌克兰的种族灭绝“被认为是对几百万大饥荒受害者纪念的侮辱,是对乌克兰人民尊严的损害,并且是违法的”。^③俄罗斯对这个问题当然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俄罗斯外交部认为,大饥荒并不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它承认,大饥荒在许多方面确实是由当时苏联领导人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很清楚的是,这种政策并没有民族的特征。我们大家都应当以更为成熟的态度对待我们共同历史中的这些复杂而又痛苦的问题,而不要将其政治化”。^④

但是,乌克兰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2010年1月13日,乌克兰上诉法院在审理由乌克兰安全局提起的诉讼案中,判决苏联领导人和前乌克兰领导人犯有在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5 апреля 2005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text/appears/2005/04/87049.shtml>.

② Белый дом не согласился с тем, как Путин в своем послании парламенту оценил распад СССР. 28 апреля 2005. <http://www.newsru.com/world/28apr2005/25prlbdm.html>.

③ 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 признала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28. 11. 2006. <http://www.grani.ru/Society/History/m.115027.html>.

④ Там ж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МИД не признал голодомор геноцидом. 14. 11. 2006. <http://www.grani.ru/Politics/Russia/m.114338.html#>.

1932—1933 年组织饥荒罪。判决书说：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组织了“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也就是人为地制造“旨在部分地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民族的生活条件”。^①

2009 年，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签订 70 周年（1939 年 8 月 23 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70 周年（1939 年 9 月 1 日）纪念活动期间，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和周边国家就当年的历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在卡廷事件问题上，俄罗斯同波兰较量和争斗自 90 年代初期以来绵延至今。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俄罗斯都曾向波兰表示道歉和忏悔，但是许多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却另有看法甚至不服。2009 年 8 月 31 日，普京总理访问波兰前夕在波兰《选举报》上发表的一篇《历史是相互抱怨的理由还是和解与伙伴关系的基础？》文章中写道：“其命运遭到集权主义政权损害的俄罗斯人民也非常理解波兰人在卡廷问题上的敏感情绪，在那里长眠着几千名波兰战俘。我们必须共同铭记这一罪行的受害者。”紧接着普京的笔调非常巧妙地一转，将卡廷事件同苏波战争的红军战俘问题挂钩：“卡廷”和“梅德诺耶”纪念碑，像 1920 年战争（即苏波战争——引注）中被俘虏的俄国士兵的悲惨命运一样，应当成为共同哀悼和相互原谅的象征。”^② 俄罗斯还拒绝了波兰提出的进一步解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的要求。

在有关苏军在希特勒德国 1939 年 9 月 1 日进攻波兰后于同月 17 日进入波兰东部问题上，波兰希望俄罗斯作出道歉，而后者则三缄其口。据报道，在 2009 年普京访问波兰并参加二战爆发 70 周年纪念活动时，76% 的波兰人期待着普京就当年苏军进攻波兰表示道歉。^③ 但是普京没有满足波兰人的要求。在普京现身波兰之前，普京上述那篇有针对性的文章已率先在波兰登载。普京首先指出波兰在二战爆发之前就已经伙同纳粹德国重新分割欧洲：“不仅德国而且还有匈牙利实际上还有波兰都参与欧洲领土重新划分。在慕尼黑条约签订的同一天，波兰向

① Украинский суд признал Сталина, Молотова и других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иновными в голодоморе. 13 января 2010 г. <http://www.newsru.com/world/13jan2010/golodomor.html>.

②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4814/>.

③ Поляки ждут извинений от премьера Путина. 30.08.2009. <http://www.rosbalt.ru/2009/08/30/667694.html>.

捷克斯洛伐克发出了最后通牒，同时与德军一起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切森和弗里施塔茨地区。”^①

俄罗斯同波罗的海国家的争执主要是围绕着瓜分东欧势力范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战争期间苏军占领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展开的。这三个国家自 90 年代独立以来一直要求苏联就当年的占领作出道歉和予以赔偿。2008 年 1 月，爱沙尼亚总理再次要求俄罗斯进行道歉。^② 同月，立陶宛总统要求俄罗斯承认苏联占领立陶宛的事实并赔偿损失（估计为 280 亿美元）。^③ 2009 年 4 月，拉脱维亚步其后尘，向俄罗斯提出第一笔占领赔偿损失 6 亿 6572 万美元，而总的赔偿则估计为 187 亿美元。^④ 俄罗斯当然不会满足它们的要求。早在 2005 年 5 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 60 周年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就明确表示俄罗斯不会向波罗的海三国进行道歉。^⑤

俄罗斯同西方国家的交锋则更为激烈和尖锐。这主要是欧洲议会和欧安组织前后通过的两项决议令俄罗斯深感不平和不安。2009 年 4 月 2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意识与集权主义决议》。决议要求欧盟所有国家宣布 8 月 23 日为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政权受害者纪念日。6 月 18 日，爱沙尼亚议会表示支持该决议并宣布 8 月 23 日为纪念日。^⑥

同年 7 月 3 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一项决议中把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谴责它们进行种族灭绝、侵犯人权和自由、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决议还要求注意欧洲议会有关宣布 8 月 23 日为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

①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4814/>.

② Эстония пока ожидает от России извинений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оккупацию, а не компенсаций. 22 января 2008. <http://www.newsru.com/world/22jan2008/sorry.html>.

③ Президент Литвы: Вильнюс будет добиваться признания Россией факта советской оккупации. 7 января 2008. <http://www.newsru.com/world/07jan2008/occupat.html>.

④ Латвия предъявила России первый счет за “советскую оккупацию” – 666 млн долларов. 28 апреля 2009. <http://www.newsru.com/world/28apr2009/latv666.html>.

⑤ Прибалтика пока не услышит извинений Москвы. 03.05.2005. http://news.bbc.co.uk/go/pr/fr/-/hi/russian/russia/newsid_4508000/4508309.stm.

⑥ Августа 1939 года: общеевропейский день памяти жертв всех тоталитарных и авторитарных режимов. 21.08.2009. <http://kiev.mfa.ee/rus/estonija/istorija/aid-609>

义统治下受害者纪念日的倡议。^①

俄罗斯代表团当时就反对把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进行比较，并对投票进行了抵制。随后俄罗斯对西方国家展开了全面的还击。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悉数上阵，以各种方法痛斥西方国家。

7月9日，俄罗斯外交部代表指出，欧安组织议会大会决议实际上把斯大林政权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决议里试图为了政治目的歪曲历史，我们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这不会促进在该组织成员国之间创造信任与合作的气氛。”^②

7月18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声明谴责重新审议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声明认为，试图修改二战的实际原因并让苏联同纳粹德国一样承担责任，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侮辱。声明指出，“历史已经作出了审判——这场悲剧的主要罪犯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纽伦堡军事法庭已经认定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国际社会已经承认这一最终判决，没有必要重新审议”。声明还表示，“把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是对俄罗斯各民族的侮辱，它们为所获得的和平付出了自己很高的代价。”^③

8月3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欧洲国家议会大会不久前把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且让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相同的责任。但这实在是厚颜无耻的谎言”。^④

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普京在波兰报纸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长文中，普京俨然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分析二战历史时对当时西方国家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和不愿与苏联共同对付德国威胁进行了严厉批判。^⑤

① Резолюция ОБСЕ о сталинизме и нацизме. <http://www.echo.msk.ru/doc/603287-echo.html>.

② Резолюция ПА ОБСЕ о сталинизме искажает историю – МИД РФ. 09.07.2009. <http://www.rian.ru/politics/20090709/176760997.html>.

③ 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выступил против пересмотра роли СССР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http://www.russkiymir.ru/russkiymir/ru/news/common/news2992.html>.

④ Разговор с Дмитрием Медведевым.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ведущего программы “Вести недели” Евгения Ревенко. 30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news.kremlin.ru/transcripts/5314>.

⑤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овод для взаимных претензий или основа для примирен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31 августа. 2009. <http://premier.gov.ru/events/news/4814/>.

还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前苏联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拉脱维亚等，并不把苏联视为自己的国家，它们都陆续建立了反映所谓苏联占领时期的博物馆，并且正在撰写与俄罗斯版本的苏联历史相悖的本民族的历史。^①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的担忧，它隐藏着在历史和文化方面俄罗斯同这些国家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危险。

俄罗斯同外部国家就历史问题所进行的争执和较量，极大地提高了俄罗斯人对历史的兴趣，同样也突出了历史教科书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和维护本国形象方面的作用。

2003 年政府治理历史教育问题与 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第一次爆发

苏联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在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垄断地位，历史教科书的体系是相当稳定的。事实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学校历史教科书的指南，教科书中对所有历史问题的论述都是以《简明教程》的指导为基础的，没人敢于质疑和挑战由官方组织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所以，那时根本就不会因观点分歧而产生所谓教科书问题。

但是，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90 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变，教育领域随即也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苏联时期的历史教育体系瓦解后，俄罗斯开始制定新的历史教育标准和模式，其特征就是历史教育的多元化和多样性。其时，由于新旧交替过程尚未完成，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是折中性的。

1994 年 12 月，俄罗斯教育部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历史教育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鉴于义务制基础教育的实施，历史和社会学教育的线性结构（5—

^① Нескончаемые перемен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шлого. 16 декабря. 2009. http://www1.voanews.com/russian/news/Russia-history_2009_12_16-79422202.html.

11 年级) 向同心结构 (5—9 年级和 10—11 年级) 转变^①; 废除人文学科教学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垄断, 实现有关研究历史进程的观念方法的多样性; 更新历史教育的内容; 为可变通的教学体系创作新一代的教科书。^②

这样, “教科书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被废除了。在多元条件下学校出现了以各种意识形态方法为基础的教科书。在各种观念 (文明的和文化学的等) 基础上编写的教科书取代了苏联时期的那些以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为基础的教科书”^③。

在 90 年代后半期俄罗斯社会政治局势紧张背景下, 形形色色的历史教科书常常会引起激烈的社会争论, 从而也引起当局注意。

俄罗斯学者 С·基里洛娃和 С·列别杰夫写道, 还在 90 年代中期, 一些失意的俄罗斯人就开始写信给总统、总理、副总理、市长、电视广播公司主席、公共住宅部门领导人、学校校长和杜马议员。一部分人抱怨, 现代史教科书里不再使用“英雄主义”、“勇气”和“功绩”的词语了。另一部分人对教科书作者总是“欺侮共产党”感到失望。第三部分人则非常认真地阅读教科书并从中找出许多错误。^④ 当时被民众投诉最多的是下列教科书: А·克赖德尔的《外国现代史》, В·奥斯特洛夫斯基和 А·乌特金的《20 世纪俄国史》, А·尤罗夫斯卡娅的《近代史》, И·多卢茨基的《现代史》。

1999 年, 俄罗斯四个地区的杜马决定禁止在教学中使用克赖德尔的教科书

① 线性结构指的是, 在整个学校的课程中各个阶段连贯地学习自古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每个阶段一次学完。相应的, 同心结构指的是, 每个阶段在更高基础上重复学习相同的历史课程。据《俄罗斯教育工作者专业提高和进修学院》历史和社会经济教育教研室主任维亚泽姆斯基介绍, 俄罗斯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情况是这样的: 在小学三、四年级开设祖国史的入门课程和初级课程, 它们包含有关人类、社会和人权的基础知识。5—9 年级的时候, 教授系统的历史课程。10—11 年级的时候, 学生们学习更有理论性的祖国史和世界史课程。在许多学校里, 高年级时除了俄国史外还开设“世界文明史”。在一些人文课程里开设了选修课: 俄国文明史、俄国史分期史。(Вяземский Е. Е. Школь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пыт и проблемы. Нов.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 2000.)

② Тюляева Т. И. Об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в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nasledie.ru/obraz/7_2/7_2_2/article.php?art=52.

③ Там же.

④ Светлана Кириллова, Сергей Лебеде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едел. <http://ps.1september.ru/article.php?ID=200308601>.

《外国现代史》。俄罗斯教育部也收到了要求检查这本教科书的充满怒火的信件。信件认为教科书贬低了苏联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还提到作者和出版社同索罗斯基金的合作，指责他们有亲美情绪。开展这场抵制克赖德尔教科书运动的是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地方杜马投票赞成禁止克赖德尔的教科书，而写投诉信的则是老战士和军事爱国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只是由于当时教育部领导人的支持，克赖德尔的教科书仍然保留在联邦教科书书目里。^①

2000年，普京上台后，为了整顿国内秩序和复兴强大国家，不仅严厉打击经济寡头和大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威，而且还力图控制大众媒体和重建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教育的地位得到提升和强化，成为重建国家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之一。相应的，作为历史教育重要载体和手段的历史教科书，开始愈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原本争议规模和性质有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出现了扩大和严重的趋势。

2002年1月，俄罗斯教育部宣布将通过竞选以创作供普通教育机构使用的祖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竞选规则，教科书应当：“揭示俄国史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公民觉悟、全民族的自我意识、历史乐观主义、对俄国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尊重、形成基本的社会专长；成为加强俄罗斯社会、对学生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知识有机教育的重要因素；从作者有关祖国史的完整方法论观念和社会存在着有关过去的历史的多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反映历史材料解释和转达的多元化；教育青年对他人观点和信念持宽容和尊重态度，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民族排外和极端主义；提供把实现地区成分的模块纳入历史教育内容基本义务的可能性。”^② 这项竞选规则实际上也是规范历史教科书的准则：写什么和如何写。

第二年，普京总统终于亲自出来为历史教科书提出任务和制定规矩了。2003年11月27日，普京总统在参观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时在那里同一些历史学家举行了会晤。普京谈到了“经常引起那些关注我们祖国历史的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即“历史书籍首先是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普京以老战士们的关切作为问题的

① Там же.

②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о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оэт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http://polit-memo.ru/publication/school_history_book/.

切入口：“不久前我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会议，并且在那里会见了一些老战士。他们再次提出了有关历史教学书籍的问题。”接着，普京明确阐述了他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

“我们已经有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这当然是不错的。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的是，我们已经脱离了对我们国家历史的一党的和单一的意识形态的阐述。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不允许陷入另一种极端。当代教科书特别是中小学和高校使用的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新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毕竟在这些教科书里应当阐述历史事实，它们应当特别培养青年人对自己的祖国历史 and 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① 普京讲话的要点是：其一，教科书不应当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其二，教科书要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和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普京的讲话实际上树立了评判历史教科书的标准，给历史教师提出了培养学生的目标。^②

在这前两天，2003 年 11 月 25 日，教育部长 В·菲利波夫建议召开专门审议教科书的联邦鉴定委员会会议，会上提出了取消多卢茨基编写的《20 世纪祖国史》10—11 年级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的建议。^③ 普京讲话后没几天，12 月 2 日，教育部长 В·菲利波夫就把多卢茨基的教科书从推荐书籍名单中剔除了。教育部第一副部长 В·博洛托夫解释的理由是：“只要打开教科书就能看到对我们祖国历史的成见和对材料的有偏见的阐述。”^④ 博洛托夫在同《新闻时报》记者谈话中还说，现在是“摆脱最近十年先是在市场上尔后在学校课桌上出现的充满偏见的教科书”的时候了。^⑤

①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встрече с учеными – историками.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194.226.82.50/text/appears/2003/11/56326.shtml>.

② Путин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не площадка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www.newsru.com/arch/russia/27nov2003/pres.html>.

③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036.html.

④ Василий Кузнецов, Игорь Долуцкий. Истор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трастной//Новое время. 21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yabloko.ru/Publ/2003/2003_12/031217_novvr_history.html.

⑤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036.html.

多卢茨基的教科书《20 世纪祖国史》（上下两册）初版于 1993 年。现书系第七版，是在 2001—2002 年出版的，每册均印刷了 2 万册。十年内该教科书共计印刷 50 万册。

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看，多卢茨基的教科书遭到“封杀”的主要原因是书中的许多描述和论述引起当局的极大不满。

据多卢茨基自己说，“教科书中所阐述的许多问题引起了教育部的愤怒，但主要是其中的一个练习作业”。该作业要求学生下面两个观点进行对比，然后予以确定或推翻：

（1）普京当选后在俄罗斯发生了国家政变，由此产生了普京个人专权和专制独裁的政权（政论家 Ю·布尔京的话）；

（2）2001 年在俄罗斯形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亚博卢”联盟领袖 Г. 亚夫林斯基的话）。^①

多卢茨基设置的不是一正一反两种对立的选项，而是两项同类选项，莫非他是要加深学生对此类观点的印象？所以，多卢茨基的这项作业所引起的恐怕远不止是普京的难堪。难怪教育部长 В·菲利波夫只是抓住多卢茨基的上述两段引文而略去练习作业的性质，在教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你们看，现在选民（指学生——引注）将投谁的票（事情刚好发生在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引注）。^②

教科书中引起当局不满甚至愤怒的其他叙述和论述有：

关于二战初期苏军进入波罗的海国家，书中写道，“开始了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半个世纪的占领。”

关于战争初期对红军的镇压，书中写道：“根据沃尔科戈诺夫的资料，在 1941—1942 年，有 15 万人因胆怯和惊慌被处决，这相当于 16 个师。”（多卢茨基解释：“胆怯和惊慌”不讨人喜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沃尔科戈诺夫的话。特别是，沃尔科戈诺夫援引了相关的文件。我随后提出的问题是：“你认为斯大林的行动是正确的吗？”这就是全部情况。这里有什么偏见吗？）

关于苏德两军作战情况，书中写道：“德军鲍鲁斯集团军曾 15 次试图突围。

① Мин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претит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а” за критику Путина. 27 ноября 2003 . <http://www.newsru.com/russia/27Nov2003/uchebnik.html>.

② Там же.

德国人在白天拼命地突围。我军的大炮和机枪在 700 公里长的地段向他们开火。而他们踩着尸体继续前进。”（多卢茨基说，一位愤怒的评论者问：“难道必须这样教历史吗？”）

关于二战初期英国、德国和苏联，书中写道：“清楚的是，英国人从 1939 年起就同法西斯作战了，而斯大林在这段时期里同法西斯一起瓜分了欧洲。”^①

问题并不止于多卢茨基教科书本身。就在教育部取消该教科书的“推荐”印章之后，普京总统又采取了一个意义更大的举措。普京在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 Ю·奥西波夫的信函中，照例以老战士们对教科书批评为理由，要求限时检查所有的历史教科书。普京写道：“我同伟大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怀有一样的感情和看法。我命令在最短时期内邀请学者和史学家们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情况。应在 2 月 1 日前报告此项工作的结果。”^②

这样，以普京总统同史学家们谈话和致科学院信函要求检查历史教科书以及取消多卢茨基教科书的教育部“推荐”印章等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出现了普京执政时期第一次历史教科书问题风波。围绕着多卢茨基教科书，俄罗斯社会各界在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政府的支持者认为总统和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学校不是政治集会的场所。学生应当学习而不是议论有关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的方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的问题。”^③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们走在支持者的前列。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

① Игорь Долуцкий. Истори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страстно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запретило учебник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для старшеклассников. Почему “Новое время”. 21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yabloko.ru/Publ/2003/2003_12/031217_novvt_history.html.

② 普京信函的具体时间不详。根据上下文看，应是在 2003 年 12 月。Путин возмущен инсинуацией в учебнике истории. 14. 01. 2004. <http://www.inosmi.ru/inrussia/20040114/204478.html>; Очень 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книги. 20. 01. 2004. <http://www.gzt.ru/topnews/politics/33479.html>。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奥西波夫新闻秘书普列斯尼亚科娃承认，“我们收到了总统要求‘审议历史教科书编写情况’的信函”。她说，院长已经委托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和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处理这个问题。（Я б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12. 01. 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③ Я б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12. 01. 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所长 A·萨哈罗夫院士在 12 月举行的讨论教学书籍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支持总统有关学校教科书应当以加强社会为目标的观点。他说，“社会已经厌倦于对抗和紧张状态并且努力争取达到一定的稳定。90 年代初期出版的那些教科书已经不能反映那种革命的快感和推翻某些教条、意识形态立场和成见的努力，所有这些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已经被整个社会所推翻。”萨哈罗夫的观点得到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历史教研室主任 A·丹尼洛夫教授的支持。丹尼洛夫认为，“教科书应当努力去巩固社会，而不应当成为对抗和斗争的领域。无论我们怎样为作者甚至为学生的自由权而斗争，教科书仍然需要有明确的范围。顺便说一下，这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①

俄罗斯科学院对总统在信函中提出的要求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2004 年元旦过后，从 1 月 2 日至 1 月 12 日，由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哲学部主任 A·捷列维扬科院士会同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萨哈罗夫通讯院士和通史研究所所长 O·丘巴里扬院士，举行“三巨头”工作小组会议，讨论总统信函并制定了两页半篇幅的答复草案。答复中有一段与总统观点完全吻合的话用粗线条标示着：“历史教科书应当促进社会团结，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公民觉悟。”院士们认为：为此，必须在 2004 年通过国家标准，在 2005 年举办由所有再次出版的教科书参加的全俄竞选，根据竞选结果，选拔出不超过三四种的教科书。答复要求让科学院而不是教育机构在教科书内容方面拥有决定权。院士们最后建议总统，取消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的超额利润，并把这些钱给学者们去撰写正确的教科书。^②

支持政府决定的教师认为，“必须让孩子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他们未必能够通过当代教科书学习爱国主义，在这些教科书里许多历史事件被夸大，而论述许多历史人物时用的都是轻蔑的语调。”^③

①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036.html.

② 据捷列维扬科说，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建议给了奥西波夫院长，而后者已经在 1 月 14 日会见了普京。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17.05.2004. <http://www.kommersant.ru/doc.aspx?DocsID=474665&print=true>.

③ 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HBC/hbc.phtml?8+278+1>.

不赞成政府决定和立场的人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看法。“人民议员”集团主席Г·拉伊科夫对《莫斯科回声》电台说，“历史应当由史学家书写，政治家不应当干预这种事情。”他认为，“当政治家干预历史的时候，他必然要按照自己的口味歪曲历史，而历史是事实与确定。政治家们是按照另一种方式思考的，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可以写在他们的回忆录和书本里，而历史应当由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歪曲事实，这毕竟是对孩子的教育。”^①

一些教育界人士担心，号召编写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可能会是恢复“一门课程只有一本教科书”的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步。那些值得注意的教科书将会同那些真正有偏见的书一起从学校图书馆消失。^②一些教师强调，“孩子们不仅应当了解‘总路线’，还应当了解反对派和旁观者的观点。否则我们便教不会他们思考！”^③

莫斯科第1619中学历史教师Г·谢姆绍娃认为，多卢茨基的教科书是“优秀教科书之一”。她说，“一本好的教科书，当它刚刚作为小册子出版时，我就用它了。我喜欢它的方法和文件，它是不寻常的。”

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了其他一些观点。譬如，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所长叶辛认为，“最好的教科书是作家撰写的。”据他的看法，院士都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存在比历史学者更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集团。”也有人认为，罪恶之源就是教学图书出版的混乱。国家“推荐”的印章，富裕的出版社可以借助经济手段将任何一本教科书买到。^④

尖锐激烈的争论让大多数俄罗斯人难辨真伪。一位俄罗斯记者感叹：不由得羡慕（俄国）革命前的中学生。他们那几代人让自己学习的是索洛维约夫和克柳

① Путин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не площадка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27 ноября 2003. <http://www.newsru.com/arch/russia/27nov2003/pres.html>.

②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18 декабря 2003. http://www.rol.ru/news/misc/news/03/12/18_036.html.

③ 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HBC/hbc.phtml?8+278+1>.

④ На подходе к дн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е. 6 февраля 2004. <http://www.sbras.ru/HBC/hbc.phtml?8+278+1>.

切夫斯基的俄国史，不知道悲伤……^①

2007 年菲利波夫《1945—2006 年俄国现代史》

教师参考书引起的大论战

如果说 2003 年那场历史教科书风波是因政府批评和“封杀”不合自己口味的教科书引起的话，那么，2007 年的这场更大的历史教科书风波则是因政府一手炮制的教科书产生的。

多卢茨基教科书争论让俄罗斯政府看到了俄罗斯历史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并从中吸取了应有的经验教训。教训之一，就是政府不能消极地坐视历史教科书领域自行发展，从而在出现问题后再被动地应对。教训之二，就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整个历史（特别是苏联时期的历史）问题进而还与整个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因而，在管理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有必要对专业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的历史意识予以引导，从而以标本结合的方式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

2007 年 6 月 18—22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会议。会议的题目是“普通教育机构的当代史和社会学常识教学的紧迫问题与第二代国家普通教育标准的研究”。

6 月 21 日，也就是会议闭幕前一天，普京总统会见了出席会议的 26 名教师代表。会见时普京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教学、历史评价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普京以历史比较法谈到了有关苏联历史问题的评价问题。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都有可怕的篇章，而就可怕的程度而言，俄罗斯还不算严重。他是这样说的：“至于我国历史上某些值得探讨的篇章，是的，它们是有的。任何国家历史上都有这样的篇章！我们比其他国家还少一点这样的篇章。而且，我们的这些篇章并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可怕。是的，我们有过可怕的篇章：让我们回忆一下从 1937 年起所发生的事件，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但是，在其他国家同样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不管如何，我们没有对平民使用过核武器。我们

^① Я б историю закрыл, слегка почистил... 12.01.2004. <http://kp.ru/daily/23192/25822/>.

没有对几千公里的地区洒过化学用品，没有对譬如越南这样的一个小国扔过比整个卫国战争时期还多的炸弹。我们没有其他黑色篇章，譬如像纳粹那样的。”

普京进一步发展了他在 2003 年有关历史教科书观点。他认为，“……在教科书里可以而且应当阐述对社会和国家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但是，质量的教学标准应当得到保障。而在教学参考书里，如果阐述了某些立场、某些观点和某些评价的话，那就应当提出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观点，而不要仅限于一种看法，譬如说对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的看法，绝对不能容忍的是，甚至有时出现侮辱俄罗斯人民的观点。”他强调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自豪感：“显然，任何教学参考书作者都不能不谈自己的观点。但是，要正确地阐述观点，不要强加于人。我坚信，这将是有益的。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定向，这将在我们公民中首先是在年轻公民中产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确实有自豪的东西。”

同时，普京指责了一些由外国资助的教科书流入了俄罗斯学校 and 高校，回击了国外对俄罗斯历史的指责。他说：“每个国家和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会有自己的兴衰成败！不能允许别人把负罪感强加给我们，让他们想想自己吧。”

普京还要求政府部门在历史教科书出版方面加强自己的作用。他说，“需要提高出版社的责任。需要富尔申科（新任教育部长——引注）领导的相关部门增强国家的作用。”^①

普京的讲话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确定了对苏联历史的总体评价：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可怕的篇章”，但是，没有像纳粹那样的黑色篇章。其潜台词就是：俄罗斯历史实际上并不可怕。普京的讲话也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方法：允许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不同的看法，但前提是不能侮辱俄罗斯人民。所以，普京的讲话实际也是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给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确定了规范与准则。

而在普京讲话之前，教师代表会议已经正式推荐和介绍了两本官方授意和资助的教学用书。它们是 2007 年上半年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教师手册：《1945—2006 年俄国现代史》教师手册（以下简称《教师手册》）；《社会学常

^①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1. 06. 200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06/21/1702_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135323.shtml.

识：21 世纪的全球化世界》教师手册。

《教师手册》是由俄罗斯国家对外政策实验室副主任 A·菲利波夫等人编写的。该书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等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分别进行了评价。

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教师手册》试图平衡两种极端的观点，作者写道：“斯大林是我们国家政治和历史上最具矛盾性的人物之一；在俄罗斯历史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能引起如此矛盾性评价（无论是在他领导国家的时候还是在他逝世以后）的人物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卫国战争时期胜利的英雄和组织者。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他是邪恶的化身。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最著名的评价之一来自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很难说丘吉尔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他接收的是一个使用木柄犁的国家，而他留下的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 A·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其父是 1917 年革命和内战著名的参加者——后被镇压）则给予斯大林另一种极端的评价：‘血腥的暴君。’”^①

根据“社会舆论基金会”2006 年 2 月有关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调查^②，作者认为：

“对斯大林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评价都是有明显理由的。一方面，他被认为是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以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在某些地方还超过原有边界）；在最伟大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实施了经济工业化和文化革命，其结果不仅是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增长，而且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进入了科学发展先进国家行列；失业现象实际上已被消灭。

“但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情况。成就（许多反对领袖的人也都承认它）是通过极其残酷地剥削人民的方式取得的。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的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首创者和理论者。一些社会阶层——富农、小市民、神职人员和旧知识分子——被整

① Филиппов А.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гг.: кн. для учителя.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7. С. 81.

② 调查的题目是：您认为，如果从总体上说，斯大林在俄国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回答斯大林发挥“正面”作用的为 47%，负面作用的为 29%，认为难以回答的有 24%。（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гг. С. 93.）

个地消灭。此外，完全忠于人民政权的群众有时也遭到严酷法律的迫害。在斯大林时期谈不上生命安全。生活水平，尤其是在农村，是低下的。所有这些都未能促进国家精神面貌的改善。”^①

书中最有争议的内容是有关斯大林时期“政治镇压”的论述。作者写道：

“至于对管理阶层人员采取的强制手段，那么，其目的是要动员管理机构以保障其在工业化进程中和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的有效性。而完成这项任务，其中包括使用了政治镇压，后者不仅是为了动员普通公民而且也是为了动员管理精英。”^②“上层和中层管理人员成为镇压对象之一的事实说明，（目的）就是想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管理机构的效率。”^③“当今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试图保证统治阶层（作为动员社会完成不切实际任务的主体）的最大限度的效率，是使用暴力的合理原因。”^④

该书的最后一章《主权民主》专门论述了普京总统2000—2006年的执政时期。该章赞扬说，“……我们认为，实际上每一项有意义的措施都是与普京总统的名字和活动相联系的。”^⑤

作者还为普京所采取的有争议的行动作了辩护。譬如，关于按党派选举，书中认为：“按党派名单选举可以比按选区多数票更准确地反映选民政治倾向的细微差别。”^⑥关于打击尤科斯石油公司问题，书中写道：“‘尤科斯案件’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得到加强的国家向一个大企业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遵守法律，缴纳税款，不要试图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信息被领会了。”^⑦有关2004年乌克兰总统选举问题，书中认为：“В·亚努科维奇是唯一能够真正对抗尤申科的候选人。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选择是明确的。”而乌克兰所谓的橙色革命则被解释为主要是“美国政策的产物”：乌克兰的紧张局势是人为制造的，而“革命”的剧本也是事先准备好的。最后，亲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们的胜利被

①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93—94.

②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87—88.

③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88.

④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90.

⑤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51.

⑥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44.

⑦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435.

剥夺了。^①

据俄罗斯《权力》杂志记者报道，发行量为一万册的《教师手册》的订单直接来自俄联邦总统办公厅。总统办公厅还下达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指示：“约定是这样的：斯大林——好（建立了垂直的政权，但是，没有私有制）；赫鲁晓夫——坏（削弱了政权的垂直性）；勃列日涅夫——好（按照评价斯大林的标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坏（毁灭了国家，但是，在叶利钦时期出现了私有制）；普京——最好的执政者（加强了政权的垂直性和私有制）。”^②

《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引起了社会的不同看法。署名“zt”的网民认为，不能坐在总统办公厅里撰写历史教科书。因为在总统办公厅的人不懂这个——你们不是干这一行的。该网民写道：“总统办公厅的人就是不应当写历史教科书。（他们）有权知道情况，而写就不应当。历史学家应当写历史教科书。政治家应当从事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会计应当编制平衡表。这一切都是明白的。”但是，网民“met0”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恰恰国家公务人员——只有他们——才应该写教科书，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国家的话。说实在的，职业史学家只能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所或其他国家科研组织里供职。我原则上不相信由其他史学家来写教材。这与学术功绩无关。”^③

反对者认为，《教师手册》的官方背景表明政府试图推出类似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新的指导课本。署名“格利耶博士”的网民在莫斯科师范大学的论坛上发表了“丹尼洛夫对达尼林（论新的‘简明教程’）”的文章。他指出，“当总统办公厅的监护人希望他们能够轻易地控制像来自全俄各省的中学教师和师范院校的教师这样的听众的时候，他们完全错了……”他认为，不需要任何“简明教程”。他承认，国家需要新的历史观念，需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他强调，这样的工作应当由职业史学家来承担。^④

①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 гг. С. 460—461.

② Анна Качуров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рипадок. <http://www.kommersant.ru/doc.aspx?DocsID=782464>.

③ Олег Кашин. Учебники истории должны писать историки. 3 Июля. 2007. 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07-03/10_uchebniki.html.

④ Доктор ГЕРЬЕ. “ДАНИЛОВ vs ДАНИЛИН” (о новом “Кратком курсе”). http://www.anticompromat.ru/danilin/kratky_curs.html.

《教师手册》中《主权民主》一章的作者B·达尼林否认该书是新的《简明教程》，但他认为，“俄罗斯教育需要一种理解历史的参照点。”他说，“书本是按照总统办公厅意思撰写的，为的是提出历史教学的某些方向。这是鉴于没有界限地阐述历史事件的情况而向我国史学界发出呼吁的第一次尝试。该书试图缩小和消除社会中的分裂状况。”^①

争议最大的还是《教师手册》本身的内容和观点，特别是有关斯大林时期的“镇压”问题和斯大林历史作用的评价。

在同年8月俄罗斯《大城市》杂志召集了专门讨论《教师手册》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俄国史》10年级和11年级教科书作者A·列瓦多夫斯基当面批评菲利波夫对斯大林时期“镇压”问题的轻描淡写。他说：“有关政治犯和古拉格的情况，我们其实上是在与调查这些罪行有关的一章中才知道的。这就不显眼了。”^②而这不应当只有一行字。因为斯大林主义首先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的镇压……”菲利波夫在为自己立场辩护时特别说道：“我一直对苏联教科书里无休止的道德说教感到愤慨。我试图避免这种道德说教。既然人们指责我不道德，那可能是我做得过火了。我确实想要避免类似于‘我们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教训’那样的措辞，看来，我过于热心了。”^③

莫斯科的一位历史教师说，“学习历史应当使人民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但是这取决于怎样来实现这一点。如果想要隐瞒坏的东西并且只说国家实力和军事胜利，那么，我不敢肯定它是培养这种感情的最好方法。”^④

反对者还对《教师手册》中对斯大林评价的平衡和折中立场表示不满。他们指责作者“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和“把对俄国历史的一种观点强加于人”。^⑤

① Олег Кашин. В поисках “Краткого курса”. 3 Июля. 2007. http://www.ng.ru/ng_politics/2007-07-03/9_kurs.html.

② 在该书的第二章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赫鲁晓夫的倡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它将研究1930—1940年代对党和苏联活动家镇压的所有材料。”（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45—2006гг. С. 100.）

③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03. 08. 2007. <http://www.bg.ru/article/6887/>.

④ Shaun Walke, “Vladimir Putin rewrites Russia’s history books to promote patriotism”, 20 August 2007, <http://news.independent.co.uk/europe/article2878775.ece>.

⑤ Василий Печко. Война за историю. 6 июля 2007. <http://www.vz.ru/politics/2007/7/6/92778.html>.

史学家尼基塔·索科洛夫认为，书本中有关斯大林恐怖问题的内容是如此模糊，以至于“他的罪行被遮盖了”。他认为，“非常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想把我们带回到统一的思想中去。”^①

但作者菲利波夫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对一些人来说，斯大林是绝对邪恶的象征。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斯大林的活动，正面的东西要大于负面的东西。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含有神话的因素。但是，这种评价上的两极性在最近都难以被接受……”^②

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俄罗斯社会舆论调查机构也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展开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社会舆论在该问题上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根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2007年7月公布的调查数据，在回答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问题时，38%的被调查者认为，教材应当只有事实，而不要包括评价；40%的人认为，教材中应当有这些评价。

对于俄罗斯历史教学中的观点多元化问题，俄罗斯人的看法也是矛盾的。60%的人同意，在教材中应当阐述对某种事件、现象和人物的几种观点，而21%的人赞成只有一种观点。但是，在这里超过一半人（52%）认为，苏联时期的做法（所有学生都只有一种教材）比现在（教师可以从几种可能的教材中挑选一种）要好，同时，24%的人赞成现在的做法。

约有30%的俄罗斯人对历史课本采取如下立场：它们应当提出各种观点，但是，同时，这种多元化应当包含在单一的一种教材里。

当局的代表是否应当监督历史课本的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俄罗斯人（56%）持赞成态度。他们提出的基本的理由是：“没有当局”就会在教材中偷偷塞进某种“骗人的东西”；“为了避免歪曲历史”；“作者可能做些渲染”；“万一他们瞎写”（20%的人）。而有13%的俄罗斯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的根据是：当局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写历史”（4%）；最好由专业史学家来监督教

① Peter Finn, New Manuals Push A Putin's – Eye View In Russian Schools, July 20, 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7/19/AR2007071902707.html>.

② Игорь Елко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 что было с нами вчера. 11 Июля. 2007. <http://www.rg.ru/2007/07/11/istoriya.html>.

材内容(3%)。^①

就在社会和学术界围绕历史参考书展开争论的时候,俄罗斯立法机关已经开始就修改教育法的问题采取行动了。7月上旬,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分别通过和批准了含有教科书鉴定和出版规定的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7月24日,该法案由普京总统签署并从9月1日起生效。

原来的教育法只是对教材的鉴定和教材目录的编制予以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对被推荐或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材实施鉴定的方法,并在鉴定的基础上每年确定联邦教材书目”。修订后的教育法增加了有关教科书出版的严格规定。按照修正案,国家有权“确定挑选出版被准许在拥有国家委托并实施普通教育教学大纲的教育机构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参考书机构的方法;确定这些机构的名单”。^②也就是说,根据新的教育法,今后教科书从鉴定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将由国家(通过教育部)来确定。

从全俄社会与人文科学教师会议到普京就教科书问题的讲话,再到俄罗斯立法机关通过有关教育法的修正案,可以看出,争议中的《当代史教师手册》不仅仅是纯粹的历史教学问题,甚至也超出了历史科学的范围,它实际上涉及了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这样一个全民范围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教师手册》所引发的争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俄罗斯政府整顿和规范包括教育和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契机。政府正在努力建立一种作为重建俄罗斯强国地位思想基础的国家导向的意识形态,^③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在俄罗斯玩弄“颜色革命”的一种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教育部在普京总统讲话后闻风而动,在教科书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极

① Школьные учебни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 какими им быть. 19.07.2007. <http://bd.fom.ru/report/map/d072906>.

② 有关俄罗斯教育法修正案,可参见 <http://mon.gov.ru/dok/proj/4006/>。

③ 按照《社会学常识教师手册》作者波利亚科夫的说法,“我们正在建立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民族的世界观,俄罗斯人的世界观。”(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о встрече с делегатам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21.06.200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7/06/21/1702_type63376type63381type82634_135323.shtml.)

有针对性的措施。8月22日，教育部通过记者招待会向人们显示了俄政府在这方面的意图和决心。在俄通社—塔斯社新闻中心举办的题为“学生教科书内容问题：加强学术和方法学的监督”的记者招待会上，俄教育部国家教育政策与法律规范司司长И·卡利那等官员以介绍和问答的形式阐述了俄政府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立场和举措。择其要端是：

第一，俄罗斯历史教科书必须是百分之百的国产教科书，作为精神产品的历史教科书市场不容外国染指。卡利那指出，学生教科书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与其他任何产品不同，教科书内容应当百分之百属于国产。俄罗斯公民乘坐外国汽车或者利用进口部件组装汽车，这不是很好，但它完全可以允许。而教科书内容，作为培养俄罗斯公民的手段，绝对应是俄罗斯产品。卡利那说，“我们应当努力使我们教科书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自己写的——从课题规则到阐述历史事实。”卡利那解释说，“外国教科书只是对学习外语才是合适的，即便是这样，考虑到俄罗斯的特征和心理特点最好还是以本国的参考书为基础。”至于历史教科书，卡利那认为，“现在到处可以遇到外国人在历史阐述问题上的投机行为。”^①

第二，国家领导人要求教育部采取措施以提高所有教科书的质量，教育部已经或正在予以落实。卡利那说，总统属下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主席团作过有关的决定，在此基础上，由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的专门委员会来鉴定所有的教科书。从2008—2009学年起，只有那些通过了专门的鉴定机构（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严格挑选的书本才能列入联邦教科书目录。

俄罗斯科学院将检查教科书所阐述的科学事实与科学观点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将审查阐述事实的教学法。通过两院鉴定后，教科书才能获得“准

①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ошедшей 22 августа 2007 г. в пресс – центре ИТАР – ТАСС, http://pedsovet.org/mtree/task_viewlink/link_id_3862/Itemid_118/; Кремль реанимирует былую славу Сталина. 22.08.2007 http://newsru.com/world/22aug2007/president_print.html; 22 августа состоялась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 тему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23.08.2007. <http://www.mon.gov.ru/press/reliz/4070/>.

许”或“推荐”的印章。^①

第三，“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风格要像祖母讲故事那样亲切”。卡利那认为，历史教科书不同于学术研究。历史科学要揭示历史事件的所有方面，而教科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们对世界和国家的立场。教科书材料的挑选和阐述材料的方法应当是独特的。

他就此给记者作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您想要让您的儿子知道您的家庭史，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会建议他根据什么样的材料进行研究：按照您祖母和曾祖母的某些故事和回忆录还是按照地区民警或地区医生所做的记载您家庭所有过失和您所患疾病的冷漠记录进行研究？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和孙子根据亲人的叙述来研究我们的家庭史。因为甚至当我们讲述有关我们家庭的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讲是如何克服它们的，而不要津津乐道地去咀嚼这些问题……我非常希望我的孙子们按照这样一种教科书来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它不是以地区民警的逻辑而是以祖母和曾祖母的逻辑书写的，这种逻辑力争使我的孩子和孙子们形成对待家庭的积极立场，甚至如果在我的家庭中曾经有过痛苦的东西。”^②

同年12月，俄罗斯教育部部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2008—2009学年历史教科书“推荐”和“准许”（使用）目录。在《教师手册》基础上撰写的同类教科书（菲利波夫同丹尼洛夫和乌特金主编的《1945—2007年俄国史》11年级教科书），进入了联邦教科书“准许”（使用）目录。^③

① “推荐”或“准许”的区别是：如果教科书是新的并且是首次通过鉴定，那么教育部就为其盖上“准许”进入学校的印章。如果教科书通过试行并且第二次通过鉴定，就可获得“推荐”的印章。印章有效期为5年。

②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ошедшей 22 августа 2007 г. в пресс – центре ИТАР – ТАСС. http://pedsovet.org/mtree/task_viewlink/link_id_3862/Itemid_118/; 22 августа состоялась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 тему “Проблемы содержания школь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силение научного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ого контроля”. 23.08.2007. <http://www.mon.gov.ru/press/reliz/4070/>.

③ Данилов А. А., Уткин А. И., Филиппов А. В. России, 1945—2007 гг.: 11 кл.: учеб. для учащихся общеобразоват. Учреждений.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м.: Федеральные перечни 2008/2009 учебного года,此外,丘巴里扬主编并与丹尼洛夫等人编写的《俄国史》11年级用教科书,也被列入“准许”目录。<http://fp.edu.ru/asp/default>.

据报道，与《教师手册》相比，在新的教科书里，对斯大林镇压的赞颂性评价没有了，而“主权民主”变成了“俄罗斯的新方针”。但是，《教师手册》中的大部分评价都保留了。^①

2008—2009 年《1900—1945 年俄国现代史》

教师手册和教科书引起的争论

2008 年，由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6 年俄国史》教师手册引起的风波尚未平息，由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1900—1945 年俄国史》教师手册接踵而来。^② 该书实际上是菲利波夫主编的《1945—2008 年俄国史》的姊妹篇，它们在方法和观点方面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有不可分割的连贯性。该书出版之前，其《构想》部分于 2008 年 6 月先行刊登在教育出版社的网站上。鉴于《构想》部分非常全面和清晰地阐述了对几乎所有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兹择要援引如下：

该书《构想》部分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手册的指导思想：“本教科书的方法论基础是俄罗斯史学家的最新研究，他们从捍卫和加强国家主权、培养俄罗斯爱国公民的角度使对我国历史的评价具有现实意义。”“为此目的，特别注重确定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实质，不仅考虑到该时期的国内进程而且也考虑到国际上的挑战。”

“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这项原则是分析革命前时期事件的基础。”

关于 20 世纪初期俄国发展水平的问题。《构想》认为，“应当重新审议有关俄国落后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传统观点，因为这种‘落后’一直是非常相对的，并不涉及整个社会关系范围。俄国一直落后的地方是：那种不是俄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从外部借用的东西。通常认为俄国的落后首先就是俄国的社会关系与欧洲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而被寻找的原因是经济基础的‘落后’。这通常是一种杜

① В учебниках истории не будут восхвалять Сталина – только Путина. 25 декабря 2007. <http://www.newsru.com/russia/25dec2007/uchebnik.html>.

② 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撰，它没有注意到的是，有时俄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方面大大超过了那些欧洲国家（18 世纪的冶金工业，20 世纪的重工业），同时，俄国也保存着自己关系的特征。”

关于十月革命。《构想》把它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里进行考察，并且参照法国大革命，改称十月革命为俄国大革命。

关于“大恐怖”问题。《构想》分析了大恐怖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属于客观因素之列。对斯大林加快现代化方针的抵制和国家领导人担心局势失控，是‘大恐怖’的主要原因。作为唯一的政党，联共（布）是对当局‘反馈’的唯一渠道。结果，在社会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影响下，它成为形成各种思想和政治集团和派别的滋生地，丧失了自己的内聚力。这不仅使斯大林面临失去领导地位而且面临人身危险的威胁 [联共（布）十七大投票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对总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移居国外的侨民集团的活动加深了这些担忧。苏联领导人仔细研究了在其他国家（西班牙是最鲜明的例子）利用‘第五纵队’的外部力量的经验。此外，斯大林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那些在内战中开始自己军事生涯的人都是托洛茨基的‘门徒’。战前，在能力和忠诚之间，斯大林选择的是军队指挥员和官僚的忠诚。”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于‘大恐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它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与实践中的理论特征有关，另一方面，它与斯大林的个性有关。”

《构想》对于斯大林个人在大恐怖中的作用是这样分析的：“……重要的是揭示，斯大林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行事的，作为制度的保卫者，作为把国家改造为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管理的工业社会的坚定支持者，作为面临着不久的将来就要爆发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作为管理者）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

当斯大林知道坚如磐石的社会模式形成了并且对当局的威胁消除后，大恐怖就停止了。这是到 1938 年夏天的时候。

但是，很快大恐怖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的了。贝利亚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后，即便恐怖已不是原来的那样规模，它已经是为工业发展的任务服务了：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有计划地逮捕了实现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国防等任务所需要的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恐怖变成了解决国民经济任务的实用主义工具。虽然镇压是为了震慑那些工作懒散的人，那当然也不能证明这是有道理的。”

《构想》认为：“在教科书里无疑应当评价‘大恐怖’年代的镇压规模。但

是，为此就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以为，如果这里有一个仅包括那些被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人的公式，这才是正确的。当所有的人并且不止一次地（包括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那些被开除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加进镇压牺牲者名单里的时候，这就可以避免利用这个题目进行投机。那些不懂得定义的人，就是根据这么大的数字来谈论牺牲者的数量。”[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里，此段话修改为：“要评价大恐怖年代镇压的规模无疑是很困难的。首先应当明确确定，我们所说的被镇压者指的是哪些人。我认为，如果是把仅仅包括那些被枪决者和因政治原因而获刑期者的数字作为基础，那才是正确的。当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以及那些被开除出共青团和共产党的人等都被列入（而且不止一次）镇压牺牲者的行列时，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避免利用该题目进行投机。”^①]

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问题。《构想》认为，批评者谴责该条约是“不道德的”，但是，这种观点很容易被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操纵其他国家命运的事例所驳倒：“在评价同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时，必须强调，该条约的替代性选择可能是德国同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而这实际上意味着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苏德条约的批评者谴责该条约决定秘密附件中提及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是‘不道德’的，有关‘民主的’英国和法国也同德国一起（这就是慕尼黑条约等）操纵弱小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事例非常容易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文件（即条约）的意义是在另一方面，即，苏联同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参与决定欧洲的命运。”

关于卡廷森林事件问题。《构想》认为，“……鉴于卡廷问题的政治敏锐性，不是去为杀害波兰战俘去辩护，应当指出，从斯大林角度看，卡廷森林枪决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政治合理性的问题，也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

^① Данилов А. А. ,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 19.

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而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不是苏俄而是波兰。”^①

从上面详细的《构想》引述中可以看出，《构想》在苏联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和对外关系问题上都为当局进行了精心的辩护。如果对照普京 2007 年在全俄教师代表会议上有关历史评价和教科书要求的讲话，应当说，这本教师手册，同先于其出版的下卷（《1945—2006 年俄国史》教师手册）一起，都很好地执行了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它们都堪称俄罗斯新的官方史学的代表。

正因为如此，它们遭到非官方史学的反对也是必然的。俄罗斯《新闻时报》在 2008 年 8 月 25 日和 9 月 9 日连续刊登文章对教师手册的《构想》进行评论。8 月 25 日，一篇题为《合理的杀人管理：新的历史观念——斯大林恐怖是“发展的工具”》（作者 A·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构想》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伯恩斯坦上来就对《构想》所说的“期望学生的关注重点集中于解释当局行动的动机和逻辑”表示异议：“建议学习的历史首先是当局的历史。那里没有人的历史。只有国家的目标和手段。虽然没有出现‘辩护’一词，但是在许多方面这正是为手段进行辩护的历史。因为难以想象，有哪个当局会没有解释和证明自己政策的动机，哪个当局不是根据自己的逻辑行事的。”

关于《构想》中有关杀害被俘波兰军官的卡廷森林事件问题，伯恩斯坦认为《构想》实际上使用的是“公正的”历史报应的观念。

伯恩斯坦对《构想》有关“大恐怖”的论述最为不满。他写道：如果说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教科书里对于斯大林镇压的历史，或者是简单地隐瞒，或者是被说成是对苏共中央总路线的某种“偏离”，那么，我们的设计者（作者——引注）则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消灭自己几百万公民的行为寻找“合理的”辩护。

对于《构想》中提出的“被镇压者”的公式，伯恩斯坦提出如下的质疑：“如果按照这样的‘公式’，那么，任何死于集中营或放逐时期的人都不是镇压的牺牲者。这里，我想提醒未来教科书的作者和教育出版社，由俄罗斯联邦总统于 1991 年 10 月 18 日签署的第 1761—1 号法令《关于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

^① О концепции курс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http://prosv.ru/umk/ist-obsh/info.aspx?ob_no=15378。《构想》部分在正式载入教师手册时作了局部修改。修改后内容可见：Введение, О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гг. Книга для учите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С. 5—25.

法令》还没有被谁废除。法令第一条明确规定：政治犯、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者、被剥夺公民资格者、特殊移民、被流放者……都是镇压的主体。这样，教科书《构想》提出自己的不同于法律解释和正式通过的被镇压者的计算方法的公式，不仅践踏了道义标准，而且也与现行法律直接相悖。”^①

伯恩斯坦写道：“我们要指出的是，打算大规模地兜售这些明显违法的解释，把它们提供给教师作为指针，提供给中学生作为知识。《构想》的基本观点还有作者的讲话，都不承认苏联存在集权主义的事实。虽然有关镇压的法律白纸黑字写道：‘在苏联政权时期，几百万人成为集权主义国家专横的牺牲者……’”

最后伯恩斯坦以嘲讽的口吻说，“去年，菲利波夫的俄国历史教科书已经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因为它试图缩小斯大林镇压的规模和对斯大林个人的独特解释（‘有效的管理者’）。一年过去了。有效的管理者成为‘成功的管理者’。而大规模恐怖则从‘合理的’角度予以解释。”^②

教师手册作者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当然无法接受如此严厉的批评。2008年9月9日，他们在《新闻时报》发表反驳和解释文章：“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观念作者解释自己的立场”。

作者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第一个问题是，“在苏联农村不存在有组织的饥荒”。《构想》里明确地写道，30年代初期的饥荒“不是”当局“引起的”，尤其不是针对某些民族的。已经作过相关的解释。我们现在仍坚持这一立场。如果我们的对手仿效乌克兰当局认为，饥荒是由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就是为了对乌克兰人民（或者就如有时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整个苏联人民）实行种族灭绝，那这是他个人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乌克兰，有人把苏联各族人民的共同灾难说成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尤申科总统试图把它变成刑事犯罪。但是，请原谅，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里需要这种观点吗？现在不能给那些极端狂热者提供有利于饥荒是由上面组织的结论的论据。

① 在正式出版的教师手册中，作者已对有关“被镇压者”的定义进行了修改。

② Анатолий Берштейн. Рациона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бийствами: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 сталинский террор оказался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развития”. 25.08.2008. <http://www.vremya.ru/2008/154/51/211168.html>.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恐怖”。既然作者似乎没有完全明白文件里所讲的是什么，我们就来解释一下。在历史书籍里，“大恐怖”绝非是指整个苏联时期，甚至也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1月的那14个月的时间，这一时期内的高潮就是以政治方面的理由所执行的逮捕和枪决。那时逮捕了约160万人，其中包括被判处死刑的68.2万人。正是这一时期显示出苏联历史上没有先例的镇压的大规模性和残酷性。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为何“大恐怖”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我们是建议教师们考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在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家曾准备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取消了对国内相当一部分公民选举权的限制。这不仅引起了一些选民的愤怒反应（譬如，在科洛姆纳的一个企业里，仅仅推选代表候选人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就进行了好几天），而且还引起了当局（特别是地方当局）对当局反对派可能当选代表的严重不安。大量的信件从地方寄送到中央，在这些信函中（当地的）当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都通报了有关新的“敌人”在为选举进行准备。这是否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这是修辞性反问。这里考虑了西班牙“第五纵队”的经验和挑唆性的“军人案件”。对所有这些假设性的“敌人”和整个社会集团进行了打击。这是“先发制人的”打击。作者们对此已有论述。这一解释哪里有为当时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辩护了？也许我们的对手认为，任何解释的试图都是辩护。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思路感到惊奇。按照伯恩斯坦的话来判断，似乎“设计者（即教师手册作者——引注）实际上是在为当局杀害自己几百万同胞寻找合理的辩护”，他实际是认为，任何解释都是辩护，但是我们却有点不太相信。

作者在这里解释了镇压的规模问题：关于镇压的规模。广泛流行的宣传方法是，把各种被镇压者（不仅是死刑犯和死于监狱者，而且是被逮捕者、被流放者、被驱逐者和被遣送者）的数量同在伟大卫国战争或在纳粹集中营里死亡者数量进行比较。宣传者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的观点：“较之德国纳粹分子，俄国共产党人杀死了更多的人”，“斯大林比希特勒还坏”等，直到“俄罗斯是对和平的威胁”。我们反对此类欺骗方法，我们要说的是，进行对比的必须是死亡者的数量。这里指的是，在教科书里不应有那些未经核实和不经科学证实的伤亡数字，而应有的是那些能被确实证明的数字。在相同的教科书里列举了所有种类的被镇压者，并且说明我们几百万同胞的这种情况。学生们在教科书里应当看到的

正是这些数字，而不是前些年传统的和令人震惊的“发现”——有关在镇压过程中几乎有1.2亿人损失！

第三个问题，关于卡廷森林事件。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波兰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的问题。这在《构想》里可以看出。即使战前的镇压是凶狠的，战争是残酷的，大规模地枪决战俘对于苏联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事件。对手在哪里看到了为杀害这些不幸者进行辩护或提出有关“公正的历史报复”的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是伯恩斯坦先生的说法）须知，我们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试图论述当局行为的动机。从斯大林方面来说，枪决被俘的波兰人就是对1920年战争后被波兰俘虏的数万红军战士死亡的回报。在教科书里有关于这种情况的文件。难道学生们无须知道这种立场？而是否同意这种立场，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尤其是这里讲的是中学教科书，学生们必须形成自己的观点。

作者最后要求：不要匆忙进行评价和作出结论，至少在教科书出版之前。请耐心，不要等很长时间。^①

不久，以丹尼洛夫和菲利波夫主编的教师手册为蓝本和指导的《1900—1945年俄国史》教科书正式出版。^② 教科书照例也引起了争论。一年前对教师手册《构想》进行批评的《新闻时报》又刊文对教科书进行了评论。А·伯恩斯坦和Д·卡尔采夫于2009年12月26日发表了“为目的辩护”的文章。

文章认为，“必须承认，教科书里实际上并没有令人极为厌恶的意想不到的内容。可是，去年的《构想》实际上全部引入了教学参考书。主要是，作者在教科书里虽然缓和了措辞，但小心地和坚定地保留了自己特别的立场。事情不仅仅在于，‘集权主义’的术语没有出现在《构想》里，也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无论是在正文里还是在书后面的专门词汇里。作者只是说，到30年代末，在国内建成的是某种‘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工业社会的特殊变体’。事情就在于，他们总体上不认为苏联历史具有集权主义的特征。”

① Ждать осталось недолго, потерпите: Авторы концепции учебник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объясняют свою позицию. 09. 09. 2008. <http://www.vremya.ru/print/212216.html>. 关于对《构想》争论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见: Обсуждение нов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истории. <http://www.vremya.ru/2008/185/13/214254.html>.

② Данилов А. А., Филиппов А. В. 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00—1945 гг. Учебник для 11 класс.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8.

文章指出，“总体上，有关我们祖国的过去‘一切正常’的观点，就如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教科书。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政治体制的严酷》一章里谈到了镇压，但是作者故意无视斯大林主义的集权—恐怖的实质，似乎竭力不‘伤害’学生们。”

文章批评说：“教科书的历史观念的第二根支柱是，俄国的过去没有可供选择的替代。根据作者的看法，结果是，不仅历史上没有假定式，而且换一种其他方式国家简直就不能生存了。当然，可以发现，《构想》公布一年后，作者最终想起：30年代苏联的‘巨大成就’是付出了自己代价的，这种代价是以几百万人的生命来计算的。提到了‘全人类的价值观’。尤其是，作者多次声明，他们不为政权的罪行进行辩护。但是，一旦谈到这一点时，立刻就直接或间接地必定出现‘但是’一词。从后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所发生的事情从国家合理性角度看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动员性政治’（这是教科书作者使用的一个术语）自然就包含着恐怖。有什么办法呢？必须解决对于国家来说的极其重要的宏大任务。”

文章表示非常担心的是：“总的来说，这比去年《构想》里所阐述的方法更为危险，在《构想》里，对‘问题的代价’是低调地缄默不语。须知，就是以这种方式唆使学生们：‘代价’，甚至如果这是几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忽视的。目的不负手段，而需要的时候史学家们就要为目的辩护。”

接着文章严厉批评不惜代价的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建设：“可能从现在的市场标准的角度来评价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奇迹’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德国战前的工业化紧急纲领和美国罗斯福时期大规模反危机计划，甚至都远没有伴随如此规模地使用暴力和如此数量的牺牲。投入到建设按照任何经济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运河和投入到修建什么地方都不通的铁路方面的几十万人的生命，那是对集权主义制度经济的真正判决。战争头一两年重建乌拉尔地区的工业基地的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它的功绩，它只是由于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潮才有可能。苏联经济现代化或为战争进行准备用来解释大恐怖是无力的根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大恐怖进行辩护。”

最后，文章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讲到学校教科书的时候，能否放弃对过去的道德评价而以‘有效性’的论断取代它？”“史学家应当同自己的

人民同欢喜共悲哀。他不应当被偏见所支配，歪曲事实，夸大幸福，在叙述中缩小灾难。他应当首先讲真话；但是他可以甚至应当充满悲伤地描述自己人民历史上所有不快和耻辱的事情，同样也应当欢欣鼓舞叙述有关引以为荣的事情、有关胜利和繁荣的事情。这样，或许他就是一个本国的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家而不首先是一个史学家。”^①

* * * * *

争论仍在继续。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从过去苏联时期表面上的极端一致到现在俄罗斯社会的众说纷纭甚至极端对立，实际上它反映了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在如何评判自己过去和确定自己未来问题上的困惑和迷失，而这一切与苏联体制70年统治所遗留的各种问题相关，也与新生后的俄罗斯艰难曲折的发展有关。

所以，即便俄罗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规定历史教学书籍的使用，包含在教科书里的作为认知和观念形态的历史问题也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和平息。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历史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原来的苏联体制向现今的俄罗斯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矛盾以及人们对这些矛盾不同认识的反映，同时，它也与俄罗斯国内不同力量的政治斗争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矛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就本质而言，俄罗斯社会各界在认知和解读本国历史时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论，那是俄罗斯社会发展尚未达到充分完善阶段的结果。只有俄罗斯经济、政治和文化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趋于缓和，社会各界对历史问题才会有更多的共识。而从俄罗斯现在的发展状况来看，这应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科书问题作为俄罗斯社会的一个“顽疾”将会不时地爆发出来。

但是，真相愈说愈清，真理越辩越明。从俄罗斯社会发展来说，历史教科书争论绝对有益无害。人们相信并且期望，通过争论和辩论，俄罗斯人对于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将更为理智和清醒。

^① Анатолий Берштейн, Дмитрий Карцев. Оправдание цели. 26. 10. 2009. <http://www.vremya.ru/2009/197/4/240268.html>.

100. 《莫洛托夫访谈录》说明了什么问题？

曾彦修

引子

《莫洛托夫访谈录》是一本 600 多页的厚书（1991 年莫斯科出版，军科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它是 1969—1986 年 17 年间，一个访问者同莫洛托夫（1890—1986 年）进行了 140 次（实为 139 次）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访问者为丘耶夫，似是一个苏联历史学教授。能在 17 年间不间断地对莫洛托夫进行 139 次访问，大约也不会老是意见相左的吧。莫洛托夫时年已在 80 岁至 96 岁之间，年事已高使他不能作系统的谈话，故所谈都很零碎，一事多次谈到，一次谈几句，论点很分散，颇难读。加以所谈内容又十分僵化、顽固，像个化石人，多不可理喻，不能不使读者反感。凡此，均使人对此书有难于卒读之感。所以有些人就很讨厌看此书。但是该书却格外重要，我们不能不感谢它，说了不少真实的事情，要是别人说，就叫人有点不会相信了。

我以老病之躯硬把此书啃了下去，而且越看越觉得此书的重要，简直是一本相当全面的最佳反面教材。读了此书以后，你就会明白，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究竟是怎么治国的，自然也就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国家能长得了吗？

苏联为什么会垮台，有些同志至今只会揪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放。其实，赫鲁晓夫在内政上只做了很局部的平反（凡因“反对派”而成为“外国间谍”的被处决者，并未平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此已表示后悔），在经济上

的斯大林模式并未有多少松动，反而把斯大林时期有些不正确之处更加发展。例如，忙于在城乡一律实行“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化，就算进入共产主义之类。以后的几代领导人也从未改弦更张，以至经济上越搞越糟。戈尔巴乔夫，我戏译为“锅儿耙焦糊”，即满锅的粃粃已经焦糊了，还救得了吗？——何况他的办法又不对头。现在有些报刊喜欢登载海外奇谈，硬说戈尔巴乔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是把斯大林上世纪30年代那套办法又搬出来了。

中国有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联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的冰是怎么冻起来的，冻成了什么样子，光靠理论书是说不清的，而且还会遭到“大反”、“砍旗”之类的责备与处理。感谢莫洛托夫这位革命老前辈，他几乎把很多重大问题都来了个现身说法。这个人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他不但不会“大反”，而且至死把斯大林抬到天上，不管多么强词夺理，他都无所谓。他特别强调的是“肃反”不彻底，即杀人还远远不够。

因此，从莫洛托夫的谈话录来看苏联的失误之处，就特别权威，特别具体，特别真实，这决不是任何其他理论探讨书与回忆录等所能代替的。可以说苏联最痛苦的失败与教训，大体上都具体化到莫洛托夫的谈话这块巨大无比的花岗岩中了。莫洛托夫完全不是把它们引以为戒，而是把它们作为无比成就来夸耀的。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套用两句：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你只要抱着吸取教训的目的去看，莫洛托夫的这本厚书就不但看得下去，而且你会感到：哎哟，原来你们的革命是这样革的呀！行吗？

绝对的个人专制独裁；对人民的超级恐怖统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三者，我以为大体上可说是他们致命的绝症。简言之，用四个字来概括也可以，就是：政酷民贫！《访谈录》在这些方面提供的直接间接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因此，这本书的用处实在很大，千万不宜等闲视之。《赫鲁晓夫言论集》，作为供批判用，我们在内部出版了一大堆，其实远没有莫洛托夫这本访谈录重要。我这篇长文，就算是替有些同志做个临时的书报秘书吧。（《访谈录》中的重要问题还多得很，例如苏德战争问题等特大问题，内容太多太大，谬论更怪，但限于篇幅，只好从略了。）

一个从未做过第二把手的“第二把手”

在斯大林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政治局委员为首的所谓“右派”彻底打倒以后，原来的总理李可夫被撤职了，莫洛托夫于1930年继任总理职务。但莫的声望、地位，比布哈林差得很远，比李可夫差得也很远，也比不上另外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威望。但莫氏有对斯大林的愚忠，在这一点上，恐怕就只有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二人可以同他相比了。

其实，在个人专制下，所谓“第二把手”之说，不过是新闻记者不科学的用语罢了，实际上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这种地位的人的。因为，在个人绝对专制下，只有君臣之分，无所谓第二、第三之说。群臣如一盘棋，由领袖自由摆弄。凡看不透此点的人无不大吃其亏，几乎全都送命。

莫洛托夫晚年，在靠养老金过活的时候，还沉湎于自命“第二把手”的往昔峥嵘，十分可笑。这无非是夸他在1930年就任政府总理以前，有几年在书记处里，他的排名仅在斯大林之后，就自以为是第二书记，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了。其实那时斯大林早已有一个无所不管的内部办公室。（它的负责人早期有两三个，现在已不为人知道了，第一个叫托弗斯图哈，被称为脑如电脑，精明能干，权大无比，后病故善终。马林科夫以一个小孩子于1925年就进入这个办公室了，什么实际工作也未做过，开始是一个不重要的人，但是权力日益膨胀，特别是协助斯大林控制党务、干部与“肃反”有大功，终被斯大林定为继承人。）党的中央书记处就算是军机处吧，但后面还有个更重要的、非正式的，但实权更大的、由斯大林直接控制的内部办公室。

即使莫洛托夫做过所谓“第二书记”吧，但自1930年12月莫洛托夫挂上总理名义以后，他这个第二把手的地位就正式没有了。此后由卡冈诺维奇担任此职。莫洛托夫自己也说：“我被任命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我便要求解除我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一职……斯大林说：‘那好吧。’于是便由卡冈诺维奇担任第二书记。总之，卡冈诺维奇在中央书记处成了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我已到人民委员会去了。”（《莫洛托夫访谈录》第313—314页。按：本文以下的引文，凡引自该书的，均省略书名。）要说在斯大林手下，有三四年时间曾出现过一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不是莫洛托

夫，而是卡冈诺维奇。1934年苏共十七大后，就大体上由日丹诺夫在党内以更明确的方式来掌握这个位置达十三四年之久了。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45个国家代表与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会议。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图为会议开幕时英、美、苏、中四国首席代表在一起交谈。左起：艾登、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宋子文。（新华社稿）

至于莫洛托夫，在苏联领导人中，似乎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始终保留了他在新闻版面上第二名的地位。但在1949年斯大林70寿辰发表的全体政治局委员联名祝词中，马林科夫就正式名列首位，莫洛托夫在等待被捕的形势下仍摆在第二名的位置上。二战后，莫洛托夫挂着部长会议副主席之名，实际上只担任外长一职。而在斯大林时期，外长一职并不重要，因为对外大权仅能掌握在斯大林一人手里。所以，实际上莫洛托夫只能以冷战骑士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起不了大作用。而且他的外长职务，在1949年3月，在他的夫人被捕之后立即被公开撤掉。这时莫洛托夫还不到60岁（莫洛托夫素以身体健壮著称），而由一个大镇压的法理与法律的首席制造者维辛斯基担任外长了。维辛斯基是有名的雄辩家，

打起冷战来，当然比莫洛托夫更有用。此后直到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之前，莫洛托夫事实上处于赋闲状态，挂了个一生同他工作无关的、消闲无权的监察部长之职，唯有等待被捕而已。但莫洛托夫的名字在新闻版面上出现时仍然始终是第二名。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即 1953 年 1 月时，莫洛托夫根本不知道也未参加的事情，报上登出来他竟然还是参加者的第二名！莫洛托夫说：“1953 年 1 月有个……我自己也看了这张报，但实际上当时谁也没有请我出席过任何活动了，因为斯大林那时已公开讲我是右派。”（第 549—550 页）请读者想想，在斯大林的眼中，莫洛托夫这样的人还是右派，而斯大林要的只是“左派”，那么，斯大林要的“左派”是比莫洛托夫还要“左”多少倍才行呢？

莫洛托夫非常清楚，他很多年都处在被窃听中，在家中也只能讲几句官话，准备克格勃上报用的。几十年要在家里滴水不漏地不讲半句斯大林不喜欢听的话而生活下去，这是多么痛苦的事！莫洛托夫说，“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受人窃听，是肃反人员告诉我的……他们直言不讳提醒我说话小心点”，“我一向清楚，了如指掌。当然，也就一向提心吊胆过日子”。但是，莫洛托夫反而替斯大林解释，说斯大林这样做是必要的。“……斯大林偏偏有时候很多疑。但他不能不多疑，不能，不能……如果你收到情报，说是……难就难在这里，是啊，难。”（第 377 页）这就是说，斯大林窃听全国任何人都是千该万该的，因为人人都可能是外国特务！说到这里，想起了苏联常唱的一首歌中的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多大的讽刺啊！同时也说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的几十年中，在全国的专政机器中甚至在广大人民中早已不知道什么叫法治、人权这些概念了。莫洛托夫本人比谁都清楚，斯大林在最后几年是根本不信任他的。斯大林终生相对信任的可能只有马林科夫一人，所以才决定把大权交给他（日丹诺夫临终前，看来在对遗传学的毁灭性的批判上同斯大林大概是有大分歧了）。莫洛托夫自述，他的夫人波琳娜·谢米诺夫娜于 1949 年 2 月被捕，罪名吓死人，莫说：“1949 年逮捕她时，罪状是她图谋行刺斯大林。”斯还命令莫洛托夫与妻子离婚，斯大林对莫洛托夫说：“你应该与妻子离婚！”“……1948 年底我们离婚了。1949 年 2 月她被捕。”（第 559 页）斯大林亲自逼令莫洛托夫离婚一事，要不是莫洛托夫说的，又一定会说是反革命造谣了！

莫洛托夫还说明，1940 年苏共十八次代表会议（注意：是会议，不是大会）上曾开除过一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莫夫人波琳娜作为候补中委被开除了

(按：这次李维诺夫的中央委员也被开除了，开除的一批人，当时延安每日新闻上全登了)，出面说明开除理由的是日丹诺夫。(日丹诺夫只管意识形态?!)莫洛托夫说：“好像日丹诺夫就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说她那个单位……出了破坏分子……那里钻进了德国间谍。”(第559页)莫夫人的单位是专管化妆品的，德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要去破坏苏联的化妆品生产?!为什么这个问题要由日丹诺夫这样的“第二号人物”出来说明呢?一来开除的人多，二来日丹诺夫出来说明，就代表斯大林，不容再发言了。

1949年2月正式逮捕波琳娜，这明明是一个小突破口，主要问题当然还在后面。刺杀斯大林!这种事可能是一个老年妇女主谋的吗?后面必然有一群大人物在主持操纵，第一个当然就只能是莫洛托夫了，所以莫洛托夫才立刻被公开免职。波琳娜不过是一条小泥鳅，后面还有一群大鲨鱼呢!

本书的访问者怀疑是波琳娜的被捕影响了莫洛托夫，但莫洛托夫十分清楚，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他影响了他的夫人。“是不是受波琳娜牵连?”“她受我的牵连。”“监狱里一次又一次地提审她，逼她供认我并不真心拥护党的路线。我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第550页)这说明对莫洛托夫下手之事已迫在眉睫了。这不是猜测，公开爆发是在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时。这次中央工作总结报告是马林科夫作的，继承人算是揭晓了。斯大林在大会上只讲了几句欢迎外国代表的应酬话。大会搞了个25人的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团候补委员11人，另有书记处成员10人，成了一个近50人的领导“核心”。不知斯大林打的什么主意，可能是实际上即取消了任何集体领导，以便马林科夫个人独裁行事。斯大林却又在25人主席团委员中，指定了10个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把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开除了。大会闭幕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集中痛骂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讲话共两个小时，骂他们二人占了一大半。莫洛托夫只在访谈录中简单提了此事一下。西蒙诺夫是参加了这次会的，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代人的见证》)中详述了此事。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估计死期到了，竟不顾一切当场起立为自己辩护。莫洛托夫也自揣，斯大林如再活一二年，他必死无疑。莫说：“我想，如果他(指斯大林——引者注)再活上一两年，我难以保住性命。”(第336页)莫恐怕是太乐观了一点。克里姆林宫大批医学家被捕和判决已在眼前。(有些书说原定于宣布斯大林死讯的1953年3月5日那天开始公审。)判决医生们之前，远胜于30年代的12级台风似的宣传攻势早已展开，一旦开庭，难道真为了只审

判这几个医生？医生，引子而已，不知道当场又要创造出多少个上层人物的“间谍中心”出来。谁能肯定这当中没有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人物呢？

但莫洛托夫的头脑是十分异于常人的（莫洛托夫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苏联类似的人还多得不可胜数），即使无缘无故地被斯大林把他作为“外国间谍”杀了，他似乎也是死得其所。莫洛托夫说：“尽管这类事（指被捕、被杀等——引者注）已出现在我身边，尽管他再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他完成的艰巨任务是我们任何人，是当时党内任何人都担负不起的。”特别无法理解的，是莫洛托夫竟认为被领袖作为“外国间谍”处死，同死于沙皇屠刀之下（按：沙皇是基本上不屠杀政治犯的），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很光荣似的。有一个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莫洛托夫的人向莫提出了这个问题：

“您曾设想过您的处境：一个跟党走过漫长道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身心的人，忽然间竟被关进牢笼！”

“那又有什么呢？噢，上帝！我是从革命观点来看这一切的”，莫洛托夫很镇静地回答，“这些年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我不止一次死里逃生。”

丘耶夫指出，这次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这个人，“客气点说，既不同情斯大林，也不同情莫洛托夫”。这个人还说，“莫洛托夫竟然如此，那斯大林又该是什么样呢……”（第563、564页）这就是说，莫洛托夫的铁石心肠既然是如此，那么，斯大林又该是怎么样呢？

所以，切勿以为莫洛托夫是党性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他坚持的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是绝不相容的。

莫洛托夫至死都百分之百地支持斯大林

明知斯大林就要对他下手了，也丝毫不改变对斯大林的愚忠。为了抬高斯大林，莫洛托夫甚至不惜诽谤列宁。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虽在个别词句中把列宁捧到天上，他说过一次“除了依靠列宁，我们别无所倚”（第575页）。这话也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可究竟还是推崇列宁的，但从全书来看，他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莫洛托夫说列宁是神经质的，他说，“列宁的晚年是复杂的，神经质”（第289页）。这问题不重要，列宁晚年多重病，情绪、性格有时不正常，不可避免，可以不论。但他甚至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

(第286页)。这就纯粹是为斯大林尽杀列宁友人作纯诬蔑性的造谣了。

莫洛托夫强调，列宁信任斯大林，他说：“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成为更坚强的政治家。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可以信赖的最可靠的人，但也批评过他。”(第289页)又说：“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把他当成自己在中央的支柱。他信任斯大林。”(第231页)

莫洛托夫比谁都清楚，他是在硬撑，全然不符合史实。

有名的列宁“遗嘱”问题，苏方已全部公布，由中国人编辑的、1987年出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总标题下，发表了列宁口授的1922年12月23日、24日、25日、26日、29日及1923年1月4日等6次信件记录稿。其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的，是1922年12月24日、25日、1923年1月4日的三次口授信。信中涉及俄共(布)中央领导人共6人，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作者按：6人中的斯大林后来把其他5人都杀了。)列宁对6人都有批评，但批评最重的是对斯大林，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两人有突出的赞美，其中对托洛茨基的赞美最高，批评也最轻；对斯大林则没有什么赞美，只有不满与担心。

第一，对托洛茨基，列宁说：“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但是他又过于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①看来，是指托氏有点命令主义。

第二，对斯大林，曾和托洛茨基并列被列宁称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之一，但列宁在“遗嘱”中多处提出了党的最大的“分裂”危险问题。列宁在12月24日口授中说：“现时中央两位杰出的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会突然来临的。”^②

斯大林的毛病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③过了10天以后，即1923年1月4日，列宁专对斯大林又加了大段语气很重的口授：

① 1922年12月24日口授，《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这些，莫洛托夫全知道，因为列宁的这些“遗嘱”在列宁逝世后不久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分小组宣读过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为了集中力量反对托洛茨基，他们彻底违背了列宁那么严重的警告，二人耍了手腕，硬把斯大林抬过了关，继续担任总书记，同时也为未来的大镇压奠定了基础。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列宁的态度很明显，他是要保托洛茨基，而公开要斯大林下台。白纸黑字，谁能颠倒过来！

我以为“遗嘱”有两大用意：首先是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其次，列宁指出了6个人的缺点，由于这些人声望特高，斯大林之外的5个人也都有某种可能继任总书记，列宁的“遗嘱”实际上就是认为斯大林连同这5个人也都不适于任总书记。一般很难明白列宁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皮达可夫。莫洛托夫在另一处偶然提及皮达可夫时，有这么几句话，他说：“皮达可夫是一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在所有年轻人当中，似乎列宁只看中了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而很少看得起我们。”（第156页）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同斯大林之间是做了交易的。大会前即商妥，列宁逝世后不久的俄共（布）十三大上的中央工作总报告不由斯大林作，而由季诺维也夫作。于是，季诺维也夫隐隐然代替了列宁似的。再加上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季诺维也夫便一直是它的主席，这当然也是列宁的意见。所以，斯大林这回非退让一下不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可能还以为是自己得到了胜利呢。

在列宁、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莫洛托夫是什么都清楚的，但为了无条件维护斯大林，他不惜信口开河地乱说一通。他甚至同列宁大唱反调，全力歌颂斯大林的粗鲁，他说：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斯大林的粗鲁，当然，他太出格了，非常生硬。然而，如果没有这生硬态度（引者按：应当读为‘大镇压’），我倒不知道能有多少好处。我想，这种生硬是必要的，否则犹豫不决、左右摇摆的人会更多。”（第359页）

莫洛托夫公然不顾白纸黑字的文献资料，说列宁“最肯定”斯大林而最警惕托洛茨基的“非常危险”性。他说：

“列宁遗嘱当然基本上对斯大林是有利的——纵观各种评价，斯大林是最受肯定的（!!!——引者）……他想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非常危险的人，所以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列——好吧，你们挑一个吧。关于斯大林，他公开的评价较少，但只有正面的。到后期他也说过斯大林的某些缺点。”（第359页）

事实上，在列宁最后两三年，在苏联成立的问题上，他反对斯大林的以俄罗斯为全联盟名称的大俄罗斯主义；反对斯大林关于南高加索三国无权以独立共和国名义加入苏联；对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以及坚决反对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等，列宁的主要批评对象都是斯大林，大量文献尚在。

莫洛托夫还对斯大林的缺点采取回避的态度。当访问者问及斯大林有哪些缺点时，莫回答说：“‘缺点？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很喜欢他，我不愿意回忆他的短处。”（第364页）在别处，莫洛托夫又强调大家都怕斯大林，甚至说这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一切都依靠斯大林。没有了斯大林，也就没有了苏联。莫说：“只要把斯大林杀了，再加上二三个人，一切就可能全完了。”（第361页）原来苏联的一亿几千万人民，都是靠了斯大林的保佑才能活命的。至于其他的二三个人是谁，莫洛托夫没有说，照全书看，当然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三剑客了。其实斯大林下面的真正掌权者是另外的三剑客，即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贝利亚。

看起来，莫洛托夫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世事似乎什么也不知道。他乐观得很，但是也主观得出奇，他信心十足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在俄国史上会得以恢复名誉，莫斯科将建一个斯大林博物馆。一定会这样！人们一定会提出这个要求。”（第364页）不过，莫洛托夫也还是说了一点对于斯大林神话不那么很美妙的东西，后文另说。

莫洛托夫至死拥护并完全肯定他亲自参加的历次大镇压

莫洛托夫明确认为大镇压不需要任何证据，他认为大镇压还很不彻底，列宁的朋友都很可疑，赫鲁晓夫、米高扬、李维诺夫等人早就该杀了。他至死反对给任何人平反，也反对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任何人。

苏联大镇压的首要对象是老干部、老领导人，尤其是同列宁有过交往的人们。为了说明这么做的正确，莫洛托夫公开说：“列宁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第286页）列宁的朋友既然全是坏人，当然就该都杀了。为了拥护斯大林，莫洛托夫不惜如此诬蔑列宁，诬蔑党，诬蔑历史！

莫洛托夫也承认，肃来肃去的结果，老布尔什维克已经所剩无几了。他说：“我们党排除万难，坚持了既定路线，粉碎了托派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虽说有缺点，虽说可靠的共产党人所剩无几，但……（下面意指斯大林和莫这样的人留下了，就取得了一切胜利）。”（第640页）这就是说：老党员几乎全杀了，所剩无几。在莫洛托夫说这些话时，他既不惭愧，也不悲伤。难道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应该是这样以杀尽自己的同志为职责的人吗？

但是，在莫洛托夫看来，苏联的大屠杀还远远不够。他明白指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没有被杀掉，就证明“大清洗”很不彻底。他尤其痛恨李维诺夫，说李维诺夫未被杀，纯属偶然，其实早该杀了。（莫洛托夫竟未看出斯大林为何要留下这张闲牌，在必要时可以打出去。）卫国战争爆发后，有一天，斯大林把李维诺夫叫来，没头没脑问他的外交礼服还在不在，李答还在。斯大林叫他立刻动身到美国去当大使，礼服是现成的，立刻就走。

莫洛托夫奇妙地提出，是列宁笔下提到的极少数共产党人挽救了布尔什维克。这就更奇了。他指的当然是斯和莫本人等。这是睁眼说瞎话。列宁多次提到斯大林，有时提到莫洛托夫，可是尖锐批评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很少。最好的证明之一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没有怎么引用过列宁表扬斯大林的话（列宁比较重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长文可能引用了），如果有，而且很多的话，能够不引用吗？列宁真正郑重其事地提到的，是在遗嘱中道及的6个人。这便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其中批评最尖锐、最严厉的是对斯大林，直

至提出要撤去他担任还不到一年的总书记职务。总书记，是中国人几十年来把它神化了，其实就是办公室主任、秘书长，至多是秘书长这一类的意思，是事务性的，同领袖根本上是两回事。

莫洛托夫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对党内有任何不同意见的同志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开手地予以消灭，而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伟大英雄。莫洛托夫毫不知羞耻地夸奖他自己也是一个“内战内行”的大专家。他说：“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 ——引者）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以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杀人也有‘基本上’正确之说!? ——引者）。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第472页）郭沫若在《韩非子批判》中，曾说过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正确话，他说韩非的政治主张是那么的残忍，使人感到韩非的神经似乎是钢丝制成的一般。这是根据上世纪40年代读郭文时的记忆，确否未再查原文。现在看了莫洛托夫的谈话，又感到韩非算什么呢？比起莫洛托夫的神经来，韩非还软弱得很呢！

莫洛托夫无缘无故地、毫无根据地、反反复复地强调，1937年前后的苏联，似乎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如果不反复地大规模推行大逮捕、大屠杀政策，苏联就要立刻完蛋。“狼来了，狼来了！”狼是谁呢！不是希特勒，而是全国的党政军干部和老百姓。但是，在实际上正好相反，1935、1936年时，人们以为要赶上1928年的时期了（即“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至少在大城市，多少有了一点能够喘一口气的感觉。再加上苏联于1934年加入国际联盟，他们的天才外交家、一脸和气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他的作风同以后几十年由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外长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葛罗米柯这些顽石般的人物的作风根本不同），在国际联盟会议上，成年累月地呼吁推行“集体安全”政策，大国一致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危险等等。那时苏联在全世界的威信真是高极了：全世界都“左”倾了！同情和拥护苏联的力量在全世界大大地增强了。中国也完全是如此，1935—1937年，苏联在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可谓达到了顶点。1936年，主要由布哈林起草的新宪法通过了（拉狄克也参与修改。通过宪法后，这两个人都相继被公开镇压了），在当时不明真相的世界进步人民面前真是耳目为之一新：人类的新曙光又一次照耀全世界了！可是，正在这个时期，苏联却忽然在全国，对上中下层的领导人和干部（包括驻外与援助西班牙反

法西斯战争的一切人员) 都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运动。按西方新闻界的说法, 整个苏联成了一部大绞肉机, 日日夜夜在开足马力地工作。但是, 莫洛托夫对此人类内部屠杀的空前惨剧却赞不绝口。此事历史上找不到先例, 希特勒的爱将隆美尔元帅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运动, 希掌握了确证, 令其自尽, 但不宣布真相、然后予以国葬。莫洛托夫说, 如果那时不大捕大杀, 苏联就生存不下去了: “没有 1937 年的肃反 (引者按: 1937 年是习惯语, 泛指斯大林时期的‘肃反’), 我们也生存不下去……不对凶恶的敌人采取严酷措施, 是不行的。” (第 512 页) 莫洛托夫认为那时苏联已惶惶不可终日, 国家已“危急之至”, 如不大杀, 就要“垮台”了: “如果不采取严厉措施, 就会有更大危险, 就会在艰难时刻使国家四分五裂。那时候,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牺牲要大得多, 要付出千百万人的牺牲, 以至于垮台, 无论如何, 危急之至。” (第 517 页) 全是废话、空话、骗人骗己的话, 这些就是开足绞肉机的“根据”!

莫洛托夫更莫名其妙地说, 只有大捕大杀才是“救国救民”、“挽救革命”的唯一办法: “想想看, 这一政策 (按: 指大规模镇压的政策) 是挽救人民, 挽救革命的唯一政策, 是符合列宁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的唯一政策。” 1935—1939 年这一特大镇压时期, 怎么会突然出现要以开足绞肉机的马来“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怪事呢? 而对于外敌——希特勒德国的生死威胁则一字不提, 枪口完全对内, 莫洛托夫竟还称之为“列宁主义”!

像上述类似的话, 充满全书。事实是, 这时的外敌问题, 无论德、日两个方向都还未达到立即就要爆发大战的程度, 不存在箭在弦上的外敌压境的大危机。这时期的唯一任务, 就是加强团结, 增强内部各方面的力量, 准备迎接德、日两个法西斯侵略国的进攻。强调抵抗德、日的人, 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布哈林 [1934 年在联共 (布) 十七大上他作了主要强调准备回击德国和日本侵略者的发言] 等, 均相继被杀了。但是, 照莫洛托夫的说法, 苏联的天就要塌下来了, 而坍塌的原因, 不是外敌, 而是来自国内种种“可能”的敌人。因此, 当时“挽救危亡”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强内部大规模的盲目镇压, 把党政军的中老干部都杀得近乎精光。军队中层 (团) 以上军官损失尤为惨重, 几乎连锅端了。朱可夫 1939 年夏在蒙古同日寇作战 (诺门罕事件) 中, 发现尉级军官当师长, 太误事了, 华西列夫斯基在 1939—1940 年的苏联攻打芬兰的战争中也发现大量师长是尉官, 因为“校”级军官几乎都杀光了。

问题是：那些被杀、被流放的人真有罪并有丝毫的罪证吗？答案是完全没有，莫洛托夫也承认他们没有什么谋反及通敌罪证。他们唯一的罪，就是被硬说为“信不过”、“不可靠”，“可能”在将来干坏事！莫洛托夫说：“1937年的肃反是必要的，应当看到，十月革命后，我们虽左右开弓，大开杀戒，取得了胜利。但是，多种残余敌对势力还存在，法西斯侵略大敌当前，他们可能（！）纠集起来。我们幸亏于1937年搞了肃反，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引者按：第五纵队是1936—1939年西班牙反抗德、意法西斯假手国内叛军首领佛朗哥作乱时，敌方自称其派往共和军内部的奸细及内部的反对派是他们的“第五纵队”。）即便在布尔什维克当中也有这样一些人：“当一切顺利时，党和国家尚未面临威胁时，他们是好的，是忠诚的，而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动摇，会投敌。”（第465页）这是斯大林式的典型理论：即人人都可能是“特务”，人人都可能要投敌。救治之法，就是先把他们通通杀光。问题是：按此理论，苏联已无可信之人，国家已无可可用之兵，人人都可能是未来的叛国犯！唯一救治之道，就是提前把他们先杀光！这话是从莫洛托夫口中老实讲出的苏联领导人长期关门大屠杀的根本理论。

布尔什维克中，究竟哪些人信得过，哪些人信不过？莫洛托夫说，凡“执行路线不坚定”的人，均在捕杀之列：“受到镇压的不仅有死硬的右派分子（注意：苏联在1938年初公开杀了布哈林以后，就始终把‘右派’放在了托派之上，一直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莫洛托夫在此也是如此。——引者注）或托洛茨基分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有许多动摇分子，这些人执行路线不坚定，当然也就无法相信他们在困难时刻不会叛变投敌。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之流还是蒙混过关，米高扬之流还是躲了过去，还有一些人……”（第466页）可见，莫洛托夫恨的是没有都杀光。其实，一个该举的例子他却没有提到，就是苏联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中将确实在战时投敌了，成为伪军“俄罗斯解放军”的总司令。照莫洛托夫的理论，为避免发生弗拉索夫事件，就要在战前把苏军的排长以上的军官都杀光，才不会出现弗拉索夫这样的叛军司令！按照莫洛托夫的荒唐逻辑（谁都知道莫洛托夫并不是这个荒唐逻辑的发明人），就不能不把苏联人都杀光，这样才能保证在将来不出一个坏人。

上述论点不是推测，而是莫洛托夫明确而强调地讲出来的。莫洛托夫的访问者（包括有时同去访问的其他几人），从根本上说，都是与莫洛托夫同调的。

(不然他们怎么能有 139 次之多呢?) 有一次访问者对莫洛托夫的“肃反”功勋表示感激时, 就出现了这么两句对话:

“你们进行了斗争, 对你们无可指责。”

“不, 应该指责斗争得不力, 没有把坏蛋通通打死!”

一个是感谢他们过去大屠杀的历史功勋; 一个是感到还杀得太不够, 十分抱歉。天呀, 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呀! 这不是一群杀人魔鬼的大合唱吗? 这样的政权不垮台, 人间还有真理吗?

如此大规模地捕人杀人, 要不要什么证据呢? 感谢高举斯大林红旗的莫洛托夫同志, 他回答得很干脆, 要什么证据! 请看下面的回答:

问: “可是, 现在有人说, 公诉书中除去被告自供以外, 没有任何算得上是罪证的事实。”

莫洛托夫答道: “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犯了罪, 他们是敌人, 还需要什么罪证! 您念念布哈林的供词就知道他是个机会主义分子! 不是还想搞富农叛乱吗?” (第 482 页)

莫洛托夫可算道尽了他们“肃反”的真相, 你现在或将来可能做坏事, 所以把你抓起来; 然后是刑讯逼供、指供; 然后是取得一切所需要的口供; 然后定案; 然后是维辛斯基的血腥演说起诉; 然后是明正典刑! 这就是千篇一律的大镇压公式。证据是绝对丝毫不要的。(莫洛托夫夫人于 1949 年初被逮捕后也被指供: 莫洛托夫拥护斯大林是假的。莫洛托夫的杀头之罪不是已准备好了吗? 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对此事是讲得清清楚楚的。)

莫洛托夫坚持大屠杀时期的一切都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书中无数次地坚持确认, 当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的国家公诉书, 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判决书, 和“犯人”的所谓“口供”全都是正确的, 因此也就全都永远有效。因篇幅关系, 这里从略。但有一趣事似仍应提一下, 莫洛托夫在 1974 年 12 月的一次谈话中, 仍认为布哈林是 1918 年刺杀列宁的主谋人。他说, “在我看来, 他(按: 指布哈林)至少参与了社会革命党人杀害列宁的阴谋。他原先主张逮捕列宁。但那时候已到了两军对垒生死存亡的关头, 斗争已发展到要处决列宁的程度”。莫洛托夫明知他是在大扯其谎。因为正是布哈林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唯一坚持劝告列宁那天晚上不要到某工厂去演讲的人。此事在 1935 年出版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中写得清清楚楚。(出版时, 斯大林去电话向克鲁普斯卡娅祝

贺，然后即发动波斯伯洛夫等在《真理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克鲁普斯卡娅进行毁灭性的攻击，而波斯伯洛夫此时正是“斯大林同志秘书处”的宣传处长。）莫洛托夫会没有看过吗？列宁夫人回忆录载，当天中午，布哈林在列宁家中吃饭，（列宁待布哈林如家人子弟，并公开在“遗嘱”中讲布哈林是全党最喜欢的人。）席间，布哈林得悉列宁当晚要到两个工厂去演讲，而头一天乌里茨基（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刚刚被刺，因此就劝列宁不要去演讲。请看列宁夫人是怎么写的吧：

“这天，布哈林在我们家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他竭力劝说伊里奇不要去演讲，伊里奇一笑置之，后来为了不再谈这个问题，他就说或许不去了……（晚上，列宁）没有带任何警卫就去参加群众大会了。”^①

因此，什么杀害布哈林的判决书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啊，以至于不得不紧跟伪史的电影《列宁在1918》啊，等等，全都是在彻头彻尾地伪造历史。电影编者卡普列尔，即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16岁时如痴如醉的情人，斯大林让他整整坐了10年牢，斯大林死后当天获释（斯女儿则说是3个月后）。他依据判决编电影，本人应属无错。我在多年前即在《羊城晚报》写过一篇短文，题作《阴谋文学的老祖宗》，就是专门介绍此事的。

莫洛托夫至死也是拥护大规模地乱砍乱杀的。他对中国人提出的、替他们辩护的“扩大化”，莫洛托夫毫不领情，他说：“我认为我们当时就应该经过一个恐怖时期，我不怕这个词，因为当时没有时间、没有可能……仔细分析。否则我们就不仅会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去冒险，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威胁。”（第425页）这就是公开承认苏联当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乱杀了！苏联的大砍大杀在斯大林时期从未停过。照莫洛托夫的理论，苏联是“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弄清情况，所以一切毫无根据的大屠杀都是完全合理的。莫洛托夫至死坚持他这套“社会主义”即是无限恐怖的理论，而且他们的“肃反”不但没有“扩大化”，而是犯了“缩小化”的错误。

这里顺便说几句，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顶了整整3年牛。后来实在顶不下去了，才于1988年初夏，不得不开始进行真正的平反工作。过去我们大骂赫鲁晓夫，实际上赫鲁晓夫是只为“斯大林分子”平反的，对一切所谓“反对派”分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1972年印本，第426页。

子根本就没有平反一个。赫鲁晓夫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平反工作已陷于倒退，历史的真相准备永久伪造下去；安德罗波夫可能不同一些，但执政一年就去世了。1988年的春夏秋三季，戈尔巴乔夫及新的政治局才决心全部平反，该年先后由苏共中央、苏联最高法院等有关部门，把三四十年代的一切大小政治假案全部平反了，并由塔斯社通报了全世界，说明这些案件全部是假案。因为查遍一切有关部门的全部档案资料，始终未查得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实他们所犯的任何一件罪行，所以，起诉书和判决书全都没有任何证据。苏联境内也始终根本不曾存在过由托洛茨基在境外做总指挥的那些所谓外国间谍、暗害集团及其活动。所有那么多人的全部罪行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因此，这些起诉书、判决书全都没有任何根据，予以撤销。对布哈林特别隆重，为恢复他的党籍，由苏共中央特别发了一个专门通报。（但是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主要还是采取大批判态度，说明那时他也还没有下决心为布哈林等平反。）实际上，由于这些平反，便也为托洛茨基本人平反了，因为在苏联境内既然没有任何由托洛茨基指挥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活动，那么，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罪行也就全没有了。苏联的这些公开平反决定，塔斯社对全世界发了消息，这些消息大体都收在新华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此书名为《克里姆林宫秘闻》，“内部发行”。因篇幅关系，苏方的平反原文就不详细引用了。

共产主义实现前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

莫洛托夫认为，专政只能是个人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必须是天罗地网，对党内意见不同的人只能放手镇压，镇压必须连及妇女儿童，决不能释放政治犯，最可怕的敌人是：人道主义。

莫洛托夫认为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均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除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别无选择，可现在我们到处都把这一提法修正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一过渡时期，所有的文献都做了修正，甚至在党纲中也如此。”（第577页）其实，莫洛托夫缺乏常识，马、恩常常是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阶段泛称为共产主义的。

而莫洛托夫心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天罗地网，使任何人都无处可逃。莫在书中谈了很多沙皇流放犯人的事情，那里管吃管住，准许通信自由，准许亲属去探亲与居住，准许看书、撰文、开会，还准许按原来的党派自行编组活动。莫洛托夫承认他们吸取了这个教训，把苏联的一切监狱、集中营、流放地都“搞成了天罗地网”（第175页），使任何人插翅难飞。在实际上，苏联全国都是如此。

苏联在惩办一切所谓“反对派”、“反革命”犯、“间谍”犯等等，就是所谓“政治犯”时，一般是要株连家属的，即家属一般都要同时被捕、监禁、流放等（我不说“全部”，但我所见的书上，苏联被捕人员大体上都是累及家属的）。莫洛托夫不仅恬不知耻地承认了这个事实，而且认为这样的惩办很必要！

“为什么波及妇女儿童？”（丘耶夫问。——引者注）

“什么‘为什么’？当时需要对这些人进行某种隔离审查；她们当然会散布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分化作用。实际上就是这样。”（第494页）累及妇女儿童，莫洛托夫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对提出这个问题表示不满与不能理解！

莫洛托夫宣传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能是几个人以至一个人的专政。他说：“在列宁健在时苏维埃的作用实际上就已经被贬低了——大权应该集中到几个人手里。”（第222页）但苏联的事实并不是几个人，而确实是一切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恐怕是苏联一切错误的总根源。个人独裁得越厉害，人民的苦难往往也就越深重，古今中外，绝无例外。

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对一切有不同意见的人，即所谓“反对派”分子，只能放手消灭。他说：“甚至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列宁认为这十分危险，要求进行坚决的斗争……总要有人放开手脚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认为，斯大林对此事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第472页）

列宁对党内有不同意见者，可能做梦也没有想过要杀他们，也没有想过用党纪处分。列宁最后两三年，同斯大林有分歧，为党的前途着想，列宁也只不过建议撤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而已。

莫洛托夫承认，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即几次同他商量，建议从集中营等

处放人。对赫鲁晓夫的这一建议，莫洛托夫彻头彻尾反对，赫氏同他商量过几次，都被他坚决拒绝了。莫洛托夫说：

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对我说过两次：“一块儿干吧！咱们友好吧！”“好吧，基础是什么？咱们谈谈。”

“毫无结果，因为我们立场不同。他主要是想让劳改营放人，无论如何也要提高自己的声望。可当时给那些明目张胆的敌人平反，我当然不能和他意见一致。”（第441页）

“我对他说基础是什么的时候，就已开始禁止他这样干了。他不愿意，我们无法共事。米高扬同他关系不错。”（第441页）

在从监狱和集中营释放一切无罪的人这个全苏人民第一号紧急的最大问题上，莫洛托夫是死硬地坚持他在斯大林时代的立场，一个不放。而对他的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宣布离了婚的夫人例外，他要求立刻放，并办到了。

莫洛托夫只要残忍的专政，而坚决把人道主义看成最可怕的敌人的。他的确是斯大林政策的最忠实的保护者，他竟说：

“赫鲁晓夫放出了一只猛兽，这猛兽眼下可能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可不能小看了赫鲁晓夫。”

“这头猛兽，人们把它叫民主。”（丘耶夫说。——引者注）

“叫人道主义。”莫洛托夫说，“说穿了，不过是市侩作风罢了。”（第434页）

莫洛托夫的残忍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这倒是他们执政时期的一个真实写照——人道主义是毒蛇猛兽！

莫洛托夫讲上述这些话时，已经是1980年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详载了莫夫人的释放经过。1953年3月上旬，斯大林追悼会结束后走下列宁墓时，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看见莫洛托夫一脸不高兴，就凑上前去祝贺他的生日（那天恰好是莫的生日），莫洛托夫气鼓鼓地说：“把波琳娜还给我！”第二天晚上，贝利亚在办公室迎接莫洛托夫，并把夫人波琳娜还给了莫洛托夫，并称波琳娜是“女英雄”。至于为什么第二天晚上才能见到人，可能是要到第二天专机才能把人从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接回来。同样，宣布斯大林死讯的当天，一个电影剧本作家兼导演，也即《列宁在1918》电影剧本编剧人卡普列尔即被释放。这个人比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大20多岁，但斯维特兰娜一心迷恋着他，追求他。斯大林在

1943 年上半年就把这个人送入狱中了。他的罪过就是：公主追求他，而他又是犹太人。于是，他便不得不为此做了十年“钦赐”的“外国间谍”。除上述两人外，莫洛托夫的自述表明，他是始终不同意释放这些“敌人”中的任何一个的。

但愿像莫洛托夫这样“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中国一个也没有！

共产党永远不能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

莫洛托夫的这种思想确实很有代表性。莫洛托夫竟然公开地、毫不迟疑地对他的访问者说：

“我认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不能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我们不能说假话，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农民的利益！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得让工人阶级独揽大权。”（第 596 页）

莫洛托夫的确是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说那个政权的本质，他连国家还要“站在各个阶级之上”，还要代表或照顾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马克思时代对农民问题的论述还很少，但列宁已提出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农联盟。没有工农联盟，就不要想建立什么社会主义，既然是工农联盟，你不考虑同时代表农民的利益，能存在多久呢？莫洛托夫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决不能同时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完完全全的劳动者，所以莫洛托夫之荒唐可笑，比什么托洛茨基还要托洛茨基主义。他的理论不是错误，而是极端的反动！莫的水平实在太低，无法与之理论。这种人参加苏联当政几十年，表面上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根本不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竟然是必须同广大农民与知识界长期为敌的东西。几十年的苏联在搞些什么，人们也不难窥见其一部分秘密了。

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对有些科学家，不管他们有罪无罪，不管他们是否有犯罪嫌疑，都只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才能让他们工作，像养牛养羊一样给他们草料吃，然后把他们的奶汁挤尽。人们早已发现，为什么从事最尖端科技研究的（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大科学家们，很多人都是长期在监狱中作出的贡献，是在叶若夫、贝利亚的狱中的发明。现在莫洛托夫公开回答了，

这竟是他们的国策，并不是叶若夫、贝利亚的发明。像权威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主要是军用飞机的设计，但一般人均以为他只是一个民用飞机设计师）、火箭之父科瓦廖夫等人，都不是贝利亚之流想捕就敢捕的，只有一个人才有这个权力，那就是斯大林。莫洛托夫说：

“我们俄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同富裕农民，同有富农情绪的人联系密切，农民国家嘛。”

这说明：一些苏联领导人似乎天生有严重的“恐富农症”，说来说去是反富农，杀布哈林的理由之一是说布哈林要使富农复辟；之后，大捉自然科学家，又同“富农情绪”扯在一起。图波列夫、科瓦廖夫这些人知道什么“富农情绪”呢，他们哪里来的“富农情绪”？

“那个图波列夫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图波列夫是苏维埃国家极其需要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内心反苏，在同亲朋好友往来中干了些有害的、腐蚀人的事，即或没干，也有这种情绪。他们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结果，把图波列夫等人送进牢房，同时下令肃反人员：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但不能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工作，设计出国家需要的装备。这是极为有用的人才……不能不考虑，遇上困难关头，他们可能成为特别危险的分子。不然在政治上要吃亏。”

古往今来，除了苏联之外，有哪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国策：必须把科学家们关在监狱中工作！

莫洛托夫的头脑里没有人民， 他甚至反对照顾一下人民的生活需要

莫洛托夫的马列主义的精神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只能过最苦的生活，要改善生活，只能到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以后再说。“社会主义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业。需要有肉，需要有这个那个，这些东西都需要。但如果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上面，那么尽管我们取得一些成绩，但最终将落得一场空。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第462页）

提问者说：“但现在人们在国内市场上连肉都看不到。”

莫洛托夫回答说：“——肉呀肉！见他的鬼去吧！只要帝国主义完蛋了就好

了!”（第 463 页）

莫洛托夫强调：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人民就很难改善生活，要加强国防力量，要做许多其他的事，要搞许多工程。我们不敢保证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战争并非必然发生。然而，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难以期待生活的改善。这是我的看法。”（第 319 页）

莫洛托夫坚决反对发展轻工业，强调只能发展重工业，实即军事工业。他说：

“用十年时间，我们可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但是，第二个十年我们就得准备垮台……”

“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就会忘记需要发展什么，特别是重工业。”（第 590 页）

莫洛托夫责骂赫鲁晓夫的最大罪过，就是他公然以吃饱面包来“欺骗”人民。他说：

“在赫鲁晓夫时代，只要有了面包，有了食品，就算好日子了。他就利用这个。与其说是他利用别人，不如说是他被别人巧妙地利用了。人人都想快快摆脱紧张气氛，轻松地舒一口气。”（第 375 页）

莫洛托夫最反对的，就是让人舒一口气。照莫洛托夫的说法，赫鲁晓夫之所以特别应当反对，就在于他被人民“利用”了！（其实赫鲁晓夫并没有真正被人民“利用”。）

莫洛托夫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什么呢？就是坚定地不准人民吃饱肚子，在主观上就必须与人民为敌！

莫洛托夫是个典型的只搞“政治挂帅”的人，他用政治思想等因素代替了一切经济利益，他从根本上反对多劳多得，否认任何的“物质刺激”。他极其奇怪地提了以下六条几乎同经济无关的政治原则，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莫洛托夫说：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六种因素可以代替（！——引者注）物质刺激：

1. 善于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
2. 开展社会主义竞赛；

3. 选择好干部；
4. 使全社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5. 实行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
6. 进行党的思想工作……”（第 575 页）

全都是痴人说梦！莫洛托夫在这六条里，只把工人当成劳动工具，全都是过去几十年实行的老一套，这里面有一点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和生活利益的迹象吗？至于所谓“国际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就像斯大林和他都主张社会主义世界均应使用俄文俄语一样，天下经济一统都归一个中心支配，为一个中心服务。我引用这些，会被人们认为是非常可笑的，毫无价值。作用就在这里，非常可笑，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毫无价值！

莫洛托夫特别迷信所谓单一的社会主义国有制。这一点，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至比较聪明的安德罗波夫都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可以说一个甚于一个。他们（包括莫洛托夫）都以为，只要把各方面都变成国有制了，共产主义就完全实现了。斯大林及其以后的几代继承人，日日夜夜都在为赶办这件大喜事操劳（主要是在农业中），结果，经济上的斯大林模式错误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丘耶夫引用安德罗波夫的话问莫洛托夫：“‘我们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我们认为发展前途是将这两种形式纳入统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也就是你正在写的观点吧。”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是的。”（第 593 页）可见要冲出斯大林模式的艰难：一切国有，斯大林去世后的几代领导人竟没有一个人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

莫洛托夫甚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就必须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了。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确早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按：这是莫洛托夫从勃列日涅夫那里搬运来的）……要想在一个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将所有制经济转为全民所有制，这是问题的关键。”（第 592 页）只要全都是全民所有制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以从赫鲁晓夫起都不断在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求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莫洛托夫尽管以未能在 30 年代杀掉赫鲁晓夫为终生憾事，但在如何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二人还是真正的同志。他们都迷信所有制改变了，实际主要是分配制度改变了，生产力自然就上去了。他们忙的都是同生产力完全不相适应的消灭任何“私有制”的痕迹，其实这是马雅

可夫斯基似的狂热的社会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在他的诗中写过：“我没有任何私有财产，除了我的那把牙刷之外。”（大意）马雅可夫斯基说这样的话不要紧，因为他一个人可以胡说八道，可是从斯大林起，就忙着建设共产主义（斯大林1939年2月在联共十八大的主题报告就是这么提出任务的），以后的领导人越来越起劲，莫洛托夫更把这点视为金科玉律。

急于改变所有制，认为所有制改变了，就很快进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了，像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所反复申述的那样，这恐怕是一切斯大林模式（包括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在内），也即苏联所犯的决定性错误之一。

莫洛托夫承认在他主持下消灭了40万户富农

实际上这还不到他的政府已宣布过的若干分之一。莫洛托夫原毫无消灭富农的打算，但只能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莫洛托夫说，苏联没有为集体化死过一个人，他一个也未见过。莫洛托夫在20世纪80年代还想继续消灭富农。

莫洛托夫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上的极“左”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列宁于1921年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上。莫洛托夫说，“新经济政策是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实行的”，“我们当时不得不暂时抛弃我们的路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向资本主义方向漂移……”（第455页）

照莫洛托夫的看法，列宁是把一切都“放弃”了，一心一意走资本主义的路了。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的，莫洛托夫对它都有上述一套看法。他不便公开反对列宁，但照他的看法，实际上认为列宁是在恢复资本主义。

莫洛托夫最感兴趣的是“消灭富农”，他对此事念念不忘，以至在苏联消灭富农的50年之后，他还是感觉有迫切的继续消灭富农的渴望：“难道把富农赶走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和他本人几个人的情绪，把富农‘赶’到荒原和不毛之地，不敢承认是肉体消灭。——引者注），第二天就可以说富农已被消灭了！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虽战胜了（是仅仅‘战胜了’，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了！——引者注）富农，但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做到彻底消灭。富农情绪现在还存在，大量存在！拿党证的人保护着富农，说他们是劳动者……这样的作家也很多，难以想象。”（第485页）照此说法，就要消灭一切党员、知识分子和作家才能消灭富农了。其实，消灭富农之说也是来自斯大林，莫洛托夫拾人牙

慧，狂嚼了 50 年还不过瘾！

莫洛托夫如果真在 1957 年的倒赫斗争中当上了总书记，他恐怕又要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消灭富农”和“肃反”运动。莫洛托夫十分得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强迫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他包干主持消灭了四十万户富农。他说：“我亲自制定了驱逐富农的地区……我们总共驱逐了四十万户富农。这项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一个委员会搞的……”（第 457 页）

“驱逐”，好轻松。两手空空，把人驱逐到冰天雪地的荒原或沙漠地区去，谁活得下来？

莫洛托夫自夸而且还想在 80 年代继续在苏联推行的消灭富农运动的大体情形，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三位教授著的翔实而比较客观的《苏联兴亡史》一书，对此事有简要客观的介绍。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出版。下面的材料，均取自该书。

苏联在 1929 年于斯大林下令消灭富农阶级之前，实际上农村已经中农化，中农占全部农户的 60% 以上。十月革命后，富农总户数锐减，并还在不断减少中。富农大体均是大家庭，平均只占农户的 4%—5%，每户人口为 7.3 人，每户劳动力为四五个。而耕地面积在十月革命后，则在日益减少中，而且是以自耕为主。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政府命令规定，根据财产多少，分别以一年中雇工 50 天、70 天、150 天以上的即为富农。即以最多的 150 天而论，也还不到半个长工。因此，这个规定之苛刻与不合理，恐怕也是世所罕见的。一家平均有四五个劳动力的农户，雇这点工所占他使用劳动力的百分比显然是很低的。这就算剥削阶级的富农了，理论上说不说得过去？苏联之事，我们缺乏了解，不去妄断，但总令人存疑。而且在内战结束之后，富农是服从政府的一切限制、排挤与高税政策的。1929 年 4 月，苏共中央又规定占农户总数 4%—5% 的富农，必须负担全部农业税的 30%—40%。在此种条件下，斯大林下令消灭富农，实际上是杀鸡取卵政策。其结果是把鸡杀了，卵却没取着。例如，强迫集体化、消灭富农一来，立即就没收富农全部耕马，然后集体饲养。结果如何，中国人自己干过，对此特别清楚，耕马除了死得快之外，不会有第二个前途。

其实消灭的何止莫洛托夫说的 40 万户富农呢？1930 年 2 月 4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政府）把要消灭的富农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为 6 万多户，第二类为

15 万户，第三类为 80 万户，总计为 100 多万户。这是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下的命令，莫洛托夫故意装作不知道。每户平均 7.3 人，100 万户应为 730 万人。按规定，第一类富农处死；第二类富农流放西伯利亚无人过问；第三类扫地出门，无条件赶出集体农庄，无衣无食无住处，其结果还不是一个死吗？《苏联兴亡史》一书说：“二十年代末苏联解决富农问题的方式，是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人为地加剧社会矛盾，人为地激化阶级斗争，人为地造成社会经济的破坏。剥夺富农财产，对富农‘扫地出门’的政策，不是体现无产阶级建设新社会的远大战略眼光和改造全社会的宽广胸怀，而是表现了俄国农民小生产者的短浅目光，以及狭隘性，简单的报复心、平均主义等等意识。”（第 297 页）这段话有胆有识，敢于突破旧教条，作出了新的正确评价，这是令人佩服的。但末三句我以为则全不对，打屁股打到同样受害的俄国小农身上去了。这种政策并不是小农经济促成的。哪个小农要把所谓已经不像富农的 700 万以上的“富农”突然全部置于死地呢？我在陕、晋、冀、鲁农村达三年之久，据我所见，没有哪个贫苦农民要想处死较富裕的农民的。

消灭富农是斯大林一个人于 1929 年末才决定的。《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则是 1930 年 1 月 21 日才发表的（发在《红星报》上而不是在《真理报》上，不知何故）。之前，在 1930 年 1 月 15 日即成立了一个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制订消灭富农计划的委员会。所以莫洛托夫以消灭富农的总领导自命，在表面上也说得通（实际上他是被指定的表面上的执行人）。1928 年年中时，加里宁及政府农业部部长雅科夫列夫（此人本为斯大林办公室重要工作人员，中央委员，后被处决了。——作者注）等等，还均主张吸收富农参加集体农庄，更不用说布哈林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更是不赞成以暴力消灭富农了（后来斯大林集中以此事整布哈林是借题目做文章）。1929 年 4 月，联共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不是大会）上，尚可以讨论富农是否可以参加集体农庄，意见不一，未作结论。所以，斯大林突然提出要用暴力彻底消灭富农，完全是一个强加于全国全党的突然行动！

在消灭富农运动中，打击面是宽得不得了。例如：“1930 年 3 月 12 日斯摩棱斯克《工人之路报》报道：巴图林区的某村没收了 34 户农户的财产，其中只有 3 户是富农。”（《苏联兴亡史》第 288 页）这比政策允许打击的富农的十倍还多，农村怎能不破产？

1943年苏美英三巨头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会议时，在斯丘密谈中，斯大林答复丘吉尔的提问中，也承认苏联在彻底消灭富农，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那几年的危险程度，比德寇入侵时的危险还要严重得多。斯大林为什么这么老实地对丘吉尔说呢？因为战时英、美、苏的合作比什么都重要，表示不同丘吉尔打官腔，以示诚意，当然，另一方面是现实的需要：必须在丘吉尔面前硬撑，表示现在还不如当年危险呢，没有什么不得了。

可是，莫洛托夫却要硬着头皮硬撑到底，胡说到底，他说：

“我们的集体化运动搞得不错。我认为，集体化运动的成绩比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更大。”（第457页）

八、莫洛托夫自称他的唯一任务是实行对外扩张

要占领东欧西欧、要分尝非洲，还要向苏联南部边境外扩展，扣着小国代表不卖国就不准走，后半夜强迫南代表签署外交文件。

莫洛托夫作为苏联较长时期的外长（1939—1948年，1953—1957年），也曾以外交家著称于世。他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外交家是怎样做的呢？下面可以举例看看。

莫洛托夫承认他的唯一任务就是对外扩张。莫洛托夫首先歌颂沙皇俄国的扩张成果，说：“好在俄国沙皇为我国夺得了这么多土地，使得我们现在能够更加有力地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了。”然后说：“我认为，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现在看来，这项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不错。”显然，莫洛托夫以斯大林和他能够继承和发展沙皇的对外扩张事业而感到无比的骄傲。

莫洛托夫还告诉我们，斯大林并不以占领东德为满意，他还想着西欧。莫洛托夫向访谈者证实确有这么回事：

“据说，哈里曼问过斯大林：‘当初德军曾兵临莫斯科城下，而现在你瓜分柏林，你对此感到得意吧？’斯大林回答说：‘沙皇亚历山大还打到巴黎呢。’有这回事吗？”莫洛托夫回答说：“有这么回事。”（第109页）

这反映了斯大林心里是没有忘记西欧的，野心比老沙皇还大。

不仅西欧，战后莫洛托夫又受斯大林之命，去索取地处亚欧交界的两个属于

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两个海峡控制着黑海到地中海的咽喉，在军事、交通、经济上均有特殊的重要性。但土耳其并非希特勒的同盟国，战后想去强占人家的国土当然难于成功。但斯大林还是非想要不可。莫洛托夫记载说：“斯大林对我说：‘要对他们施加压力，争取共管。’我说：‘他们不会同意的。’斯大林说：‘你去争取嘛！’”（第108—109页）当然没有争取到，因为美、英不同意。

斯大林还想在非洲北部占领一块地方，就是利比亚。若占有这块地，不但可以控制非洲北半部，还可以从军事上威胁地中海及南欧诸地区。莫洛托夫对此事写得很生动，他对西方大国提出此项要求时，气得英国外相贝文当场发病：

“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声称利比亚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予支持，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贝文一听就犯了病，甚至还给他打了一针。我只好放弃。贝文跳起来喊：‘这是胡闹，胡闹！你们从未到那里去过！’”（第109页）

莫洛托夫还详细讲述了一个故事：战后格鲁吉亚共产党首领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见故乡来人，指着地图对战后的大扩张表示比较满意，“‘只是我对我们这一段边界还不满意！’斯大林说着，指了指高加索以南地区”（第2页）。俄国南界以外是些什么国家呢？这就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三国。接壤处都是贫瘠地区，显然意在军事需要。以后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果然发动了占领阿富汗的战争，达十年之久，是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全部撤军的。

对于战后的扩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比较满意。莫洛托夫说：“斯大林不止一次说过，俄国人打赢过多次战争，误却不善于利用胜利果实……在分享果实时被人抛在一边，让人宰割。在这场战争结束时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干得很出色。”（第79页）

为了强占他国，莫洛托夫在苏德战争前奉命干的事情之蛮横无理，恐怕是中外历史上未见过的。1940年苏联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时，实在令人吃惊。1940年苏联正式出兵占领这三个小国之前，“1939年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来见我们。我对他说：‘你不签字加盟（指并入苏联。——引者注）就休想回去’”。“从爱沙尼亚来了一位部长，是个军人……我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我们干得很出色。”“他们走投无路，总得想办法保全自己。”（第2—3页）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就是这么发生了伟大“革命”的，“人民狂热要求加入苏联”的真相就

是如此。

战后，这种行为对盟友南斯拉夫照样施用过。

1948年2月2日起，斯大林强令保共季米特洛夫、南共铁托到莫斯科去（未说去干什么）。铁托心知不对，抗命不去，叫南共的第二名领导人卡德尔去了。一开始斯大林就下命令，强令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两国合并成立联邦（事先保共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这事很明显，是要用季米特洛夫的保加利亚来控制南斯拉夫，以限制南斯拉夫的半独立性（南斯拉夫是多年苦战，自己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斯大林还说：“没有苏联的参加，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广泛的联邦（季米特洛夫在一个月前曾公开建议过在东欧成立较广泛的联邦。——引者注），要是有一天建立联邦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俄罗斯联邦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合并（当时的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之间还隔着一个宽大的里海呢。——引者注），把乌克兰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合并，把白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合并。”而且斯大林还说这样的“联邦”“是会建立的”。^①这就是说，苏联要直接全部吞并东欧诸国。

斯大林当场就要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签署两国建立联邦合为一国的协定。卡德尔尽一切办法婉辞了，答应回国后再商量。但卡德尔必须留两天同莫洛托夫讨论两国经济合作问题。卡德尔说：“第二天（应为1948年2月4日了。——引者注）凌晨三点钟，我被叫醒，接到通知说，莫洛托夫叫我去克里姆林宫……当我抵达那里后，莫洛托夫把一份文件扔到我面前，对我说：‘请签字。’我拿起文件，见上面写着：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商定，将对所有对外政策问题进行磋商。”^②这回卡德尔忍辱签字了，估计是这话还有点弹性，以后还可以扯皮。

莫洛托夫告诉我们，斯大林（以及莫洛托夫）所理想的世界共产主义，就是全世界都要归苏联领导，而且全世界都得说俄语，用俄文。莫洛托夫介绍说：“斯大林研究语言学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制度胜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为了这个目的，普希金和列宁使用过的语言就将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语言，国际交往的语言了。”（第324页）

①（南）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②（南）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第133页。

这当然也是莫洛托夫的思想，而且莫氏说得更不像话：“我到蒙古时恰好是泽登巴尔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达姆巴担任第一书记。达姆巴是一个狡黠、谨慎、不讲俄语的人。可这就已经证明他不能胜任领导职务了。因为要阅读《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第126页）这就是说，蒙古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也不过是同苏联的一个州委书记一模一样的身份，一切都要靠《真理报》与《共产党人》这些报刊的指示，否则就休想担任领导工作。

卡德尔在尝过苏联的一切侵略、侮辱的痛苦后，他说：“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统治各国人民，主宰国际工人运动。”^①

坚决反对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与反帝是不能并存的

莫洛托夫是最坚决地反对和平共处的，但不知他有什么办法去立即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泛指发达的资本主义诸国）。这纯粹是一个闭眼不看世界的愚人空想，好像是外星飞来的一个世界革命家似的。莫洛托夫认为，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是决不能共处的，必须用尽全力去消灭世界帝国主义，人家又不爆发革命，当然只能输出革命了。至于如何输出，他是不管的，他只会唱高调，只会一味反对和平共处。莫洛托夫引用150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作为根据，他说：

“一百多年前，共产党人就不怕直言‘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以此来号召人民举行起义。如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可我们却在谈和平共处……如果要前进，我们的前景只有一个——进行革命。这种前景最令人信服了。”（第586页）

“赫鲁晓夫竟然将和平共处写进了党纲……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第585页）

“我记得在斯大林的文章中也未用过像和平共处之类模棱两可的说法。”（第585页）

其实，莫洛托夫也曾非常肯定地主张过“和平共处”。他鼓吹和平共处比赫鲁晓夫还早，比赫鲁晓夫更积极，更理论化。苏联长期驻中国的外交官、副外长、联合国苏联首席代表费德林在所著《费德林回忆录》中就有关于莫洛托夫的

^①（南）爱德华·卡德尔著，李代军等译：《卡德尔回忆录》，第137页。

《研究列宁的和平共处论点》一长节，是专述莫洛托夫在1955年时是如何特别重视必须坚持“和平共处”这个特别重要原则的。1955年，莫洛托夫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外长身份率领苏联代表团到旧金山去出席联合国成立10周年特别大会时，是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的，“刚一登上英国远洋轮（玛丽王后号），莫洛托夫便召集我们开业务会，要求我们学习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论点”。

费德林在书中说，莫洛托夫说：“我们要认真领会这个重要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用列宁的构想武装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著作中提的这一思想是苏联同西方发展国际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性的论点……从现在起，我们的引文中不再用‘和平同存’的说法，而是‘和平共处’。”

随行人员未带《列宁全集》，记不清列宁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是怎么讲的，费德林说：“莫洛托夫申斥我们，并且立刻把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一字一句地背了出来。”

“五天中，莫洛托夫每天两次召集我们讨论和平共处问题……他说，和平共处政策不是战争间歇期间的权宜之计，而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考虑到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处和合作，它就不是战术步骤，而是我们同外国关系中的战略。总而言之，要树立这样一种思想，过去把过多的力量用于刀剑，现在该是化剑为犁了。”^①

可是，莫洛托夫对丘耶夫谈话时，一切都做了180度的转变，唯一的目的是反对赫鲁晓夫，他这算什么无产阶级政治家呢？其实，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共处”，还远没有莫洛托夫这么地道。

莫洛托夫在丘耶夫面前认为提倡和平共处，就是向帝国主义示弱投降。他说：“如今到处使用和平共处……而求和就意味着示弱，在强敌面前示弱……示弱不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第585页）

莫洛托夫最后二三十年竟然一变而为要么是用全力去打倒帝国主义，要么是所谓和平共处，二者绝不能并存：“如果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目标，那么怎能主张不打倒帝国主义而与之和平共处呢？”（第586页）莫洛托夫不顾现实中的情况，不顾主客观力量的对比，只会天天高叫打倒一切帝国主

^①（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86—87页。

义，反对和平共处，那就只有再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一条路可走了。这不是坚决要同渴望和平的全世界人民对立是什么？

据丘耶夫转述，“莫洛托夫认为，帝国主义将在二十世纪彻底灭亡”。（第589页）这是完全不要根据的胡言乱语，非常可笑，无评论价值。

莫洛托夫认为：“美国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在那里会比其他国家更早实现。”（第105页）但是，这是莫洛托夫纯主观的一厢情愿。这么多年来，美国人民何时有过非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的迹象呢？

莫洛托夫证实贝利亚之流只能百分之百地执行命令

这些人的身家性命也全在斯大林手中。斯大林周围也是贝利亚的人。贝利亚曾对莫洛托夫夸口称，斯大林是被他杀的。

苏联国内，由于个人崇拜已成为人们的思维自动控制系统，那里的很多干部和普通人民都有两个误会：一是凡被杀的就一定是反革命，绝对该杀。例如，一个曾同丘耶夫一起去访问过莫洛托夫的作家，他的父母都是在30年代被斯大林杀了的，但他还是狂热地拥护斯大林的镇压。父母虽然已经平反了，还认为斯大林杀得是对的。另一个大误会认为是认为，凡杀错了的，全都是贝利亚之流干的，斯大林爱民如子，什么都不知道。简言之，不外“该杀”与“受蒙蔽”说两种。至于斯大林，则什么错误也没有。

可是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却为我们谈出了某些真相。他说：“但是我认为贝利亚自己不敢做主。他是执行命令，执行斯大林最强硬的命令。”（第495页）又说：“不，我从来不认为贝利亚应负主要责任，我向来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斯大林和我们，因为我们表示过支持，而且一贯积极支持。而我本人时时都很积极，主张采取措施。我们干得如此严酷，我过去没有后悔，今后也一定不后悔。”（第405页）

莫洛托夫还认为贝利亚之流不干绝对不行。“他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心惊胆战，怕斯大林。”“斯大林的妻子对贝利亚恨之入骨。但是如果他不干，人们会找到另外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好做，逃脱不了。”（第406页）

大镇压后留下的零星的几个人是否很安全呢？莫洛托夫在全书中多次讲，他和伏罗希洛夫等一直被窃听，他本人也时时在准备被捕。

斯大林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与她的情人卡普列尔往来的情书、电话记录等也全落到了斯大林的手中（见斯维特兰娜《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其他人还用问吗？

在这种体制下，贝利亚也不会安于“执行者”的角色，事实发展的结果是，其实斯大林公私生活周围的一切高、中、低级人员，也都是贝利亚派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不是贝利亚的人，即斯大林内部办公室负责人波斯克列贝舍夫中将，斯大林周围及随身警卫负责人弗拉西克中将，斯大林死前竟将他们捕了起来。后来，后者被弄死；前者于斯大林去世后被放出）。此后，斯大林一天24小时，不管室内还是室外，全掌握在贝利亚部下手中，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他本人已成为贝利亚的手中物。莫洛托夫证明了这点，他说：

“他（指斯大林。——引者注）知道，为了身家性命，贝利亚无所不为。负责挑选警卫人员的，事实上正是这个贝利亚，斯大林是从贝利亚给他派的人里再挑选，可自己还以为是自己亲自选用警卫的呢。哪知道贝利亚搞了名堂。”（第389页）

斯大林知道这事，但摆脱不了。他要摆脱，就得依靠国防军，但他更不放心国防军这股力量，所以才会在30年代把中级以上的军官几乎“清洗”光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两个元帅的回忆录都证明了此点。朱可夫说，1939年夏在中蒙边境发生日军进攻的“诺门罕事件”时，他奉命去做总指挥，发现有的师长是由尉官担任，因为师内的校官全部被捕或杀掉了。）华西列夫斯基在1939—1940年的对芬战争中到前线也发现很多师均由尉官指挥，因为校官都已被镇压了（包括被捕）。

莫洛托夫看出，斯大林逝世前几天，只有贝利亚一个人最活跃，一切都是贝利亚在做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完全是这么说的），他们的性命当时全握在贝利亚一个人的手中，所以政治局诸人才不得不联合国防军来消灭贝利亚等人，以求自保。莫洛托夫还说：

“我不能排除是他（指贝利亚。——引者注）对斯大林下了毒手，因我从他的话语中觉察出一些……比如1953年5月1日在列宁墓观礼台上他作了这种暗示……显然是为了引起我的同情，他对我说：‘我把那位给收拾了。’好像是给我帮了什么忙似的。自然他的意图是要改变我对他的态度：‘我救了你们大家！’”（第292页）

斯大林之死，迄今还是一个谜，难下定论。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斯大林最信任的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竟希望他快死。《赫鲁晓夫回忆录》也载明：在半夜，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个有决定作用的人得报去别墅，看到斯大林不省人事后，却故意命令侍候的人们说，斯大林睡着了，不要去惊动他，根本不找医生来抢救，三个人扬长而去，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三人再来，斯大林仍未死，这以后才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请医生抢救……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一句不解释，他们眼见斯大林已完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马、贝、赫三人为何不找医生，为何三人一起扬长而去……这些显然证明：他们不去救斯大林，希望他快点死。

莫洛托夫说，在斯大林的授权下，“他（指贝利亚。——引者注）整理了所有人的材料。还整理了斯大林的材料。当然也整理了我的，嗯，不是材料，而是……”（第406页）莫洛托夫没有说下去，当然都是要他命的“罪状”。所以莫洛托夫再一次证实了当时杀人时（不包括一般的刑事犯）的罪名其实早已编好，就看什么时候用或不用的问题了。

莫洛托夫贬低斯大林身边的一切人， 而反复称颂一个人——日丹诺夫

莫洛托夫自我感觉良好，他似乎真觉得自己是斯大林以下的第二号人物。所以，他看不起列宁身边的一切人，也看不起斯大林身边的一切同僚，如在苏联被视为圣人、完人以及超级能人的斯维尔德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等，都被莫洛托夫贬得一文不值。说基洛夫的唯一本事就是会对群众大作鼓动演说。至于对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这些人，莫洛托夫更看不起，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似乎不够斯大林分子资格。贬得少一点的，是对卡冈诺维奇，因为这个人对斯大林太忠实了，所以可贵。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说，卡冈诺维奇对莫洛托夫不很满意，他批评莫洛托夫对死后的斯大林歌颂得还不够。

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不断地被莫洛托夫反复称赞，而且是充满感情的，这个人就是日丹诺夫。我随手记了一下，很不完全，莫洛托夫在书中至少称赞了日丹诺夫8次。无关紧要的称赞就不去说了（对其他任何人，除了斯大林之外，都没有这么称赞过）。莫洛托夫告诉了我们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信息：

“基洛夫组织能力弱，他是一个好的群众工作者（这两句话根本矛盾——引者注）。我们对他也很好。斯大林喜欢他。我要说，他，是斯大林最器重的人……”（传说基洛夫曾是斯大林的接班人，看来并非全是胡说。——引者注）

“我同基洛夫私交甚好。在我的记忆里，斯大林对基洛夫的态度，或许只有后来的日丹诺夫能与之相提并论。基洛夫死后，他喜欢日丹诺夫超过任何人。”（第374页）

在另一个地方，莫洛托夫又说“斯大林对日丹诺夫分外器重，对他的态度简直好极了。”（第386页）

至于莫洛托夫本人，对日丹诺夫也是五体投地的。这种赞美主要是来源于思想的一致。莫洛托夫说：“我认为他的文章，晚年时期的一些谈话（当然指日丹诺夫晚年的各种大批判报告。——引者注），很有意思。”（第386页）

莫洛托夫把日丹诺夫看得比基洛夫高明得多，也重要得多。当访问者问莫洛托夫：“他比基洛夫能干吗？”莫洛托夫答道：“比基洛夫？当然强。大家都说他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不管怎样，应该说他（文化）修养不错。”（第386页）

莫洛托夫这些话，证明我几十年一个不变的观点：要说苏联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第二号人物”的话，这个人物就是日丹诺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此点，我同蓝英年交谈时，一谈就通。蓝英年还说，有些多年研究苏联问题的人，对此竟无感觉，你就知道他的程度如何了。在斯大林手下，尽管长期以来似乎是马林科夫管的事最多，实权似乎最大，但那不过是一个“宫内大臣”而已，短时间内是难于摆在党和国家的“第二号”岗位上去的。但是，日丹诺夫与斯大林在遗传学批判上大概是发生了矛盾，似已失势，日丹诺夫也立即在1948年8月逝世，此时才是马林科夫在内部正式升为“第二号人物”了。1949年12月21日《真理报》报道政治局10人向斯大林70寿辰致的集体颂词，名单不依字母顺序，前三名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莫洛托夫系循例照顾，马林科夫已正式取得继承人的身份了。这证明，斯大林旁边的“哼哈二将”，正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

以莫洛托夫的政治思想状况，只对日丹诺夫一人赞不绝口，这不是中国人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

莫洛托夫证实了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斯大林在干什么

从上述资料总可以证明莫洛托夫是个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者了吧，莫洛托夫总不会有什么诬蔑和毁谤斯大林的可能吧？赫鲁晓夫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对斯大林有批评，有些将帅的回忆录对斯大林也有所批评，即斯大林在德寇开始进攻的最初几天什么也没有干，人也见不着。这是否造谣呢？请看看莫洛托夫对这件事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战争爆发初的几天里，“他（指斯大林。——引者注）两三天没露面，待在别墅里。不用说，他难过得很，郁郁不乐，人们全都不自在，他尤其如此”。（第 395 页）过去的一切传说，也大都不过如此而已，在中国一直把这说成是反革命造谣。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讲的也并没怎么添油加醋，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二，丘耶夫念了段阿夫托尔汉诺夫《权力学》一书中的一段话给莫洛托夫听，该书说，战后几天，“大家来到斯大林别墅，请他发表告人民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众人遂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答：“是的，是这样，大致是对的。”（第 394 页）

丘耶夫又说：“（大家）提议让斯大林领导红军最高统帅部，可是他拒不接受。”

莫洛托夫答：“他何以要独揽大权？他本来就是领袖，怎能让琐事缠身，抓那些芥豆小事呢。他拒绝了，这当然是对的。”（第 394 页）在莫洛托夫眼里，斯大林拒绝出任抵抗统帅，也是“当然对的”。

要不是莫洛托夫出来证实，谁会相信这些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会是事实呢？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希特勒的数百万装甲部队、成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从北到南在同一秒钟向苏联发动了猛烈的全面进攻，全国不知所措，可是斯大林几天不见人、不理事、不表态，不发表告人民书，拒绝担任最高统帅。现在莫洛托夫不容置疑地证实了（甚至比赫鲁晓夫批评的还要多得多），在中国现在还是有人坚决不相信这些——因为这确实也有点叫人难于相信。莫洛托夫要不出面证明，谁会相信呢？

即便在这种时候，莫洛托夫仍不忘替斯大林辩护，说是“琐事”、“芥豆小

事”！在莫洛托夫们的眼中恐怕除了内部大镇压外，其余的，包括亡国危险到了眼前，也是“芥豆小事”！

事后斯大林（也包括莫洛托夫等）开口闭口就反复强调希特勒“背信弃义”，似乎原以为希特勒是不会或不应当“背信弃义”的。每次看见这种可笑的责备，我都感到无比的痛苦与惊讶，世界上谁曾经认为希特勒是个遵守信义的君子呢！

写这篇东西，不需要才能，只需要耐着性子和笨工夫。九十衰翁，溽暑为此，能否完篇，未可为必。今幸凑成，亦云幸矣。无他，仍不过是《诗经》上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两句话在起作用而已。

101. 我们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什么教训？

黄宗良

全面地、正确地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是十分重要的。总结历史教训主要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未来的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的。苏联模式的长处和弊端对中国都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改革就是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总结得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向。比如，离开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去谈论加强党的领导，离开发展、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这一根本任务，本末倒置地把意识形态工作、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放在第一位，离开保护人权和政治文明建设、把“刀把子”当成“一抓就灵”的武器，那不正是要重蹈苏共的覆辙、重犯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吗？

现在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因为有了近 20 年来国内外从各个方面的总结，又有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实践中产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参照。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要处理好一系列的矛盾统一体中矛盾双方的“关系”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常常不是机械地划清姓“社”或姓“资”，姓“马”或姓“修”的界限问题，问题常常出在“过”或“不及”，错误往往是由“真理向前多走了一步”而产生，即过火、过“左”、过急，因失控失度而招来祸端。因此，本文对苏联剧变的教训的总结就从如何处理好建设好社会主义中若干对“关系”的角度来谈。

是否建立密切的党群、官民关系， 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是一个天天挂在嘴边的老生常谈问题，是一个人们都听腻了的问题，但对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最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选民中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这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历史事实。苏联解体前夕，在1991年6月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的竞选中，已经宣布退出苏共的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当选，而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雷日科夫得票率只有16.85%。这绝非偶然，而是苏共长期脱离民众的结果。

一个在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宣布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绕开这个问题去研究如何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说是隔靴搔痒。

说到底，这是一个执政“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是执政党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靠什么取得政权？靠其纲领、路线、政策代表广大工农兵的利益和要求〔见本书（7）《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一文〕。那时党处在在野地位，没有权力，它能用枪支把民众驱赶到自己这边来吗？但是取得政权以后地位就变了。党掌握着包括军队、警察在内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手中有号令一切的大权。党不仅是领导者，而且是执政者、管理者，用什么保证自己永远处于人民公仆的地位而不是骑在民众头上的官老爷？

尽管苏联宪法标明全部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尽管党的宗旨和纲领表明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党，但是人民并没有切实的知情权、参与权、民主选举权、民主监督权。这就不能体现党的宗旨、纲领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民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还是社会团体的选举）长期流于形式，委任制被滥用，监督制度和机制极不完善、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和党政官员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于是漠视民众、巴结上司便成为

官场常态，庸人、奸人、小人出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在这种体制下，久而久之便不可避免地形成高踞于民众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掌握党、国家和社会全部权力的这个阶层，他们口头上讲的仍然是马列主义，是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他们的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志趣情操已经同广大工农和普通知识分子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何谈“血肉关系”！党群、官民关系的疏离，正是造成广大民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对社会主义信仰发生危机的真正根源。问题的实质是党政官员而不是民众对社会主义理想和原则的动摇背弃。

1991年6月，即苏联解体的前夕的一次调查表明，在苏联的高层干部队伍中，3/4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明证。

这种体制是在“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总体框架下产生的。“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放弃了“人人当官”，人人参加管理的设想而提出的正确结论。如何保证党正确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必须有民主的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缺乏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条件下，少数领导人大权在握了，不谦虚谨慎了，自以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实际上是把一些激进的、不切实际的措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强加于广大人民群众；遇到不同意见者、敢于抵制者，便滥用职权，在捍卫社会主义利益、保卫党的路线的旗号下，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加以批判、“清洗”和镇压，造成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难以抚平的硬伤。这就不仅仅是脱离群众，而是走到民众的对立面了。这样的执政党，民众怎么可能把它当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众又怎么可能由衷地拥护呢？

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实践的结果就只能从未经实践检验的设想、既定的目标出发搞社会主义。斯大林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就匆忙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赫鲁晓夫又提出20年内把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宣布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都是一脉相承的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在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牢靠的物质文化条件的背景下宣布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又不能不过分地依赖国家机器、依靠强制性的力量来支持和运转，自然根基不牢，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

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同广大民众的关系是全部政治建设，包括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的中心问题；共产党成功执政的根本保证在于，把诚心诚意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作为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和根本路线。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建设的关键应该是废止滥用委任制，切实保障选举人的民主选举权利；思想建设上要真正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观念。

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政治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进行

共产党人搞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为了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提高其自由民主程度，最后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政治文化中封建专制主义残余浓厚，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十分繁重。

在这样的国家里，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前就发生过争论。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他反对认为缺乏这个经济文化前提就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① 简言之，先夺权，后建设；先政治，后经济。这种思路是适应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问题在于夺得政权之后怎么搞。

取得政权之后也仍然面临着政治任务：被推翻的阶级不可能不企图复辟，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巩固自己的政权；即使在政权得到巩固，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也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顺利推进经济建设，完成生产任务。

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哪个是中心、是根本、是基础性的？

尽管列宁处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和复杂，他对政治与经济建设任务的关系的观点仍然是十分明确的。他一有机会，哪怕是在战争期间的喘息时机也要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他十分明白，管理俄国“单靠专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77页。

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住的”。^①

斯大林倒不是像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认定的那样，只注意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注意抓发展生产力。他提出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立起其经济基础，而重工业是基础的基础。这当然是唯物主义的。他还反对在贫穷生活的基础上用拉平的办法搞社会主义。^② 客观地说，他并没有像后来中国的极左派那样，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位置。问题不是他重视政治任务，而是没有把握好政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没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来抓。他过分热衷于依靠阶级斗争、动用专政手段。当他提出“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经过“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的道路来使国家消亡时，^③ 他已经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实际上陷入了“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他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搞“大清洗”、大镇压，不仅造成大量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因为挫伤、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上层建筑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基础进行，而不是相反。但认识到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不等于就能够把经济建设搞好。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运转自如的经济体制。苏联实行的是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认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由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生产与消费需求相脱节，生产者的贡献与取得的报酬不相一致，因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恒久的活力，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经济。

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还必须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以改善民生为发展的重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即大炮与黄油、导弹与面包的关系，重军工、轻民用（工业）。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以及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传统的影响，苏联的国防开支、军工生产大大超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限

①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241页。

② 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37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90页。

度，给苏联背上沉重的包袱，使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加上苏联发展观念和战略中历来都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等，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有的以人为本的观念，使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受影响，从而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民众的吸引力。

没有摆正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位置，经济发展又不尽如人意，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苏联剧变教训告诉人们：执政党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中国共产党今天坚持的这些执政理念，正是对包括苏联剧变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个人集权必将使党丧失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最重要理论结论。这些掷地有声的论点实际上也是对苏共亡党丧权教训的深刻总结。

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20世纪初、在建党初期创立的。其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是与官僚的集中制相区别。但实际还是强调集中。这在革命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很有必要，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凝聚党的力量、统一全党意志和行动所必需的。但共产党是主张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政党，党内民主不仅是保证正确集中的基础，而且也是共产党员政治生活的需要。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列宁虽然生活在非常需要强调集中的夺取政权时期和政权建立初期，仍然积极地发展党内民主。比如，即使在炮火连天的国内战争时期也按期每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及其最高领导人的错误等等。

但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之后，党内民主一步步遭到削弱、破坏和践踏。这主要表现在：党内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形成实际上的广泛的委任制；党内监督十分薄弱，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成为相应的党委会

领导的检查党委决议的执行情况和处理违纪党员的机构；党员民主权利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持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民主权利，甚至身家性命都得不到保障；特别是集体领导制度受到削弱和破坏，形成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体制。

这种体制形成的途径是不按党章的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从而实际上使具体工作机构、办事机构置于权力机关、领导机关之上。从十三大（1924年）到十九大（1952年）两次党代会之间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由1年到2年到3年到4年到5年到13年。斯大林漠视全党代表大会的权威，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全会”，是“全会决定一切”。^①这显然是违反党章规定的言论。但他实际也没有按党章的规定召开全会。据统计，把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全党代表会议加在一起，1923—1929年年均3次以上，1930—1936年年均约两次，1937—1952年，年均不到一次。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中央全会权力小于政治局，政治局的权力小于书记处，书记处的权力小于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办公室不言而喻是听命于斯大林。这样，党内权力体制就变成背离党章规定的金字塔。它自上而下是：总书记—斯大林办公室—书记处和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全党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发号施令、裁决一切的是处在权力顶端的总书记。

在这种权力体制下，苏共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决策，常常是由少数人，甚至是个人决定的。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表现尤为突出。在苏联历史上，全盘农业集体化和30年代“大清洗”是两个长期影响着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而在这两次重大的运动中，斯大林不止一次是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方针性指令的。

个人集权制的形成，个人专权作风的强化，是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崇拜思想同时又反过来助长和强化个人集权制。斯大林不仅接受，而且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底斯大林五十大寿全国为他祝寿开始到他去世，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成了任用干部的标准，成为苏联“臣民”们必须遵守的“法律”。

斯大林之后，苏共党内民主有了某些改善。起码是全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大体按时召开了。赫鲁晓夫执政11年，召开了3次党代会，34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28页。

次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召开全党代表大会 4 次，中央全会 48 次，政治局会议从二十四大到二十六次 10 年间开了 451 次，年均 45 次。

不过，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没有改变党内权力体制、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的基本框架。尽管个人崇拜受到批判、集体领导得到强调，在他们各自执政后期，还是不同程度地重复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错误。1979 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这是苏联在国际社会被搞得声名狼藉的重大举动，但是据不少材料披露，这个重大的决策竟是由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几个人商量后就作出的。^①

个人集权、个人专断是苏共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和破坏的集中表现。因此，苏共面临的改革的方向毫无疑问应该是发展党内民主。那么，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新思维为指导思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为何把苏共推上绝路呢？

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在经济上是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话，在政治上可以说是既无正常的民主，也无正确的集中。苏共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控制，有“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靠垄断意识形态来维持党和国家的“思想统一”；“硬”的一手主要是靠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靠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戈尔巴乔夫大讲“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这些口号一般来说并没有错，但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即“没有限度”、“无条件的民主”、“大小事情都要有公开性”。^②在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统制和思想禁锢的过程中，对新闻、舆论工具完全“开禁”。这样一来，思想由“高度统一”到完全失控。

发展党内民主确实是此时关系到苏共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能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和“度”，造成了两大恶果。一是从淡化民主集中制走向党内派别化，使党内有不同纲领的派别争斗不休，难以统一。另一个恶果是党中央同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关系由原来的过分集权走向党的联邦化。

① 详见（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4—279 页。

②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 年）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 年 2 月 19 日。

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等于砍断维系着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根钢索。苏共的分崩离析使国家解体不可避免。

当苏联处于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当权却比改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联改行总统制以后，党和国家分开了，政治局被撇在一边。在形势越来越失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越来越大的权力。这实际上说明政治局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优柔寡断、目光茫然的“舵手”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重大决策便是“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宣布的。这真是苏共领导人个人专权的传统体制给这个“90 高龄”的党的最后的致命一击，是这个党最后吞下的一颗永远也消化不了的苦果。

为什么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即下令解散一个有 1800 万党员的党时，苏共各级组织和党员竟惊人地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的缺失造成党员长期缺乏积极性和主人翁感，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早已丧失，表面上的一致性掩盖着政治分歧、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无力。这样的党，自然经不起社会政治风浪的冲击。

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又是其后继者， 二者既有对抗，又有共处与合作

如果说党群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对最重要的内部关系，那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则是一对最重要的外部关系。

关于如何认识这个关系，笔者曾在自己主编的著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史论》的结束语中，在《实行对外开放、利用西方文明成果的若干历史经验》一文^①中，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社”、“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关系，而不只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这里主要说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国家关系和文化方面的关系。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这里不准备细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是实行世界革命战略还是实

^① 见《北京大学学报》1993 年第 1 期。

行和平共处政策？这二者常常是矛盾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这些词句使得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旗号、包装。因而70年来它自始至终都未放弃这个思想，只是国际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民族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

苏联在世界称雄争霸对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和深刻的。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相互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其实，苏联对外政策战略目标常使内政被置于服从的地位。为了实现对外政策战略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方针不易改变；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农业落后的状况长期无法理顺；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易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无法调整，军费负担沉重，从而限制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

苏联扩张主义有一个认识根源，对资本主义世界新的发展、新的情况缺乏正确估量，苏联长期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腐朽的、危机不断深化的。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估计，苏共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经受着总危机”，1971年二十四大虽然提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在适应世界新形势”，但仍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苏共二十五大进而强调“当前的资本主义能避免危机的神话——已经破产”。1981年二十六大的提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半个世纪过去，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苏共看来，仍然是“总危机”，实际情况如何，便充耳不闻了。这是苏共搞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观点同时影响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而来的是对两种制度长期的和平共处缺乏足够的耐心，对对外开放缺乏紧迫感，而是凭着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到处扩展，同美国争霸天下。

总之，把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对立起来。在苏联与西方对峙、对立、对抗的条件下，东欧国家的发展也被限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面，任何背着苏联“老大哥”与西方国家发展外交、经济、文化关系的努力都必须同苏联的步调一致，否则就都可能引起苏联的怀疑，甚至被视为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背叛。当然，这里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客观上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军事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封锁、文化上的渗透政策。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

义国家应该也只能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

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列宁有一个提法：“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①人们常常记住“掘墓人”而忘记了“后继人”。列宁对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问题，认识是很正确的、精辟的，而且是比较一贯的。他有的话说得很肯定。如他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② 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把这个不少人熟悉的公式再抽象，便是苏维埃政权 +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 社会主义。^③

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表明他对此缺乏足够的理解。

长期以来，人们一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都看成姓资、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结果使这些文明成果变成似乎资产阶级一家独有。其实，许多东西是属于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经验，是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是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用甚至是不用不行的，不用就会偏离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大道，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比如市场经济问题。苏联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转机制的病根子，就是始终未能处理好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看成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当时党纲就规定要用产品分配代替贸易，准备取消商品。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使列宁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要性。到了工业化时期，斯大林批评了布哈林使市场“常态化”的理论，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已到了商品货币不断消亡的阶段了。到了50年代初，斯大林的认识有了变化，提出了“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但又留下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同有

①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9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2—173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20页。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对立的、对生产没有调节作用等教条。^①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开阔了人们在市场问题上的理论视野，苏共二十大纲领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是到了1960年后半期，当东欧改革掀起新浪潮，人们对市场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时，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联又发起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斥之为“反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同公有制、计划生产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是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按劳分配等等。^②

在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上认识的几起几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起来反抗束缚经济发展的僵硬教条。可惜它始终未能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经济模式。直到80年代初，苏联95%左右的物质仍由国家统拨。苏联认识到必须实行市场经济时，已是积重难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又进一步使苏联经济全面失控，急剧滑坡，陷于“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可悲境地。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崩溃几乎是同步的。

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成果，也应该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比如资本主义的选举制、任期制，是在同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的斗争中产生的，是与封建主义的世袭制、终身制相对立的，是比后者进步的制度。它们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有，还包括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该批判继承的民主政治和一些具有共同规律的东西。

苏东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对于苏共垮台是有决定意义的。这种弊端的产生并长期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也可以说是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完全对立起来，没有注意批判吸取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结果。人们很难找到斯大林谈论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经验的言论。

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什么？人们常说是“高度集权”。其实，这么看还未抓住关键。其致命的弊端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安全机关对包括高层人物在内的全社会的控制、监督 and 无法无天的镇压；另一个是监督制度的机制薄弱、极不完善，尤其是最高领导集团、最高领导人之不受监督和制约。在苏联，

① 《斯大林文选》，第581—589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译：《苏联理论界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92页。

监察、监督机关缺乏相应的、实际的权力，而权力是必须用权力来制约的，最需要制约的恰恰是监督体系达不到的地方。于是，最高领导人所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和灾难的错误、罪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只有在他们身后，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败北之后，才能受到揭露和清算，可那已经太晚了。

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应用“权力制衡”原则而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这个“分权”实质上就是剥削阶级对于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的分享，它对于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管理是有效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但却不能把它所蕴涵的权力制衡原则一起抛弃。权力制衡原则是人类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总结，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被滥用和权力腐败的重要规则，是任何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健全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时必须加以吸取和借鉴的文明成果。

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又涉及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关系。由于已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共产党执政后对封建主义残余严重存在又都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下大力气肃清其影响，致使其在社会主义嫩弱的机体里潜伏下来，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甚至猖獗一时。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出现的错误，往往正是封建主义残余对资本主义进步的东西的抵制和反动。

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要坚持“自愿联合”和 “权利平等”的原则

长期以来，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苏东剧变中；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瓦解同国家的解体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相结合的结果。当然，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从内容到表现形式均有一定差别。这里从苏联的情况出发加以总结。

第一，决不能把民族问题、民族矛盾简单地等同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这二者有密切关系，但前者比后者要复杂得多。苏联在民族问题上就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把民族矛盾和斗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他们把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

不加分析地斥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把它作为阶级斗争问题，作为反动的东西加以批判和压制。民族主义的根源，被笼统地归结为旧社会的影响和国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斯大林将它称为“资本主义残余”。^① 苏联学者说，这种倾向与劳动人民的利益毫无相容之处，它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残余势力的利益，其客观结果是在敌对国家面前分裂劳动群众；认为这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弊端—旧习惯、旧风俗和旧传统的余毒，是企图复活民族情绪和观念的国外帝国主义宣传影响的结果。在苏联，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一直受到无情打击，并且在政治上不得翻身。

第二，要坚持各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充分自主权。苏联的几部宪法都规定了各民族自愿联合、权利平等、自由退出的原则，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强迫合并，对鞑靼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对民族平等的粗暴践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自主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都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威胁多民族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苏联的教训告诉人们，必须谨慎地区别各民族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与民族主义的界限；必须在保持中央必要的集中权力与尊重各民族的自主权之间寻找合理的“度”；在实行联邦制国家，还必须正确处理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与国家结构上实行联邦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前者而限制和剥夺民族的自主权，也不能因为后者而实行党的联邦化。

第三，要充分估计到民族问题的解决、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列宁曾经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即民族运动的觉醒、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后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化的标志。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毕竟是在没有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估计这两种趋势在苏联的表现，对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苏联的官方民族理论片面地强调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的趋势，没有充分估计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把民族矛盾的消失、民族的统一过程等同于公有制经济基础、共同的阶级结构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上，他们把它简单化为：民族平等导致民族繁荣、

^① 《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9页。

导致民族融合。事实上，平等如果被搞成平均主义（这是很容易出现的），先进的民族不满意，落后的民族形成依赖性，因而未必就能促进民族的繁荣；而民族的繁荣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民族的统一和融合，因为一些落后的民族很可能由于民族经济文化大发展而萌发和加强了民族独立意识，努力谋求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强调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增强离心的倾向。

由于片面夸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趋势，就很容易采取某些人为加快这一统一和融合趋势的措施，欲速则不达。与此同时，也容易把另一种趋势、把任何追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都视为倒退的、反动的，给予压制和打击，而不是通过制度化和某种机构对各民族的合理利益和要求进行协调和保护。这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的根源。

必须坚定不移推进体制改革，改革中要处理好改革、 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

这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苏联剧变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教训。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在批判个人崇拜、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和开始实行干部更新制度，以及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努力。对赫鲁晓夫主持的改革，要肯定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意义和作用。他的改革顺应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并非个人头脑发热之举。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首先是他没有突破原来僵化的体制，当然改革中的错误造成了某种不稳定和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政策和若干措施，对纠正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造成的混乱、稳定社会起过积极作用。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实行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上的稳定在苏联这个阶段的发展中起过好的作用。但勃列日涅夫对“稳定”的片面强调成了社会走向停滞落后的起点。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实际上被取消，导致干部队伍，特别是高层领导的年龄老化、思想保守和僵化。经济体制方面则连“改革”的字眼也不再使用，而代之以“完善”。“完善”的结果是加强了集中的计划领导，产品经济模式没有触动。加上对外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的衰退。所以，这种“完善”、“改良”，促进了旧

模式的“成熟”；而“成熟”掩盖着矛盾，孕育着、潜伏着危机。^①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已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段历史，提供了为求稳定而放弃改革，结果为社会更大的不稳定埋下祸根的实例。勃列日涅夫使苏联失去了几乎是最后的改革时机。历史说明，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已处于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时候上台执政。此时毫不犹豫地就把改革提到日程是对的。但如何把握既要推进改革又要保持改革本身所需要的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二者之间的合理的度，是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

80年代中期苏联前途有两个“必然”和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并不是绝对必然的；苏联原来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的状况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苏联崩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则不是必然的。

研究苏联为何剧变，要先弄清楚它原来是靠什么维持的。它靠的是一软一硬。软的是思想教育，即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人，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引人，用党掌握的舆论工具统一社会舆论和人们的思想。而实际上在苏联的停滞和衰退年代，甚至更早，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特别是年轻人）由于官僚特权阶层的腐败，在西方的宣传攻势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剩下来的就是硬的一手，即靠党的纪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军队为支柱的国家机器。如果在使用硬件时再不得当，社会全局就会失控，天下大乱。

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受挫之后，把改革的重点转向了政治领域。这样，原来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被打乱，经济状况则由于人们注意力转向政治斗争而继续恶化，使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丧失信心。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由“官僚阶层”所体现的改革的“阻碍机制”。于是清除这个“官僚阶层”、不加分析地把大批干部当成改革对象必然要大规模撤换干部，使改革失去了大部分本来经过教育可以依靠的力量。

戈尔巴乔夫想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手段来扫除“阻碍机制”，实行“多元化”。但他在提出这两个口号时，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制度建设。政治上

^① 黄宗良：《苏联政治与苏联剧变》，宫达非主编：《中国著名学者苏联剧变新探》，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297页。

的多元化使党内有派、党外有党，难以达成共识，苏共没有起到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作用；搞全民选举的大民主，不顾现实条件地照搬十月革命时期提出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社会出现权力真空。结果，在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危机深重的大地上诱发出两个东西：一个是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一个是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

党的削弱、涣散和瓦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社会舆论揭露苏共历史错误大大损伤了苏共的形象和威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削弱了党的权力；多党制的出现，否定了党原有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放弃造成党内派别林立和实际上党的联邦化倾向。作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变化使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失控，使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国家解体趋势难以挽回。

军队在政治思想多元化的社会氛围中，早已军心四散，政治倾向早已分化。1991年“8·19事件”中，试图挽救危局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去执行最重要任务的部队倒向叶利钦。这不仅宣告苏共传统派的彻底失败，也表明了主流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也失去了政治主导地位。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

苏联剧变的教训告诉人们，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时要看到，必须在推进改革和保持社会稳定二者之间寻找和掌握合理的度，任何片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社会稳定应该是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得到合理协调的结果。这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做到。改革就是除旧布新，解决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新的基础上求得新的稳定。但改革本身，不可能不打破旧的平衡，不可能不触动僵化体制维护者的利益，甚至不能不在利益的重新调整中触动许多人的旧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想和习惯，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震荡。但是如果求稳怕乱，畏缩不前，只能积重难返，最后走入死胡同。当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有无正确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方法。就方法步骤而论，改革必须保证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此，必须考虑社会绝大多数人对改革措施的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必须谨慎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就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根据实践而不是根据书本来谈论社会主义**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对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丧魂落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苏共的失败从思想理论工作来说，首先是教条主义，是“左”的、僵化理论带来的恶果。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右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惩罚。

列宁是实事求是的，十月革命后六七年中，正是他领导着党根据俄国国情和实践经验不断地、及时地提出对社会主义的新看法。斯大林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作过某些贡献，他的错误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把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模式化，并以教科书的形式给后人留下影响很深的僵化教条。他去世之后，许多僵化的“左”的理论观点长期统治着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阵地。

教条主义就是脱离实际，不是面对现实、面对矛盾、揭露矛盾，用妥善的办法缓解和解决矛盾，而是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捂住矛盾，粉饰现实，有时竟到了自欺欺人的地步。“实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不断自我调节，在发展，他们却长达半个多世纪闭着眼睛唱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老调，而不去研究人家的新情况。在民族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教条主义不面对事实、回避矛盾的特点。明明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从60年代开始，苏联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发展起来，不仅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乃至恐怖活动，而且不断出现各种民族组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还是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并且是“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①由于教条主义的理解，当民族问题尖锐地表现出来以后，他们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方面是没有充分意识到民族矛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所等编译：《苏联民族问题文件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343页。

的严重性，一方面又高唱“民主化”、“公开性”，于是，民族分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苏联的分崩离析正是对他们的教条主义民族理论和官僚主义地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的无情讽刺。

教条主义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是唯上、唯书。苏共长期持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观点，就是这种唯上、唯书的典型表现，而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矛盾视而不见，不予承认，也都是拘泥于“经典”结论的结果。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使苏共无力回答和解决，或以错误的认识和方式回答和对待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对民众的形式主义的“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概源于此。这样，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起来，长期习惯于搞教条主义、广大民众早已厌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还能打胜仗吗？

唯上、唯书，轻视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根源，是对“自发”和“自觉性”的片面认识。一百多年前，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批判了“自发论”，提出要从“外面”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自觉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领导作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解成党是天生正确的，人民群众的任何“自发性”都是倾向于“工联主义”（机会主义的一种）、非社会主义的，那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历史证明，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史上发生的党的领导的错误有不少是由人民群众“自发”的“运动”来纠正的。

唯上、唯书的制度和体制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包括意识形态部门在内的选人用人缺乏民主机制。官员们只能听命于上级，任何从实际出发，反映民众呼声、要求和利益的努力，只要与上级稍有“不一致”都可能给个人带来负面影响，理论创新哪怕是正确的都可能带来“麻烦”；而唯上、唯书，无条件地保持“高度一致”才是明哲保身，平平安安做官升官的最好办法。僵化的理论正是来源于僵化的制度。

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一个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当成是封闭的体系、终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在同对立面的相互斗争中、相互比较中克服和战胜错误的理论和思潮，同时也吸取其他思想理论中新的科学成就，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成为永远生气勃勃的科学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封闭的体系，当成绝对正确的终极真理，把其他理论，包括资本主义的

文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戴上姓“机”、姓“资”的帽子，最后只有使自己的理论萎缩、老化、僵死。这样就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在“意见多元化”的思想领域里很快败下阵来？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观点已经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搞教条主义只能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阵地。^①

苏联剧变为我们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提供的教训是：第一，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搞个人专制、一言堂，搞文化专制，理论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话。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说到底是要使其深入人心，为此必须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的思想教育方式。不管受众接受不接受，“灌输”就是一切，是对理论思想教育不负责任，是一种消极怠工的行为。第三，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只有培养一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唯上，不唯书，尊重民众实践经验，不当风派，敢说真话，善于思考，敢于探索的理论队伍，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社会主义事业才有希望。正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① 黄宗良：《教条主义与苏联的解体》，见《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20页。

苏联大事记^①

吕瑞林 左凤荣

1917 年

2月23日，为纪念国际妇女节，更为了抗议面包短缺，彼得格勒约13万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打出了“面包!”、“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

2月25日，彼得格勒几乎所有企业都停工，参加罢工者达到30多万人，一些工厂还成立了战斗队，罢工开始具有全社会的性质。沙皇军警开始镇压，局势渐趋平息。

2月27日，士兵开始起义，各政党开始采取行动，影响事态发展，成立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

3月1日，沙皇同意“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模式，要求在他回到彼得格勒前军队不要采取行动。

3月2日，杜马和许多贵族将领要求沙皇为国家作出牺牲，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把皇位让给其弟米哈伊尔大公。米哈伊尔拒绝这样接受皇位，俄国君主制终结。

^① 俄历1918年2月1日列宁宣布改用公历，此后日期均为公历，此前日期为俄历，俄历比公历早13天。

3月2日，临时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李沃夫公爵任总理兼内务部长。宣布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等。

3月20日，列宁发表《远方来信》提出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等看法，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彼得格勒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赞同。

3月27日—4月2日，布尔什维克举行全党工作者代表会议，会上就如何巩固民主革命胜利问题展开争论。斯大林认为：“只要临时政府在采取巩固革命的步骤，那就给予支持，只要它是反革命的，支持临时政府就不能容许。”会议选举4人组成的代表团，负责与孟什维克谈判联合问题。

4月3日，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卢那察尔斯基等乘“铅封车厢”从瑞士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在彼得格勒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4月4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的提纲刊登在4月7日《真理报》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思想的核心是要解决政权问题，即布尔什维克应该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为把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4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比2票否决了《四月提纲》。多数中央委员也反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

4月14日—22日，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全市代表会议上，列宁被选为会议的名誉主席，经过列宁的耐心解释，列宁的路线得到大多数代表的拥护。

4月24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51人，代表8万多党员，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的提纲。

4月28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召开，决定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建议被否决，大会选出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256名正式委员中，布尔什维克只有35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分别占107名和101名。

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和士兵举行示威游行，举着“打倒战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标语，布尔什维克威信大增。

7月3日—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走上街头，反对临时政府、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被支持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打击。

7月6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等布尔什维克领袖。

7月11日，苏维埃发布《告军人书》，承认和服从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布尔什维克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7月24日，李沃夫辞职，克伦斯基出任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部长。

7月26日—8月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秘密举行，列宁未能出席，大会讨论制定了七月事变后的策略，实现了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统一，托洛茨基被选为中央委员。

8月24日，总司令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迫使克伦斯基政府寻求人民的支持，甚至包括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所有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及其所属赤卫队都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到9月1日叛乱被粉碎，科尔尼洛夫被捕。

8月—9月，列宁在藏身地芬兰的拉兹里夫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

9月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

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9月12日—14日，列宁连续给中央写了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认为时机成熟了，应当夺取政权，制订武装起义的总计划。

9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讨论了列宁的信，会议决定近期举行中央会议讨论策略问题。

10月7日，列宁乔装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10月10日，列宁出席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武装起义的特别会议，会议要求各级组织按照武装起义的方针开展实际工作。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表《论时局》的信，反对武装起义的方针。

10月16日，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批准了列宁关于起义的决定。

10月18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短评，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致命的举动。

10月20日，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0月23日，为了防范起义，克伦斯基下令查禁布尔什维克报纸，重新逮捕布尔什维克领袖。

10月24日晨，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部署起义事务。《工人之路》报被查封，士官生试图占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命令，命令各团队做好战斗准备。当天下午5时开始，起义武装占领彼得格勒战略要地。

10月24日晚，列宁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与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一起领导起义。

10月25日晨，整个城市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10时，发布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克伦斯基以“决定亲自去迎接开来的增援部队”为由，乘坐美国大使馆的小汽车逃跑了，临时政府处于群龙无首状态。

10月25日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此刻，攻打冬宫的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下，赤卫队员和士兵冲进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彼得格勒起义取得胜利。消息传到斯莫尔尼宫，卢那察尔斯基宣读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10月2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提出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全部土地归国家所有，交给农民使用。选举产生新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1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29名，其他党派10名。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

10月2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

11月3日，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的凯歌中行进。

11月10日，全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废除旧的等级制度，全体公民一律以“俄罗斯共和国公民”称呼。

11月12日—15日，举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共选出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17名，其他党派和组织的代表88名。

11月22日，宣布撤销各级旧法院，地方审判员直接民主选举产生。

12月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以捷尔仁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这是一个实行“红色恐怖”的机构，常常不经审判就处死被认为是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

12月初，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正式达成联合组阁协议，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

12月15日，俄国和德国同意休战。

1918年

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会议拒绝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会议。

1月6日凌晨，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1月13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通过了两个代表大会合并的决议，并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国为工兵农苏维埃共和国。

1月15日，列宁改变了不建立常备军的政策，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月28日，负责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托洛茨基发表声明，拒绝在割地赔款的和约上签字，同时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复员军队，谈判中断。

1月29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红军和红海军均实行

志愿兵制，6月下旬根据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报告，改为义务兵役制。

2月18日，德军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新的全线军事进攻，当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同意与德方恢复和谈，德军占领一些城镇。

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

3月3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式签署。

3月6日—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大会以30票赞成，1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决议，接受布列斯特和约并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

3月14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并决定将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苏维埃政权获得“喘息”时机。

5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法令要求农民在一周内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判10年以上徒刑。

5月13日，通过粮食垄断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国家垄断粮食买卖和实行固定价格，自由贸易实际上被禁止。

5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叛乱。

6月，英、法、美、意四国混合部队4万多人在俄国北部登陆，日本、德国等也乘机出兵，对苏俄进行干涉。

6月11日，成立贫农委员会，任务是在农村代替苏维埃掌权，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具，协助当地粮食机构没收富农余粮，在分配粮食和农具时给予贫苦农民以优待。

7月4日—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谴责布尔什维克背叛了农民阶级，要求取消贫农委员会，他们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并在一些城市策动武装叛乱，叛乱被平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宣告结束。

7月1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开始生效。

7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人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抗击国内外敌人。

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要求“一切为了前线”。

9月3日，彼得格勒枪毙了500多名人质和可疑分子。

9月初，成立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设置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约·约·瓦采文斯、谢·谢·加米涅夫先后任总司令。托洛茨基仍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对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作用，被誉为“红军之父”。

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月12日，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

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拥有动员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用于国防的全部权力。

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劳动法典》，宣布对所有16—50岁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实行劳动义务制。

1919 年

1月11日，为整顿城乡交换，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规定农民有义务按固定价格将全部剩余农产品交给国家，以保证军队和工人的粮食供应。国家按需要数量进行征收，实际上拿走的不仅是余粮。

2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的措施”的决定，大力宣传成立公社和协作社。

3月2日，为了进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季诺维也夫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它是共产党世界性的统一机构，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

3月18日—23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决定实行依靠贫农，同中农保持巩固的联盟，反对富农的政策。列宁在会上对军事反对派进行了原则性批评，为托洛茨基辩护。

3月，旧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控制了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大片领土，与外国干涉者配合，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大威胁。

4月12日,《真理报》发表列宁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关于东方战线局势的提纲,提出东方战线是决定性战线,要在短时间内加强东方战线,号召人民积极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5月,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在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的配合下,向彼得格勒进攻,6月底被击溃。

7月,邓尼金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在南方向苏维埃政权发动第二次进攻,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目标直指莫斯科。

8月中旬,高尔察克全线溃败,不再是主要威胁。

10月,邓尼金攻占奥廖尔,列宁发出“大家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10月中旬歼灭了邓尼金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奥廖尔和沃罗涅日。

10月,布哈林和奥布拉任斯基合写的通俗著作《共产主义ABC》问世,列宁认为该书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到30年代初,该书再版近20次。

12月26日,苏俄人民委员会颁布在成年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

1920年

1月16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解除对苏俄的经济封锁。

1月17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公共食堂就餐的工人、职员免费用餐。

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劳动普遍义务制》法令,要求所有居民,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必须完成规定的劳动义务,不履行劳动义务者将交法庭审判,劳动义务制因此成了强迫劳动制。

2月,高尔察克被捕,并被处决。

2月2日,苏俄首先同爱沙尼亚签订和约,承认爱沙尼亚独立,双方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是苏俄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和约。

2月18日,列宁宣布苏维埃俄国愿“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愿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建立经济联系。

是年春,邓尼金被彻底击溃。

3月29日—4月5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条件下召开

的，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

5月7日，俄联邦与孟什维克领导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签署相互承认的条约，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6月—10月，苏俄军队取得反对波兰干涉者的胜利后，开始越过边界向波兰进军，本以为其世界革命会得到波兰工人的支持，在华沙城下，苏俄军队却遇到了波兰工人的抵抗。战争的失利，使列宁对世界革命形势的认识有了转变。

7月12日，苏俄政府同立陶宛签订和约，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8月11日，苏俄政府同拉脱维亚签订和约，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1月，在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俄共（布）党内出现了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列宁认为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布哈林认为两种职能都有。列宁提出工会应当保护工人的利益，但没有引起重视。

11月23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到苏俄开办工矿企业。

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

12月22日—29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国家电气化计划，预计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新建发电站30座，列宁把它称为“第二个党纲”。

1921 年

2月8日，列宁给中央政治局会议写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用粮食税代替粮食征收制。

2月11日，俄共（布）中央通过建立红色教授学院的决议，红色教授学院与已存在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起，成为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摇篮。

2月26日，苏俄与波斯签订友好条约，建立外交关系。

2月28日，列宁格勒的城市工人由于食品不足而举行罢工和示威，喀琅施

塔得海军基地的两万多名水兵同情工人，发生兵变，他们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提出建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要求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2月—3月，苏俄出兵格鲁吉亚，兼并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

3月8日—16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会上通过《关于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等决议，此后俄共（布）逐步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3月16日，苏英贸易协定签订，这是苏俄同资本主义大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表明英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苏俄。

3月18日，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平息，大约有8000人逃往芬兰，2600多人被枪决，6000多人被判刑。《波兰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和平条约》（《里加条约》）签订，苏波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5月起，苏俄开始遭受严重饥荒，饥荒波及苏俄30多个省，波及将近20%的居民，受灾人口达3350万人，有近500万人饿死。造成此次饥荒的原因既有干旱这样的天灾，也有革命和战争破坏、西方的经济封锁、粮食征收制伤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5月26日—28日，俄共（布）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认真的政策，商品交换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合作社是商品交换的主要机构。

7月13日，高尔基向“有良知的人们”发出呼吁书：由于歉收，千百万的俄国人正面临饥饿的威胁，呼吁有良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用粮食和药品帮助俄国。

8月6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告《国际无产阶级书》，并向欧美各国政府发出专函，请求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向苏维埃俄国提供粮食援助。

8月20日，面对苏俄的大饥荒，美国救济总署与苏俄政府在里加签订了救济灾民的条约。在整个饥荒期间，美国救济总署共募集资金6600万美元。截至1922年7月1日，美国共向苏俄提供粮食、药品、服装等救济物资788878吨，救助灾民885万人。

1922 年

3月27日—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

4月10日—5月19日，热那亚会议举行。这是苏俄政权建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国际会议。在会议期间，苏俄政府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

5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私人基本财产权》的决议，规定：承认并保护私人基本财产权和总额在1万金卢布以下的遗产继承权。

6月8日—8月7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在被提起诉讼的34人中有12人被判死刑，高尔基称这是“卑鄙的死刑”，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对此表示抗议。

8月16日，苏俄政府开始驱逐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共计110名知识分子，要求他们不得擅自回国，否则将被处以极刑。被驱逐者许多是俄罗斯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杰出代表，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索罗金等，也有科学家和医生等，只准他们带走少量衣物和20美元现金。同样的行动在乌克兰等地也有发生，还有不少人从被驱逐出境改为国内流放。

8月—12月，有300—400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在政府的压力下，还有几十万知识分子以种种方式逃离俄国。

12月1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要求他在中央全会上声明他们在维护外贸垄断问题上立场一致。

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

12月23日—1923年3月6日，列宁在病中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书信和文章，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调开”。

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宣言和条约，最初加入联盟的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和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23 年

3月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同日，列宁给斯大林写“绝交信”。

3月6日，列宁给格鲁吉共产党人写信，表示对他们的支持。晚上列宁病情加重，到10日失去了说话能力。

4月17日—25日，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病重未能出席，他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也未能送达大会。

7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第一部苏联宪法。成立联盟政府——以列宁为主席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关。

10月8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问题提出尖锐批评，随后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的《四十六人声明》。

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托洛茨基给党中央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

12月5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

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

1924 年

1月16日—18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托洛茨基把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结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是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1月17日—20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对党内争论的情况激动不安。

1月21日，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终年54岁。

1月26日—2月2日，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

2月，苏联进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1、3、5卢布纸币和铜、银辅币，同时规定新币1卢布兑换旧币5万卢布，1切尔文银行券兑换新币10卢布。货币改革有利于苏联经济的稳定。

2月17日，布哈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发表题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的长篇演说，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他认为现在的任务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要把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看做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苏联走向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渐进的道路，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从长远看，阶级矛盾与斗争趋于缓和。

4月初，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报告，全面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他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把列宁主义仅归结为革命和专政，忽视了列宁在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验。

5月23日—31日，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本应该“印发”给党代会每一位代表，但仅向代表大会各代表团分别传达，不准记录，不进行讨论。传达人声称斯大林愿意改正自己的缺点。

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等正式签订，苏俄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作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共管。两国互相承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8月，格鲁吉亚对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不满的农民举行暴动，很快被平息，但在此后举行的全国范围内的苏维埃选举中，农民进行了抵制，只有7%—10%的选民参加投票。

9月，托洛茨基发表《一九一七年》一书的序言《十月的教训》，由于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在十月革命时期的错误，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

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作报告，历数托洛茨基以往与列宁的分歧，称他是孟什维克的代理人。

11月19日，斯大林发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此后，揭露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充斥报刊。

11月30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把托洛茨基与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对立起来。

是年，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先后承认苏联，还有许多国家与苏联建交。

1925 年

1月15日，托洛茨基给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写信，不接受说他执行一条特殊路线的指责，提出辞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月17日—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指责和批判托洛茨基，给予他最严厉警告，并认为他不能继续在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工作。

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任命他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副院长。

4月，召开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

6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党的文学政策》的决议，主张文学领域中的不同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争，不允许用一纸命令或党的决议使某个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的垄断合法化。

9月，季诺维也夫出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以托洛茨基为靶子，全面阐述他对列宁主义的认识。

10月，在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科夫和克鲁普斯卡娅联名向党中央发出“四人信件”，要求重新审查和讨论党的有关重要决策，标志着“新反对派”正式形成。

12月18日—31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决定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提出要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

1926 年

1 月，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发表，修改自己关于单独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说法，把社会主义“一国胜利”与“最终胜利”区分开来，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4 月 24 日，《苏德友好中立条约》在柏林签字。

7 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在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上相近的“新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联名提出《十三人声明》，从“左”的立场出发，反对放宽农村政策，主张加快工业化。

10 月 16 日，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发表声明，表示放弃派别活动，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10 月 23 日—26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提出警告，并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0 月 26 日—11 月 3 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召开，反对派受到严厉谴责，明确了实施工业化的意义、前提、任务及措施，特别强调要奉行高速度、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

1927 年

5 月 26 日，托季联盟上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史称《八十三人声明》，反对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应该恢复列宁在世时允许党内有分歧和争论的一贯做法，有 3000 多人在文件上签名。

7 月 29 日—8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关于 1927—1928 年度的经济的指示》，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严重警告处分，决定在年底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9 月 3 日，利用党章规定在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前，党员有权提交反提纲，托季联盟向联共（布）中央提交《反对派政纲》，要求发表，中央政治局拒绝印发，党内争论再度激烈起来。

10月21日—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决定在全党进行公开争论。

11月7日，托季联盟利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大城市举行对中央公开抗议的游行示威。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

11月16日，苏联著名外交家、托洛茨基的亲密朋友越飞自杀，送葬者很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葬礼上相继发表讲话。

12月2日—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提出“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决议。大会决定把托季联盟的75名骨干分子和23名萨普龙诺夫分子开除出党，托季联盟在政治和组织上失败。

1928 年

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

从上年秋冬起，国家收购到的粮食大幅度减少，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政治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但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和非常措施适用的范围等，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1月6日，中央向地方发布第三个关于加强粮食收购工作的命令，要求地方在一周时间内彻底改变粮食收购工作现状。

1月15日—2月6日，为确保各地完成粮食收购任务，斯大林亲自去西伯利亚催粮。动用刑法第107条，通过非常措施，在短期内征集到了大批粮食。这也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去农村。

2月1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此后在苏联展开了全面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农业政策的改变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农民不愿多种粮食。

3月10日，顿巴斯工业联合企业的沙赫特矿区发生了矿井爆炸事件。这本是一起由于管理混乱、操作失当、设备老化引发的生产事故，苏联安全部门却把

它说成是资产阶级专家制造的暗害活动。

4月6日—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粮食收购工作和沙赫特事件等问题，通过了《关于本年度的粮食收购和组织1928—1929年度的粮食收购运动》的决议，要求随着粮食收购困难的消除，取消党的措施中带有非常性质的部分。

4月1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别向联共（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组织作四月联席全会的报告，所讲内容却是对立的。斯大林强调小农经济效率低和富农的破坏；布哈林则强调国家计划的失误。

5月28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作《在粮食战线上》的报告，再次强调小农经济是造成粮食困难的根源，不点名地批评布哈林想用恢复富农经济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把党内分歧上升到革命与反动的高度。

7月4日，斯大林发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系统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前进必然尖锐化；只有通过加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能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

7月4日—12日，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斯大林与布哈林间的分歧，布哈林要求停止在农村使用非常措施征购粮食，斯大林采用的过火手段违背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中央联席会议的决议精神，应对农村中的严重局势负责。斯大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的源泉是农民，农民必须缴纳“贡税”。全会通过决议要求停止破坏法制的行为，酌量把粮食价格提高一些。

7月5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公布顿巴斯“沙赫特事件”判决书，有55人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叛国罪，11人被处死。此举开始了斯大林时期对知识分子的镇压。

7月17日—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确认各国党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残余，也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共产党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结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

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捍卫新经济政策。

10月1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斥责拥护布哈林主张的乌格兰诺夫，并对莫斯科市委进行改组，成立了以鲍曼为首的莫斯科市委。

11月1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表《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话，强调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关键，右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1929 年

1月18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托洛茨基犯有组织非法的反苏维埃党派、策划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将其驱逐出境。

1月21日，布哈林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会上作关于《列宁政治遗嘱》的报告，以阐述列宁晚年思想的方式与斯大林论战。

1月22日，托洛茨基全家离开阿拉木图赴土耳其。

1月30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斯大林抓住1928年7月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晤做文章，抨击布哈林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称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的声明是反对中央及其总路线的宣言。

2月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和解方案”，被布哈林拒绝。布哈林起草了一份批驳斯大林的政策声明，称斯大林用个人决定代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2月9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认定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组织派别联盟，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4月16日—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批评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所担任的职务。7月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批准了这个决定。

4月23日—29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决定以最佳方案为五年计划草案的正式文本。

5月20日—28日，全苏第五次苏维埃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公布了两种方案的各项指标，将初步方案看做是最佳方案的某种最

低限度的保障。

夏天，各主要产粮区都开始了大规模组建集体农庄，并且出现了实现集体化的村、乡、区。

8月，联共（布）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专门会议，赞同一些区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思想。

11月3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指出“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发生大转变的一年”，称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批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此后出现规模巨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

11月10日—1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集团》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会上要求迅速实现全盘集体化，会议决定派2.5万人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联合社等岗位去工作。

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发表声明，表示承认有错误。至此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联共（布）党内的数次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斯大林模式开始取代新经济政策。

12月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工业管理》的决定，工业管理体制向集中化、计划化、行政化方向发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农业人民委员雅·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研究有关全盘集体化的问题和制定具体办法。

12月21日，为庆祝斯大林50岁寿辰，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唯一助手，唯一继承者，是活着的列宁，斯大林的造神运动开始。

12月27日，斯大林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评“平衡”论、“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强调应当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指出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此时的所谓“富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在新经济政策下致富的农民。

1930 年

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不同地区集体化的不同速度，主要产粮区在1930年秋季或至迟1931年春季基本完成集体化，其他地区最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这一方针下，“左”倾冒进在所难免。

1月26日，政治局发布《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对富农“扫地出门”，在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胜利冲昏头脑》，迫不得已对前期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过火行为“纠偏”，许多地方干部因此受到严厉处罚。

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要求制止强制和过火行为。此后大量农民退社，许多集体农庄解散。

6月26日—7月13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正式把苏联的国家工业化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其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处在于：从重工业开始，实行高速度，依靠本国（主要是农民）积累资金；斯大林在报告中称，当前面临着社会主义的“全线总进攻”，并按这一精神提高了五年计划的几项重要指标。

11月25日—12月7日，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审判了“工业党”案件，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

12月9日，斯大林接见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委员，就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战线的形势和任务发表谈话，提出要展开全面的批判，主要问题是进攻，向所有方向进攻。批判的对象有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梁赞诺夫、德波休等等，甚至点了恩格斯的名，宣称“恩格斯也不是全部正确”，如果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恩格斯，这不是件坏事。这次谈话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学术界全面开展大批判和大清洗的动员令

是年，党内出现以联共（布）中央书记西尔佐夫、中央委员洛米纳泽为首的反党派。他们认为斯大林大肆吹嘘的工业化成就是欺诈，全盘集体化是封建农奴主对待农民的态度，他们及其支持者被开除出党。

1931 年

1月2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认为领导该杂志的德波林等人，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使该杂志的工作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任务，决定改组该杂志编委会。

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督促完成任务，苏联必须用至多10年的时间走完先进国家50至100年走过的路，强调“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

3月1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共产主义科学院工作》的决议，要求在理论战线上抓阶级斗争。

6月，整个苏联已有半数以上的农户（52.7%）加入了集体农庄，这个速度远远快于当初的预期，但“超高速”的集体化带来了严重后果：牲畜被大量宰杀，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苏联不得不对粮食和其他食品重新实行配给制。

10月，《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刊登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的给杂志编辑部的信，他严厉斥责该杂志刊登历史学者斯卢茨基写的关于战前布尔什维克与第二国际关系问题的文章。

11月，斯卢茨基被开除出共产主义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不久被捕，后被处决。

1932 年

1月30日—2月4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的指示》的决议，该计划仍是一个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超高速的工业化计划。

2月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的紧急措施》的决议，肯定工作队是集体农庄中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的环节。

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组织》的决议，取消原来的文艺组织，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6月，莫斯科市委书记柳京通过秘密渠道，印发一份《致联共（布）全体党

员》“柳亭纲领”的文件，认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被斯大林及其集团引进了前所未有的死胡同，号召党员行动起来从下面开始斗争，打倒斯大林专政及斯大林集团。柳亭、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等大批人被逮捕和送往集中营。

8月7日，通过斯大林亲自起草的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又称“五穗谷物法”，对“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人，可以采取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的处罚，情节较轻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8月，在粮食高征购指标和集体化运动对生产力破坏的背景下，乌克兰等地发生严重饥荒，斯大林仍派莫洛托夫到那里催粮，对饥饿中的民众没有任何救助措施，而国家的粮食出口却逐年增加。

11月8日，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原因既有两个人生活中的不合，也与当时苏联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关。阿利卢耶娃不明白，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以给那么多人带来痛苦为代价，并因此经常与斯大林发生争执。

1933 年

1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建立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目的及任务》的决议，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的首要任务，是保证集体农庄和庄员无条件地按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特别是要同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同集体农庄中抗拒执行党和政府的粮食收购和肉类收购措施的现象作斗争”。

春天，乌克兰及苏联多个产粮区的大饥荒在蔓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救灾，反而颁布命令禁止居民离开农村。

2月15日—19日，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集中讨论集体农庄的巩固问题。

9月2日，苏联与意大利缔结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11月16日，苏联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934 年

1月26日—2月10日，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通过

了《关于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基洛夫得票数超过斯大林 300 多张。

2 月 21 日，布哈林被任命为政府报纸《消息报》主编。

7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决定，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7 月 19 日，斯大林给政治局委员写题为《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的信，批判恩格斯。

8 月，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作家创作的原则。

9 月 18 日，国联大会多数赞成苏联加入国联，并任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12 月 1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列宁格勒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办公室外的走廊上遭暗杀，凶手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斯大林及其他党政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处理此案。斯大林借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大清洗”运动。

12 月 6 日，苏联政府为基洛夫举行葬礼。因怀疑基洛夫是被“白卫恐怖分子”暗杀的，在此前后几天，苏联处决和逮捕了一大批“白卫恐怖分子”，其中列宁格勒枪决了 39 人，莫斯科枪决了 29 人，明斯克逮捕了 12 人（其中 9 人被枪决），基辅逮捕了 37 人（其中 28 人被枪决）。

12 月 16 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原反对派成员被捕，他们否认与基洛夫被暗杀有关。

12 月 22 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侦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通报，称尼古拉耶夫是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由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名为“列宁格勒总部”。

1935 年

1 月 15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策划杀害基洛夫为由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 19 人进行了审讯，并判处他们 5 年至 10 年监禁。

1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被暗杀的问题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出秘密信，称敌人的处境越是绝望，他们就越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

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要求各级组织提高警惕性，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的敌人的反革命巢穴。在列宁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个高潮，被称为“基洛夫激流”。

2月1日，叶若夫被提升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他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忠实执行者。

2月，苏联成立由31人组成的宪法委员会，起草新宪法，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负责起草宪法的法律部分。

3月，苏日签订中东铁路协定，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这条铁路出售给所谓的“满洲国政府”，等于承认了伪满洲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政府表示抗议。

5月2日，法苏两国在巴黎签署《法苏互助条约》，宣布在缔约一方遭受某一欧洲国家侵略或侵略威胁时，彼此协商并给予支援和协助。

5月4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

5月13日，联共（布）中央给各级党委发信，要求对党员证件进行仔细检查，因为敌人“以党证作掩护来搞特务、暗害等活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被清除出党。

5月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互助条约，但规定只有法国对被侵略国家给予支援和协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援助。

6月7日，根据斯大林的安排，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了叶若夫《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办事机构和阿·叶努基泽同志》的报告，他宣称破获了谋害斯大林的恐怖组织。

7月27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讯“克里姆林宫恐怖主义阴谋集团”，110人被判刑，其中2人被处死。

8月31日，苏联开始在全国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即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11月14日，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有3000名先进工作者出席。

12月8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授予43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以列宁勋章。

1936 年

4 月 28 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 776—120 号决议，从乌克兰迁移 35820 名“不可靠的”波兰人到哈萨克。

6 月 12 日，苏联新宪法草案在报刊上公布，供全民讨论。

7 月 29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题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间谍恐怖活动》的秘密信，在此，斯大林制造了“人民敌人”这一概念，为大规模镇压制造法律根据。

8 月 19 日—24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进行公开审判，不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也没有提交人证或物证，被告按事先拟好的供词承认“根据托洛茨基匪徒在苏联的秘密组织领导人斯米尔诺夫所得的托洛茨基的指令”，组织了“联合总部”并暗杀了基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 16 人全部被判处死刑。

8 月 25 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 16 人被执行死刑，而按规定他们在 72 小时内可以提出上诉。

9 月 25 日，叶若夫取代雅戈达，成为内务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更忠顺的工具。

11 月 25 日—12 月 5 日，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宣布苏联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大会通过了新宪法，把斯大林模式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一方面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平等的宪法，一方面又在进行无法无天的“大清洗”。

1937 年

1 月 17 日，布哈林被解除《消息报》主编的职务。

1 月 23 日—30 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被告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 17 人，其中 13 人被判处死刑，罪名是“接受托洛茨基的指示，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

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

席奥尔忠尼启泽“自杀”。

2月—3月，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党活动”问题。布哈林宣布绝食以抗议对他的诽谤，会议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布哈林给年轻的妻子留下遗嘱：《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表示自己忠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在恶魔的机器面前无能为力。

3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作《论党的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认为阶级斗争延伸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

4月，苏联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导原则的政治色彩更浓，社会主义超阶段发展思想更严重，目标是在10—15年内使苏联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的三个五年计划，使重工业一枝独秀，农业、轻工业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无实质性提高。

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鲍列维奇、科尔克、埃德曼、普特纳、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等8名战功卓著的军界领导人进行秘密审判，第二天他们全部被处死。此后军队中的“大清洗”愈演愈烈，大批高级将领被处死。

6月29日，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库恩·贝拉被捕，11月30日被杀。

7月17日，根据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第103/1127—267号决议，把毗连伊朗、阿富汗、土耳其的苏联边境地带的各族居民迁往内地。

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1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第1428—326号决议，从远东（主要是滨海边疆区）迁移全部朝鲜人（171781人）到哈萨克等地，以防被日本人“利用”。

12月12日，举行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这是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选举。

是年，叶若夫对内务部进行了“清洗”，有14000多名工作人员被捕，其中3000多人被处死。

1938 年

1月12日，苏共政治局委员加里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届常会上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所谓“布哈林右派和托派联盟阴谋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布哈林、李可夫等18人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处15—25年监禁。

3月15日，布哈林等人被枪决。被列宁称为“革命的金娃”、“全党最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0岁。

7月，叶若夫被撤销内务人民委员职务，调任航运人民委员，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

9月3日，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在巴黎召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成立大会，宣布成立第四国际。

10月1日，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

10月8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第1084—269号决议，从阿塞拜疆边境地区迁移6000名伊朗人到哈萨克斯坦。

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设立联共（布）中央高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的决定。此后，苏联高层党政干部几乎都从苏共中央党校的校门中走出，报考（选送）进入该校学习的条件是35周岁以下、5年以上党龄、3年以上党或苏维埃负责工作的经验、具有高等学校的学历。

1939 年

3月10日—21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审议并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

4月10日，叶若夫被捕，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恐怖活动，这个刽子手成了替罪羊，于次年2月4日被枪决。

4月15日—8月4日，英、法、苏三国开始在莫斯科举行谈判，目的是缔结三国互助条约，但没有成功。

8月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向苏提出希望改善彼此关系。

8月21日，苏联宣布苏英法三国谈判无限期休会，并于当晚复电希特勒同意里宾特洛甫23日来莫斯科。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附有秘密议定书，苏联和德国划分了双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势力范围。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会议通过《普遍义务兵役法》，应征年龄从21岁降至19岁，中学毕业生的服役年龄为18岁。服役期也相应延长。

9月17日，在波兰政府流亡的当天，苏军越过苏波边境，向西推进200—300公里，占领了波兰19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1300万，俘虏波兰官兵近25万人。

9月28日，苏德签订《苏德边界友好条约》及三个秘密议定书，重新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

9月28日—10月5日、10日，苏联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使三国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其国境并在其境内设立基地。

11月30日，苏联以维护安全为由，要求芬兰割让土地及租借海军基地汉科港，芬兰答应调整边界，但拒绝租借汉科港，两国谈判破裂，苏军大举入侵芬兰，苏芬战争爆发。

1940年

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押在卡廷和其他集中营、监狱的两万多名波兰军官处以死刑。

3月12日，经过三个多月激战，苏军取得苏芬战争的胜利，苏芬在莫斯科签署和约，芬兰被迫将卡累利阿地峡等地割让给苏联，苏联取得芬兰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汉科半岛及附近岛屿30年。

4月7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农产品征购和收购政策》的决议。

4月11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向国家义务交售谷物和稻谷的决议》，规定按耕地面积而不是计划播种面积

计算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提供谷物和稻谷的数额，不履行义务要受法律制裁。

5月，根据苏联战俘管理局统计，共有22000多名波兰战俘被枪杀。枪杀他们的原因是子虚乌有的战俘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反苏宣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积极投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等。

6月，苏联乘德军进攻西欧之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在那里成立新政府。

6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改行每天工作8小时、实行7日工作周和禁止企业、机关职工任意旷工的命令》、《关于工业企业应对生产劣质产品和不遵守标准规格负责的命令》，用法律措施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责任感。

6月30日，苏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面积为5.1万平方公里。

8月2日，苏联在比萨拉比亚成立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8月3日—5日，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苏联增加了17.4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86万人口。

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家中遭到苏联克格勃特工、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的袭击，第二天去世。托洛茨基虽然躲过了苏联30年代的大审判，最终仍没逃脱斯大林的追杀。

12月18日，希特勒下达了对苏作战的第21号命令，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

3月20日，苏军情报部部长戈里科夫将军把德国“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内容报给斯大林。

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政领导全部出席。签约当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4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及人民对第三国之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4月底，丘吉尔写信给斯大林，提醒斯大林注意德军向东移动的动向。

6月13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要求斯大林批准下令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斯大林怕刺激德国，故延误了时机。

6月14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从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分别迁移所谓犯有反革命等罪行的人3668名、12682名、9236名、22648名、9595名、27887名，至9月完成，接收地区是西伯利亚、哈萨克、科米自治共和国。

6月21日晚，基辅军区报告两名投诚的德国士兵带来的、德军正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德军计划于22日4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一准确情报。

6月22日4时，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战争初期苏军严重失利，仅当日苏联空军就损失飞机1200架，失去了边境地区全部军用仓库和储备的武器与军用物资。中午，莫洛托夫代表党和政府发表演说，号召苏联军民把敌人赶出苏联领土。

6月30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组成国防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人民尽一切力量，为赶走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7月10日，苏德战场上，德军已在西北方向推进500公里，在西部推进了600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了350公里。不久，德军占领了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及乌克兰的大部分，逼近了列宁格勒。

7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德军后方组织斗争》的决议。

8月12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第2060—935号联合决议和8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21—160号命令，将伏尔加河地区的德意志人迁移到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中亚各共和国。至10月28日从伏尔加河德意志自治共和国迁出446480人，该自治共和国被撤销。1941—1942年总共迁移德意志人1209430名，迁移行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

8月26日，根据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第196号和1942年3月9日通过的第00713号决议，从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迁移全部芬兰人，1942年4月完

成，共迁走 9000 余人去西伯利亚。

9 月 8 日，列宁格勒陷入德军围困之下。

9 月 19 日，乌克兰首府基辅陷落。

9 月 30 日，莫斯科会战开始。

10 月 1 日，苏、英、美三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协定在莫斯科签订。

10 月 10 日，斯大林任命从列宁格勒召回的朱可夫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负责守卫莫斯科。

10 月 16 日，苏联政府机构和各国驻苏外交使团迁往古比雪夫，斯大林留在莫斯科，没有撤退。

11 月 7 日，在法西斯德国围困的炮声中，红场举行传统阅兵式，斯大林发表演说，鼓舞了与法西斯德国顽强战斗的军民，受阅部队直接开赴前线。

12 月 5 日，德军在莫斯科近郊开始溃败，莫斯科会战出现转折，苏军转入反攻。

1942 年

1 月 1 日，中国、苏联、美国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共同反对法西斯的《联合国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4 月 5 日，希特勒发布训令，集中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

4 月 20 日，莫斯科会战以德军的溃败而结束，德军被击退 150—300 公里，损失兵员 50 万。

7 月 17 日，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德军集中了 90 万兵力与苏军展开了斯大林格勒争夺战。

8 月 25 日，苏军宣布斯大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做好城市巷战的准备。德军投入 2000 多架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轰炸，城市陷入一片火海。

11 月 19 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转入反攻。

1943 年

1 月 26 日，苏联著名的植物学家、遗传学家、作物地理学家，为发展生物遗传理论和改良植物品种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知名科学家瓦维洛夫被折磨死于狱中。

1 月，苏军歼灭了列宁格勒近郊的德军，被围困长达 500 天的列宁格勒解围。

2 月 2 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军全歼被围德军，俘虏德第 6 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以下 24 名将军。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拟定《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

6 月 10 日，出于协调苏联与反法西斯联盟盟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10 月 12 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 115—136 号决议和 10 月 14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 1118—342 号决议，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卡拉恰耶夫族，撤销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总共迁移 69267 人去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晤，讨论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战后成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对德国的处置、苏联对日宣战、重建独立的波兰等问题，发表了《德黑兰宣言》。

12 月 27 日，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和 12 月 28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 1432—425 号决议，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卡尔梅克民族，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共有 93139 名卡尔梅克人被迁往西伯利亚。

1944 年

1 月 31 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 5073 号决议和 2 月 21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 00193 号命令，以通敌为由迁移整个车臣民族和印古什民族。共迁移车臣人 393229 名、印古什人 91250 名到哈萨克和吉尔吉斯。

3 月 5 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 5309 号决议，以“背叛行为”和“土匪活动”为由迁移整个巴尔卡尔民族。共迁移 37107 名巴尔卡尔人去哈萨克和吉尔

吉斯。

3月31日，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命令，迁移从事反苏活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和乌克兰起义军成员100300人到国家东部地区。

5月11日，苏联政府以和德国侵略者合作为由把居住在克里木自治共和国的20万鞑靼人全体迁往中亚定居。

6月2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984号决议，以通敌和反苏行为为由，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迁移保加利亚人12422名、希腊人15040名、亚美尼亚人9621名到东部地区，同时迁移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等共1000多名。

6月24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6100号决议，从克里米亚往乌兹别克迁移外籍希腊人3531名，从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迁移无国籍希腊人8300名，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迁移16375名希腊人到国家东部地区。

7月31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6279号决议，从格鲁吉亚毗连土耳其的边境地区迁移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亚美尼亚人穆斯林）共91095人去乌兹别克、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他们被怀疑为“叛徒、土耳其的代理人”。1944年从外高加索总共迁移库尔德人40000名。

7月，苏军突破德军防线，进入波兰境内。

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达成战后划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百分比协议。

是年，苏军发动10次打击，共歼敌160万人，基本上收复了苏联国土。

1945 年

1月，苏军分南北两路向西进发，攻占哥尼斯堡、西里西亚、奥地利，打开了通往柏林之路。

2月4日—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处置德国、对日作战、波兰问题和联合国组织与托管制问题，达成了某些协议与谅解，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日趋明显。

4月5日—16日，铁托访问苏联，双方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南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4月16日，苏军开始柏林战役。

4月25日，苏、美军队在易北河会师。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屋顶。

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在柏林近郊卡尔斯霍特向苏、美、英、法四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文件，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7日—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柏林西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讨论占领德国的原则、波兰西部边界、审判战犯、对日作战、赔偿等问题，美、英与苏联的矛盾日益激化。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8月14日，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大连旅顺港、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规定两国在对日战争中进行配合，中苏共管中长铁路30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30年，大连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决赞成独立，中国政府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终战诏书，苏军进驻朝鲜北部。

8月16日，苏联与波兰签订以寇松线为基础的边界条约。

8月18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投降，在10天的对日作战中苏军共歼日军8.4万人，受降60万人。

9月2日，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巡洋舰“密苏里号”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向美、中、苏、英等国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结束。

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纵下，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显示，97.8%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1946年

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苏联继续扩大钢、铁、煤、石油等部门的生产，该演说

在英、美等国引起强烈反响。

2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华盛顿发出了论述苏联对外政策根源的8000字长电报，呼吁“遏制”苏联的扩张行为。

2月27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

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和平砥柱》的演说，声称欧洲已经被一道铁幕隔开，攻击苏东国家没有民主和自由。

3月13日，斯大林就丘吉尔的演说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这是进行反苏战争宣传、进行反苏战争的方针。

3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即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的法令。规定“必须保证首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要求工业总产值要比1940年增长72%，机器制造业增长135%；而对于农业和消费资料生产则含糊提出达到战前水平，规定农业生产超过1940年的27%。实际情况是，工业产值最后突破了计划的17%，而轻工业只完成了计划的80%，农业只完成了计划的78.6%。

7月27日，针对从乌克兰蔓延开来的大饥荒，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不许浪费、盗窃粮食，防止粮食霉变的决定》，当年有9511名集体农庄主席被判刑，不少生产队队长和农场负责人也被定罪。由于政府拒绝施救，在这次大饥荒中有200万人饿死。

8月9日，斯大林主持召开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决定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开展批判，讽刺小说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被作为异端进行批判。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谴责两杂志刊登渗透着一切外来事物精神的作品，责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进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8月26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改进办法》的决议，谴责1945—1946年上演的一些剧目，实际上不准在戏剧舞台上按照生活的实际、多层次地反映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人。

9月4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关于电影〈灿烂的生活〉》的决议，谴责其作者和导演“丑化”苏联社会。此后，苏共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整肃。

1947 年

2 月，在粮食危机严重的背景下，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加强农业的措施。会议要求加强对集体农庄的进一步监管，提高集体农庄的劳动定额，削减集体农庄庄员从事副业的范围，限制集体农庄庄员外出务工的机会。

5 月 2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废除死刑的命令。

6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宣布对欧洲国家实行援助计划，即马歇尔计划。

6 月 1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加强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

6 月 27 日，英、法、苏三国外交官在巴黎开会，讨论马歇尔的建议。7 月 2 日，苏联退出会议，同时也向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施压，禁止它们参加马歇尔计划。

7 月—8 月，苏联与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贸易协定，被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

9 月 10 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 3214—1050 号决议，从乌克兰西部迁移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成员及其家属 74898 人到东部地区。至 50 年代初，总共迁移 171566 人。

9 月 22 日—27 日，欧洲九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波兰西部的一个小镇举行秘密会议，在苏联的主导下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任务是交流经验，必要时在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个党的活动。实际上这是共产国际的复活。

12 月 14 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和取消粮食、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的决议，旧币按 10:1 比例在一周内兑换成新币，存入银行的超过 3000 卢布部分，按 1:1 的比例兑换。币制改革实际上具有强行没收的性质，推卸了国家保障向居民供应的责任，价格实际上提高了。

12 月 16 日，苏联开始发行新货币。

1948 年

2月3日，马林科夫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解散犹太人作家联合会和查封犹太语刊物》的决定，苏联开展全国性的反犹运动。

2月4日，与罗马尼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18日，与匈牙利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2月21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第417—160号决议，从波罗的海三国迁移民族主义者、土匪、富农家庭的成员。这次代号为“春天”的行动于1948年5月22日开始，仅从立陶宛就迁移49331人去西伯利亚。

3月18日和19日，苏联决定从南斯拉夫撤走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

3月19日，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3月—5月，苏南两党交换了7次信件，但分歧依旧。

4月6日，与芬兰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6月20日—28日，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举行第三次会议，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中推行反苏反马列主义的路线，实际上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东欧各国随之进行了大规模“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许多有独立自主倾向的党员干部被“清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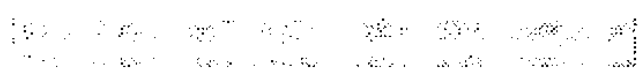
6月24日，苏联开始对西柏林实施封锁，封锁持续到1949年5月12日。西方组织了大规模的空运以保障西柏林居民的生活和供应。

8月3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日丹诺夫去世。

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它的参加者被指控“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同国外犹太人反动组织保持联系和从事间谍活动”。此案牵连到莫斯科政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批人，连莫洛托夫的妻子也遭逮捕。

1949 年

1月25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3月5日—14日，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苏，苏联与朝鲜达成苏联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和在苏联训练朝鲜军官的协议。

3月14日，莫洛托夫被解除外交部长职务，由维辛斯基接任。

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立。

10月2日，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8月13日，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拉祖金、列宁格勒市前执行委员会主席索洛维耶夫等人在走出马林科夫办公室时被捕。随后一大批列宁格勒的党政高级干部被捕。

9月23日，苏联完成第一次核爆炸。

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遭逮捕。

11月，情报局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南共在刽子手和特务的掌握中》的决议，给南共罗织了大量罪名

12月16日—1950年3月4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1950 年

1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关于对祖国叛徒、间谍和怠工者施用死刑》的命令，恢复死刑。

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苏联要在1952年底前把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的苏军基地及一切设施全部移交给中国。

3月30日—4月25日，金日成在莫斯科访问近一个月，斯大林三次会晤金日成，会谈涉及下列问题：金日成拟通过武力完成国家统一；朝鲜的经济建设问题；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苏联归还朝鲜咸兴港的问题。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但要求他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6月20日—8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三篇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后汇集成《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7月1日—6日，斯大林两次要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苏联将“完全满足朝鲜关于运送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的要求”，并“将全面提供武器、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据统计，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达8.7亿卢布。

9月20日，列宁格勒案件的主要人物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死刑，甚至没有要求他们像30年代被害者那样认罪。

9月30日和10月1日，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等人被处决。

1952 年

9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

10月5日—14日，时隔13年后，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决定把党的名称从全联盟共产党（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从联共（布）改称苏共〕。

1953 年

1月13日，根据犹太女医生季马舒克的揭发，15名苏联知名医学权威被捕，其中多数人是专门负责克里姆林宫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的，他们被指控是“帝国主义间谍”，企图谋害苏联领导人。

1月2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给告密者季马舒克授予列宁勋章。

3月1日，斯大林患脑溢血昏迷。

3月4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确定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组成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及各部部长的人选。

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伏罗希洛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家保安部与内务部合并，贝利亚任新内务部的部长、莫洛托夫为外交部

长。党务由赫鲁晓夫负责，他实际上成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月9日，举行斯大林追悼会和葬礼，马林科夫在讲话中提出要关心人民的福利，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

4月4日，苏联内务部宣布，克里姆林宫医生案是没有根据的，涉案人员获释，并恢复名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发布命令，追回发给季马舒克的列宁勋章。

4月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权利的社会主义法律。

6月1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23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开除的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为作协成员。

6月26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被逮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贝利亚反国家罪行”决议，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其案件移交苏联最高法院审理。

7月2日—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揭露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8月5日—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五次会议，马林科夫在闭幕式上发表长篇演说，表示要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个人副业义务交售额和减少农民的税收。

8月20日，苏联宣布氢弹试验成功。

9月3日—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讨论农业问题，赫鲁晓夫作《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9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通过决议，降低私人副业向国家义务交售的畜产品的定额。

10月2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日用品生产并改进其质量》的决议。

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

12月18日—23日，苏联最高法院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贝利亚等17人

于23日被处决。

1954 年

1月22日，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信，提出垦荒计划。

2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关于把俄罗斯的克里木州划归乌克兰的命令。

2月23日—3月2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关于开垦生荒地及熟荒地》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决议，苏联计划两年内垦荒1300万公顷。

5月，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发表，“解冻”一词成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

6月24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免除集体农庄庄员、工人、职员、渔业合作社和工艺合作社社员的私人副业向国家交售谷物的义务，勾销集体农庄、庄员和其他个人在谷物义务交售和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的全部积欠。

9月29日—10月12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关于对日本关系问题的联合宣言》以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新建15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1月29日，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2月14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对该案件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制造了这一案件，马林科夫威信扫地。

1955 年

1月7日，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召见匈牙利党政领导人，指责纳吉在政府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错误。

1月25日—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会议建议解除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

务。

2月3日—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接受马林科夫提出解除他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申请，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

5月11日—14日，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华沙举行会议，共同缔结了《华沙条约》。

5月27日—6月2日，赫鲁晓夫率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双方签署了《苏南两国政府宣言》，表示在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中的平等地位作为处理各项问题的原则。

9月13日，苏联与联邦德国建交。

12月，苏联爆炸了第二颗巨大的热核装置，表明苏联已经拥有了可以运载的氢弹了。

1956年

2月14日—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赫鲁晓夫提出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

2月24日夜—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未列入大会议程的内部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时间长达4个多小时，后被称为“秘密报告”。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把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报告的内容在全国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实际上全国很快就家喻户晓了。

3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爆发群众示威游行，反对二十大决议，喊出了“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的口号。

4月，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党的代表经过协商后认为，情报局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决定解散，机关刊物也停刊。

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成了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6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谢皮洛夫为外交部长。

6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文本，世界开始知晓这

个报告。

6月28日，波兰波兹南20万人走上街头，高喊“要面包、民主、自由！”“俄国佬滚回去！”“打倒秘密警察！”“要哥穆尔卡！”“上帝！”“打倒共产主义！”等口号，当局拒绝接见游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发生了骚乱，最后政府出动保安部队和坦克，将事态平息。

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宣布把一大批原由全联盟各部管辖的企业和组织，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管辖。

10月19日—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哥穆尔卡恢复总书记职务，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军领导人赶往华沙进行干预，并下令驻波兰苏军向华沙逼近。苏波两党代表团举行会谈，苏军停止前进，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

10月23日，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人们高喊“我们要纳吉！”“格罗下台！”“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事态很快失控。

10月24日凌晨，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时，匈牙利人开始与苏军发生冲突。

10月25日，卡达尔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免去格罗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纳吉主持政府的工作。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布《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犯了错误，表示今后将遵循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协商，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的一切可能性。

10月30日—31日，苏军撤至布达佩斯城外的飞机场。

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出兵匈牙利，授权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与铁托进行秘密谈判，征得铁托的同意。

11月1日，纳吉向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同时声明匈牙利中立，并向联合国呼吁要求帮助维护匈牙利的中立，卡达尔等人宣布与纳吉政府决裂，重组劳动人民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人民党。

11月4日，苏军元帅科涅夫指挥平息匈牙利暴乱的行动，苏军调集了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只用了三天时间，武装冲突基本平息，建立了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新政府。

1957 年

1月4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工人党和政府代表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就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发表公报。

1月，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恢复建制。

2月1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进一步改进管理工业和建设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通过相关决议。

6月5日—14日，赫鲁晓夫率团访问芬兰，莫洛托夫等人借机制订了撤换赫鲁晓夫的计划。

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召开，会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对赫鲁晓夫的政策进行指责，提出审查赫鲁晓夫的行为，赫鲁晓夫、米高扬等反对。

6月19日，在人数更全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马林科夫提出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在主席团委员中，反赫鲁晓夫者占多数，朱可夫等军方代表反对撤换赫鲁晓夫。

6月20日，正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争吵不休时，得到会议消息的中央委员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

6月22日—2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解除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解除谢皮洛夫的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职务，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10月4日，苏联发射的第一颗地球卫星“人造卫星一号”进入轨道。

10月15日，苏中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在发展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

11月14日—1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莫斯科宣言》。

年底，南乌拉尔车里雅宾斯克埋藏核废料的处理场发生爆炸事故，污染的泥土被抛上高空，被吹至几十英里以外，有几万人受害。

1958 年

2月25日—2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定把机器拖拉机站转卖给集体农庄，分期将其改组为技术修理站。

3月27日—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免去布尔加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决定由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月18日，苏联提出中苏分别出资共建长波电台，建成后共同使用。

6月1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作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的报告，通过关于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采购农产品的新制度、采购价格和条件的决议。

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在与毛泽东会见时提出，苏联考虑未来中苏与美国共同作战的情况，希望建立一支联合舰队。此事与前述长波电台问题，使毛泽东认为苏联触犯了中国国家利益。

7月31日，赫鲁晓夫访华，向中共解释苏联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立场，以求得中共的理解。

8月3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建设、维护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专用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

10月23日，创作了《日瓦戈医生》的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却遭到苏共的批判，帕斯捷尔纳克宣布放弃奖金。

是年，苏联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470万吨，是1953年的156%，其中垦荒区生产了5850万吨，占40%以上。

1959 年

1月2日，苏联向月球发射宇宙火箭成功。

1月27日—2月5日，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

6月20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9月15日—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这是苏联领导人首次访美。

9月29日—10月4日，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会谈中讨论了台海局势问题、中印关系问题等，因双方观点大相径庭，最后不欢而散。

1960年

4月，中共借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表面上批判铁托和南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实则是批判苏共。

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因U-2飞机事件苏美关系再趋紧张，会议不欢而散。

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除伏罗希洛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担任。

6月24日—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中苏两党在会上爆发冲突。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决定撤回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

8月，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学者、专家。

10月20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有装置了火箭的核潜艇。

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声明》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为了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战争威胁，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1961年

4月12日，苏联宣布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实现了世界历史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宇航员。

4月26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苏联经济区划和组织大经

济区的协调和规划工作》的决议。

6月3日，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讨论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和苏美关系等问题。

8月13日，民主德国沿柏林边界修筑“柏林墙”。

10月17日—31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通过第三个党纲，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共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再次谴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下。

12月11日，鉴于阿尔巴尼亚奉行“反列宁主义行为”，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断绝外交关系。

1962 年

3月5日—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赫鲁晓夫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赫鲁晓夫对农业状况表示严重不安。

夏天，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大面积取消休耕地，1200万公顷休耕地种上了玉米、向日葵等作物，此举加重了1963年的干旱。

9月9日，《真理报》发表苏联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对计划与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由此触发了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改革大讨论。

10月22日，苏联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被美国发现，美国宣布武装封锁古巴。

11月8日—11日，苏联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全部拆除运走。

11月19日—23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定取消现有的党委，建立分管农业和工业的两个平行的党委。

11月20日，美国取消对古巴的海面封锁，加勒比海危机结束。

11月，《新世界》第11期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2月26日，苏共中央召开意识形态会议，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表长篇讲话，强调文艺不能没有舵和帆，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

的态度。

1963 年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详细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问题。

6 月 14 日，中共致信苏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即“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被称为“二十五条”。

7 月 5 日—20 日，苏中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发表《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指名批判，中苏两党没有达成协议。

8 月 5 日，苏联与美、英在莫斯科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 月 13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9 月 2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1 月 19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是年，哈萨克斯坦有 2000 万公顷耕地受到黑风暴的侵害，中亚地区有 4500 公顷土地受侵蚀，不顾自然规律的大规模垦荒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苏联开始大量进口粮食和肉类。

1964 年

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3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月17日,苏共举行庆祝赫鲁晓夫70寿辰活动,勃列日涅夫等人对赫鲁晓夫进行吹捧,暗地里却在策划罢免赫鲁晓夫。

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10月14日—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分别举行全体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共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的社论,称:“我们的道路”“是由党在它的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由苏共纲领确定的”。

11月5日—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并会见了苏联新领导人,但苏联新领导人并不想根本改变赫鲁晓夫的方针,中苏关系并未好转。

11月16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波德戈尔内《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工业苏维埃机关和农业苏维埃机关合并》的报告,决定取消赫鲁晓夫时期以生产原则为基础分别成立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

12月9日—11日,苏联第六届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召开,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4年10月15日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和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命令。会议解除了赫鲁晓夫宪法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该职。

12月,苏联宣布从1965年起,利沃夫将有5个工业企业试行“利别尔曼建

议”，试验方案是由利别尔曼亲自参加制定的。

1965 年

2月5日—6日和10日—11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两次在北京停留，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会见和谈话。谈话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向柯西金表示，尽管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该改善。

2月26日，柯西金在莫斯科电视台就访问越南、朝鲜和中国发表演说。他认为在北京的会晤和谈话是有益的，有助于弄清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但又说“共运的困难和分歧是不能一下子解决的”。

3月1日—5日，苏共原打算召开的有26个党参加的“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会议，由于7个党拒绝参加，最后改称“协商会晤”。

3月2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组题为《苏共领导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步骤（3月1—5日，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分裂会议）》的材料。

3月，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清理赫鲁晓夫时期的农业政策，制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遭公开批判。

9月27日—29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听取柯西金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撤销赫鲁晓夫时期对经济的行政区管理体制，恢复部门管理体制。

10月4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工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和加强对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同一天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决定从1966年起，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业企业中，分期分批地推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给企业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提高企业领导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0月27日，《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国际主义职责》的编辑部文章。文章说，“苏联担负着同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重担”，“举不出一个没有受到苏联全力支持的革命运动”。因此，苏联“已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稳定

的中心”。

12月5日，为抗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和迫害，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爆发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示威，被认为是苏联维护权利运动的开端。

12月7日—9日，苏联第六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解除了米高扬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选举波德戈尔内担任这一职务。

1966 年

2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客人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拒绝苏共的邀请，中苏两党关系至此完全断绝。

3月29日—4月8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在总结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进行了清算，并建议取消新党章中关于定期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书记的规定，回避了斯大林问题，决定中央主席团改名为中央政治局，中央第一书记改称为中央总书记，取消中央俄罗斯联邦局。

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要求写一本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

11月19日，前来中国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的苏中友协代表团，中断在中国的访问回到莫斯科。塔斯社报道说，中断访问的原因是“中国方面藐视接待客人的起码常规”，对代表团“进行侮辱性和敌意的攻击”，以及“对代表团的正常工作进行阻挠”。12月15日，中苏友协负责人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苏联的报道纯系“造谣诬蔑”。

11月27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评中国的事件》，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的评论和攻击。

12月12日—1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研究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关于下一年度的国家计划和预算问题。

是年，集体农庄庄员参照当地国营农场的劳动定额和工资标准，实行月工资制度。

1967 年

2月9日，苏联单方面废除苏联和中国互免签证的协议。中国外交部2月10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一项口头声明，指出该协议是由苏联于1956年提出的，中国方面从促进中苏友谊出发同意了该协议。现在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协议，是“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的又一严重步骤”。

4月13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改行全面经济核算制》的决议。

8月14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和提高它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

11月3日，勃列日涅夫在题为《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50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苏联社会已是一个和谐、没有弊病的社会，意味着苏联不再需要改革和改进。

12月29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苏联外交机构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葛罗米柯在谈苏联外交的策略时说“控制事态，掌握外交主动，能攻善守，随机应变——无论哪种外交手段，只要能给苏维埃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好处，都不应不加利用”。

1968 年

1月22日，苏共召开中央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会议，研究“苏维埃政权50周年和党组织在文化方面工作的某些问题”。

2月26日—3月5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在布达佩斯召开，出席会晤的有苏共等64个党的代表团或代表。苏共提出在1968年11月至12月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认为，中国等许多党没有出席这次会晤，“是个深深令人感到不安的问题”，这会在各党关系中“产生新的不满因素”。

4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提出发展对苏联关系

的原则和改善华沙条约组织的主张。提出要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全面合作”。要求“改善华沙条约组织结构”，“改进联合司令部的活动”。

5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短暂的同志式会晤”。会晤中，苏共领导人表达了对捷局势的“不安”。

5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在苏黎世出版，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圈》在巴黎出版，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7月4日—6日，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国党中央相继致信捷共中央主席团，建议7月7日在华沙举行六国党最高级会晤，讨论捷局势。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与会。

7月14日，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五国领导人在华沙会晤，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决定对捷进行“集体制裁”。

8月20日晚，苏联飞机首先占领布拉格机场，接着苏联、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五国武装部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到21日晚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克里姆林宫的“寒流”摧毁。

8月23日，苏联领导人把杜布切克等捷克领导人抓到莫斯科，举行“苏捷两党会谈”。

8月26日，苏联迫使捷克领导人签署《莫斯科会谈公报》。

9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指出，“每个共产党不但对本国人民负责，也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负责……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不能够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利益，同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为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寻找理由。

10月16日，苏捷签订《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条件》的条约。

11月11日—12日，勃列日涅夫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宣布：“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背离了这些普遍规律就可能离开社会主义本身。而当某一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的时候，出现对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不仅仅是这一

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关心的事情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正式出笼。

11月17日，苏籍英国《新闻晚报》驻莫斯科记者维克多·路易斯去台湾旅行，并同“国防部部长”蒋经国谈了话。

11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将社会治安部更名为内务部。

12月1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批准《苏联人民监察机关条例》。

1969 年

3月2日，中国边防军巡逻队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时，与苏联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3月15日，中苏边防军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5月5日—17日，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7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等17个党没有参加。

6月10日，苏联数十名军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中国边防人员前去交涉时，苏方人员开枪打死中国一名女牧民，双方随后发生武装冲突。

6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递交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的声明。声明歪曲历史，把沙皇俄国通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

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苏联边防军于当日侵入中国黑龙江省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报告。宣称“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即使对以下这类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类事件可能在地理位置上是遥远的，但却涉及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朋友的安全”。

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就苏联军队在六、七两月，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不断地侵犯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有计划、有准备地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提出强烈抗议。

8月21日，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城市在苏联侵捷一周年之际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谈，就中苏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重开谈判。

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声明，重申了中国政府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一贯主张。

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的文件，重申了中国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即分清历史，照顾现实，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10月19日，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至1978年6月，谈判进行了15轮，由于苏方拒绝履行9月11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否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谈判未达成协议。

11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1月，作家索尔仁尼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1970年

1月9日，中国驻苏大使馆就苏联一再把中国台湾省说成“国家”一事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照会。

1月15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石油开采工业》的决议。

4月2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工会中央理事会通过《关于完善国营农场和其他国营农业企业工作人员劳动报酬制度》的决议。

5月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苏捷友好互助条约》。

5月8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25周年集会上说“社会主义正处在历史性的进攻阶段”。

6月12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谈到苏美关系问题时说，苏联对美国的“阴谋诡计”将“给予坚决回击”。

10月8日，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

10月9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宣传部指示多家报刊，刊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的声明，认为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是“冷战性质的挑衅”。但许多作家对索尔仁尼琴获奖表示高兴。

11月4日，苏联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和查利泽等“持不同政见者”组成“苏联人权委员会”。

是年，按照勃列日涅夫指示，由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出版。

1971 年

3月30日—4月9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重申“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再提“改革”，用“改善”、“完善”取而代之，苏联走向停滞。中央委员会从195人扩大至241人，勃列日涅夫把自己的支持者提拔起来，成为其统治的重要支柱。

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苏美相互关系准则等文件。

6月，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批评一些经济学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倾向，此后，陆续开展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不再使用“改革”一词，而改用“完善”。

7月25日，《真理报》就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对中国进行攻击，说中美接近反映出中美“两国霸权野心”。

9月3日，苏、美、英、法四国签署《西柏林协定》，确认四大国对柏林的权利，苏联对西柏林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畅通作出保证，西方国家则承认西柏林不是联邦德国的一部分。

9月11日，苏联历史上第一位领取特种退休金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病逝。

10月25日—30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西方国家。

11月27日，苏联第一颗火星人造卫星制造成功。

1972 年

4 月 20 日—24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访问苏联，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作准备。

5 月 22 日—30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双方签署《苏美相互关系原则》、《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等文件，奠定了苏美缓和的基础。

6 月 3 日，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交部长在西柏林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后议定书，联邦德国同苏联和波兰分别交换了苏联—联邦德国条约和波兰—联邦德国条约的批准书。

6 月 13 日，苏共中央公布《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

7 月 8 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苏联大使宣布要求苏联军事专家全部离开埃及的决定。

10 月 27 日，苏联宣布不阻拦苏联犹太人去以色列，此举被认为是“对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损害”。

11 月 5 日，苏、美、英、法四国大使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谈宣布结束，并发表声明：支持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勃列日涅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授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列宁勋章。

11 月底，开始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筹备会议。

12 月，苏共中央全会对柯西金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停滞了。

是年，苏联允许 3.2 万名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73 年

2 月 19 日，勃列日涅夫出席波德戈尔内的授勋仪式，授予波德戈尔内列宁勋章和“镰刀和锤子”金质奖章。

2 月 22 日—25 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捷克斯洛伐克。22 日在布拉格授予胡萨

克列宁勋章。23 日接受捷克斯洛伐克一级白狮勋章。

3 月 1 日，苏联共产党开始更换党证，按传统，第一号党证写上了列宁的名字，第二号党证发给勃列日涅夫。

4 月 2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改组工业管理机构，实行 2—3 级管理制，成立各种联合公司。

5 月 11 日—12 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波兰，在华沙授予盖莱克列宁勋章。

5 月 12 日—13 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3 日在柏林授予昂纳克列宁勋章。

5 月 18 日—22 日，勃列日涅夫访问联邦德国，实现了战后苏联首脑对西德的首次访问。

6 月 18 日—27 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两国签订了《苏美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 9 个文件。

6 月 27 日，苏联西伯利亚到欧洲部分的输油管干线竣工，全长 2200 公里。

7 月 19 日，苏联率先承认阿富汗前首相达乌德发动政变后建立的共和国政府。

9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苏关系时，攻击中国奉行“反苏和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

12 月，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第 1 卷在巴黎出版。

是年，苏联的石油出口从上一年 1.07 亿吨增加到 1.18 亿吨，收入从上一年 17 亿卢布增加到 24 亿卢布。

1974 年

1 月 7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主张把他关进监狱，安德罗波夫认为法律依据不足，提出把他驱逐出境。

2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褫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

2 月 13 日，索尔仁尼琴被押上一架联邦德国特意安排的“航空班机”，到达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直到 1994 年 5 月索尔仁尼琴才重回自己的祖国。

3月7日，苏联向印度政府保证，在出版标有中印边界的地图时，“将考虑印度的观点”。

4月3日，为进一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非黑土带农业的措施的决议》。

4月22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善轻工业商品生产的计划和经济刺激的若干措施》的决定。

5月4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他的《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一书中写道，除了加强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之外，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保障可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6月27日—7月3日，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美苏促进经济、工业、技术合作长期协定》等10个文件。

11月23日—24日，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福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谈，双方发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中风”。

11月，勃列日涅夫率团访问蒙古，参加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再次“中风”。

12月4日—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

12月10日，瑞典皇家学院为索尔仁尼琴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瑞典国王和多位亲王出席。索尔仁尼琴不无感慨地说：大概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给瑞典皇家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

1975 年

5月12日—17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利比亚，两国达成协议，苏联向利比亚出售6亿美元的武器。

6月18日，塔斯社发表《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反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攻击中国“对日本施加影响，以使日本同第三国，包括同苏联的关系复杂化”。

7月17日—19日，苏联“联盟号”飞船和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宇宙对接成功并进行联合飞行。

7月31日—8月1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第三阶段会议举行，各国首脑最

后签署被称为“赫尔辛基精神”的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宣言》，确认战后欧洲边界不可变更，东西方人员和思想“自由交流”。这是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的最高成果。

10月20日，美国白宫宣布美苏达成五年购买谷物协议，规定，苏联每年将从美国购买600万吨—800万吨小麦和玉米。

10月27日—31日，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在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两国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新阶段”。

11月14日，苏联派遣军事人员进入安哥拉，并增加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武器援助。

1976年

1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2月10日—11日，苏联军舰炮轰安哥拉城市，非洲一些国家同声谴责。

2月24日—3月5日，苏联共产党举行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要求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写入新宪法。

5月8日，勃列日涅夫被授予元帅军衔。

5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跨单位合作和农业一体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决议，指出发展农工综合体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主要方向和必要条件。

6月29日—30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柏林举行，勃列日涅夫率团参加。

7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致电中国人大常委会，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9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吊唁毛泽东主席逝世。

9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7周年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来贺电，表示愿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1月15日—17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

11月22日—24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罗马尼亚，24日接受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级星勋章。

11月24日，苏联与安哥拉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是年，苏联进口粮食2063.8万吨，是苏联有史以来净进口粮食最多的一年。

1977年

1月21日，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写信给美国总统卡特，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是恶劣的，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呼吁给予支持。

5月24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波德戈尔内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6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波德戈尔内被解除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以总书记身份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8月17日，苏联“北极号”原子破冰船到达地球的最顶点——北极点。

10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被写入宪法，据新宪法规定勃列日涅夫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勃列日涅夫总揽了苏联党、政、军的大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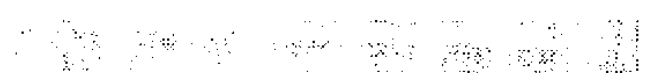
11月2日，勃列日涅夫在十月革命60周年庆祝会上作报告，谈到裁军问题时，说苏联“不想破坏现在东西方之间在中欧或者苏美之间所形成的军事力量大致的均衡状态”。

12月13日，苏联同美国签订一项延长苏美农业合作协定的议定书。

1978年

4月10日，苏联派往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舍甫琴科“因同苏联政府发生分歧”，拒绝回苏联。西方通讯社说，这是40年来苏联第一个大使级外交官叛逃。

4月，苏联在阿富汗策动军事政变，杀死达乌德，成立由人民民主党主席塔拉基担任主席的革命委员会。塔拉基推行全盘苏化的方针，使阿富汗国内出现严重危机。



6月13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攻击中国推进世界战争,“勒索一系列邻国的领土”。

6月19日,苏联政府就正在谈判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向日本政府提交声明,威胁说,如果日本签订一项包含针对苏联的条款的条约,苏联对日政策将“作必要的修改”。

8月9日—15日,苏联海军舰队开始使用越南金兰湾基地。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苏联指责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压力”“投降”,条约对亚洲的稳定具有“危险性”。

11月1日—9日,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把越南纳入苏联的战略体系。

11月22日,勃列日涅夫写信给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要求他们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

11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契尔年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书记。

12月19日,《真理报》就中美建交发表短评,说中美建交是把中美“最近几年来的秘密勾结在法律上肯定下来”。

年底,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出兵柬埔寨。

1979 年

1月15日,苏联在安理会否决关于在柬埔寨停火和撤出外国军队的提案。

4月3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宣布,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倡议同苏联进行新的谈判。

5月8日,勃列日涅夫给自己的儿子尤里·勃列日涅夫等人授勋。

6月15日—18日,勃列日涅夫与美国总统卡特在维也纳举行会谈,双方签订《苏美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及议定书等文件。

7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及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决议,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的作用》的决议,进一步完善计划经济体制。

9月23日,参加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联

政府代表团就中苏国家关系问题举行第一轮谈判。至11月30日止，双方举行了6次全体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12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

10月2日，日本外务省抗议苏联在色丹岛设立军事基地，强烈要求苏军撤出。

11月2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27日，在苏联军队直接参与下，阿富汗发生武装政变，阿明政权被推翻，卡尔迈勒组成新政府。苏联大军侵入阿富汗，遭到了阿富汗人民的抵抗，苏军陷入持久战。

1980 年

1月1日—2月，世界上近50个国家的领导人或发言人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

1月7日，苏联在安理会否决关于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提案。

1月10日—14日，联合国举行紧急特别会议，讨论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大会以104票对18票通过“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

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宣布，当前进行中苏国家关系第二轮谈判是不适宜的。他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威胁世界和平，也威胁中国的安全，并为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了新的障碍。”

1月22日，苏联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因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而被苏联当局强行从莫斯科迁移到高尔基城。

5月20日，苏联驻法大使契尔沃年科对法国记者谈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三个条件：一、承认卡尔迈勒政府；二、举行卡尔迈勒政府同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三、停止任何“外来干涉”并保证以后不进行干涉。他点了三个“外来干涉”国家：美国、沙特阿拉伯和埃及。

6月23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苏共二十六大在1981年1月25日召开。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攻击美国和中国对阿富汗“采取武装侵略”，声称苏联是“应阿富汗的请求”“帮助”阿富汗“反击侵略”，否认苏联“想闯入暖洋”

和“想把别人的石油据为己有”。

7月10日，苏联同阿根廷签署五年粮食贸易协定，确定苏联今后五年内将从阿根廷购买2250万吨粮食。

7月20日，第2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许多国家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拒绝参加。

8月20日，苏联报纸在沉默50天后首次报道波兰工人罢工事件。

8月25日和28日，塔斯社就波兰局势接连发表两篇评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波兰顺利前进不可动摇的基础，指责波兰反社会主义分子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国家发生的客观和主观困难进行投机。

9月27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西方继续在波兰挑唆反社会主义行动。

10月7日，塔斯社发表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在六中全会续会上讲话的详细摘要，删掉了关于波兰10月3日的罢工和将巴比乌赫等前领导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等重要内容。

10月21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23日，柯西金在进行经济改革问题上与勃列日涅夫发生分歧，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决定解除柯西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接任。

11月26日，苏联和蒙古签署两国政府关于苏蒙国界制度和在边界问题上进行合作互助的条约。

12月3日—14日，西方警告苏联不要干涉波兰，苏联表示它“无意干涉波兰事务”。

12月5日，华沙条约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破例举行当年的第二次会晤，主要讨论了波兰问题。强调波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牢固一环”，重申波兰“可以期望得到华沙条约国兄弟般的声援和支持”。

1981 年

1 月 19 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茨维贡自杀。

2 月 23 日—3 月 3 日，苏共二十六次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当前党在对内外政策方面的任务的报告，继续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

4 月 23 日—24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代表团访问波兰，这是自 1980 年夏天波兰发生罢工浪潮以来苏共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波。

5 月 26 日，加拿大小麦局局长宣布加拿大同苏联签订了一项大宗粮食贸易协定，规定加拿大在今后五年内向苏联出售 2500 万吨粮食。

5 月 27 日，美国总统里根强调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谈判。

5 月 28 日，美国总统里根会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的妻子。夏兰斯基尚在苏联被押，是犹太人。

5 月底—6 月，波兰一些地方出现反苏标语、传单和发生涂污和破坏苏军纪念碑事件。

6 月 5 日，苏共中央致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指责波兰现领导人对敌人的要求“进行无休止的退让”。

8 月 3 日—12 日，波兰再次发生团结工会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行动，苏联报纸指责这“实际上”是“夺权斗争”，要求波兰党采取果断行动。

8 月 5 日，美国总统里根宣称美国不会签署第二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因为它有重大缺陷。

9 月 5 日—10 日，塔斯社接连就波兰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评论，说这是一次反社会主义的集会。

9 月 14 日，勃列日涅夫会见老挝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凯山，并授予他列宁勋章。

9 月 17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就波兰局势致波兰党政领导人一项声明，说反社会主义在波兰已达到危险边缘，敦促波兰当局“立即采取坚决而果断的措施，制止反苏行径”。

12 月 7 日—12 日，塔斯社接连发表评论，说波兰局势严重，团结工会的拉

多姆会议的目的是夺权，波兰政府应给团结工会以反击。

12月13日—14日，波兰宣布实行军管，塔斯社发表声明，说这是“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

12月16日，苏联应波兰政府的请求向波兰提供实物援助。据波通社12月24日报道，一周来，苏联和东欧国家向波兰运送了24.4万吨援助物资。

1982年

1月25日，实际上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苏斯洛夫去世。他长期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苏联的“灰衣主教”。

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长篇讲话，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3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勃列日涅夫讲话作出回应：“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10月5日—21日，中苏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第一轮磋商。

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会见苏联陆海军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认为，同中国的关系有不小的意义。

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参加在红场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65周年集会，晚上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为各国使者举行的招待会。

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总书记人选时，契尔年科和吉洪诺夫相互提名，没有得到响应，乌斯季诺夫提名安德罗波夫，得到多数人同意。

11月12日，苏共中央全会选举68岁的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人虽然头脑较为清醒，但已重病缠身。

11月15日，苏联为勃列日涅夫举行国葬。安德罗波夫致悼词，对勃列日涅夫大加溢美，并表示继续其内外政策。

12月17日，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被解职，切布里科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

1983 年

7月25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扩大工业生产联合公司（企业）在计划和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及加强其他经济成果所负责任的补充措施》的决议，决定将下达给企业的指标减少到只有3项。

9月1日，进入苏联萨哈林岛上空的韩国波音-747客机被苏联空军击落，269名旅客丧生，苏联拒绝认错和赔偿。

9月5日，西方国家禁止俄罗斯民航飞机入境14天。

9月16日，安德罗波夫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2月13日，苏联前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自杀身亡。

12月，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工业中进一步发展劳动组合与劳动刺激的作业队形式并提高其效率》的决议，部长会议随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84 年

2月9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2月13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73岁、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4月11日—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契尔年科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吉洪诺夫再次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8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速国民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议，强调加快科技进步是党、政府和一切社会团体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12月20日，苏联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去世，勃列日涅夫的“老近卫军”少了一根支柱。

1985 年

3 月 10 日，74 岁的契尔年科终于油干灯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当政仅 13 个月。

3 月 11 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3 月 23 日，《真理报》开始发起大规模的反酗酒宣传运动。

4 月 23 日，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革新方针，拉开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序幕，利加乔夫、雷日科夫、切布里科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5 月 7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反酗酒和禁止私酿酒”决定。

5 月 16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加大反酗酒斗争》法令，为反酗酒活动打下法律基础。该运动一直持续到 1988 年，给苏联造成严重的财政和经济损失。

7 月 1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罗曼诺夫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谢瓦尔德纳泽升为政治局委员，叶利钦成为苏共中央书记。

7 月 2 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葛罗米柯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毫无外交经验的谢瓦尔德纳泽任外交部长。

9 月 27 日，解除吉洪诺夫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雷日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 月 15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集中讨论苏联共产党党纲和党章的修订问题，否定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

11 月 22 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首次会晤。

12 月 24 日，在莫斯科当政 18 年的格里申被解职，叶利钦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986 年

1 月 15 日，苏联发表声明，提议从 1986 年开始实行使人类摆脱面临核浩劫

的恐惧的计划，建议分三个阶段销毁核武器。

2月25日—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修正案和《关于苏联1986—1990年和200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提出实施“加速战略”，并确定了实现该战略的基本途径。

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原子能核电站发生核事故。由于苏联政府继续沿用以前掩盖问题的处理方式，此举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面影响，促使戈尔巴乔夫加强公开性。

5月9日，苏联国防部声明：“不仅在核战争中，而且在军备竞赛中都不能取胜。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破坏军事战略平衡。”

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第一次公开肯定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要努力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10月11日，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雷克雅未克会晤。

11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个体劳动法》，允许私人在手工业生产、居民生活服务等27个项目中从事个体生产经营，但不得经商、雇工、搞非劳动收入或损害其他公共利益。

12月16—18日，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任命非哈萨克族人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动，“阿拉木图事件”使苏联民族问题浮出水面。

1987 年

1月27日—28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提出各级党的第一书记都要以差额选举产生，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要实行民主化，不要以党代政。选举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卢基扬诺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5月26日，越南宣布开始从柬埔寨撤军，当年撤出5万人，越南同意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

5月28日，西德青年鲁斯特驾驶飞机降落红场，在苏联和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戈尔巴乔夫借机撤换军队领导人。

6月25日—2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中心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通过了

《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

8月23日，时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48周年纪念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首都发生集会，要求公布该条约的秘密议定书。

10月21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叶利钦对改革进展缓慢提出批评，并提出辞职，会议转而讨论叶利钦问题。

11月2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十月和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全面总结了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联所处的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继续批评叶利钦，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常委委员的职务。

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分别以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书中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导思想，表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思维”。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华盛顿会晤，并签署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

1988年

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军事审判庭1938年对布哈林等人的判决。

2月18日，苏共中央全会上叶利钦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这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

2月20日，纳卡州州委通过致苏联最高苏维埃呼吁书，要求把该州从阿塞拜疆划归亚美尼亚管辖。由于苏共中央在此事上反应迟缓，导致了该地区日后多年的民族冲突。

2月27日—28日，在苏姆盖特市发生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两天内有32人被杀，其中亚美尼亚人有26名，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

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对苏联改革提出批评，此举被认为是苏共保守派的反击。

3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纳—卡冲突”通过决议，不允许用向国家政治机关施加压力的方式解决民族领土争端问题，要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采取措施加强法制，维护社会秩序。

3月2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50年代初的一批受害者，其中包括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恢复党籍。

4月5日，《真理报》发表《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进行反击，认为她是站在保守和教条主义立场上反对改革。

4月，在爱沙尼亚建立了名为“支持改革人民阵线”的民族自由运动。

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5月29日—6月2日，里根访问莫斯科。这是美国国家元首时隔14年后对苏联的访问，美苏签署了《关于两国进行联合核查核试验的协定》、《关于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相互通报的协定》，以及1989—1991年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的计划等。

6月28日—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认为政治体制是造成前期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主要原因，苏联把改革的主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

7月1日，《合作社法》生效，可以在各个领域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使所有制形式更趋多样化。

7月9日，为30年代被错误镇压的布哈林、李可夫恢复党籍。

8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对30年代四起重大案件平反，表明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的指控不成立。

8月，决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可将土地出租给家庭和个人，租期可达50年，承租土地者在农忙时可雇佣劳动力。

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取代退休的葛罗米柯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提高苏维埃在国家管理中的地位。

10月2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

10月9日，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

10月23日，立陶宛改革运动成立。

12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宪法（根本法）的修改与补充》的法律，通过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

12月1日—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作准备。

1989 年

1 月，苏联开始进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选举与以往不同：实行差额选举、政府官员不能同时担任人民代表。

2 月 6 日，中苏双方同时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宣布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

2 月 15 日，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结束。

3 月 16 日，苏联发表从蒙古撤军的声明。

3 月 26 日，苏联共选出 2250 名代表，其中 750 名社会组织推荐，其余是在地区选举和民族选区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竞选产生的，许多共产党的干部落选，波波夫、索布恰克、萨哈罗夫等激进派代表人物当选。

4 月 4 日—9 日，从 4 日开始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发生群众集会事件，9 日凌晨军队在驱散人群的过程中造成 16 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后戈尔巴乔夫宣布，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再干预类似事件。

4 月 14 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4 月 25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政策受到批评。

5 月 16 日，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晤，中苏“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了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5 月 27 日，第一次苏联人代会召开，人代会成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其常设机构是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

6 月 10 日，叶利钦以递补的方式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当选最高苏维埃建设和建筑问题委员会主席。

7 月 10 日，西伯利亚麦罗沃州 1.2 万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罢工很快涉及其他地区，铁路、工程建设等部门的工人卷入。罢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秩序混乱。

9 月 23 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

9 月 25 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 1940 年并入苏联的法律无效。

10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议案，今后15个月内禁止罢工，但罢工不仅没有停息，规模也越来越大。

10月23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声明，1979年苏联进军阿富汗是对人类普遍价值的践踏。

11月26日，《真理报》发表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对苏联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评判。此文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越来越多地接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与主张。

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马耳他实现会晤，标志美苏间的“冷战”结束。

12月5日，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1968年派他们国家的军队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是对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干涉，应该受到谴责。”

12月10日，莫斯科一些非正式组织在集会上提出了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

12月12日—24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有人提出取消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大会勉强通过了政府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大会宣布苏联出兵阿富汗应该受到道义和政治上的谴责；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违背苏联对外政策原则”。

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苏共独立。

1990年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赴立陶宛劝说其留在联盟内，此举反而坚定了立陶宛人的独立决心。

1月，苏共内部出现了民主纲领派。成立之初，其领导人多为跨地区议员团成员，他们提出了《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民主纲领》，主张根本改革苏共。

2月4日，莫斯科20万人举行未经政府批准的集会和游行，提出了取消宪法第六条、把多党制写进宪法等标语口号。

2月5日—7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决定党将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承认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2月26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协议，分三个阶段至1991年底撤走驻捷全部苏军。

3月10日，苏、匈两国签署协议，确定驻匈苏军于1991年6月30日前撤完。

3月1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候选人；立陶宛议会通过《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此举标志着立陶宛在脱离苏联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随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先后发表独立宣言，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作用。

3月13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等决议，决定删去宪法第六条，宣布实行总统制，把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

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实际上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但这个法律从来没有被任何共和国执行过。苏联正式承认对造成两万多波兰军官死亡的卡廷事件负责。

4月中旬，苏共内的正统力量“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召开代表大会，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马克思主义行动纲领》。

4月23日—26日，中国总理李鹏访苏，与雷日科夫总理、戈尔巴乔夫总统等举行了会谈，中苏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

5月4日，拉脱维亚新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5月30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其盟友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反对派和平夺权。

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此举使苏联的解体走上了不归路。

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召开，成立俄罗斯共产党，此举促进了苏共联邦化的发展，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7月2日—13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苏共所接受，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利加乔夫被逐出领导核心，叶利钦等人宣布退出苏共。

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了一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的“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即“500天计划”。方案的基础是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确立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提出一些反垄断和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等，同时要求中央把广泛的权力交给各个共和国。

7月27日，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拟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但叶利钦和雷日科夫并未真正协调，而是各拿出了一套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

9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4+2外长会谈（苏、美、英、法和联邦德国、民主德国）达成协议，最终签署《彻底调整对德关系条约》，确定尊重战后边界，统一后的德国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将奉行和平政策。

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委托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向市场经济过渡方案的基础上拟订一个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统一方案，叶利钦不接受这种做法，表示要独立行事。

10月16日，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以333票赞成，12票反对，34票弃权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交的名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统一方案》，但叶利钦不执行，实际上是一纸空文。

10月20日—21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通过政治宣言、章程和一系列决议。

12月8日，格鲁吉亚共产党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12月17日—27日，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关于国内局势和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决定》，通过宪法修正案，建立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体制，设立副总统，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总构想及其签订程序的决定》，决定1991年3月17日就签订新联盟条约举行全民公决。

12月20日，谢瓦尔德纳泽在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突然宣布辞去外交部长职务，以表示对“独裁”的抗议，戈尔巴乔夫对谢瓦尔德纳泽未经商讨就提出辞职大为震怒。

1991 年

1月8日，立陶宛发生新的骚乱。

1月13日，苏军部队和坦克进入维尔纽斯，发生流血事件，事后戈尔巴乔夫推诿责任。

1月1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名，帕夫洛夫被任命为苏联总理。

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声明，说戈尔巴乔夫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要求他立即辞职。

3月8日，苏联发表新联盟条约草案。

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除格鲁吉亚等6个共和国未参加外，参加公决的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

4月1日，华约组织宣布解散其军事机构。

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

4月16日—19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这是苏日关系史上苏联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日本。

4月23日，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9个共和国领导人发表“9+1联合声明”，提出签订主权国家联盟新条约。

4月24日—25日，举行苏共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受到俄共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等人的强烈谴责，但会议没有同意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5月15日—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继1957年以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对苏联的首次访问，也是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进一步推进了中苏关系的发展。

5月16日，中苏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了《关于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解决了中苏大部分边界的争端。

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

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和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两个主人。

6月28日，经互会9个成员国的代表在布达佩斯签署了解散经互会的议定书，规定90天后经互会章程失效，届时即告正式解散。

7月1日，华约6个成员国领导人在布拉格签署议定书，宣告华约的有效期限提前结束，华沙条约组织至此正式解散。

7月10日，叶利钦正式就职俄罗斯联邦总统。

7月20日，叶利钦签署《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构、机关和组织中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和组织机构活动》的命令，苏共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谴责叶利钦的“非党化”命令违反宪法。

7月24日，戈尔巴乔夫与10个加盟共和国全权代表团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结束会晤，宣布制订新联盟条约的工作已经完成，准备修改后在9—10月签署。

7月25日—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这是最后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主要议题是新党纲草案和关于联盟条约草案。戈尔巴乔夫受到攻击，许多人指责他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会最终通过了《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各级党组织对草案进行讨论的任务的决定》，决定1991年11—12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新党纲。

7月27日，雅科夫列夫辞去苏联总统首席顾问的职务，又一位改革主将离戈尔巴乔夫而去。

7月29日—30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会晤，讨论新联盟条约，达成协议，决定8月20日签署，苏联将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共和国的权力大为增强。

7月31日，苏美首脑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简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为长达9年的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画上了句号。

8月5日，戈尔巴乔夫带着家人去福罗斯休假，计划8月19日返回。

8月17日下午，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兰诺夫、舍宁、博尔金等人在位于列宁大街尽头的克格勃中心秘密开会，讨论实行紧急状态，决定派出代表向戈尔巴乔夫摊牌，如果他不同意，则用亚纳耶夫取而代之。

8月18日下午，巴克兰诺夫、舍宁、博尔金和瓦连尼科夫飞到福罗斯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们实行紧急状态的要求，戈尔巴乔夫的对外联系被切断，实际上被软禁在别墅里。

8月19日，为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订，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自即日起由他代行总统职务，同时宣布成立由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政变只持续了3天。

8月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立即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切决定；解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有成员的职务；任命了新的国防、内务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此后，苏联局势更加复杂化。

8月23日，叶利钦签署“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共产党停止活动”的命令。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的国家。

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叶利钦签署“关于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产党财产”的命令，把苏共和俄共的财产收归俄罗斯国家所有。

8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停止苏共在全联盟活动的决议；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宣布独立。

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月31日，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9日，塔吉克斯坦宣布独立。

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格鲁吉亚领导人阿姆萨胡尔季阿要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承认格鲁吉亚独立。

10月27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决定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脑在明斯克附近举行会晤，签署别洛韦日协定，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戈尔巴乔夫更新和保留联盟的努力宣告失败。

12月21日，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在

阿拉木图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议定书，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12月25日，17时，戈尔巴乔夫阴沉着脸，最后一次作为国家首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楼顶印有镰刀锤子的红旗降下，升起了俄罗斯联邦的三色旗。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的宣言。

本书作者简介（按姓氏笔画排序）

陆南泉

马龙闪，1941年生，河南省宜阳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俄罗斯苏联史研究，兼顾世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问题。曾参加“六五”、“七五”国家社科重点课题研究，主持“九五”国家重点和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并单独完成中宣部、教育部有关课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史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现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中心理事。先后被聘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洛阳大学特聘教授和温州大学兼职教授。从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和《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等3部；曾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三主编之一）、《世界近现代科技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变革》、《苏共执政模式研究》等4部；合著：《苏联史纲》（1917—1937）2卷、《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1953—1964）、《斯大林模式研究》、《苏联剧变新探》、《20世纪世界文化》等8部。译著有《巴黎公社史》（上、下册）、《肖洛霍夫中短篇小说选》和《从阿尔巴特到西伯利亚》等4部。主要代表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0年）科研成果三等奖，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发表学术著作、论文、文章、译著等130余种。

孔田平，1965年生，山西省昔阳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东欧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法学博士。兼

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理事、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专家。1997年12月—1998年12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东欧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1年9月—2002年8月在华沙经济学院金融与管理学院做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中东欧问题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波兰政治经济、东欧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转轨经济比较、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巴尔干问题。曾发表数十篇论文及研究报告，合著多部，主要代表作：《东欧经济改革之路——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

尹彦，1957年生，贵州省贵阳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1995年、1997年两次获厦门市优秀教师称号，2001年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2004年获福建省党校系统优秀教师称号。

著有《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2001年）和“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政治思想研究”（2007年）。发表论文60余篇。

王桂香，1965年生，黑龙江省黑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副研究员。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获双学士学位，90年代初曾公派赴莫斯科留学，1995年获哲学副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苏联政治史”及“1953年至1957年的苏联”两项课题的研究，发表多篇有关俄罗斯现代政治和苏联政治类的论文。参加翻译的译著有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阿卡耶夫的回忆录《难忘的十年》、丘拜斯主编的《俄罗斯式私有化》；主要负责翻译的译著有：罗伊·麦德维杰夫的《普京时代——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等。

叶书宗，1936年生，浙江省天台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196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共运史专业研究生班。曾任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长江文化研究所所长。

承担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八五”课题“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经济演变

的历史考察”；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九五”中长期课题“长江文明史”；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著有《苏联的革命与建设》、《苏联兴亡史》（合著）、《回眸“布拉格之春”》、《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研究》等书8部；主编《长江文化与中华民族》、《长江文明史》等。发表有关苏联历史论文多篇。

左凤荣，1964年生，辽宁省阜新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国际政治专业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9年7月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2001年7月毕业于中央党校，获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在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大学进修。兼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等。

主要著作有：《赫鲁晓夫传》、《走进克里姆林宫》、《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读懂斯大林》（与姜长斌教授合著）和《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获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参写的主要著作有：《斯大林政治评传》、《苏联兴亡史论》、《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等。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京执政下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完成两项中组部课题（分获一、二等奖），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课题的研究。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100多篇。

李兴，1966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系）所长。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留学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1997年）、乌克兰基辅大学（2000—2001年），访问德国、法国、日本、比利时、朝鲜等国。2005年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兼职有：教育部高等学校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兼职研究员。

独立与合作出版著作10部，其中独立专著2部，主编2部。在俄罗斯《远

东问题研究》、乌克兰《基辅大学学报》、亚美尼亚《透析》等国内外重要期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 120 多篇。

李凌，1925 年生，广东省广州市人。1938 年广州沦陷，辗转逃难到香港伯父处，入英文书院。因不愿接受殖民主义教育，1940 年离家赴昆明考入同济高中。1942 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 年加入共产党，后任第二支部书记。1946 年联大结束，随校复员到北大学习，任中共南系第二支部书记。在联大“一二·一”运动和在北平“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都参加发动和领导工作。1947 年赴解放区，向中共中央青委汇报白区地下党工作，同年冬，作为先进党员，被选派到空军，在第一航校任政治教员。1955 年调回北京，在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任编辑（负责政治组）；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 年春改正后，任北大荒 850 劳改农场党校政治教员。1962 年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1978 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未定稿》，1982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1987 年离休。

著有：《中国社科院学者文集·李凌集》、《勇破坚冰的〈未定稿〉及其他》、《他山之石》及与万木春、黎勤合编出版《中国古代爱情诗三百首》，发表论文数十篇。

吕瑞林，1975 年生，河北省河间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在读博士。1998 年 7 月毕业于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 年 7 月毕业于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9 年 9 月就读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

发表的论文有：《社会科学的高度政治化及其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继承和超越》、《简论〈共产党宣言〉中的所有制问题》等。

杨存堂，笔名柳植，1934 年生，陕西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长期从事世界现代史、苏联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主编《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研究苏联史，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

学理论》、《东欧中亚研究》、《陕西师大学报》等杂志发表有关十月革命、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及主要特点、赫鲁晓夫及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文章多篇。著有：《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美苏冷战中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世纪性的实践》等专著，并参加了《苏联史纲》等书的写作。任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并主编其中的3卷。

杨闯，1944年生，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1981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外交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首席馆员，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政治处主任。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现任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理事、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期刊社学术顾问等职。

主要著作：《外交学》（主编）、《外交学概论》（合著）、《近代国际关系史纲》、《百年中俄关系》、《国际政治百科》、《苏联兴亡史纲》（合著）等。主编《百年中外关系系列丛书》、《国际政治百科》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何伟，1926年生，河北省赵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在晋察冀军区三纵队供给部工作。1949年4月转业到河北省财政厅。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后转读经济学研究生，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1989年曾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现任信息产业部经济专家委员会顾问、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是《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100位经济学家》之一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专著和主编著作30余部，主要有：《何伟选集》、《何伟文选》、《观念撞击的火花》、《商品经济与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商品》、《股份制与社会所有制》、《谏策与诤言》、《“三农”问题症结所在》、《中国改革之路研究》、《现代企业战略学》、《分配经济学》等，在全国各类报刊上发表论文2000余篇。

沈志华，1950年出生。1979—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

专业硕士研究生班读书（未毕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高级研究员。

主要研究：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代表作：《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修订版）、《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主编）、《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专题史研究（1917—1991）》（主编）等，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卷本《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8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等文献资料集。

陆南泉，1933年生，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人。1960年莫斯科财政学院（现俄罗斯联邦财政科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执教和从事苏联问题研究。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曾先后任经济研究室、俄罗斯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并兼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顾问组组长，哈尔滨、佳木斯市政府等经济顾问。先后两次任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教授。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撰写、主编和合作主编的专著有《苏联经济》、《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从企业入手——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苏联改革大思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新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苏联兴亡史论》、《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等十余部，并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研究报告。译著有《苏联财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5部。

郑异凡，1935年生于南京，原籍浙江省江山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的专家。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苏东处处长，现任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曾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政治和理论室主任、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理事。

长期研究苏联史，重点研究苏联十月革命至30年代的历史。著有：《天鹅之歌——关于列宁后期思想的对话》、《布哈林论》、《不惑集》、《史海探索》。《苏联史纲（1917—1937）》一书的撰稿者之一。“七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斯大林的理论 and 实践”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之一（后成书《斯大林模式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项目“布哈林研究”、“俄国社会主义理论问题跟踪”。主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的校订工作。主编《布哈林文选》、《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译《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论争资料》、《托洛茨基读本》，此外还有多种译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副主编，并主编其中的5卷。

周尚文，1935年生，上海市人。1961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起为政治学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苏联史的教学和研究，曾任华东师大政教系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研究》副主编。现任上海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有：《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主编）、《苏联兴亡史》（3人合著）、《社会主义150年》、《借鉴与比较——中俄经济转轨比较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研究》、《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苏共执政模式研究》（合著）等。发表论文200多篇。曾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十多项，多次获上海市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张英姣，1978年生，山东省威海市人。2001年至2004年就读于武汉大学，获得世界历史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7月至今，在山东省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是该校国际共产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所成员。2008年9月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主持山

东省 2007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独联体‘颜色革命’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张盛发，1957 年生，上海市人。1998 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03 年，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5—2006 年，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代表作：《斯大林与冷战》。主要在研项目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A 类课题《苏联通史》（8 卷本主编）。

罗肇鸿，1936 年生，广东省大埔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7—1962 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1962—1965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1966 年 4 月起一直在中国科学院（1977 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曾于 1980—1982 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进修比较经济学。1985—1993 年任副所长，1985 年晋升为研究员，同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在一些高等院校担任兼职教授。

已经发表论著 200 多万字。专著：《高科技与产业结构升级》；主编：《国际经济学概论》、《世界市场经济主要模式》、《世界市场经济模式综合与比较》、《世界经济调整与改革新浪潮》、《国外科技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跨国并购：特点、影响和对策》。

林蕴晖，1932 年生，江苏省丹阳市人。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当代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奠基创业》（《中国二十世纪全史》第 7 卷）；《辅助建国》（《刘少奇之路》第 3 卷）；《共和国年轮——1953》；《走出误区——我观共和国之路》；《国史札记——事件篇》；《国史札记——史论篇》；《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2 卷·1953—1955）；《乌托邦运动——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4 卷·1958—1961）。此外还有合著及主编著作多部。

姜长斌，1935年生，2009年1月去世，山东省龙口市人。1954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班。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东欧中亚学会（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欧中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常务理事；中国乌克兰学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等社会兼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起）；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译著有：《俄罗斯森林》，《冈察洛夫环球游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萨哈林旅行记》，《涅维尔斯科伊船长》。专著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苏—早期体制的形成》、《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1879—1924）》、《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读懂斯大林》（与左凤荣合著）等。主编和参与主编的著作有：《斯大林政治评传》、《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1954—1973年》（任中方主编，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被列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目，2001）、《苏联兴亡史论》等。

项佐涛，1982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人。2001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现为该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研究。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学术创新奖、学术十杰等奖项，并作为青春的榜样——优秀研究生系列报道之一在学校主页报道。2009年2月，参加维也纳大学举办的“Korea and East Asia: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ist Systems”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The Soviet Model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Changed and Unchanged”；2009年9—12月，在贝尔格莱德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博士论文资料搜集。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剖析》、《历史中的观念与观念中的历史——国外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及其演变研究》、《1939—1940年托派关于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争论》、《曲径探新路——原苏东地区近20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关系》等论文10余篇。

郭洁，1975年生，祖籍甘肃。2006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

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欧政治与外交、冷战国际史、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主要有：《美国情报界眼中的国际共运（1949—1966）》、《东欧转型国家公民社会探析》、《1956 年美国对匈牙利十月危机的反应》、《三十年来东欧政治变迁》等。主编有《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 6 卷第 10 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9 年）。

姚海，1952 年生，江苏省苏州人。1983 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苏联史专业，获硕士学位。1993—1994 年间为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苏州科技学院历史系教授、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中心研究员。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副会长。

从事俄国历史和文化、俄国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俄国现代化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成果有专著：《俄罗斯文化之路》（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台湾淑馨出版社繁体字本 1992 年版）、《近代俄国立宪运动源流》、《当代俄国》，《俄罗斯文化》。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 卷、第 2 卷、第 13 卷。参加编写著作多种。发表论文 40 余篇。

赵常庆，1940 年生，1964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1994—1995 年作为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在莫斯科大学进修。1964—2006 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部属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1992—2006 年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国际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兼中亚研究室主任，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亚与外高加索国家事务、苏联国内政治与民族问题。主编或独著《中亚五国概论》、《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十年巨变——中亚与外高加索国家卷》、《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哈萨克斯坦》等专著和工具书。参与《中国与中亚》、《苏联兴亡史纲》、《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等 20 多部专著和工具书的写作。此外还撰写多篇专题研究报告，以

及近 300 篇论文、文章和内部报告。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3 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1 项和重点项目多项、亚洲开发银行项目 2 项。

栾景河，1964 年生，黑龙江省牡丹江人。俄罗斯罗斯托夫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199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1999 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荣誉博士（2007 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对俄交流咨询专家、北京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俄文化交流中心教授等。

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中俄中苏关系史、当代中俄关系、苏联历史、当代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主要著作有：《20 世纪后期中俄关系史中过去的一页》（俄罗斯罗斯托夫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7）、《21 世纪的俄罗斯谁主沉浮》、《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合著）。主编论文集：《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发表论文及研究报告 50 余篇。

高放，原名高元滋，1927 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等。1981 年由国务院总理批准聘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3 年被聘为教授。1992 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证书和金质奖章，并返聘继续招收博士生。2009 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 23 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

主编、合编、合译、合著、专著 50 余部，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治学风雨路漫漫》等 9 本文集。

顾志红，1954年生，上海市人。1974年毕业于洛阳外语学院俄语专业，并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研究所工作。1981年1月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1986、1996、2001年先后在乌克兰基辅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立陶宛维尔纽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和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非常邻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列国志·摩尔多瓦》、《普京的安邦之道——俄罗斯近邻外交》、《事实与真相——俄罗斯地缘政治与外交》。

徐天新，1934年生，北京市人。1959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苏联史和世界现代史研究。主持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统一的思想与实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先后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及北京大学科研奖、教学优秀奖和教材优秀奖。曾任中国苏联东欧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编委。专著有《平等、强国的理想与苏联的实践》。主编《世界通史·现代卷》、《世界通史·当代卷》、《欧洲的分与合》。参与《俄国通史简编》、《苏联史纲》、《斯大林模式研究》等著作的撰写。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委。发表有关论文多篇。

徐葵，1927年生，江苏省南汇县张江乡人（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1944年9月—1948年6月在重庆和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1944年在重庆开始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48年7—12月在正定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在东单区人民政府工作。1949年5月—1975年5月在中华全国学联、中华全国青联、中国共青团中央工作，曾任全国学联秘书长、副主席，全国青联副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其间1958—1962年为中国学联常驻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和副主席。1975年5月—1980年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苏联组和苏联研究所工作。1981—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现改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长、所长、研究员。1982年2—10月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做访问学者。1994 年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称号。2006 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主编和参与主编《苏联概览》、《东欧概览》、《苏联剧变新探》等著作。参与翻译和校对了《布哈林政治传记》、《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被枪决的苏联元帅》、《我的父亲贝利亚》、《普京文集》（2000—2002）、《普京文集》（2002—2008）等译著。发表有：《最近 20 年的苏联：发展、变化和问题》、《建立和发展新型的中苏关系》、《关于苏联 74 年社会主义实践和苏联剧变的历史思考》等论文。

黄立菲，1951 年生，北京市人。1986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导，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曾多次出访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所和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出访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中心、瑞士日内瓦大学历史系和斯拉夫语言与文明系、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大学院等。

从事苏联经济史、苏联计量史学、20 世纪俄国政治社会史的研究。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和重点项目多项。独著、主编、合著著作 7 种，发表学术论文、文章近百篇（其中在俄罗斯发表论文 4 篇），翻译著作 1 部。代表作：《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模式的历史考察》（主编）、《现代化之路：俄罗斯、中国、东欧改革比较研究》（主编之一）、《苏联史学理论》（第三作者）、《历史学家与数学——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译著）。现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维埃社会”。

黄宗良，1940 年生，广东省潮州市人，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先后到苏联、东欧、日本、美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讲学和学术访问。1989 年起任教授，1993 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俄关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政治学、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体制改革的教学和研究。主编和独著有：《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易》、《世界社会主义史论》、《政治学原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历史、理论和评价》、《共产党和社会党百年关系史》等 10 余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多次获北京市和北京大学优秀论文、优秀教材、优秀教师奖。2008 年获北京大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百项精品成果奖”精品奖。2010 年其主编著作被评为 2006—2008 年全国优秀党建读物。2004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曾彦修，笔名严秀，1919 年生，四川省宜宾人。1935 年冬在重庆北碚兼善中学毕业后，进入成都市联中高中部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赴延安，1938 年 1 月先在陕北公学学习，3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延安马列学院第 1 班学习，后留院做教学工作，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1941 年 6 月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4 年 4 月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 1949 年秋南下广东。50 年代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54 年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主持工作。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领导工作，1979 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曾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第二届顾问。1941 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严秀杂文选》、《全国杂文选粹·严秀卷》、《审干杂谈》。主编有：《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当代杂文选粹》丛书、《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鲁迅选集》（两卷本）、《青年杂文选》、《牵牛花蔓》（获全国 1995 年—1996 年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等。

蒲国良，1966 年生，河南省柘城县人。先后就读于河南大学、山西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

务理事。主要从事苏联政治与社会发展史、中苏关系史、中国外交史、世界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 1956—1965 年的中苏关系》、《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合著）等。主编教材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联合主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联合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概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苏大论战史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研究”等。

戴隆斌，1962 年生，湖南省新化县人。1981 年 9 月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85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免试录取为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攻读世界地区史苏联史专业，1988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 年 6 月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现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世界所综合处处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副主编、中央编译局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编译局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

从事苏联历史、当代俄罗斯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和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主要著述有：《斯大林传》（专著）、《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5 卷（主编）、《欧美共运风云录》（副主编）等，参与写作或翻译的著作有 10 余部，发表《苏联罗名制的形成、特点及其影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评析》、《中俄腐败问题比较研究》、《俄罗斯共产党的现状、问题及前景》、《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与问题》等文章 60 余篇。

苏联真相

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阎明复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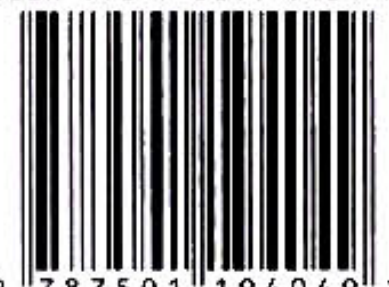
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

——李凤林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上架建议：世界政治

ISBN 978-7-5011-9404-9



9 787501 194049 >

定价：246.00元（全三册）